【企鹅版】

西方经济学史

从古希腊到21世纪初的经济大历史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conomics

罗杰·E. 巴克豪斯 ⊙著
Roger E. Backhouse
莫竹芩 袁野 ⊙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conomics

以故事论说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

纵览经济发展历程，体悟大师核心思想

这是一本讲述从古至今的经济学大师思想的书籍

一本由享誉世界的企鹅出版集团出版的经济学历史通俗著作

条理明晰，可信又可读

在同类著作中，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核心书籍

ISBN 978-7-80700-123-2

9 787807 001232 >

ISBN 978-7-80700-123-2

定价：39.80元

陈列类别 ◇经济 ◇思想史

【企鹅版】

罗杰·E. 巴克豪斯 ⊙著
Roger E. Backhouse
莫竹芩 袁野 ⊙译

西方经济学史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conomics
By Roger E Backhouse
Copyright © 2002 By Roger E Backhouse
由英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在英国首次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7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3-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经济学史 / [英] 罗杰·F 巴克豪斯 著. 莫竹芩 袁野译.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2004.6
书名原文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conomics
ISBN 978-7-80700-123-2
Ⅰ西… Ⅱ ①罗… ②莫… ③袁… Ⅲ 经济史-世界 Ⅳ 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4118 号

西方经济学史

作 者 [英] 罗杰·E.巴克豪斯 (Roger E Backhouse)
译 者 莫竹芩 袁 野
责任编辑 柯祥河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印制 周松涛
印刷装订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75
字数 25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80700-123-2
定价 39.8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以故事论说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

纵览经济发展历程，体悟大师核心思想

经济学是一门按照模式进行思维的科学，而模式本身又夹杂着艺术，这种艺术就是能选出适合当前世界的模型。出色的经济学家十分稀少，因为要运用“有准备的观察”才能捕捉到好的模型，尽管这种天赋并不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能，但却显得十分难得。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前　言

本书讲述的是人们试图去理解经济现象的历史。它所讲的内容有多种叫法：经济思想史、经济观念史、经济分析史、经济原理史。除非偶然，否则它并不关注经济现象本身，只关注人们如何试图了解现象背后的意义。如同哲学史或科学史一样，它是知识史的一个分支。为了点明核心思想，本书的主题不是工业革命，也不是大企业的兴起抑或大衰退，而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以及许多不那么知名的人物，是如何感知和分析经济社会的。

经济思想史的写作糅合了形形色色的故事。显然，讲述曾经作过这番思考的人的经历，也就是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是很有必要的，同样也有必要涵盖经济史。例如说，自然科学家可以假定，如今的原子结构和 DNA 的分子结构同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的一模一样。经济学家却无法作比较性的假设。经济学家面对的这个世界，即使和过去一个世纪相比，也已是沧海桑田。（或许人类对于“人性”的感觉始终如一，但它的确切意思和内涵并不清晰。）政治史也很重要，因为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之间难舍难分，而且一直以来，经济学家经常或不经常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他们努力影响过政治，而政治事务也影响过他们。最后，有必要考虑一下与之相关的学科的变迁，以及它身处的知识氛围的变化。经济学家的预见和思维方式必然是由他写作时的整体文化形成的。因而写经济学史，

必须触摸到宗教史、神学史、哲学史、数学史、科学史，触摸到经济学和政治学。

各类历史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问题因此复杂化了。例如，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史或政治史与经济思想之间存在单一联系。经济思想为政治提供了养料，影响了经济中的事件（虽然不一定按照其始作俑者的意愿）。这三类历史互相依存。同样的道理，经济史与知识史之间的联系更加普遍。经济学家们努力将所学的科学知识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学科课程中，不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还是牛顿或达尔文的科学。他们受到启蒙运动、实证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哲学运动的影响，也受到我们全然没有意识到的一切事物的影响。然而，各学科的联系也按照另一种方式运行。比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就深受马尔萨斯经济思想的影响。一言蔽之，经济思想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至少直到最近，经济学还不是由一群名叫“经济学家”的专家从事的一项活动。正是这个因素，推动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以及普遍意义上的智力生活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现代的学科界限其实并不存在，同样，社会上大学的作用已经变得几乎面目全非。神学家、律师、哲学家、商人和政府官员，都是有责任发展经济思想的人。他们有些人担任学术职务，很多没有担任。举个例说，亚当·斯密曾经是道德哲学家，他的经济观念植根于道德哲学，却形成了广泛得多的社会科学体系的一个部分。进一步说，撰写了经济文献典籍的那些人，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些社会担任过各式各样的职务，所以说，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进行跨越时代的比较。当 13 世纪的学者乔巴姆的托马斯（Thomas of Chobham）写到贸易和金融的时候，他正在为听忏悔的牧师们带路。或许他今天的同事不应该钻研现代经院

派经济学，而应该研究罗马教皇的通谕。杰勒德·马里内斯（Gerard Malynes）和托马斯·芒（Thomas Mun）都曾在17世纪的英国撰写经济著作，他们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商人，但我们认为他们对于我们理解外贸和汇率有所贡献。或许我们应该把他们看做国际货币组织的雅克·波拉克（Jacques Polak）、金融家詹姆斯·戈德史密斯（James Goldsmith）等人的先驱。

当我们撰写任何一部涵盖时期超过了上个世纪的经济学史论著的时候，唯一可行的做法是，从浩若瀚海的文献中，从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环境下写作的文献中精挑细选。的确，关于历史，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看看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目的而采纳的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就是说，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过去的学者，不要搞得好像他们是现代经济理论家似的。

什么是经济学？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基础是我们知道经济学和经济现象是什么。其实经济学极其难以界定。本门学科应用得最为广泛的定义恐怕要算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给出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这里的人类行为是指目的和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两者可以替换使用。"人们不是把与经济学相联系的那些现象（价格、资金、生产、市场、讨价还价）看做稀缺性的结果，就是看成人类试图克服稀缺性问题的办法。罗宾斯的定义距捕捉到一切经济问题的普遍特性还很远，可它代表了阐述这些问题的本质的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具有限制性的观点。比如说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的经营活动，或者降低大规模失业的政策方案，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们有利用稀缺资源的含义？罗宾斯的定义是1932年下的，那时正值经济大衰退高潮，全世界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都是巨大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在闲置，他的定义恐怕令人啼笑皆非。

更接近本质的定义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大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的。他把经济学定义为对人类日常商业生活的研究。他这话的意思我们了解，也很难表示反对，虽然这定义非常模糊。精确地说，经济学是处理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问题，或者再精确些，它是如何组织生产，以便满足人类需要。还有一些人把经济学定义为选择的逻辑，或者是对市场的研究。

这些定义表达了一些含义，但或许同样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含义没有表达出来。经济学的论题没有被界定为物品的买卖、市场、企业的组织、股票交易甚至货币。这些都是经济现象，可有些社会里未曾发生这些现象。例如，可能在有些社会，货币并不存在（或者只执行某种礼仪职能），也可能在有些社会里，生产不是靠企业，或者交易不经由市场进行。这些社会也面临经济问题——如何生产物品，如何分配，等等，但是我们通常与经济生活相联系的那些现象消失了。更好的办法是，把企业、股票交易、货币之类的现象视为为了解决更基本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制度。因此，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些更基本的问题联系起来定义经济学，而不是与只存在于某些社会的制度相联系。

任何人撰写系统性的《经济学原理》，都必须选定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定义，并在这个定义的范围内写作，经济史学家却无需如此。相反，他们可以从造就了现代经济学的那些思想开始着手，也就是从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被发现，又在被认作经济学家的那些人手中

得到发展的思想着手。然而，这些思想并不提供一个精确的定义，因为这门学科的界限根本模糊不清。学者、记者、公务员、政治家和其他作家（甚至小说家们）全都在发展和研究经济思想。并且，不仅是“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管理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在分析。在这个事实面前，经济学的界限愈加模糊了。（职业经济学家们可能不把这样的写作看做“好的”或“严肃的”经济学，它可能受到虚妄论点的牵引而信马由缰，可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它仍旧是经济学。）以这种十分实用的方式研究这门学科，较之按照经济学的论题来下定义，似乎不那么讨人喜欢。可实际上，即使历史学家专门按照经济学严格的分析性定义开展工作，它仍然是可行的办法，而且或许还与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实际做法有相似之处。

既然决定了是什么构成了现代经济学，我们有可能回顾过去，追根溯源，查找已知思想的源头。有些源头显然指向本学科之外（比如牛顿力学或宗教改革），经济史学家们将不再深究。另一些则指向经济史学家们依旧归于经济学范畴的一些观念，只是它们的表现和内容可能与现代经济学大相径庭。这些将被归到经济史中。这样选择的结果是，我们回溯历史越深，某些观念是否属于“经济”范畴就越具有争议性。当人们一如既往地争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是否是经济学的“创始人”的时候，他们是在说，早先的学者不应该被视为经济学家。

这就提出了经济学史写作中的两大问题：应该从哪里入手？我们观察过去的视角有没有因为透过现代经济学的镜头而发生了扭曲？

有些历史学家举证说，不到进入现代社会（例如 15、16 世纪），抑或不到 18 世纪的亚当·斯密把前人的工作系统化，就不算

开始了“正式的”经济学。这种论点称，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以及人们通过市场发生交往，并针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的学科。它称，早期的学者关注的内容截然不同，他们关注道德问题和神学问题，诸如市场交换，有息借贷的公平与否，他们的工作不该归到经济学来。

然而，这种论点存在一个大问题：什么构成经济分析，什么不构成，或者什么构成“正式的”或“真正的”的经济学，什么不构成，这中间做不到泾渭分明。举个例说，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就商业活动的公正性提出的道德和神学上的论点，是以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为前提的。这些写作的经济内容或许半藏半掩，或许含含糊糊，但它的确有。本书的基本观念是，即使在太古时代也存在经济思想，而且那些古代思想关系到如何给现代经济学的起源定位。进一步说，甚至在本世纪，经济学分析的一些规范性问题，与古人所展开的也能对应起来。经济学家永远在为这个那个政策能否改善社会福利而争个不休。加入伦理道德因素考虑这类问题的做法，可能不时兴了，但不管怎么说，道德前提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一如它是亚里士多德考虑市场问题的基础一样。《旧约》和《荷马史诗》一样，都蕴含了许许多多经济思想。一部经济学通史不必对这些书多有赘言，但它确实是来龙去脉的一部分。

我的论点一言蔽之：经济学没有开始，没有“创始人”；我们如今视为经济学一部分的那些问题，前人也一直在思考。在本书中，我从古希腊讲起，从《旧约》的世界写起，因为我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但那地方并不代表经济思想的开端。

透过现代视角回顾过去

上面标题指出的方法，着眼点在所谓的“经济思想的起源”，如今这方法不时髦了。在后现代社会里，你必得强调各种观念的历史关联，同时谴责任何透过现代视角观察过去的努力，才算时髦。然而，不论谁撰写经济思想史，都有必要从某种程度上借用现代视角，回顾过去。仅仅把注意力放在“经济”思想上，等于是依照现代分类法去分拣过去的思想。不管我们多么努力要这样做，都无法彻底摆脱我们试图回答的这些问题的前提。更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彰显地陈述这些前提，而不是假装它们不存在。本书的目的是解释经济学是如何发展到21世纪初的这个状况的。

写一部符合大众标准的“重要的”经济学史，是惯常的做法。可这么做只是依赖前人所下的判断，却不能避免因个人利益而影响其材料的选择。经济史学家往往从某个传统标准，即一系列先前的经济学代表作、代表人物和代表事件着手，接着加以修正，在某些位置多加强调，某些位置又略作减轻，以便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和发现的线索作出回馈。随着经济学的变迁，那些构成适当标准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

透过现代视角研究过去，能引出很多故事来，可这些故事构成了极其没有说服力的历史。当历史学家的故事说的是历史如何从原初的开端发展到他的朋友、同时代人或其他英雄所触及的“真理”，就产生了所谓的“辉格历史”。这个名字起源于19世纪的辉格党人，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讲述大不列颠的历史的，读者们自然对此

持怀疑态度。不管怎么样，许多经济学家在分享辉格党人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还写了不少经济学史的著作。他们很难承认，自己这一代的（他们本人可能为之作出过贡献的）理论和手段可能并不比前人的高明。批评家称，这种方法忽略了重大的历史问题，结果往往是丑化了实际事件。他们批评得对。

不过，以古鉴今不一定意味着把历史当进步来讲。思想的实际进化过程当中，既有历史事件、利益的归属，也有歧视、误解、错误以及一切不宜算作进步的事物。而历史情节所包含的问题，可能从如今被视作经济学的行列中渐渐消失了，或者挪到其他行列去了。当我们回首过去，可能发现先人提的问题和我们提的不一样，说不定古人的问题连我们都觉得很难理解，于是，历史是不是在进步，值得怀疑。

本书的叙事

这本书的叙事明显反映了一些传统观念，正是这些观念构成了经济学。某些话题之所以包含在内，是因为它们“显然”应该在。如果书中不说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些人的话，出版商（不是指广大读者）会不高兴的。人们对经济学史这个名词的一般理解就是如此，只有这么写，大家才认为它是经济学史。然而，这本书偏离了各式经济人物的相对重要性这个传统标准，也偏离了它所涵盖的许多话题的传统标准。它还努力把人们放在一个适当的历史背景——一个大家或许认可的背景中。

这本书并不像过去惯常的一样，围绕“各位先贤”做文章。各章节一般从对历史背景的讨论开始，然后延伸到在此背景下出现的经济思想。全书穿插地强调经济史、政治史和知识史，但一般来说不会比它所展开的故事突出。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在有些时期，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区别并不分明，这时候，讨论经济学之外的一些观念就尤为重要。随着经济学的发展，20 世纪成为一门学术课程，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才越来越多成为学科范畴之内出现的问题。另外，这本书自始至终强调产生经济思想的社会及环境，而不单纯强调个人，不单纯强调大致可称为经济学界社会学的内容。经济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抑或更精确些，反映在经济事务上的人的地位）一直在改变，经济思想的发展方式因而受到影响。因此，研究早期材料的各章节多涉及通史。但随着故事的开展，经济思想逐步突出，通史的分量越来越小。到了 20 世纪，经济学业已成为主流学科，这时候，经济思想所发生的变化，根本原因出在学科内部。

本书的确涵盖了传统标准，可又有很多方面挑战了传统标准。伊斯兰世界被收入中世纪这一章中。政治哲学和霍布斯哲学理论的挑战成了讲述 17 世纪英国的一章中的重要部分。本书把斯密看做道德哲学家，放在苏格兰启蒙运动里讲。我所描绘的马尔萨斯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学家或人口统计学家，还是对于现代政治议题有所贡献的人。19 世纪初法、德学者的理论贡献和英国同行的放在了一起。张伯伦则放在美国工业经济学那一章讨论，而不在英国成本论那一章。这些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应该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20 世纪成了整个叙事的主体，几乎占了一半篇幅。为了涵盖这个世纪，我力图给出尽可能博大的一幅画卷。既然我的主要目标是解释这门学科是如何发展到时下这个状况的，所以我突出讲述了其理论

“核心”之下的各种发展进步。然而，这些发展还不构成整个叙事。

整个叙事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本书所涵盖的各个时期的专家论著。上一段提到的“革新”便全部取自这些著作。我能够偏离传统叙事的地方越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的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近期著作就越多，20 世纪尤其如此。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1)

第 1 章　古代世界 …… (1)

荷马与赫西俄德 …… (1)

地产管理——色诺芬的《经济论》 …… (4)

柏拉图的理想国 …… (9)

亚里士多德论公正和交易 …… (11)

亚里士多德与致富 …… (15)

罗马 …… (17)

小结 …… (20)

第 2 章　中世纪 …… (22)

罗马的衰落 …… (22)

《旧约》时期 …… (24)

阿威罗伊 …… (28)

伊本·赫勒敦 …… (31)

从查理·马特到黑死病 …… (34)

12 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大学经济学 …… (36)

柯勒斯姆与《货币理论》 …… (43)

小结 …… (47)

第3章　现代世界观的出现（16世纪） …… (48)

文艺复兴与现代科学的出现 …… (48)
宗教改革 …… (51)
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兴起 …… (54)
重商主义 …… (56)
马基雅维里 …… (58)
萨拉曼卡学派和美洲的财富 …… (59)
都铎王朝下的英国 …… (61)
16世纪的经济学 …… (64)

第4章　17世纪英国的科学、政治和贸易 …… (65)

背景 …… (65)
科学与皇家学会的科学家 …… (66)
政治动乱 …… (73)
经济问题——荷兰的商业实力和1620年代的危机 …… (76)
贸易差额论 …… (78)
利率与自由贸易论点 …… (81)
17世纪90年代的重铸币危机 …… (86)
17世纪英国的经济学 …… (90)

第5章　18世纪法国的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 …… (91)

专制国家的问题 …… (91)
18世纪早期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 (93)
坎蒂龙通论商业的性质 …… (97)
启蒙运动 …… (102)
重农主义 …… (103)
杜尔哥 …… (108)
旧制度下的经济思想 …… (113)

第 6 章　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 (115)

哈其生 …… (117)
休谟 …… (119)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 (122)
亚当·斯密 …… (127)
分工与市场 …… (130)
资本积累 …… (133)
斯密与自由主义 …… (134)
18 世纪末的经济思想 …… (136)

第 7 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1790～1870 年） …… (138)

从道德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 (138)
功利主义与哲学激进派 …… (142)
李嘉图经济学 …… (144)
其他经济学理论 …… (148)
政府的政策与国家的作用 …… (155)
货币 …… (15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161)
卡尔·马克思 …… (165)
小结 …… (173)

第 8 章　欧洲的历史与理论的分裂（1870～1914 年）
…… (175)

经济学的职业化 …… (175)
杰文斯、瓦尔拉斯与数理经济学 …… (177)
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学 …… (182)
英国的历史经济学与马歇尔学派 …… (187)
欧洲经济理论（1900～1914 年） …… (193)

第 9 章　美国经济学的兴起（1870 ~ 1939 年） …… (196)

19 世纪晚期的美国经济学 …… (196)
约翰·贝茨·克拉克 …… (199)
数理经济学 …… (202)
索尔斯坦·凡勃伦 …… (207)
约翰·康芒斯 …… (211)
两次大战之间的多元主义 …… (213)
两次大战之间的竞争研究 …… (215)
欧洲学者的移民潮 …… (221)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经济学 …… (223)

第 10 章　货币与经济周期（1898 ~ 1939 年） …… (225)

魏克赛尔的积累过程 …… (225)
经济环境的变化 …… (228)
经济周期理论在奥地利和瑞典 …… (231)
从马歇尔到凯恩斯 …… (234)
美国传统 …… (239)
凯恩斯的《通论》 …… (244)
凯恩斯革命 …… (248)
二次大战后宏观经济学的转变 …… (251)

第 11 章　经济计量学和数理经济学（1930 年至今）
…… (254)

经济学的数学化 …… (254)
国民收入核算法的革命 …… (257)
经济计量学会和现代经济计量学的起源 …… (263)
弗瑞希、丁伯根和考尔斯委员会 …… (267)
第二次世界大战 …… (272)

一般均衡理论 …… (274)
博弈论 …… (283)
经济学的再次数学化 …… (286)

第 12 章 福利经济学（1870 年至今） …… (290)

边际主义 …… (290)
国家与社会福利 …… (292)
洛桑学派 …… (295)
经济核算之辩 …… (297)
福利经济学（1930～1960 年） …… (300)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 (304)
小结 …… (306)

第 13 章 经济学家与政策（1939 年至今） …… (310)

经济学职业的作用在扩大 …… (310)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计划 …… (312)
通货膨胀和货币主义 …… (317)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 (321)
发展经济学 …… (324)
小结 …… (330)

第 14 章 学科的扩张（1960 年至今） …… (333)

应用经济学 …… (333)
经济学的扩张主义 …… (335)
非正统经济学 …… (338)
新概念和新手段 …… (341)
20 世纪的经济学 …… (346)

后记：经济学家及其历史 …… (351)

1

古代世界

荷马与赫西俄德

柏拉图认为荷马培育了希腊，他那史诗般的诗歌给出了生活应有的价值观。在埃及发现的纸草纸古代文献，荷马的卷册超过了其他作家的总和。就连今天，赫克托、阿基里斯、特洛伊的故事以及奥德修斯之旅[①]还是构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现在还不清楚应该把《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当成某一个人的著作，还是许多诗人的著作集。不管是何种情况，它们都表示，公元前 750 ~ 725 年左右的某个地方记录下来了一部长篇口传习俗史。荷马的史诗与赫西俄德（公元前 700 年）的诗，都追溯到欧洲那段尽可能久远的历史。

---

① 赫克托，Hector，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勇士。阿基里斯，Achilles，源自希腊神话，传说他除脚踝以外刀枪不入。特洛伊，Troy，小亚细亚古城。奥德修斯，Odysseus，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曾指挥特洛伊战争，使希腊获胜。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描述的社会大概部分地反映了公元前 1400～1100 年前后特洛伊的迈西尼[①]社会（青铜时代），也部分地反映了荷马自己身处的时代。它是有秩序的，分等级的。它不依赖市场关系，却是靠财富的分配建立等级制度，这些财富来自赠礼、偷盗、竞赛的奖励、战利品、战败的城邦给予征服者的贡品。有人认为，如果希腊军队不是这样图谋于掠夺，特洛伊可能衰落得更早。荷马把贸易看做获取财富的次要手段和低等手段。他们的英雄是贵族的勇士，严格依据其头衔获得奖赏。赠礼则按照严格的互惠原则加以管理，交换礼物之前、之后以及交换的时候，参与交换的各方都应该是同一等级，这一点很重要。主人有责任殷勤地款待客人，并赠送礼物，而客人反过来也有责任在过后的某个时日向主人的家族回赠礼物。

这个经济体的基础是家庭，也就是地主及其家庭，再加上在某块地产上劳动的所有奴隶。主人和奴隶并肩劳动。荷马把繁荣看成是秩序井然、家庭富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存在对于超额财富的怀疑——家庭理当富有，但不要太富。当然，也有贸易商和手工艺者（我们读到，希腊士兵们用战利品交换粮食，手工艺者被带到某处地产上从事某项工作），可他们不如地产那么重要。即使奴隶获得了自由，一旦失去了在地产中的位置，也就失去了保障。与农业或军事掠夺手段相比，贸易被视为低等的致富手段。

赫西俄德的两篇代表作中，大家认为含有经济内容最多的是

---

① 迈西尼，Mycenae，古代希腊都市。

《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他以两个创世记故事开头。一个是著名的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另一个，毫无疑问地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记故事的影响，讲述了黄金时代诸神的后裔，从“远离疾病，没有辛劳”的状态，沦落到铁器时代，劳作和不幸成了家常便饭。赫西俄德就在这些条件下如何谋生给了读者很多建议。《工作与时日》是东方智慧文学传统下的一个诗篇，它提的有些建议，现在应该归到礼仪或占星学范畴，有些建议很实用，比如农业方面的建议，又比如为了防止海上迷航，应该何时起航的建议。作品辗转于两种建议之间，竟然不着痕迹。尽管两个故事落入了同样的传统，但如果同巴比伦人和犹太人的创世记故事相比较，赫西俄德的故事（和荷马的诗歌一样）还是较为世俗化的。宙斯带来了繁荣，而赫西俄德把道德和取悦宙斯看做人类必须应对的主要挑战，可这些故事是作者本人好奇心的产物，不是神职人员的作品。

从赫西俄德的作品可见，他已经意识到稀缺资源是一个基本经济问题。人类之所以必须工作，原因是“神把人的食品藏起来了，否则你轻轻松松干一天的活，就足够你一整年不干活了”。必须在（引向财富的）工作和闲暇之间作出选择。赫西俄德甚至建议，竞争可以刺激生产，因为它将使手工艺者互相仿效。不过，虽然这些观念在《工作与时日》中一目了然，但却没有采用这么抽象的术语来表达。赫西俄德把自己描述成农民，说他父亲一贫如洗，不得已背井离乡。毋庸吃惊，在他的眼中，引向繁荣的美德是勤劳、诚实、和平。他的理想是农业上的自给自足，没有战争来破坏农民创造的产品。这与荷马史诗中发现的贵族式的

轻视劳动和尚武精神相去甚远，可两位诗人一致认为，有土地才有保障。

赫西俄德的诗歌是最早提出经济问题的作品的生动写照。那些作品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见解，但浅尝辄止，很难说它们究竟有多大意义。

地产管理——色诺芬的《经济论》

公元前 7 世纪到公元前 4 世纪这个时期，见证了文学、科学和哲学的伟大成就。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 624 ~ 546 年）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水是存在于一切生命形式中的主要物质，而地球是漂浮在水上的一个大圆盘。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 610 ~ 546 年）绘制了当时的已知世界的第一张地图，还创作了据信是以散文形式写的第一份论文。他们的理论鲜有存世，所以我们知之甚少，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曾努力论证世界的本质，努力把自己从神话传说中解放出来。到了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 570 ~ 490 年）把理论和默祷当做净化灵魂的手段。尽管他致力于如今被我们视作数字神秘主义的形式，认为数字和比率都具有神秘的属性，他和他的追随者依然对哲学和数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公元前 5 世纪则见证了剧作家的出现，如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 525 ~ 456 年）、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 495 ~ 406 年）、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 480 ~ 406 年），还出现了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

485～425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400年）等历史学家。

这些发展造就了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354年）和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9～347年）身处社会的背景。这段时期完全没有经济数据，因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仅仅来自政治史。可我们知道，这段时期的经济如同荷马时代一样，依然依赖于农业，地产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可这当中的几个世纪又发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公元前594年，由执政官或公民首脑梭仑（Solon，公元前638～559年?）引入雅典的各项改革。这些改革剥夺了贵族的权力，以选举为基础，由有产阶级组成了400人的议会，形成民主制度的基础。土地实行再分配，将法律编成法典，建立了银币制度。雅典商人的队伍得到了壮大，贸易扩张了。由于雅典人出口物品，特别是橄榄油，换取了粮食，专业化的农业得到了发展。自给自足的旧理想开始瓦解。

虽然梭仑努力维持社会稳定，但他的改革还是造成了阶级分化和政治巨变。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逐渐卷入一系列同波斯人的战争中。公元前480年，雅典落入波斯人手中。此后，波斯人的舰队在萨拉米战败，次年，波斯军队又在普拉塔亚被斯巴达人打败，敌对状态这才告以结束。希腊海军的胜利造就了传奇，使雅典城逐渐成为由希腊各城邦组成的海军联盟的首领，有资格要求各城邦进贡。实际上，雅典就是帝国的中心，而它的主要对手是斯巴达。雅典的强大在于贸易和海上力量，而斯巴达的优势在于农业和军队。公元前431年，两个城邦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

争——终于打响了，公元前 404 年，以雅典的失败和海军联盟的分崩离析而告终。

从一系列波斯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 50 年间，雅典和平无虞。由此诞生的国泰民安的一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这个名字取自古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429 年），他从公元前 461 到 430 年领导了更为民主的政治派别。海盗被驱逐出东地中海，贸易欣欣向荣，带有商业性质的农业和制造业得到了发展，相伴而生的还有银行业、借贷、货币兑换、商品投机和垄断贸易，这些活动从现在看来是与商业社会相联系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绘雅典：“（它是）一个经济活动错综复杂的商业中心，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欧洲才堪以逾越。”这样造就的繁荣为帕台农神庙等雄伟的建筑项目奠定了基础。

雅典的民主是直接的，把所有公民，也就是雅典出身的成年男子都囊括在内。陪审团甚至由几百个公民组成，雅典的诉讼制度中，原告和被告双方必须为自己辩护，这个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人们必须具备捍卫各自利益，为自己辩解的能力。从此，人们需要雄辩家为他们训练了。雄辩家在城邦之间巡回穿梭，虽然他们的主旨是掌握公共演说的技巧，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信，他们的学生必须了解所有领域的最近发现。因而雄辩家成了古希腊第一批职业知识分子，也就是大学诞生以前的教授们。最早和最杰出的雄辩家是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 490～420 年），他执教 40 年，成绩斐然，后因怀疑神的存在而被流放。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 469～399 年）就是在“职业知识分子”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四处巡游，可以避开各个城邦的

法律和习俗。他们致力于抽象思维，虽然很多人也敬神，但对周遭的现象，他们又寻找非宗教的解释。苏格拉底以方法见长，善于追根问底。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柏拉图和色诺芬之流的能人做他的学生。然而，他也因此成了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云》（The Clouds）中的笑柄，这部剧作奚落他怀疑神是不是负责下雨、打雷。苏格拉底只字未提自己，我们对他的了解仅仅来自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当然也来自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对话。他们记录翔实，足可令我们满怀信心，但其实我们往往很难确知，哪些观念归功于苏格拉底本人，哪些是色诺芬或柏拉图借他之口。

色诺芬出身雅典上流阶层，和苏格拉底的所有学生一样生活优越。出于某种原因（苏格拉底于公元前 399 年被审判和执行死刑，他或许受到了牵连），他离开雅典，在公元前 401 年加入前往波斯的远征军，协助小居鲁士和兄弟争夺王位，遭到失败。如果我们信得过色诺芬对此次事件的记录，那么是他负责带领这支队伍回到了希腊。公元前 399 年到 394 年，他居住在斯巴达人保护之下的一处乡村庄园，替斯巴达作战，直到公元前 365 年，才回到雅典。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一生中较为安定的这段时期写的。

色诺芬的《经济论》（Oikonomikos），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两个词的起源。但这个词翻译成地产管理者或地产管理更为妥当。取字面意思看，它是说家政管理，“oikos”是希腊语的“家庭”，引申义是地产，色诺芬的《经济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管理农业财产的论文。书中也发现有和苏格拉底强调自律，教导人们行使权威等类似的文论，但主题还是组织的效率。既然

希腊人强调生产中的人性因素（这或许是奴隶社会的一个特征），他们也就把“有效的管理”解释成了“有效的领导”。

对一名有效率的领导人最基本的要求是，不管军事领域也好，农业领域也好，他必须通晓相关各领域的知识。色诺芬宣称，人们将追随他们视为卓越领导人的人，而“顺从”总比“逼从”强百倍。尽管他援引的是战例，但他认为同一原理适用于任何一项活动。对有效的另一个要求是秩序。色诺芬采用了腓尼基人[①]的三层桨战船（由三层桨驱动的一种船）来说明问题：船上的一切物品都装载妥当，负责人即使不在现场，也了解摆放情况。这便是财产有效运行的原理——有效地组织和计算库存。人们普遍相信，良好的组织可以产生双倍的生产力。

从这个角度看，色诺芬所强调的效率，似乎仅仅是把管理应用在农业财产而非现代企业的实践上。但他构想的“管理艺术”这个概念却比这宽泛得多，一直延伸到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问题上。他讨论到大居鲁士如何组织帝国的时候，明确说明了这个概念。他说，大居鲁士安排一名官员负责保护臣民遭到袭击，另一名官员负责改良土地。只要其中一个没能恪尽职守，另一个就会注意到，因为他们俩一损俱损。没有国防，就会丧失农业果实；而没有足够的农业产出，国家无以抵御外侵。虽然统治者给了官员们适当的刺激，但统治者仍有必要在国家所有事务上占有利益，农业和国防上均是如此。行政当局才是有效配置资源和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方式，而市场机制则不是。

---

① 腓尼基，叙利亚沿岸的古国。

色诺芬对分工的记录确曾引起后来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所以有必要提一提。他观察到，在一个小镇上，同一个工匠可能必须既做椅子、门、桌子，又做犁，但他不可能精通所有活计。而在大城市，需求之大，大到人们可以专门干其中的一个活儿，因而更加有效率。再回到地产管理上，色诺芬认为，分工可以应用于厨房，在这样的厨房里准备的饮食，比一个人包干到底的小厨房做出来的好。

色诺芬的模型是人们与自然的交互关系的模型，而不是人与人通过市场发生关系的模型。生产的效率关系到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以期获得最多产出的问题。他的世界是静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想当然地认为自然是已知的，为人所理解的。贸易和市场是次要的。这个时期的雅典已然取得贸易和商业上的长足发展，人们或许惊讶色诺芬为什么还和荷马当年一样，把农业财产当成经济活动的中心。但他的战士身份，和在斯巴达人的保护之下当了30年地主的经历，可以解释这一点。而对于他的一些同龄人，如此的解释就较难成立了。

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试图绘制一份理想国家的蓝图，当时正值公元前15和14世纪，政治骚乱席卷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经验告诉柏拉图，无论民主还是暴政都无法带来一个稳定的社会。民主社会的领袖并不做所谓公平的事，而是利用职务之便获得支持。反过来，暴君会利用权力增进自己的利益，而

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可完全没有领导，国家又会陷入混乱。对此困境，柏拉图的解决办法是创造一个哲学家式的国王阶层，即“守卫者”，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治理国家。这些人将是自封的，因为他们是唯一懂得社会组织方法的一群人。在理想国里，为了对这群人进行岗位培训，保证他们尽职尽责，还专门设计了一整套培养程序和生活方式。为了保证守卫者不至于腐败和追求个人利益，禁止他们拥有财产，甚至不能处理金银事务。他们将从社会的其余部分获取生活必需的工资。他们和暴君不同，必须置国家利益为首位。

柏拉图的目光关注社会的有效组织，关注基于理性原则而组织起来的公平社会。和其他希腊作家一样，他认为效率和生产中人的因素有关系。人们理当专心从事他们天生适合的活动，应当得到相应的培训。的确，城邦就是起源于专业化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他视资源和技术的实质性授予为理所当然。他的世界是一个静态世界，在其中，人人都有固定的位置。这个世界被毫无利益关系的统治者治理得井然有序。尽管他也看到了贸易的作用，但市场在他的理想国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许也有消费品的买卖，但财产将（根据算术原理）在城市之间合理配置。没有利润，也不支付利息。

这样的国家观念假设各个城市都保持小规模。柏拉图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认定一个城市最佳的家庭数是 5040 个。理由是，它可以被前 10 个自然数整除，因而可以分解为最佳数量的治理单位。城市保持小规模的想法与希腊城邦的经验之谈是一致的，它要受到农业用地和资源容量的限制。当人口增长，城市就会组

织一次远征，好发现殖民地。这个殖民地成为新的城市，希腊的生活方式在那里得以维持。这些殖民地往往独立于造就它的城市，整个地中海地区，特别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北非，都找得到这样的殖民地。

柏拉图是贵族，曾参与雅典的公共事务，打过好几场战役。早年他游历四方，访问过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团体。从中他或许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在西西里，他结识了叙拉古的统治者戴奥尼夏一世，此君公元前 367 年去世之后，他试图教授其子戴奥尼夏二世治国之术，却徒劳无功。公元前 375 年前后，他为了把政治家培训成哲学家，在雅典城外，以传说中的英雄阿卡德谟斯命名的一处林园里，创立了自己的柏拉图学园。和雅典雄辩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 436～338 年）几年前创立的重视训练辩才的学校不同，柏拉图相信，教授治理社会的原理更重要。他的几名学生后来成了统治者（暴君），柏拉图认为他的学园的任务就是为这些人进言。人们相信至少有一次，有一名暴君根据柏拉图的教导修正了治国方针。

亚里士多德论公正和交易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 年）是物理学家的儿子，也是柏拉图的学生。他 17 岁进入柏拉图学园，一直待到 20 年后柏拉图去世。

在很多人眼里，亚里士多德对后人的影响不过限于“哲学家”范畴。其实他的作品跨越哲学、政治、伦理、自然科学、医

药乃至几乎一切探索领域，并主导了这些领域的思想长达近两千年。他对于今天称之为经济的领域的贡献见诸两处：《尼各马科伦理学》（Nichomachean Ethics）的卷五和《政治学》（Politics）的卷一。前一本书中，他分析了公正的概念，在后一本书中，他关注家庭和国家的性质。

在雅典法律体系中，持有争议的双方必须首先找到一位仲裁者，此人会努力达成一项公平或公正的解决方法。只有当其中一方不接受仲裁者的决策时，争议才会诉诸法庭，法庭必须在双方诉讼请求的限度之间，或者在仲裁者的方案和受侵害方的诉讼请求之间，决定一个解决方案。《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五卷中，亚里士多德考虑了适用于这些争议的公正原则。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因为它立即明确了：一、亚里士多德考虑的是应当应用于司法决策的原则；二、他在处理个别的交易案例（即个体的买卖双方就特定的物品进行磋商），并不是处理在有组织有竞争的市场进行的交易。事实确乎如此，尽管截至公元前 14 世纪，雅典的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竞争性的市场还十分少见，相互间间隔甚远。大量证据说明，标准商品的价格曾经受到管制（连歌手的价格也被管制——即便某些歌手的服务深受追捧，也会通过投票得到配置），而制成品的产量或许变化莫测，于是和单独的交易一样，每一个商品的价格必须经过个别磋商。

亚里士多德谈到物品的交易和分配的时候，区分了公正的三种类型。第一是分配公正。这就要求依据美德按比例分配物品、荣誉或任何配给品。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很多物品，包括战利品、希腊拉夫里翁矿藏的

白银等，都是由国家分配的。亚里士多德给分配公正下的定义弹性很大，根据不同的设定，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界定美德。一场战役之后，战士的美德或许是用他们对胜利所作的贡献衡量的。而在合伙制下，公正要求依据个人所投的资本来分配物品。进一步说，评估美德可以有不同的前提条件：民主社会中，可能假设公民所获份额人人平等，而在暴政社会，人们会认为暴君的所得多于其他公民。第二类公正是经过矫正的公正，即补偿损失的一方，以便纠正先前的不公正。经过矫正，公平得以恢复。最后是互惠的（或可交换的）公正，或交易中的公正。

假设两个人交换物品，我们如何评价交易是否公平？古希腊普遍认可的一个办法是：自愿的交易必定公平。色诺芬以两个男孩为例——一个长得高，却穿了一件短外衣，另一个生得矮，却穿了长外衣，于是俩人交换外衣。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次公平交易，因为两个孩子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却认识到，在这样的交易中，公正并未决定独一无二的价格，而只是决定了卖方打算接受的最低价格和买方打算付出的最高价格之间一系列可能的价格。他的回答是两个极端价格的调和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具备这样的性质，假如公平价格比卖方接受的最低价格高出 40%，也就比买方打算付出的最高价格低 40%。公正也就是在不公平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均点。

所谓公正即找到合适的平均点的原则也适用于另外两种公正类型。分配公正涉及均衡，或者几何比例，同几何平均数有关。（两个数的几何平均数就是对它们的乘数开平方的结果。）经过矫正的公正涉及算术比例（补偿的数额应该和损失额相等）。因而

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把三种公正类型同三种他已知的平均数类型联系在一起：几何平均数、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这远不是偶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深受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影响。毕达哥拉斯曾研究出音符之间的数学联系，而且据信，类似的协调关系和比率也可以解释其他现象，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与比率、调和数之间具有如此密切的平行关系，是毫不奇怪的。

毕达哥拉斯数学对亚里士多德的交易记录的影响更为深远。截至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人们已经广为接受一切物质都由共同的单位组成的观点（原子论）。几何学基于零，算术基于“1”，以此类推，乃至这个物质世界。人们相信这意味着，不同现象是用同一标准衡量的，可以用类似于自然数之比的方式表示。这也正是发现了 π 等无法用比率表达的无理数之后，毕达哥拉斯学说受到巨大冲击的原因。以物易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得各种物品用同一标准得到衡量——比如可以用麦子量度鞋子。可假如鞋匠不想要麦子，农夫不想要鞋子，交换就不会发生，两种物品就不可能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如何得到解决？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货币。鞋匠和农夫可能不想要对方的产品，但他们都卖掉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也就是说，鞋子和麦子都可以通过其货币价格之间的比率加以比较。是需求使得物品可以用同一标准衡量，而货币扮演了需求的中介的角色。

亚里士多德与致富

不过，尽管金钱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根本，他仍相信，商业活动的常规作用的局限性还是显著的。他是在区分了两种致富手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第一种手段属于地产管理的范畴。像饲养哪一类家畜最有钱可赚，或者，是去种麦子还是去养蜂，这样的事情人们应该是知道的。这些都是获取财富的自然方式。反之，第二类是通过交换获得财富，是非自然的方式，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方所失是另一方所得。获取财富的非自然方式包括商业和高利贷（有息借贷）。介乎两者之间的则是采矿之类的活动。

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苏格拉底派的哲学家都主张，公民应当努力过上美好生活。这才是公民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独立城邦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由各自的地产提供物质资源。为了过上美好生活而增加必需的物品储备，属于获取财富的自然方式。虽然地产管理是十分基本的，但通过交易换取自家无法生产的物品，以及用自己的剩余产品交换更需要的产品，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特性，即需求是有限的。一旦衣食无忧，就不再需要积累更多的财富。高消费水平不再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获取财富的自然方式是有限度的。

商业之所以困扰亚里士多德，是因为它提供了积累无限财富的可能性。这一点雅典人心知肚明，因为城邦若能实现自给自足，固然十分理想，但雅典曾经发生几次危机，被迫从商人手中

筹措资金。一般而言，商人不是公民，所以用这种方式筹措资金等于离开公民范畴。令人迷惑的是，即使再有意义的事，商人和投机家也都可以放下不做，但他们依然想方设法创造出如此之多的财富，在危急时刻足以拯救城邦。这是怎么实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物品要么可以拿来用，要么拿来交换。其中，前者是适当的自然的过程，一如人们互相需要对方的物品，而进行交易一样。另一方面，仅仅以赚钱为目的的交易是非自然的，因为物品没有被用在适当的用途上。利用交易创造财富，说明财富是可以无限制地积累的，交易活动的非自然性就是这样暴露出来的。而亚里士多德相信，无限的财富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人可能坐拥金山，却苦于缺乏食品而活活挨饿。

适当地获取财富以及纯粹为了赚钱而交易都是有限度的观点，同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论十分吻合。财富的自然获取法的精髓在于，它使得人们在城邦里过上美好生活。它目的清晰，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求财富。同样的，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谈到公正问题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一种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并非产生于任何类型的邪恶，诸如自我放纵、怯懦、胆小、愤怒、坏脾气、卑鄙，而仅仅来自以从收获中赢得愉悦为动机的活动”。通过这个区别，人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分离出了生活的一个方面——一个他正试图描绘为“经济的”那个方面，那就是赚钱。可意味深长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这个方面当做我们如今视为经济活动的那些活动的重要部分，因为生产和贸易的最重要的几个类型被他排除在外了。更意味深长的是，他并不认为市场和营利活动可以为管制社会提供某种机制。秩序

的产生并非来自个体追逐各自目标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效的治理。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从事传道授业。公元前 342 年，他被任命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公元前 335 年，他回到雅典，创立了吕克昂学府。最终摧毁了希腊各城邦的独立性的人正是亚历山大。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他把马其顿帝国扩张到希腊的各个角落，扩张到埃及，穿过印度洋直取大部分波斯帝国，希腊城邦因此被削弱了。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较为短命，公元前 323 年他去世之后，就分崩离析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把希腊文化传播到整个古代世界。独立城邦的时代过去了，沿着先它而存在的波斯帝国和埃及帝国的路线，这个帝国的治理方式依然在延续。希腊语成了官方语言，在各个城市里流传（虽然乡村不讲）。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城市，希腊的数学、科学、医学和哲学正欣欣向荣。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虽然根植在希腊城邦，却赢得了广泛得多的读者。

罗　马

亚历山大去世之际，罗马共和国还只控制了意大利半岛西海岸的一小块区域。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这个共和国成长为帝国，覆盖了欧洲的大部分及北非。公元 14 年，奥古斯都[①]去世时，罗马帝国已经从西班牙扩张到了叙利亚，从莱茵兰延伸到了

---

① 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 63 年～公元 14 年，原名屋大维，恺撒的继承人，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

埃及。图拉真[①]统治时期（98～117 年），版图扩张到最大。虽然北方的版图主要丢给了法兰克部族，但大部分疆界依旧保持到公元 4 世纪末。道路、城市和其他主要的公共工程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修建起来。罗马无疑是当时的西方世界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文明。

罗马诞生了征服世界的军队，诞生了足以令后人见其残垣断壁而心生敬畏的建筑。拉丁语渐渐成了欧洲受教育阶层的语言。然而帝国的中心一直在东方。罗马靠埃及提供粮食。帝国最大的城市和最多的人口都位于小亚细亚的东部省份，而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依然是乡村。帝国的文化中心也在东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安提俄克、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希腊化城市，在那里，希腊人继续取得科学和哲学上的进步。罗马学者很乐意承认他们受了希腊人的恩惠，结果，人们普遍相信罗马人对于经济学贡献甚少。他们一直被称为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是工程师而不是科学家。尽管他们的贡献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难以媲美，但上述观点实在有失公允。罗马学者的贡献体现在别的方面，其中的解释即将从罗马社会结构中找到。

罗马帝国的政体把政治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军队联系在一起。战争与征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士兵的奖赏便是获得转让的土地，伴之以政治权力。为了捍卫自己的财产，人们期望罗马人心甘情愿地去披荆斩棘，流血牺牲。而有钱人，有更多财富要捍卫的人，理当面对最严重的危险。穷人很少从战争中有所斩获，

---

① 图拉真，Trajan，公元 53～117 年，古罗马皇帝。

因此既不应该要求他们纳税，也不该要求他们去打仗。贸易提供了通往财富的路线，可这一类财富要想带来政治权力，就得转化为土地才行。因此，土地才是财富的杰出形式。

在罗马帝国，特别在上流阶层拥有最多信徒的两种哲学流派，都起源于希腊。一个是犬儒主义哲学，创始人是西诺普的戴奥真尼斯（Diogenes of Sinope，约公元前 410～320 年）。它的分支斯多葛哲学由西希昂的齐诺（Zeno of Citium，约公元前 335～263 年）创立。斯多葛哲学的最后一位诠释者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公元 121～180 年，161～180 年在位）。犬儒主义和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 341～270 年）后期的教义一样，都强调此地此刻。把需求降低到最低程度，生活状况连平头百姓都觉得窘困不堪，唯有这样才会脱离欲望。斯多葛哲学则相信，幸福并不来自物质财产，是来自善。德行是唯一的好东西，一个人要做到最好，才没有遗憾。犬儒主义和斯多葛哲学都认为，美德具有这样的本质。因此他们都主张自然法，认为人类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由自然法加以判断。

自然法的概念适用于整个人类，为法学这个领域提供了基础，而法学或许是罗马人对社会思想作出的最大贡献。罗马法律对后来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许多重大经济思想在罗马商业法中得到了阐明。罗马人非常尊重财产，他们的法律包含了许多捍卫所有权的条款。有限公司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律，意思是独立于参与者而存在的实体。契约方面的法律则允许人们开展贸易，保障财产，并准许转让财产。然而，虽然贸易得到许可，但和来自地产的财富比起来，从贸易获得的财

富依然更有争议。当时总有一种认识，以为贸易财富似乎来得无端由，以某种方式被玷污了，而衍生于土地的财富就不会。克己思想出现在诸多商业法中，是理性这个概念的起源。

如果各方一致而且自愿地赞成一项契约，则这个契约必然公平。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是个特别重要的思想。因为不是说执行了哪一个仪式或规则，契约就可以生效，生效的唯一条件是各方必须一致赞成。它关注的是发生自愿行为时的环境，关注在哪个点上会强迫发生不自愿行为。如果有人可以说明他曾在胁迫下达成一项契约，便可能因为他没有自愿达成契约而废止契约。然而一般而言，只有当某种威胁足以吓倒一个意志坚强的人的时候，这种威胁才会导致契约失效。这种威胁一般必须是暴力威胁，但也不尽然。故意欺瞒也会导致契约失效。例如，如果有人在所提供物品的质量方面受到误导，他就没有真正赞成这项契约。不过，就一项契约进行一般的讨价还价还是允许的。

小　结

古希腊世界甚至古罗马世界看似遥不可及，却发展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希腊哲学对整个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谈到的经济思想还只形成了这个传统的冰山一角。我们的推理思路回溯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论证了共相的存在——唯有通过抽象推理才能理解的各种理想的、纯粹的形式。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具体的事实才是根本，必须经过归纳才能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一般原理。这两种不同态度依旧困扰着现代经济学。罗马法

律也具有类似影响力。此外，经典著作至少一直到 20 世纪，还构成了许多经济学家教育生涯的重要部分，所以，今后各章谈到的许多学者都受到它们的直接影响。

古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给自足和孤立的交易。当这些交易的条款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控制范围，很自然的，注意力就应该放在交易的公平与否上了。然而，尽管那时候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商业活动依然发达而且显著，足以向现代发起意义深远的挑战。整体而言，我们所了解的那些思想家都对商业持怀疑态度。公正与商业道德这两个主题主宰了经济问题的讨论过程，直到 17 世纪，人们才渐渐接受市场经济这个新事物，渐渐承认经商是需要天分的。

2

中世纪

罗马的衰落

传统认为，古代世界以罗马及罗马帝国的衰落为终结。这个过程说来话长，它的末日一般定在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衰落之日，但帝国的东部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为基础，又延续了 1000 年。一般认为现代世界是从 15 世纪开始的。这是一个文艺复兴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典人性，葡萄牙的探险家们发现了新世界和通往远东的海上航线。1453 年君士坦丁堡败给土耳其人的那个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两个时间之间的那段岁月，就是所谓的中世纪。

用这种方法计时的话，中世纪几乎涵盖了欧洲历史的 1000 年，在此期间，发生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深刻变化。脱离了宗教，是无法理解这些变化的。这里发生的关键事件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大帝（约 272 年或 273～337 年）于

312 年皈依基督教。在狄奥多西一世（约 346 ~ 395 年）治下，基督教逐渐成为官方宗教，非基督徒和异教徒遭受迫害。宗教和政治一连几个世纪纠缠不清，除了统治核心以外，其他人一般偏爱基督教的非正统形式。比如说，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相对帝国的官方宗教而言，属于异教）就曾在乡村地区广为传播。但自从罗马衰落，伊斯兰教出现以后，基督教内部的许多纷争便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掩盖了。

虽然野蛮的入侵者为罗马的衰落提供了流行的解释，但经济问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公元 3 世纪是帝国的危难时期。人口下降了 1/3，东方人的入侵殃及平民，是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黄金供给量下降了，可能是因为，帝国的征服行动一度是黄金的主要来源，可现在不再有新的征服之举了，也可能仅仅因为商业在衰退。随着黄金供给量的降低，帝国同东方的贸易极度萎缩。并且，既然帝国政权是靠军队维系的，而且城市里的众多人口需要靠食品分配得到安抚，于是税收涨了。当局必须时不时地征用食品，好供养军队和穷人。所需的资金，一部分是通过贬低币值才筹集到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货币还是纯银，可到了 250 年，银含量降到了 40%，到 270 年，更降到了 4%。接连几个皇帝努力从事过财政改革，达到极致的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243 ~ 316 年，284 ~ 305 年在位）301 年颁布的法令，力图固定价格和工资，可通货膨胀仍在继续。

罗马帝国最后几年中，城镇衰落了。这是一次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这个变化在中世纪时期更加显著。西罗马帝国的城市多为殖民城市，而东罗马帝国的城市更大，创造过许多财富。随

着贸易的衰退，西罗马帝国城镇的地位下降了，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撤离行动。圣哲罗姆（St Jerome，约 347～420 年）等基督教的苦行者放弃尘世的财产，退到不毛之地的举动，便是这次撤离的标志。

要理解中世纪的经济思想，仅仅理解前一章所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是不够的，还必须理解《圣经》中的经济思想。这就要回溯到《旧约》的那个时期。

《旧约》时期

早期基督教教会的经济思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犹太教。按照《旧约》的传统，人们认为压抑欲望是对付稀缺问题的重要途径。和古希腊一样，当时也对贸易持极大怀疑，对有息借贷满腔敌意。然而，经济学的《圣经》式教学方法还是有其特点的。人类被看做管家，负责将上帝委托之物尽其所用。工作是好事，是为人类所作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上帝告诉亚当，要繁殖和充实地球，就是在伊甸园，也要精耕细作。亚伯拉罕因其忠诚而受到丰厚的奖赏。这些文字描述的，可以说是神在恩赐经济增长，让人们积累财富。

《旧约》含有很多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禁止向以色列人索要借贷利息；只要奴隶工作 6 年，就可以获得自由，并给予足够开始新生活的资本。还有，每到第七年（类似安息日），所有债务一笔勾销，每到第五十年（大赦年），所有土地的所有权都将归还给最初的所有者。没有证据证明，大赦年的规定是强制执行

的，而且直到君主政体的那个时代（约公元前 1000～900 年）为止，当然还存在为数可观的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的原因之一是，国王强征税收，征用物品和强制服役。（穷人的处境是先哲们写作的主题。）不过，法律条款依然维持了人类仅是管家，而非他们土地的完全所有人的观点。

虽然财富是给予正人君子的奖赏，但《旧约》批评道，追求个人财富是把人们带离上帝身边。在摩西看来，崇拜金牛犊[①]是和崇拜上帝相矛盾的。同样，当以赛亚[②]写到以色列充斥着外国人和贸易商，（可能因此而）遍地都是金银财宝，他观察到，这片土地也满是偶像，人们在亲手做成的东西面前顶礼膜拜。《旧约》通篇写的是，增加个人财富总是和不诚实的商业活动以及剥削穷人相联系的。这种态度借先知阿摩司（公元前 8 世纪）之口得到了明确表达。

> 注意听罢，你们这些欺压穷人，把弱小的百姓赶尽杀绝的人。你们说："什么时候月朔或安息日才过去？我们好开仓卖粮？我们要缩小称量的容积，把物价抬高，用假秤骗人，连青糠也一起卖掉。我们可用钱买穷人，也可用一双鞋来换穷人。"（《旧约·阿摩司》8:4—6）

《旧约》以同样的方式，把放贷人和贸易商、零售商一并看做行为不轨之人，说他们预先索取利息，连外衣之类安眠所需的必需品都要剥夺掉（《旧约·出埃及记》22:25—26）。

---

① 金牛犊，the Golden Calf，古代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亦指作为崇拜对象的金钱。
② 以赛亚，Isaiah，公元前 8 世纪希伯来预言家。

因而，追求来的财富是要受到严惩的，它与服从神的旨意而产生的财富之间有明显区别。服从神的旨意，就是要像个负责任的管家一样工作和行事，这些行为远远不会定罪为经济活动。它反对的是做坏事，并不反对追求财富本身。但是，人们因为追求财富而被怂恿着做坏事，所以追求财富是错误的。因此，只要以色列人照顾自己的人，只要行为公平，《旧约》就鼓励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旧约·传道书》甚至鼓励人们从事外贸活动，对于如何承担（和规避）风险还提出了建议："把你的粮食送过海去，有一天你会得到回报。把你的货物分到7个冒险事业上去，或者8个，因为你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灾难。"《旧约》写的不是如何脱离世俗。只有当金钱成为唯一动机之时，人才会堕落。

《旧约》通篇讲耶稣，他的许多教义与犹太教的法律十分吻合。他用管家身份和冒险这样的词汇比喻人才，他教导人们，正直的人会得到奖赏。可他自己就是一个劳动者，他的追随者中，很多来自犹太社会的最穷苦阶层，毫无带来重大经济、社会或政治变革的希望。于是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放弃财产，并警告说，富人会发现自己不可能获得拯救。

《新约》强调的有所不同。对于早期基督教而言，特别是对于把基督教从犹太人的异教改变成向所有种族开放的宗教的圣保罗而言，基督的即将复活，世界末日即将随之而来。这就是说，《旧约》中发现的关于经济进步的思想被弃置一旁，就连管理好资源的重要性也被贬低了。保罗写道，有钱人不应该考虑持有财产，甚至也不应该花时间尽其所用。他的建议是，人们应该一如

既往地行事，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说明开创任何新的事业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此环境下，经济思想显然无以发展。然而，当人们渐渐明了，世界末日不会发生在最初的十二使徒在世的那段时期（据信，圣彼得已在公元 65 年被尼禄[①]迫害致死），于是，教会重新开始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新约》以后的各卷中有一些这方面的线索，尤其是在末卷《启示录》中。

因此，早期教会的神父们为《旧约》和《新约》中的不同观点左右为难。但总体而言，或许是受到同时代的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影响，他们倾向于脱离世俗。贫穷和超然脱离世俗财产的行为是受到鼓励的，隐士和圣人抛弃一切，归隐贫穷生活的例子俯拾即是。《旧约》给人下达劳动命令，理由是，懒惰将导致堕落。劳动受到崇尚是因为它能防止人们变懒，当然要是人们能抵抗诱惑，劳动就更好。

这段时期的杰出人物是北非的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 年）。他在《上帝之城》（City of God）里反驳道，罗马 410 年败给阿拉里克[②]和哥特人并不是罗马皇帝信仰基督教的报应。这本书之所以意义深远，是因为它展望了创建一个新社会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味地回顾保留或再造过去的社会。奥古斯丁不同于柏拉图，他不追求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蓝图，因为在人间创造一个完美社会是无法实现的。相反，他认为努力向一个完美社会靠近再靠近就是进步。

---

① 尼禄，Nero，37～68 年，古罗马暴君。

② 阿拉里克，Alaric，370～410 年，西哥特人领袖，曾三次率军入侵意大利，410 年攻陷罗马，大掠三日。

奥古斯丁论证道，财富是上帝的馈赠。不过，虽然财富是好东西，但不是最好的。它应当被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结局。虽然他认为最好干脆不要拥有财产，但他也认识到，不是人人都做得到这一点。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私人财产是完全合法的，但禁止人们爱财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会使人误入歧途。奥古斯丁以同样的方式区别了贸易商及其贸易：贸易本身没有错，因为它可能使本来得不到物品的人得到它，因而有利于人类，可贸易也容易被误用。罪恶存在于贸易商身上，不在贸易本身。不过，认为私人财产合法的这种教义同公共财产的自然法原理之间，依然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私人财产是国家的创造物，国家有权力夺走它。

奥古斯丁从希腊思想中汲取了很多观点，但他的视野广阔得无与伦比。色诺芬甚至亚里士多德仍在关注城邦或者城市国家，奥古斯丁却已经在研究由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协定来界定的一个种群了，这个种群是不论出身或地点的。社会要么进步，要么倒退，全看这种共享利益是何性质。他拓展了《旧约》关于发展的观点，使之与整个基督教界相关，而不仅仅与以色列相关。他还提供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事实证明，他的视角在西欧新兴社会中深有影响。

阿威罗伊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尽管这次事件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现状却鲜有改变。西欧出现的野蛮王国不打算颠覆罗马帝

国，却想成为它的一部分。他们依然尊敬罗马皇帝，但此时的皇帝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不在罗马了。导致古代世界终结的重大事件不是罗马的陨落，而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和穆斯林征服阿拉伯、波斯帝国、北非和西班牙的大半疆土。穆斯林跨越欧洲的进军一直到732年才被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阻截在普瓦捷。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社会与地中海中断了联系，必须重整河山。现在，叙利亚的贸易商并没有因为西罗马帝国的陨落，就从西欧消失了。相反，在穆斯林的土地上，贸易正欣欣向荣，一个伟大的文明建立起来了，它吸收了波斯文化，又补充了亚历山大带来的希腊文化。伊拉克的巴格达、埃及的亚历山大、西班牙的科尔多瓦等城市建立起了学习中心，希腊的遗产在欧洲其他地方遗失了，却在这里一度留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通过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的翻译，最先进入了讲拉丁语的西方。

这段时期伊斯兰教的经济文献分为两类：一是伊斯兰统治的“黄金时代”（750～1250年）的文献；第二类从随之而来的危难年代（1250～1500年）开始，直到摩尔人被赶出西班牙，欧洲国家开始发现之旅为止。文献的背景是《古兰经》。和《新约》、《旧约》一样，《古兰经》没有系统地探索经济学，但的确探讨了孤立但却现实的经济问题。它说，为了扶助穷人，收入和财产应当纳税。禁止对借贷取息。遗产是受到管制的，所以地产必须分作几份，而不传给某一个受益人。除此之外，很少有经济内容。虽然在那些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之下，这些规则代表了一种挑战，但伊斯兰社会十分传统，经济学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可以找到文献的两种主要类型。一

是所谓的“国君之镜”文献。这些镜书其实就是公开的信件，通常由学者们和维齐尔[①]撰写，向统治者描述有效而公平的政府的形象，并提出商业和公共管理最佳构建方案。经济意义上最进步的一个例子是阿勒迪马什基（Al - Dimashqi）9 世纪提出来的。他解释说，商人只要与产品盈余方或短缺方沟通，就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可他又论证说，为了有利于社会，商人必须避免投机，抑制聚敛财富的欲望。他可以取得正常的利润，但不应太多。另一类文献则关注城市或家庭的组织，是由律师和公务员们写的，有时也由负责保障市场有秩序地发挥功用的治安官撰写。他们分析了自由市场与调控市场及价格的欲望之间的矛盾。之所以想调控市场和价格，是因为短缺导致物品太贵，形成了危及城市贫民生存的巨大压力。这些作品常常探讨定价、影响消费的因素、物品的供给等经济问题。

阿威罗伊（Averroës，1126 ~ 1198 年）是伊斯兰杰出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他身处黄金时代临近终了的时候，生动描述了希腊遗产与伊斯兰思想之间的潜在冲突。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科尔多瓦担任首席法官，1169 年他也被任命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担任同一职务。他的一生，一部分是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度过，其中包括晚年给埃米尔[②]当首席医生。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评注大约是 12 世纪 70 年代在科尔多瓦写的，这些评注特别重要，因为正是通过它们，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亚里士多德才为基督教的西方所知。

---

① 维齐尔，vizier，伊斯兰国家尤指奥斯曼帝国的高官或大臣。

② 埃米尔，Emir，穆斯林国家的酋长、贵族或王公。

阿威罗伊对柏拉图关于有力统治者的理想颇有共鸣，但他同意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力图通过缜密的论辩，建立道德原则。这便使他和遵守宗教传统的人起了冲突，那些人不喜欢他对《古兰经》所揭示的道德进行推理来调和道德的方式。埃米尔一度把他赶出马拉喀什，焚毁了他关于希腊哲学的很多书籍。

阿威罗伊与亚里士多德分歧最大的或许要算他对待货币的态度。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货币有三种功效：交换的手段、价值的衡量手段、为了未来的交易而储藏价值的手段。对于这些，阿威罗伊补充说，货币还是购买力的储备：它不同于其他也可以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物品，它可以随时使用，而不必先卖掉。在货币是否为类同于其他物品的商品的问题上，他也持有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观点。阿威罗伊在 12 世纪写道，他认为货币的交易是理所当然的：缺了货币，经济就无法发挥功能，所以货币是独一无二的。亚里士多德就不这么看。他进一步说，出于两个原因，货币的价值必须是不可变的。第一，货币被用来衡量一切事物，必须是不可变的。第二，假如货币用来当做价值的储藏手段，那么其价值发生的变化就是不公平的。统治者降低铸币中的金属含量而造出来的货币，属于纯利，他什么都不做就获得了这个纯利，如同利用借贷获得利息一样，都不公平。因此阿威罗伊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统治者依其意愿而改变货币价值的惯例的观点。

伊本·赫勒敦

到了 13 世纪，形势变了。随着蒙古人进军欧洲，波斯的大

部分和小亚细亚落入了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手中。阿拉贡、卡斯提尔、纳瓦拉、阿斯图里亚斯都是中世纪西班牙王国信奉天主教的国王们，设法从摩尔人手中收回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这便是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年）的写作背景。他来自摩尔人与安达卢西亚人的混血家庭，自从塞维利亚落入天主教徒手里，一家就移民到了北非。他一生从业很多，当过公务员、法理学家、历史学家，还一度随埃及苏丹与蒙古征服者贴木儿（Tamerlane，即Timur，1336～1405年）商谈和平条约。他受过的科学、哲学教育在他那个时代算是非常好的。虽然他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与埃米尔、苏丹们来往密切，但他的西班牙出身使他对北非文明抱着局外人的态度。

伊本·赫勒敦的主要作品是一部文明史，他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都交织其中。这是一部关于社会科学或文化学的作品，他的写作目的不是引申出道德规则，而是对社会组织作出解释。他十分熟悉希腊哲学，但逐渐怀疑起十分抽象的理论思维来，因为它可以导致投机，导致人无法从过去的经验汲取教训。询问要做到详尽无遗，询问的结果才不会误导人。

按照伊本·赫勒敦的想法，文明是周期性活动的。一位历史学家是这样总结他的理论的：

一个新的王朝出现了，强大起来了，它的疆域扩大了。在这个疆域内，政令畅通，市民安居乐业，文明兴旺发达。工匠的人数增加了，劳动力分工愈加明细。部分原因是，人口和人均产出的增长带来了总收入的增长，带来了市场的扩大，而市场是得到政府支援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增长并不

因缺少努力或缺乏需求就停滞；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品味在变化，需求在增长，于是需求总是跟随供给的脚步。然而，奢侈的消费和闲适的生活削弱了王朝，动摇了士气，消弭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和美德。往往三四代人之后，统治王朝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瓦解了，增长因而停滞。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复杂经济体的衰落，以及更粗糙状态的回归。

尽管这番简述可能被视为政治理论，解释了王朝的兴衰，也尽管社会学的因素（比如比较贝都因人[①]的“沙漠”生活与“二流”城市生活的价值）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但经济因素同等重要。虽然分工对效率的作用、需求对品味的影响、消费与资本积累之间的选择以及利润（从而导致税收）对生产的影响，没有拿出来单独探讨，但它们作为故事的一部分，全都作了分析。

伊本·赫勒敦对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记录是一次显著的进步。如果与这段时期其他穆斯林文献放在一起，他的作品显示了对14世纪伊斯兰社会某些周期阶段上的经济现象的惊人理解。伊斯兰世界里，贸易和科学共同繁荣，像伊本·赫勒敦这样参与法律制度和政府治理体系的人，有能力利用各自的经验，承袭先人的传统，积累丰富的经济知识。可是，伊本·赫勒敦在伊斯兰世界并没有产生久远的影响。经济思想的下一轮重大发展即将兴起，而且恰恰在西欧，而不是北非。

---

① 贝都因人，Bedouin，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

从查理·马特到黑死病

伊斯兰的黄金时代正是基督教欧洲的黑暗年代。在南方，穆斯林控制了西班牙的大部分领土，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而9世纪的时候，斯堪的纳维亚人主宰了北方。涌进欧洲大部分地方的黄金流停止了，乡村丧失了自给自足的能力。可基督教的欧洲到底还是撑过来了。它的延续主要得益于两种机构或制度的发展。一个是小修道院，在那里，基督教得以存续。截至700年，欧洲其他地方的本笃会[①]修道院都落入侵略者手中，但基督教知识，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经典知识，终于在爱尔兰和诺森伯兰（在英格兰）的修道院保留了下来。等到这些修道院遭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洗劫时，基督教已经又传播回法国和德国。

第二个关键制度有时称为“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是许多年以后才杜撰出来的一个术语，在欧洲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因此务必谨慎使用。）在此制度下，土地的受让与军队联系在一起。威胁欧洲的入侵者是骑兵。为了抵御他们的入侵，有必要以波斯和拜占庭为鉴，招募骑兵，让他们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务必要特殊喂养，才能使战马彪悍体壮。波斯和拜占庭帝国为了供养这样的骑兵，一度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枯竭状况，这个问题现在被查理·马特（719～741年任法兰克的统治者）解决了。他把从教会没收来的土地赠与一个新的勇士阶层。这些接受了土

---

① 本笃会，Benedictine，即天主教本笃会，由圣本尼迪克特创建于公元529年前后。

地权力的人，反过来有义务应国王的召唤，在地里安置一位（或一定数目的）骑士。围绕这个制度，一整个以土地所有权与军队之间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查理·马特从英格兰和爱尔兰带来僧侣，重新组织法兰克教会。修道院建立起来了，比原先的本笃会更加清心寡欲。国家与教会之间形成了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联盟，最引人注目的标志就是统治者与罗马教皇之间签订的协约，以及查理大帝（742～814 年）在罗马的加冕礼。

军事力量和高度克制的宗教秩序共同为欧洲的扩张时期提供了基础。诺曼[①]的骑士征服了英格兰（1066 年）和意大利南部（1057～1085 年），又和克鲁尼（在法国勃艮第）的僧侣们一道，在组织从摩尔人手中“再征服”西班牙的行动（1085～1340 年）中发挥了作用。1096～1291 年间，受到教会鼓励，法兰克骑士及其追随者们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基督教国家。12 和 13 世纪见证了北欧平原的殖民化进程。骑士（条顿骑士团，即耶路撒冷的圣玛丽医院骑士团）和宗教界均牵涉其中。西多会修士或修女们[②]尤其活跃：这些修道院通常在更远的东方建立了殖民地，变荒地为沃野。以同样的方式，各个城镇也在更远的东方发展了新的城镇。其他城镇则由国王们建立。十字军东征使远距离贸易复活了，威尼斯等意大利贸易城市提供了大量的金融和交通手段，又开始在欧洲用黄金铸币。蒙古人征服了亚洲，建立了从东欧延伸至中国的一个联合的、宽容的、和平的帝国，

---

① 诺曼人，Norman，10 世纪定居在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的后裔。

② 西多会修士（或修女），Cistercian，该教会 1098 年在法国 Cistercien 创建。

使得同远东的贸易扩张成为可能。

然而到了14世纪，这种扩张停止了。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等领土被西方占领，东方的进军遭到阻遏。摩尔人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想方设法阻止在西班牙的再征服行动。按照法兰克模式组织起来的骑士们，竟是依照意大利贸易城市的模式在统治东地中海地区。弓箭手们，包括克雷西战役中的英国弓箭手们，开始打败身披铠甲的骑士们。贸易开始衰退，欧洲许多大银行从此倒闭。接着，1347～1351年，黑死病在全欧洲传播。人口下降了1/3，有些地区甚至减少了一半。劳动力变得稀缺，劳动者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十分普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控制劳动力的立法、教会收回失去的土地的努力，都盛行一时。封建社会一度是扩张的手段，现在变得保守而缺乏灵活性。

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大学经济学

在此之前，就在扩张过程当中，发生了所谓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或许与增长的繁荣、新生力量（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封建制度的松动，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有关，当时对于学习的要求在增长。不同于古希腊雄辩家的逍遥学派教师出现了。12世纪上半叶，皮埃尔·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年）是法兰西经院派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神学家，他主张理性，反对审查制度。欧洲一些地方曾经处在摩尔人控制之下，那里的人们是用阿拉伯语学习的，通过这条路线，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希腊典籍。阿威罗伊的评注受到了热烈追捧，西方学者们这

才认识了亚里士多德。这场骚动导致了一种新机构的诞生。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是最早的一批，截至 1400 年，又有了 53 所。

正是从这些大学诞生了当时的经济著作。大学的学者们以巴黎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机动的、国际性的团体。那里产生的经济学通常被称为“经院学派”经济学，首先关注的是道德。不过，即使是道德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要求人们思考经济活动的实际运作方式。

最早的经院学派经济学作品是从为告解神父制作的指南手册上发现的。那些指南写的是告解神父应当如何向前来忏悔的人们提出建议。因为许多神父对寻求精神指引的人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并不熟悉，所以这些书的经济学特征十分显著。乔巴姆的托马斯写的《忏悔大全》（Summa Confessorum）就是其中一例。这本书大约是 1215 年写的，逐渐成为所有成人至少一年一度前来忏悔的必读书。托马斯审视了各种职业的道德危险，其中就包括商人的，于是经济学进入了这本书的视野。他列举的资本的罪恶包括高利贷和贪婪。可他又强烈维护商业，以下是先前的许多作品都未注意到的：

> 商业就是为了以较高的价格卖出某种东西，而以较低的价格买进它。这件事情适合专业人士去做，即使他没有对早先买来、以后再卖掉的物品进行任何改进。是商人把某个地方富余的物品带到稀缺的地方，所以如果没有商人，就会有很多地区面临极大的需求。因此，商人除了索要他买这些物品所花的资本以外，还可以索要其劳动力的价值、交通费和

其他费用。如果他们对商品作了某些改进，也可以索要这部分价值。

接下来，他把商人放在与工匠平起平坐的位置，而在当时，工匠是深受欢迎的职业，因为耶稣的养父约瑟就是木匠。可托马斯又警告人们，欺骗顾客或者索要的价格多于公平价格，都是有罪的。

托马斯就高利贷问题提出了好几个论点。（1）借钱的时候，货币的所有权从出借人转移给借款人，因此高利贷是出借人利用属于别人的财产获利。（2）高利贷者出卖时间，而时间是属于上帝的。（3）为了获取利润份额而借给别人钱是有罪的，除非出借人也以同样的比例分摊费用和损失。托马斯不容许支付利息，以作为对出借人在借贷期间失去的机会的补偿。可他又接受出借人就借款人未能及时偿还贷款而发生的损失索要补偿。

欧塞尔的威廉（William of Auxerre，约 1140～1231 年）在此类思想上，迈出了显著的一步。人们认为，这位神学家 1230 年参与劝说了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不要查禁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威廉把道德放在自然法基础上，其意义是“自然理性规定人们，做事要么不假思索，要么不思虑过多”。一位现代学者这样写道：

> 要想过高估计这样一个概念对于社会哲学的重要性也难。它提供了一套多少是不证自明的理性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的论证就是在这个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这样的（假设在逻辑上正确的）论证达成的结论从理性上是有效的，但也是标准化的，因为它们以法律为基础。

威廉对私人财产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总结说这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其必要性服从于以下的条件：在需要的时候，有财产的人有义务与没有财产的人分享财产。经由类似的脉络，他论证说，利用强迫，包括利用借款人需要用钱的心理而可能产生的讨价还价的力量，会导致合同无效。并不因为借款人自愿签订合同，就可以说利息的支付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人们依然把大阿尔伯特[①]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 1225～1274 年）看成经院学派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两者都是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他们的作品问世的年代，人们不仅可以在忏悔手册中发现经济思想，还能从对彼得·朗巴德（Peter Lombard）的《教父名言集》（Sentences）和对亚里士多德的评注中找到。两者都是非常普遍的文献形式。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卷五中论述道，假如鞋子与食品的比率同鞋匠与农民的比率是相等的，或者假如房子与鞋子的比率等于建筑商与鞋匠的比率，就是公平的。这段话挑起了诸多争议，因为“鞋匠与农民”和“建筑商与鞋匠”的含义非常模糊。阿尔伯特对这段话有个评注，认为应该这样理解它的含义：用一个物品表示另一个物品的价值，应该既与对这两种物品的相关需求成比例，也与它们所花费的劳动力成比例：

> 正如用劳动力和费用比较农民和鞋匠，因此鞋匠的产品和农民的产品相比较……就共同付出的辛劳和麻烦来说，他们得到了充分的衡量。

---

① 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即阿尔伯图斯·马格纳斯，Albertus Magnus，约 1200～1280 年，德国经院哲学家、神学家，代表作《亚里士多德哲学注疏》。

……根据一件物品的价值与另一件物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进行交易……这个比例是就需求而言的，而需求正是交易的原因。

在第一句中，阿尔伯特说，鞋子和食品的价值应该与鞋匠和农民的劳动力及费用成比例。在第二句中，他引进了需求，作为应当决定相对价值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看的话，这些段落应该这样理解：他们解释了劳动力为何应当得到报偿。假如造床铺的人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以弥补自己的费用，就不会再造更多的床铺了。因此，价值应当既与对物品的需求相关，又和物品的制造成本相关。阿尔伯特以一个伦理问题开头，在亚里士多德写出的一个含糊不清的段落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一个社会要想获得所需物品，必须给出什么样的价格。

托马斯·阿奎那是大阿尔伯特的学生，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努力简化他的导师的作品，并将其分类。和阿尔伯特一样，他把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等神父们的思想糅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他关于财产的教导中有充分的体现。它囊括了经院哲学家们采用过的所有主要论点，其中又有很多源自亚里士多德。这些观点包括：要想实现自由，就需要私人财产；关心自己的财产多于关心别人的财产；私人财产产生秩序。不过，最能充分显示阿奎那糅合教父们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才能的，或许要算和平的论点。这个论点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但阿奎那论证说，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人类开始自甘堕落，正因如此，只有出于和平的目的才有必要持有私人财产，从而将这个论点基督教化了。可阿奎那又认识到，虽然出于必需而拥有的财产是私有的，但那种财产所

产生的果实是共同的，必须要么通过将某人盈余的物品给予急需的人，要么通过买卖，才能实现共享。

要理解经院哲学家们对财产和财富的态度，须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投身于贫穷生活的行乞修道士。他们并没有考虑靠财富来提升生活质量，更不会认定财富本身就是结局。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假使人人都穷，就没有人可以提供援助了。这就解释了阿奎那为什么警告说，太穷和太富都不好。只有当财富的利用同公平、慈善的需要相一致时，财富才有利于人。

对于公正，有一点要求：当物品用来交换的时候，必须在公平的价格上实现买与卖，也就是说，必须是互相公正，或者交易的公正。这里，经院哲学家们从罗马法律中接过了这样一个思想：某种物品的价值是它可以在不构成欺诈的前提下售出的最高价格。然而，他们不愿意由此得出结论说，按可以卖得的最高价格卖出一个物品是公平的。他们一致认为，对物品或其质量作故意的误传，是有失公平的。但这个取自罗马法律的论点假设双方一致同意物品交换的条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买方必须提供物品的多少信息？假如物品存在明显的瑕疵，卖方足以索要一个合适的价格，且不必逢人便讲这个瑕疵所在（这样做可能使物品的卖出价格低于公平价格）。买卖双方可以讨价还价，他们总是想以智取胜。卖方也不必把日后可能降低价格的各种因素都告诉买方。例如，一艘满载粮食的船只的船主不必告诉买方，很快还有其他船只抵达。公平价格是当前合适的价格，而不是日后实现的合适价格。

经院哲学家对公平价格的结论，隐藏着一个重要思想：市场防止发生经济强迫行为。假如物品对卖方的价值高于它的正常价值，就可以按这个更高的价值售出，否则卖方会感到亏了。但如果一些影响到买方的环境被卖方所利用，就有失公平了。（的确，自然法很久以来就有一项传统，在急需的情况下，比如遇到饥荒，拿走所需的物品并不构成偷盗——这时的财产变成了共同财产。）他们还认识到，正如公开市场所发生的一样，卖方之间的竞争是在保护买方。

经院哲学家们探讨财产、公平价格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提供基于自然法的观点，旨在支持和解释（或描述）教会在经济事务上的教义。他们一直关注由强迫引起的不公正，以及补偿受强迫者的需要等问题。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和区分了许多经济概念，在高利贷学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山上宝训[①]中命令“借钱不要期望任何回报”的话，圣安布罗斯[②]的“接受高利贷等于犯下抢劫罪”的宣言，都被他们广泛引用。但他们也努力找到理性的论点来佐证其案例。

对高利贷的一切讨论都有一个基本思想：货币是不增值的。利用货币来赚钱不符合自然规律。因此，即使借款人利用借来的钱赚到了利润，也是因为他付出了努力，并不是货币本身具有生产效率。货币不增值的思想因借贷的法律概念而得到了巩固。在法律上，多数借贷行为是把借出的物品的所有权转移给借款人，

---

① 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指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内容系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② 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339～397年，意大利米兰主教。

借款人因此要以同样方式给予报偿。还给出借人的并不是最初的物品。这种借贷只适用于可替代物品，例如金银、酒、油或粮食，这些物品可以互相交换，可以衡量或计算。既然所有权转移给了借款人，那么利用这些物品产生的任何利润也属于借款人，出借人是无权要求分享的。

禁止借款人支付任何利息给出借人的主要先决条件是，一旦出借人因借款人无力及时还债而遭遇损失，出借人可以要求赔偿。例如，乔巴姆的托马斯就举了个例子，说出借人需要这笔钱去参加集市贸易，去付租金，或者给女儿置办嫁妆。为实际发生的损失作出赔偿是被广泛接受的。可一旦这个看法延伸到因不履行责任而发生的预料中的损失的时候，或者在借款期间内由出借人原因而发生的损失的时候，争议就出现了。比如阿奎那反对在后一种情况下给予赔偿的观点，理由是，既然所有权转移给了借款人，那么取得赔偿的出借人等于是在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些先决条件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允许赔偿，就可能被人们有计划地利用来绕开对高利贷的禁令。基于对借款人可能不履行责任的理解，以及对惩罚的理解，可以在借款合同中加上一个惩罚条款。

柯勒斯姆与《货币理论》

经院派的经济传统是不断进化的传统，虽然托马斯·阿奎那从多个方面给出了清晰的描述，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传统依然几经变迁。自从 12 世纪以来，早期教会的神父们和亚里

士多德定下的框架几乎无所不包，可还是留下了改变的空间和接受一系列新的质询的探索空间。这一点，14 和 15 世纪关于货币的著作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提供了分析性框架，但为了回馈新的问题，又有新的思想发展起来了。

14 世纪是发生经济、政治和社会巨变的一个时代。将军队和土地权力联系起来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衰弱，而商业正在扩张。信用和银行业的新形式正在逐步发展。这个世纪中叶，黑死病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紧缺，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关系。国王们发现自己捉襟见肘，只得更多地求助于降低货币成色（减少铸币中的金银含量）等手段，以增加收入。货币的问题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因此变得愈加显著。

发展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来处理这些新问题的办法，在柯勒斯姆（Nicole Oresme）的《论货币的起源、性质、法则和替代物》（Treatise on the Origin, Nature, Law and Alterations of Money）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这本书是 14 世纪用拉丁文写的，作者是法国人，生于 1320 年左右，曾在巴黎学习，担任法国查理五世的顾问，死于 1382 年，时任法国立斯城的主教。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小册子，讲的是变更通货的罪恶。但它对亚里士多德施以浓墨重彩，这或许反映了当时被经院哲学家们广泛接受的思想。在这本书中，柯勒斯姆虽也提出了亚里士多德对货币起源的论点及其对货币的“非自然”用途的谴责，但它强调的内容是一个世纪以前未曾发现的。降低货币的成色是在破坏货币的信用，因此理应受谴责（柯勒斯姆认为它比高利贷还恶劣，而高利贷又比利用交易来赚钱的做法恶劣些）。（为了熔化和出售切下来的金

属而）弄缺货币的边缘也是有害的，因为缺了口的货币还在当做重量无缺的货币一样在循环。两个例子中柯勒斯姆的观点是，这种行为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价值产生疑惑，所以是有害的。他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说明，最应该保持性质稳定的就是货币。

引起柯勒斯姆的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通货中的金银比率。他论证说，这个比率应当反映两种金属的自然稀缺性。既然黄金更加稀缺，就应该把它的价值定得比白银更高。其中暗示了这样一个思想：稀缺的商品比富余的商品更有价值。当两种金属的相对稀缺关系发生改变时，铸币中黄金与白银的比率也必须发生改变。不过柯勒斯姆相信，这样的改变是很少发生的，统治者力图改变通货的成色，绝大多数是出于主观臆断，其目的不过是提高收入而已。他说，提高稀缺金属的价值好比垄断者为其产品索要高价，因此也作了相应的谴责。

柯勒斯姆的主要观点还有：货币是为社会而准备的，要以统治者定的价格来使用货币。同理，人们可以拥有财产，但社会有权享有那份财产所产生的成果；统治者有权铸造货币，有权给货币定价，但要求统治者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实施这项权力。因此，虽然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而改变货币的价格是错误的，但他为了社会的利益而这样做，却是合法的：

> 既然货币属于社会……似乎社会可以按其意愿而控制货币……假如社会急需大量货币备战或赎回被俘的君王，或者为了其他紧急事件，那么可以通过改变货币的价值来筹措资金，这么做并不有悖于自然，也不是高利贷性质的，因为它不是君王自己的行为，而是货币所属的社会的行为。

发生在1356年的一次事件对这个段落的重要性作了诠释。法国国王约翰三世在普瓦捷被英国人俘获，王储面临400万克朗的赎金要求。这个金额太大了，一旦付了这笔钱，法国货币的稳定性必然受到威胁。于是，王储（后来的查理五世）向柯勒斯姆寻求经济上的建议。

柯勒斯姆的作品在经济活动的不同思路之间很有张力。头一个想法是，统治者如何决定货币价值是他的特权。这暗示了人们理当按全额价值接受缺损的铸币，而不要根据铸币内在的价值（自然界赋予的财富）估价。同时，柯勒斯姆又认识到，人类只做有利可图的事：他们无视统治者设定的价格，“仿佛它就是自然界的财富一样”来出售货币。这么一来，一旦贵重金属丧失了适当用途，即一旦不是给开采这些金属的国家准备贸易资金，就会被运往国外。于是，他隐约看到了市场的力量，因为他看到，被低估的货币将被拿来出口，导致国内经济窘迫。他还看到，统治者在通货方面维持公众的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到这时候，货币已经不再全然依赖它所含有的白银的价值了。换言之，货币已经不单单是一枚标有印记，以免去称重和检测的麻烦的贵重金属了。但是当柯勒斯姆向统治者改变货币价值的方式提出挑战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带有道德或政治色彩的，认为社会利益必须置于统治者自身利益之上。因此，是道德或政治约束，而不是经济力量在约束统治者应该做什么。所以说，他的基本观点依然彻头彻尾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只是问题的背景现代得多。

小　结

要说中世纪没有诞生影响深远的经济思想，是远远偏离事实的。它的基本框架保持了伦理性，由神学和法律赋予特征。然而，经院学者们试图为他们的道德判断找到理性的论点，以便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开拓思想。为此，他们必须发展和分析经济概念。他们被引导着去探索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价值，是什么决定了制定价格的时候竞争的作用。他们还探索了货币的本质，并对新的商业制度的发展给予了关注。他们使用了预期利润、预期亏损、机会成本的概念，虽然不是人人都承认，这些概念可以证明利息支付的合理性。因此，虽然经院派关注的焦点在道德方面，但他们有能力并确实分析了经济运行方式。

3

现代世界观的出现
（16 世纪）

文艺复兴与现代科学的出现

中世纪社会没有消失在一夜之间。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封建制度一直延续到 18 和 19 世纪。俄国直到 1861 年才废除农奴制度。中世纪的世界观则延续了更长时间，在这个世界观里，宗教、科学、神秘主义总是如影随形。可是从很多方面看，15 世纪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开端。1453 年君士坦丁堡败给土耳其人便是它的分水岭，它标志着罗马帝国在东方的终结。本世纪的后半叶，葡萄牙人开发了非洲海岸线，1498 年抵达了印度。1492 年到达西印度群岛，不出几年，南北美洲大陆就陆续被发现。人类不再以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了。

这些新发现固然富有戏剧性，可它们还只是 15 至 17 世纪欧洲社会发生的更具延展性的变革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艺

术、文学、文化的繁荣，以意大利为中心，史称文艺复兴。要不是希腊和拉丁典籍被再次发现，这次复兴或许不会发生。14 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学者彼特拉克（Petrarch，1304 ~ 1374 年）曾回顾上一个千年，说它是“黑暗时代”，以便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作对比，从此开始了重新发现古代文献的过程。中世纪的经院派当然也重新发现了大量的古代作品，但哲学是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其中首推亚里士多德，而彼特拉克努力从全部典籍——包括诗歌、历史、生物学、哲学和科学——中汲取营养。古典学问又提供了教会之外的另一个道德灵感的源泉。

甚至从受教会委托制造的大量艺术作品中，也可找到对人性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就始建于 1506 年。重要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少有宗教主题，即使在处理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典籍的再次发现以及新的人文主义这两者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要说明这一点，引用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 ~ 1519 年）、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 ~ 1564 年）、拉斐尔（Raphael，1483 ~ 1520 年）的名字就足够了。音乐方面也是如此。艺术和音乐不再单单用于宗教。

人类重新发现了古典文献，也就发现了科学的新视角，其中许多由柏拉图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衍生而来。它是一种世界观，认为科学、占星术、多神教里的神，在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位置。新柏拉图主义把太阳和神性相联系的观念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这个观念离认为地球围绕太阳周转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观点仅一步之遥。

完成这一步的哥白尼（Copernicus，1473 ~ 1543 年）受到毕

达哥拉斯学说的驱使，寻找能解释星球活动规律的简单的数学公式。他对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①]那里秉承下来的地心说很反感，认为它既粗俗，又不精确。他认为，修订历法是个紧迫而实际的问题，因而形成一个更加精确的体系至关重要。（因为历法的一年不完全等于太阳周转的一年，四季正在渐渐偏离历法上的传统时间。）哥白尼把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弃置一边，转而寻找古典学者的理论，发现了其中隐含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观。虽然对这样一个体系的预测还远远不尽如人意，但哥白尼的结论还是胜过了由旧体系衍生出的结果。不过，尽管哥白尼把地球在宇宙中心的位置拿掉了，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但他的宇宙哲学的其余部分还停留在中世纪。天体依然受多个水晶球的驱动，以稳定的速度周期性运转。哥白尼还不宜假定地球是活动的，因为对于明确的反对意见，他无法作答，比如问如果地球是活动的，地球表面的物体为何不掉下来。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世界观进一步远离中世纪，朝着现代科学观迈进。开普勒（Kepler，1571～1630 年）采用了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 年）提供的更加精确的天文观测资料，发现了椭圆形轨道，而太阳就位于其中一个焦点上，使数据正确得多。他也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对宇宙的和谐和形状的探索的启发。可是对于活动地球观的主要质疑，他依然没有作答，也未对地球为何应该活动作出任何理论上的解释。这个问题留给了伽利略（Galileo，1564～1642 年），是他发展了新的调查手段，

---

① 托勒密，Ptolemy，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建立了地心宇宙体系学说。

并假定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活动之间存在同一性。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年）再一次发展了古典时期学者的思想，在把天体看成在无限大的空间中活动的微粒的路上迈进了一步。他以伽利略为榜样，提交了第一份惯性定律报告。接着，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年）补充了重力定律，完善了这个体系。牛顿能用他的重力定律解释星球的运动和地球表面物体的运动。这还是头一次有一个协调而完备的体系替代中世纪的宇宙学。人类不再以为宇宙的活动受到上帝操纵，而是受机械定律的控制。上帝或许在设置活动规律的时候起了作用（好比说造钟表的神），但一旦设置完，他的作用便告以结束了。

对现代科学的兴起作一个简要记录，必定是过于简化了，但它已经足够我们提出几个重要观点。科学革命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变革，不仅提供了思考自然现象的方法的线索，还提供了思考宗教和社会问题的线索。这场巨大的变化需要很长的描述过程。起初，对于这场科学革命的预测，从奥卡姆[①]的著作中滋生的现代思维方式可见一斑，他把人类理性和神的启示划为不同范畴。而到了这场变革的尾声阶段，就连牛顿也坚持，占星术无法与他的天文学相分离。

宗教改革

16世纪也是宗教改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教的各个教会

---

① 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1285～1349年，英国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中世纪唯名论主要代表，著有《逻辑大全》等。

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出来。这一次或者一系列事件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它或许是英国、尼德兰（即荷兰）这两个新教国家在17、18世纪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可是，宗教改革没有对传统经济思维产生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它本质上仍是一场保守的运动，是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道德和神学的再次肯定，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异教徒的影响的否定。当时有一名男修道士兜售免罪券，好支付圣彼得大教堂建筑的费用，这次事件驱使路德1517年公开了他的“95条论纲”。

路德反对教会等级制度的行为，之所以比早几个世纪许多和他类似的异教徒的行为意义更加深远，原因之一便是当时发明了印刷术。谷登堡（Gutenberg，1398～1468年），德国金匠，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于1455年印刷出版《42行圣经》，据说这是第一本活字印刷的书籍。截至15世纪末，印刷书的数量也许超过了以前好几千年手抄书的全部数量。印刷术意味着新教徒的思想可以在欧洲范围内迅速传播，所以，路德的抗议之声远远超越了单单一个教士与教会的争执范畴。宗教改革的成功背后另有一个因素，那便是欧洲新出现的民族主义。在日耳曼国家，路德找到了既抵制罗马教皇制度，又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人们。宗教差异可以当做政治斗争的武器。

宗教改革中的主要人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让·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年），在经济问题上持保守态度。路德坚决赞成禁止高利贷，力倡公平价格原理，就连已经渐渐为人接受的一些例外情况，也遭到他的反对。例如，由

于货币是不增值的，所以对延迟支付的款项索要额外费用是错误的。他认可社会必须实行等级制度的想法，这与中世纪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就总体而言，路德对经济问题缺乏兴趣，当然也就对经济事务毫无好奇心。加尔文也差不多，虽然他放宽了关于高利贷的教义，但他也十分坚持公平价格的思想。他希望商人只赚取适度的利润，不要贪得无厌。可就是在高利贷的问题上，他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和经院派的教理十分接近的。他固然承认支付利息是合法的，可又为之设置了前提条件：出借人不应该专门从事此行，不应趁穷人之危，应当遵守利率的法律限制。这些信条无疑都落入经院派的传统之中。

宗教改革对政治思想产生了十分直接的影响。从中世纪的世界观看来，法律的好坏要根据它们是否与上帝的法律相一致来判断。主权得自上帝，因此查理曼大帝 800 年被授予神圣罗马皇帝的皇冠，是经罗马教皇，即基督在人间的代理人的许可进行的。世俗权力和神权之间的争执固然旷日持久，但任何一方都没有想办法完全废除另一方。两种权力之间的冲突是中世纪政治的特性，是消除不了的。另一方面，既然要解决这些冲突，于是涌现出了关于世俗权力和神权合理要求的权利的一大批文献。激进派们接受主权来自人类的观念，可同时又努力将这个观念同上帝是至上主权的思想相调和。

随着宗教改革，这个局面发生了变革。人人必须效忠的单一神权不再存在了。假如某个统治者成了新教徒，那么对于他那些依然忠实于天主教会的下属而言，问题就来了。作为新教徒的个人处在身为天主教徒的统治者治下，也有类似的问题。可以想

象，当时的下属们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宗教上的顾虑要求他们不服从统治者。简言之，现在有了政治义务的问题，政治构架要求一个新的基础。要获得这个新基础，方法之一是求助于自然法的思想。自然法的思想源自斯多葛派和罗马思想，经经院派之手得到发展，最后却被信教的律师和哲学家们接受了。这里面含有经济思想的线索，但直到17世纪（格劳秀斯、普芬多夫、霍布斯、洛克①）才被人们开发出来。16世纪的新奇的经济思想是从别的地方形成的。

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兴起

伴随这些文化和宗教变革而来的是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中世纪社会是一个诸多势力竞相争夺最高权力的社会。其中，历代皇帝（先是罗马皇帝，后来是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斗最能说明问题。与此同时，地方上数不清的君王都在要求臣民的效忠。诚然，君主的存在已有几个世纪，但他们很少统治具备任何强烈的民族特征的土地，而且他们的权力经常受到生活在领土内的贵族权力的限制：国王们无权独揽军事大权。然而，从15世纪开始，这个局面有所改变。出现了好几个有实力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各自疆界分明，区域内的居民都

---

① 格劳秀斯，Grotius，1583～1645年，荷兰法学家和诗人，著有《战争与和平法》，确立国际法标准。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1632～1694年，德国自然法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英国政治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者，主要著作是《利维坦》、《论物体》。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主张君主立宪政体，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

有共同的民族特征，统治他们的国王既然有军事垄断权力，也就掌握了政治权力。贵族势力逐渐服从于君王的权力。这个过程在英国先行一步。英国具有明确的国家疆域，免受外国人侵者的侵害。领土大得多，且更有实力的法国和西班牙也不甘落后。

这些新兴的单一民族国家资源供给十分贫瘠。它们必须供养陆军和海军，可行政力量和税收能力十分有限。为了维持永久性的国家军队，各国捉襟见肘。统治者只得求助于雇用外国雇佣兵这样的权宜之计。国王们，甚至欧洲最繁荣地区的国王们，也长期入不敷出。于是人们不仅越来越多地用民族的思路思考问题，还开始考虑如何增加各民族的经济实力。经济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地理发现改变了贸易模式。海上长途贸易路线的开放具有巨大的影响，堪称西欧经济史的转折点。西班牙人征服了美洲，带了大量的金银回欧洲。14、15 世纪一度持续下跌的物价，在 16 世纪又开始回升了。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新的责任。英国伊丽莎白一世于 1597～1601 年推出了济贫法，为穷人提供了支援，这种支援却是上一个世纪不需要的。

这些变化伴随着欧洲经济平衡中的两大转化。首先是独立城邦的衰落。16 世纪增长最快的城市都是首都。例如，伦敦的人口从 1500 年的少于 5 万人增加到 1700 年的 57.5 万左右。其他城市却没有增长到这个程度。和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相比，威尼斯的重要性减弱了。第二个转变是北海周边国家的日益繁荣和地中海国家的衰败。有这样一个说法：从 17 世纪末的局面来看，如果说工业革命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唯独不可能发生在英国或

低地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但如果先看到早两个世纪时的局面，就很难得出这个结论了。

重商主义

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兴起往往和“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个词汇一直用来描述从中世纪末到启蒙运动时期（15～18 世纪）这整个阶段的经济思想。但“重商主义”这个词连同它的同义词“重商制度”，是直到 18 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使用的。它的发明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演说家米拉波侯爵（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 年），把它推而广之的则是亚当·斯密，他在 1776 年的《国富论》中使用了这个词汇。斯密把它当做标签，用来指称他所批判的一系列政策。接着，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采纳了这个词汇，用来指代别的事物。正如专门术语以这种方式得到发展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斯密从总体上过于简化了前人的思想，而许多过于简化了的思想又被放到以后的文献当中。然而，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已经论证了最好不用这个词汇，但它还是可以用来描述广泛意义上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

重商主义政策包括利用国家力量建立工业，获得和增加出口盈余，积累贵重金属储备。这些贵重金属的储备可以随时转化为货币，人们相信它们对于一国的实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可以带来经济优势（更多的货币供应可以刺激生产和就业），而供养军队也需要它们。

重商主义经济学不像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学，它着眼于单一民族国家，认为这样的国家处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当中。但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横跨了三个或四个世纪，这期间，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它覆盖了从欣欣向荣的英国、荷兰等经济体到东欧等落后得多的地区。欧洲内部也存在社会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差异。想知道这些为何重要，就得考虑一直被提议用来解释重商主义政策的一些目标，包括：（1）利用全国保护性的关税和国内自由贸易制度统一国家；（2）通过发展经济，为国家提供充足的收入；（3）通过鼓励贸易和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实现高就业；（4）利用贸易政策积累财富。问题是不同的目标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利用海关政策实现统一的做法，英国已经不必要，但德国直到19世纪晚期才得以实现。利用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收入，则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海军国务大臣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年）的政策特征，却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政策。难怪可以说：政策并不是政府努力实现更大目标的结果，必须根据社会对特定问题的反应来解释政策。

还有一个问题：“重商主义”既被用来表示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又表示用于分析这些政策的经济思想。既是指柯尔贝尔之类的政治家的行为和思想，又是指发展了经济运行原理的思想的那些人，即所谓的“重商主义”学者。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一样，重商主义学者总体上也对眼下发生的实际问题作出了反应。他们的思想既受到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视角的影响。对重商主义文献作出了贡献的

既有研究经院派传统的学者（研究自然法的哲学家们），也有律师、政府官员或“行政顾问”、商人、投机家和冒险家。难怪不存在什么统一的重商主义信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本章以及以后各章将谨慎地使用“重商主义”这个词汇。虽然我们探讨到的很多作者可以列为“重商主义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好还是关注他们作品的其他方面，不要以这种方式将他们归类。当然有时候，我们很难回避这个词汇。

马基雅维里

16 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名的政治思想家是《君主论》的作者尼科罗·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 年）。虽然马基雅维里的方法和 17 世纪的作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可他的书既不是对新出现的单一民族国家问题的回应，也没有就宗教改革对中世纪主权概念的破坏作出回答。他写于宗教改革之前，只对某些意大利城邦面临的局势给予了回答。

他的书从很多方面与过去决裂，认为国家利益和宗教有明显区分，政治这门科学同道德不搭界。马基雅维里分析了统治者如何能够最有效地达到目的——一般而言就是提高国家实力。他曾为统治者制定了可以无情地使用权力的规则。尽管后来的评论家们经常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但说不定他恰恰就是用这种方法，才得以分析更为重要的问题。他的方法包括观察和演绎。观察，即从以往的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的结果得出结论；演绎，即由人性的一般假设推而论之。他的建议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

即人们会品行不端，自私自利，这并非因为他相信人类不讲道德规范，而是因为这才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假设。人类可能品行端正或者无私，但如果统治者要依赖这一点，又未免太愚蠢。

萨拉曼卡学派和美洲的财富

经院派的思想跨越了16、17世纪依然存在，只是它的内容随新的环境而发生了变化。这种思想保持了强势的地方，一个是西班牙的萨拉曼卡，那里有一个杰出的学派。神学家和法理学家们继续以传统的经院派风格写作。处处都是提问、反对、区分、解决方案和结论，大量地引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言辞。他们的经济分析始于亚里士多德，可除此以外，对于商业的增长以及从新世界流入欧洲落后地区的大量财宝而引发的新问题，他们也是敏感的。萨拉曼卡学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利贷、价格和货币，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把托马斯·阿奎那创立的托马斯主义原理同当时的商业实践统一起来，也有必要解释一下美洲财富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萨拉曼卡学派队伍中的重要人物是马丁·德·阿兹皮尔奎塔·纳瓦罗，或者叫纳瓦鲁斯（Martin de Azpilcueta Navarro，或Navarrus，死于1586年），他是多明我会修道士，搬到西班牙之前，曾在法国的图卢兹和卡奥尔教法律。纳瓦罗对货币价值的描写被收入一部神学手册的附录《对解决高利贷方案的注释》（Comentario resolutorio de usuras，1556年）中。他以亚里士多德关于“货币的目的是刺激贸易”这个观察结果为出发点。早期的作者

都谴责货币的其他用途是不符合自然的，纳瓦罗却认为，为了盈利而进行交换是货币的第二大用途。同理，商人从买卖货物中赚取合理利润是公正的，只要交换货币是为了获得合理的生活费，这么做就是合法的。他还对高利贷采取了更为宽松的看法，允许对损失作更大范围的补偿。

不过，谁又能在永远按公平价格交换货币的同时赚取利润呢？纳瓦罗的回答是，货币的价值不是稳定的，不单单取决于它的计数（上面的印记）或所包含的贵重金属的数量。这个价值还决定于货币的稀缺性以及对它的需要，同时还有诸如增值、贬值甚至拒绝使用等不确定因素。虽然有时候交换货币是为了人为地制造短缺从而获取大量利润，是错误的，但利用货币价值的正常变化而交换货币，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却是合法的。

这些道德主张以供求理论为基础，既适用于货币，也适用于其他商品：

> 当供给短缺需求旺盛的时候，一切商品变得昂贵，而货币，可以卖、出让或以另一种契约形式交换的货币，也是商品，因此当它的供给短缺需求旺盛的时候，它也变得昂贵起来。

纳瓦罗写到，这便是“自从发现了印度群岛，使本国充塞了金银以来”物价上涨的原因。虽然看起来仿佛其他一切物品都变贵了，其实是因为货币的价值下降了。他接着以类似的方式解释了金银的相对价格的变化。

当时的西班牙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它从美洲攫取了巨额财富，却很少留在国内。货币流到了欧洲的其他地方，热那亚、

罗马、安特卫普和威尼斯这些城市的货币最为充沛。对此，西班牙的一个对策是强行制定禁止货币出口的各项法律。萨拉曼卡学派的另一位成员，托马斯·德·梅卡多（Thomas de Mercardo，死于 1585 年），完全采用了和纳瓦罗同样的论据，声明这些法律不能够把货币留在国内。假如货币被输出国外，那是因为它在国外的价值比国内更高，例如在安特卫普就比在塞维利亚高，所以唯一能阻止它离开本国的办法就是提高它相对于其他商品的国内价值。和纳瓦罗一样，梅卡多也认为，货币价值在不同地方的这些自然变化证明了，参与外汇交易并从中牟利是合情合理的。

物以稀为贵，物多则价廉这个看法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古代，无怪乎萨拉曼卡学派不是唯一看到了美洲的财富和上涨的价格之间的联系的人。另一个看到了这个联系的人是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 年）。他是律师，在法国政府任职。博丹注意到，一切物品的价格和土地价格都上涨了。他声称，其中的基本原因既不是稀缺性，也不是垄断（两者往往是高价的原因），而是因为金银太丰富了。博丹援引历史上的例子，包括圣经上的和古代发生的故事，来支持这个主张。他突出于萨拉曼卡学派著作的一点是，他详细而切实地探讨了欧洲不同地方的货币条件，这使他得以同某些当局探讨，贸易是如何导致货币从一国流入另一国的。

都铎王朝下的英国

英国结束中世纪的日子通常定在 1485 年亨利·都铎加冕的

那一天。虽然都铎王朝遇到了当时欧洲的其他统治者也在面临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和收入的持续短少，但还没有碰到边界线的界定问题。都铎时期最有趣的经济著作是《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这本书可能是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1513～1577 年）写的，他是剑桥大学的教师，也是律师和政府官员。本书写于 1549 年，1581 年修订。它采取了医生（领导人物）、骑士、商人、工匠、庄稼汉（农夫）之间的对话形式，其中讨论到了当时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重点是通货膨胀问题和圈地放羊的问题。

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16 世纪的英国，通货膨胀问题十分严重。早几个世纪中，价格虽有波动，却从没出现过物价上涨的长期趋势，可到了 16 世纪末，小麦的价格已经比那个世纪初的时候涨了四五倍。本书的作者洞见到了真实收入和货币收入之间的差异，他指出，上涨的物价只危及依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们，如租金已由先前制定的合同规定好了的地主们，拿固定工资的工人们。而那些做买卖的则从涨价中获利了。他还指出，假如换购外国货的国内出口货也涨了价，那么抱怨外国货更贵就是毫无意义的。

稀缺或“不足”导致涨价的思想已众所周知，可现在的问题是，即使物品充足的时候，价格还是在涨。史密斯提供的解释是货币降低了成色——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降低货币成色这个话题的第一个版本就是在 1542～1551 年之间所谓的“大贬值”时期写的，那时候，英国先令的银含量降到了先前的 1/6。货币价值发生的这些改变受到了有力的谴责。或许这时候的史密斯读

到了博丹的著作，1581 年，他提出了对通货膨胀的新的解释：从印度群岛和其他国家进口的金银导致货币数量增加了。

英国布匹的出口增加了，为了满足日益提高的羊毛需求，人们开展了圈地运动，牧羊业随之扩张了。人们看到，富有的地主们把公共地围起来放羊，导致食品不足，断了穷人的活路。不出所料，圈地运动饱受争议，成了《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的重要议题。史密斯的解释是，圈地运动是羊毛相对于小麦价格更高的结果。他论证说，除非有适当的回报，否则人们不会从事别的或危险的工作。

> 拿走这些报酬……（而且）谁还会犁地挖土，从事辛苦的手工作业？……（假如）把所有报酬都拿走，这一切技能必会衰退，所以假如有一部分报酬减少了，这些职业技能就会用得少……于是它们用得越少，报酬就越少，还更不受尊重。

史密斯认为，有必要使“犁地的利润丝毫不差地同放牧者和牧场主人的利润一样好”，否则“牧场就会侵占到耕地上来，发展到来不及制定任何法律来挽回的地步”。因此，阻止牧业扩张的方法不是立法，而是使它不那么有利可图。办法是，把使得出口羊毛如此有钱可赚的关税取消掉。

史密斯看到了贸易平衡的重要性，对进口不必要的奢侈品或用英国原材料做的制成品大摇其头。他鼓励推出能创造就业和带给本国财富的新产业。这些都是可以标为“重商主义”的政策。然而，他表现出了对价格重商主义的热切意识，认定人们是受自利的驱动而行事的。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作品标志着同经院派经

济学分道扬镳。

16 世纪的经济学

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经济思想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经济实力是国力的关键，众多思想被用来构想政策，以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经济思想的焦点发生了变化。把因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及商业、贸易的扩张而产生的新问题解决好，也是十分重要的。从长期来看，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将对经济思想产生主要影响，但是在 16 世纪，它们的影响力小得多。脱离早期思维方式的过程是渐进的——经济思想不会一夜之间发生革命。

萨拉曼卡学派最终的态度是倾向于非常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时期的商业活动，可它的方法正巧落在经院派的传统框架中。让·博丹、托马斯·史密斯爵士这样的务实派既是律师，又是政府官员，他们的思想就离中世纪的观念益发远了。从更深的程度上看，人们为了分析这个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把道德问题弃置一旁。学者们不再争论利润的道德性质，反倒开始把追求利润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并努力找出其内在含意，和马基雅维里曾经为治国者出于自利而采取的权术找出其内在含意的做法如出一辙。

4

17 世纪英国的科学、政治和贸易

背　景

17 世纪的英国诞生了无数分析经济问题的短小手册。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谈商人们努力捍卫自身利益，争取对自身有利的政策。贸易是通过贸易公司（如商人冒险家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组织进行的，公司规定，同赋予了它们垄断特权的地区进行贸易。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利益，而反对这些公司的特权的旁观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新的经济思想由此而生。虽然大多数作者受到自利思想的驱动，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进行谨慎精微的分析，于是便有了了不起的进步。同这一类文献的崛起相关联的，一个是该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另一个是鼓励人们为他们想采纳的政策提供理性论据的政治制度。在这背后，则是人们反映在对待科学和政治的新的态度上的越来越长远的眼光，而这个态度又对人们

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学与皇家学会的科学家

两位重要人物主导了17世纪的科学思想。第一位是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他的《新工具论》（Novum Organum，1620年）是试验的、经验主义科学的一部宣言。他号召在两个原则基础上重构知识：一个是发展史（详细系统地收集有关发展过程的事实），一个是归纳（从这些事实引申出自然规律）。科学家将是自然的仆人和诠释者。培根批判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权威，说他们没有在细心观察的基础上，反而经常在与自然相悖的基础上创建精巧的论点。发出这些怨言的早就大有人在，但唯有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探讨。

第二位领军人物是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和培根一样，笛卡尔向经院派哲学发起挑战，努力建立知识赖以依存的坚实基础。他因名言“我思故我在”而闻名遐迩，这句话是说，唯一无可置疑的是我在怀疑。然而在科学界，他的思想中最具深远意义的一个方面则是，他认为理性是十分重要的。培根努力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构筑知识，而笛卡尔以数学的方式，把知识建立在一系列简单而不证自明的真理的基础上。利用推理逻辑，可以从这些真理引申出更加复杂的真理。结果，一个确定且没有内在矛盾的知识体系将建立起来。

培根和笛卡尔都挑战了传统权威，都拿出了他们认为能为知识提供安全基础的方法。他们拿出的方法有很大不同，培根强调

归纳，笛卡尔强调演绎。可两者还是有类似的地方。笛卡尔认为，最简单最全面的世界观不是把世界看成一个简单的有机体，而是由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要用各部分的活动方式和交互作用的方式来理解，就像一个机械系统一样。科学家不应该依赖对世界的主观判断，而要在可测量的属性基础上评判世界。虽然差异是存在的，而且相去千里，但笛卡尔相信测量，又与培根对实验科学的信仰是一致的。他们在反对权威的知识基础方面携手并进。

培根的计划被皇家学会采纳了。这个组织 1662 年获得执照，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如罗伯特·玻意耳（领袖人物），伊萨克·牛顿，罗伯特·胡克，约翰·洛克和萨缪尔·佩皮斯[①]等。它的座右铭“不借人言”正是培根反对权威论点的回声。该学会设计了进行试验的步骤，还安排了试验结果被接受时的报告步骤。这个项目的归纳部分存在严重的困难，就连归纳这个概念也是模棱两可的。学会的批评家，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年），就它的实验步骤提出了合理的质疑，如：有些事实的收集毫无意义；“名家”做的有些试验活该受到乔纳森·斯威夫特[②]的大肆讥讽。尽管存在这些疑问，皇家学会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仅玻意耳和牛顿的成就就足以构筑它的成功。

---

① 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1627～1691 年，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伦敦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 年，英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 年，英国文学家，海军行政长官，以所写日记闻名于世。

②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 年，英国讽刺文学大师。

从一开始，经济问题就构成了皇家学会计划的一部分。培根曾经号召研究不同职业的发展史——“改变了的或形成了的性质”。这里的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年）。配第曾在荷兰、法国学医，为霍布斯（此人曾给培根当助手）当过一小段时间的助手。1646年回到牛津。在那里，他遇见了玻意耳，并加入了皇家学会创始人的圈子。尽管后来他作为牛津大学解剖学教授和伦敦格雷欣学院的音乐教授的地位渐渐牢固，他还是辞别了伦敦，前往爱尔兰充当克伦威尔军队的医生。克伦威尔当时正要分割爱尔兰土地，好犒赏士兵和资助人。1655～1658年，配第着手执行调查任务，绘制了当时在所有国家看来最好的一些地图。他从已经得到土地又想出售的士兵手中收买土地，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大地主身份，不过他还得花大量时间捍卫自己的所有权。

配第在《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k）的前言里，清楚地阐明了他彻头彻尾的培根主义经济学方法。这本书写于17世纪70年代，但直到1690年他去世以后才得以出版。其中写道：“我不光使用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汇，不光是用理智的论据，还采取了这样的过程……用数字、重量或测量结果来表达自我；只采用理性的论据，只考虑这样的理由，比如说它们在本质上存在有形基础。”他写这本书是要展示他与流行的观念大不同的观点，认为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他借助以数字和算术方法为基础的论据，试图达到这个目的。

配第的英国财富观的核心是关于劳动力价值的论点。财富由人、土地（这一点法国显然比英国多）、资本组成。据观察，英

国人每年花费 7 英镑，从这个观察结果出发，假设有 600 万人口，他算出国家年收入必定是 4200 万英镑。减去 800 万英镑的租金和 800 万“私人财产”（住房、船只、牛、铸币、存货）所获的利润，剩下的 2600 万英镑就必须是劳动力创造的。这就给出了下列国民收支账：

支　出		收　入	
个人支出	4200 万英镑	工资	2600 万英镑
		利润	800 万英镑
		租金	800 万英镑
总计	4200 万英镑	总计	4200 万英镑

配第继续计算人口本身的价值。他假设，劳动力的报酬率等于土地的报酬率。他又进一步假设，这个价值等于由此产生的年收入的 20 倍（也就暗示了每年的利率是 5%），由此推断，假如劳动力每年贡献 2600 万英镑，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应该等于这个数的 20 倍，也就是 5.2 亿英镑。除以人口数以后，得到每人头约 86 英镑的价值。这样，他可以用这个数字来计算大瘟疫时损失的人口价值等问题。

在配第的其他作品中，他制作了更为详细的国民收支账。在《哲言》（Verbum Sapienti，1665 年）中，他假设支出的分配是这样的：1/6 人口每天花费 2 便士，另 1/6 人口每天花费 4 便士，以此类推。又假设一年的工作日是 287 天，人口的工作比例是 50%，由此推导出年平均支出的数字来。他还假设英国有 2400 万英亩土地，每英亩租金是 6 先令 8 便士，由此推导出租金的数目。他的《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学》（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

land，1672 年）中还有愈发详尽的账目，他在书中分析了土地占有数、房屋大小以及占有期的分配问题。

这些国民收支账固然简单，但却代表了概念上的重大进步。用现代术语学来表达的话，它们包含了以下思想：（1）国民支出（或产出）和国民收入是相等的。（2）国民收入是一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支出的总和。（3）一切财产的价值都由一个共同折扣率同所获收入联系起来。比如，租金率与土地价值之间的关系等于利润率与资本价值之间的关系。显然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不过，这些计算公式中的数字的精确性，起码也是非常可疑的。配第是从死亡名单（教区内不同死因的死亡记录）估算人口的，却没有就自己为了进行计算而不得不作的假设作一番讨论，也没有讨论到基本数据的可靠性。更糟的是，许多数字纯粹是出于臆想。对这一点，他在《政治算术》的前言中也承认了，他说他的很多观察结果“要么是真的，要么也不太像假的……假如真是假的，也没假到足以破坏它们所带出的论点；可最糟的还是显示了通往我所追求的知识的路径的那些假设”。简言之，用现代标准看，他对自己的数字显得谦卑有礼。这么做的理由是，他对全然精确的数字并不感兴趣。他的目标只是确定足够精确的量值，以便说明自己想说明的问题。

配第相信一国从金银财宝的积累中受益，对进口品征税可能有助于此，就此意义而言，他的经济学属于重商主义。然而，他并没有把金银财宝和财富简单地混淆起来。他认识到，粮食也是财富。对于货币何以特别重要，他也自有一套理论。而金银珠宝不同的是，它们是不朽的，从而“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财富。

进一步说，推动贸易也需要货币。这就是把贵金属熔化掉，制成铸币，对一国有利的原因。所需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的速度。这里，配第又一次举了数字的例子。假设 600 万人每人每年花费 7 英镑，那么他们每周的总开支就是约 80 万英镑。假如“人人都确实花了他这笔每周的开支”，那么货币将在这一周内流通 1 次，有 100 万英镑足矣。可除此之外，土地的租金（共计 400 万英镑）是半年一付，另外需要 400 万英镑；住房的租金（又是一年 400 万英镑）是每季度一付，又需要 100 万英镑。于是总的说来，这个国家需要 600 万英镑。配第还论证说，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利率的降低。他声称，过去 40 年以来，年利率已经从 10% 降到了 6%，这就是“货币增加的结果”。

看看配第的数据，不难看出，他没有跟上皇家学会的那些同时代人，如玻意耳、胡克等人的成就。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为防止爱尔兰穷人家的孩子成为父母或祖国的负担，也为使他们有益于共和国而提出的谦虚的提案》（A Modest Proposal, for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in Ireland from being a Burd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 and for Making them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k, 1729 年）中，配第的论点受到了无情讥讽，说他的演绎法没有追索“本质上具有有形基础的”理由；那些理由比起先人举出的理由来，不确定性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他所用的算术无非修辞工具而已。若是说，他没能遵守培根主义方法论，尚有可能。但这些看法没有击中要害，其实，他的方法论的确引导他提出了新问题。光是问一问劳动力规模对于国民财富的贡献，推动贸易所需的货币数量，抑或不同税种的效果，无一不是观察经济现象的新

思路。在问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配第的确忠实地采用了培根和皇家学会的方法。他对爱尔兰的调查给了他一些数据，大大促进了他的工作。当然，既然他能够获得的信息量极少，而他想努力解决的问题又如此错综复杂，因此他的统计结果难免不可靠。

经济学史学家们总是把“政治算术”这个词同配第联系在一起，可他并不是采用这些方法的唯一一人。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1620～1674 年），配第的亲密朋友，1662 年因著作《根据死亡名单而作的自然和政治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1662 年）而被选为皇家学会成员。他研究了出生和死亡数据，从而估算伦敦的人口，制定了第一份存活率表（显示有多少人活到各个年龄的表）。这个世纪末，他和配第的著作被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1648～1712 年）推进了一步。金掌握了更多的数据，较之配第所能做到的，他估算的人口数目有了很大改进，国民收支账也详尽得多。他计算了国民储蓄，把人口分成储蓄阶层和入不敷出的阶层。他还制定了 1688 年和 1695 年英国、法国、荷兰三国的收入、人口及人均收入的比较账。他很有兴趣了解，这几个国家延续当时的战时状态的潜力有多大，这些账和他其他几个计算结果就是受到这个兴趣的推动才完成的。以英国为例，他估算了战争融资的来源，计算了依靠增加生产、减少消费和投资减缩等手段达到的资金数量。据他 1695 年的计算，战争不可能延续到 1698 年以后。（果然，1697 年夏天进行了和平谈判。）最后，应当提到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1656～1714 年）。此人研究了不同地区的税收分配问题，金死后，也是他负责金的著作

出版事宜。

创立了 20 世纪国民收支账的人们把格朗特、配第、戴夫南特、金视为先驱，可对他们作品的兴趣波动极大。亚当·斯密和 18、19 世纪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对《政治算术》的价值心存疑问，所以它对这门学科鲜有影响。只有当人们应用 20 世纪的现代资源，来处理国民收支账的时候，才有可能创建系统的、可信的国民收支账。

政治动乱

17 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英国都处在政治骚乱的状态中。早先的历代斯图亚特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 年在位）和查理一世（1625～1649 年在位），当他们需要的资金超过了从皇家财产和关税等税收的确定形式中所能筹集到的数量时，会迫不得已向议会求援。曾有一时（即“十一年暴政”，1629～1640 年），查理企图完全摆脱议会实行独裁。接下来，这个国家经历了国内战争时期（1642～1649 年），终于落得由奥利弗·克伦威尔摄政的结果。1660 年斯图亚特家族重新上台，但如今他们显然无法再恢复祖宗的专制主义了，宪法冲突仍在延续。到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1685～1688 年在位）继承查理二世（1660～1685 年在位）的王位的时候，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1688 年，奥伦治王室的威廉（1689～1702 年在位）在托培登陆，詹姆斯不得已逃离英国。这个威廉把国王当做严格意义上的立宪君主。这一切政治动乱向人们提出了关于社会组织基础的基本问题。

这些疑问的背后，是人们对待贪婪、妒忌、性欲等当时所谓强烈情感的态度的更深刻变化。到 17 世纪的时候，人们已经渐渐接受了这些破坏性情感不可能被宗教或道德教义所遏制的看法，也渐渐发觉有必要寻找社会组织方式的另一种解释。一个可能是，可以用一种情感控制另一些情感。培根曾认为，正如猎手利用一个动物捕获另一个动物，或者统治者利用一个小集团控制另一个小集团一样，一种“感情”可以用来主宰另一种。（这种方法显然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相信，破坏性的情感，如对财富、荣耀和支配的欲望，可以由与之对抗的情感，如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生活的渴望，以工作来实现这个梦想的希望，来加以检验。这些对抗性的情感渐渐被称为“利益”。

然而，正当人们开始思索社会是依靠利益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利益”这个词的理解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16 世纪末期，“利益”还和“国家理性”是同义词，被视为介于情感和理智之间。英国内战期间，利益的概念开始不仅单单适用于国民利益，还适用到本国的个人和团体身上。这时候的利益也就涵盖了一切人类渴望，包括荣耀、安全、荣誉以及物质舒适度，并提供了反映和计算如何实现这些渴望的一点线索。可到了 17 世纪末，利益又开始采取更为狭义的经济解释了。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法国。所以，卡迪纳尔·黎塞留[①]的秘书才可能在 1661 年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利益这个名字一直专指财富利益。”于是到了 18 世纪，我们发现，正如大卫·休谟所说，一般情况下学者们总

---

① 卡迪纳尔·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 年，法国路易十三的国务秘书兼御前会议主席，枢机主教。

是假设，人们的动力来自“对获得物品和财产的热望”或更简单的“对收获的热爱”。

对此过程作出的贡献受到最广泛争议的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1651 年）。这本书之所以这么有影响，不是因为人们赞同它，而是因为它的论点看起来太有说服力了，人们虽嫌恶它，却无法视而不见。《利维坦》把各方面都得罪了。它得罪了保皇派，因为它反对国王享有超凡权利；同时它又疏远了反对君权的人，因为它论证君权必须是绝对的。

霍布斯的论点是，只有当由政府来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公民社会。没有政府，社会会恢复到自然状态，大家都不得不洁身自保。接着，霍布斯把这样一个自然状态描绘为战争状态。谁都可以随心所欲，没有政府管他。进一步说，谁都会为了保护自己而进犯邻居。人类的行为将变得不可预测，结果将是普遍的恐惧和不安全感。财产将陷入危险，合同无法强制执行，经济生活更是不可能实现。霍布斯为了逃避英国内战而背井离乡，在法国的 10 年间（1641 ~ 1651 年），他潜心写作《利维坦》。英国议会挑战了国王的君权，从此英国卷入了内战，这或许对霍布斯的观点有所影响。看样子，霍布斯可能也受到了德国局势的影响。三十年战争（1618 ~ 1648 年）期间，德国陷入了经济和政治混乱中，当权者互相厮杀，竞相取得建立各自君权的权利。

霍布斯认为，脱离这种局势的出路是，要选择一个最高统治者（一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机构），这个人或机构将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只有做到这一点，公民社会才会成为可能。就其本

身而言，这是一个标准的君权社会契约理论。霍布斯的理论有别于其他社会契约理论之处是，他认为君权必须是绝对的，不能够被分割或受到限制。霍布斯论证说，对君权强加限制的话，会导致冲突，最终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冲突。因此，君主必须有权利管辖公正，有权利任命和奖赏臣子（谁都是肉体凡胎，一个人不可能独自管辖一个社会），有权利审查政治宗教观点。既然宗教曾经是三十年战争和 17 世纪英国的冲突中的重要缘由之一，那么这一项权利是必不可少的。

霍布斯关于君权的论点在经济思想史上十分重要，因为在《利维坦》中，他试图解决的是社会组织力量究竟是什么的基本问题。虽然他视之为政治问题，但读者中有很多人开始把这个问题看成经济问题。霍布斯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重要。他所说的公民社会需要一个绝对君权的结论，不仅建立在神学论点的基础上，也建立在由对人类本性的假设作出的理性演绎的基础上，这个假设便是，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人们将为了追求自己的安全而冒犯邻居。这是对社会的坚决而长期的展望。它有点类似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方法，但走得更远一步。马基雅维里认为，统治者从这种假设出发为人处世，是谨慎的做法，而霍布斯则把他的整个君权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上。

经济问题——荷兰的商业实力和 1620 年代的危机

15、16 世纪，欧洲的经济中心是在意大利北部。威尼斯城邦主宰了地中海贸易，同时成了繁荣的制造中心。跨越大西洋的贸

易则由塞维利亚主宰了。到了 17 世纪，经济实力决定性地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了欧洲西北部。整个 17 世纪，北欧和西欧（包括不列颠、爱尔兰、低地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口上升了 1/3，而地中海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下降了 4%。1600 年以后，威尼斯就进入了衰退时期。荷兰取得了香料贸易权，反宗教改革[①]为图书出版重重设卡，德国因三十年战争而失去了重要的市场。土耳其货币的成色降低了，所以棉花和丝绸这两种纺织品行业的关键原材料的成本提高了。在西班牙，美洲白银的流入量减少了，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政府面临一系列金融危机。前一个世纪的繁荣并未伴随着工业的任何可持续增长。地中海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危机，1620 年代初更难熬。与此同时，北欧和西欧的经济却经历了一个增长时期。最成功的经济体要算荷兰。荷兰新研制的平底船 1595 年第一次下水，它有着又长又平的船体和简化了的传动装置，比起其他国家的类似船只来，它的制造成本少得多，开起来也省力得多，或许这要算荷兰经济成功的主要标志。

和荷兰一样，英国也非常依赖海外贸易，所以把荷兰人视为眼中钉。1652 ~ 1654 年，1665 ~ 1667 年，1672 ~ 1674 年，1680 ~ 1684 年，两国分别展开了海战。贸易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人们绞尽脑汁想知道，为什么荷兰就这么繁荣。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的低贷款利率是荷兰繁荣的原因还是结果？假如是原因的话，这能否用来支持各项采取更低利率的措施（如高利贷法）？可如果是

---

① 反宗教改革，指 16 ~ 17 世纪初天主教会纠集封建势力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各项活动。

结果的话，那么这些措施就可能是有害的。

从 1520 年到 1624 年，英国经历了剧烈的商业危机，其直接原因是销往欧洲的布匹数量减少了。英国商人从伦敦出口的布匹数量从 1618 年的 102，300 匹减少到 1620 年的 85，700 匹。两年以后，继续减少到 75，600 匹。直到 1628 年，才回升到 1618 年的水平。失业现象遍布全国。这场危机的长期原因固然是国外竞争的增加，但短期诱因则是市场的突然丧失，先是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后又是荷兰。

这场危机催生了一大批小册子，个个都在争辩危机的起因，并提出补救的方案。各大团体都在党同伐异。有些把危机的原因定在布匹行业本身，说是在于国外竞争力量的增长和英国布匹质量的下降。另一些则谴责商人，批评商人冒险家团体拥有垄断特权，占据了过半数的英国布匹出口量。最有意义的探讨还是和货币有关。当时存在一个普遍的观念，认为“货币短缺”是一个重大问题，而这又与外汇的不稳定性有关。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牵连德国发生通货剧变，说不定这件事也算 1618 年到 1620 年出口量下滑得如此厉害的原因。

贸易差额论

对这场危机的传统解释是杰勒德·梅林斯（Gerard Malynes，1586～1641 年在世[①]）提出的。他是商人，也是政府官员。他声

① 此处及以后各处的“在世”，均表示生卒年月不明的人的全盛期或其工作的时期。

称，白银之所以流出了英国，是因为英国铸币被低估了。外汇交易商能够迫使英国铸币的价值低于它的票面价值，也就是低于皇家铸币局规定的价值。如果说票面价值反映了金银的世界价格，那么低估会导致英国铸币被出口，因为这样的话，它作为贵重金属就比作为铸币更值钱了。这样便能说明英国货币短缺的原因。低汇率解释了英国物品为何卖得如此便宜，也解释了为何进口品如此昂贵。他提出，补救的办法是重建皇家外汇局，管制外汇交易，以便将汇率恢复到适当的水平。

与此相对的有所谓贸易收支理论家的各种论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1608～1654 年在世，商人冒险家团体成员）和托马斯·芒（Thomas Mun，1571～1641 年，东印度公司成员）。他们认为，是物品的流动在控制汇率和金银的流动。为了阻止金银财宝流出国外，有必要增加贸易收支余额，也就是减少进口，特别是不必要商品的进口，同时增加出口。这就要求实行低汇率而不是高汇率。更有意义的是，他们认为是“贸易收支余额”决定了货币的流动。

看得出，如果进出口完全不对价格有所反应，那么梅林斯要求高汇率就是对的，可如果进出口对价格的反应极大，米塞尔登和芒就说对了。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还不光是在贸易流动对价格的反应性的假设上。他们都同意货币是商业的“灵魂”，也同意必须阻止英国的货币流失到国外，但在这些一致意见的背后，还存在着关于经济如何运行的不同观点。从梅林斯的世界观看来，铸币具有内在价值，这个价值决定于它的金银含量，这便是最高统治者要建立的特权。因此，皇家外汇局有必要向商人提供

铸币真实价值的信息，以使外汇交易能够反映这个价值。相反，对于米塞尔登和芒来说，物品的买卖才是基本的，是供求关系而非最高统治者在决定包括通货价值在内的各种价值。

贸易收支理论家们的工作，就建立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而言是重要的。他们没有把货币看成需要积聚的财富，而是看成运行的资本。这种观点最鲜明的代表人物是芒。对于他来说，推动贸易是需要货币的。要想积累金银财宝，就要允许它用到贸易中。在他死后出版的《得自外贸的英国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1664 年）中，有个章节题目叫“商品贸易中我国货币的出口是增加我国财富的一种手段”，芒认为货币出口的目的是：

> 使我们带进来更多的外国货，在预定的时候再送出去，将大大增加我们的金银财宝，扩大我国贸易。因为虽然我们的确是以此方式每年扩大进口，以维持更多的船运和水手，改善陛下的海关和其他部门的利益，但我们消费的这些外国货并不比以前多，所以上述增加的商品……最终成了一种大得多的价值对我们的输出。

芒的贸易收支理论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它是以外贸为中心的增长理论：就其本身而言，它代表了经济活动的一个特殊概念，越来越多地挑战了 17 世纪以生产为根本的观念。在刚才引用的段落中，芒鲜明地指出，外国商品的消费量不会增长，但英国的转口贸易将会增长。此外，芒的理论为其担任董事的东印度公司被许可向印度出口金银提供了合理的证据。这家公司找不到合适的货物用于出口，于是他的理论十分必要。

利率与自由贸易论点

从查理二世复辟到 17 世纪末，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应不应该通过关于降低利率的立法。1668 年，有人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将最高法定利率从每年 6% 降到 4%。这项提案最具声望的倡议者是乔赛亚·蔡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1630～1699 年）。此人是商人，靠给皇家海军供货，发了财，也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捍卫者之一。蔡尔德从很多方面都像是一位学者所称的“老派”经济学人：“他看起来更像是鼓吹家而不是理论家，像专利药品的发货商，一个自称客观其实有成见的当事人，一个不到家的模仿家，而非精力旺盛的革新家，一个偶尔才称得上的自由主义者。”（“新派”是指客观的科学家。）他的《关于贸易和货币利息的观察摘要》（Brief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rade and Interest of Money，1668 年），一开头就质问荷兰何以远比英国强盛。他提供了 15 种解释，却又说，最后一个解释，即低利率，才是最重要的，是荷兰财富的缘由中的缘由。蔡尔德以两种类型的证据支持他的论点。首先是，前些年降低了法定最高利率，1620 年代从 10% 降到 8%，1640 年代又从 8% 降到 6%，使商人数量及其个人财富都增加了。第二个是比较不同国家而得的证据。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只付 3% 的利率，却欣欣向荣；西班牙的利率介于 10% ～12% 之间，货币极度短缺；法国，利率 7%，状况中等。据蔡尔德说，这些国家“或穷或富，与它们所付和通常付的货币利息恰好成比例”。他说，这个规律百试不爽。

蔡尔德认识到，这样的证据并没有说明，低利率就是繁荣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但他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论据来证明他所称的论点。他说，把利率从6%降到4%或3%可以使本国的资本储备翻番，但他没有深究这个问题，却转而回答其他人对降低利率提出的异议。对于荷兰没有高利贷法，他的回答是，荷兰的其他制度，如高质量证券、银行、汇票的使用以及较低的公共支出，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反面的论点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在《利率降至4%之可能后果》（Some Consequences That are Like to Follow upon Lessening of Interest to 4 per cent，1668年）中提出的。他是后任财政大臣的阿什利勋爵的秘书。尽管他的论点前后不完全一致，且错误明显（这恐怕不奇怪，毕竟这是他对经济学的第一次探险），但他的册子还是因建立了严密而有逻辑的论点而有别于蔡尔德的书。

洛克认为，把利率限制在4%会减少可供借贷的资金的供应量。除此以外，他还认为存在一个取决于一国货币数量与贸易总量之比的“自然”利率：“通过自然地使用利息，我的意思是，货币当前的稀缺性使它自然地处在那个比率上。”和一心一意关注利率的蔡尔德不一样，洛克看到，假如较低的利率是由（银行、使用支票等措施）增加资金供应量引起的，那么它的效果将与强制实行法定最高利率的效果大相径庭。

如果利息决定于贸易所需的货币数量，那么一个国家需要多少货币呢？刚才说过，配第的计算可以看做是为此问题提供明确答案的一个努力。洛克的回答则引入了“周转的快慢”这个概念：

因为它不光取决于货币数量，还取决于货币周转的快慢——既然我们无法轻易追踪到它……做一些可能的猜想，我们将考虑多少货币是必要的，必须有多少货币停留在每个人的手上，才是进行贸易所必需的。

这些论点使洛克免于把利率放到货币经济学的更广义的问题中，比如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作为对纳瓦罗和博丹等 16 世纪学者的回应，他认为货币的价值（或相当于商品价值）取决于货币数量与贸易量之比。货币充足说明货币会变便宜，而商品会变贵。假如一个经济是封闭的，就说明货币数量无关紧要：如果降低货币数量，物价会变得更低，可以进行更多的贸易。

另一方面，在一个开放全球贸易和使用与邻国同样的货币的国家，肯定有一个进行贸易的特定的货币比率。理由是，如果一国拥有的（相对于贸易量的）货币量比邻国少，那么，要么是物价肯定降低，要么是物品肯定卖不出去，货币不够用来以时下国外的价格购买货物。又如果国内物价低于外国的物价，这个国家就会因进口的支出多于出口的收入而蒙受损失。此外，这个国家还会冒劳动者移民至高工资国家的危险。

坚持低利率是财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的，洛克不是唯一一个。另一位论证此事的是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1641～1691 年）。此人与土耳其做贸易发了财，之后回到英国，先后在海关和财政部任官职。他的《论贸易》（Discourses upon Trade，1691 年）是受了降低法定最高利率的新举措的刺激而写的。这本书的出版前言上，他的兄弟、成功的政治作家罗杰·诺思

（Roger North，1653～1734 年）强调了抽象和基于“清晰而鲜明的事实”的推理的重要性。以此方式获得知识已经成了“习惯性的”做法了。罗杰·诺思认为，这种笛卡尔式的推理方式正是他兄弟达德利的作品的特征：“他开门见山，从无可辩驳的真的原理讲起；小心谨慎地推进，进而对有关贸易的最美妙的争议作出判断……他把事物浓缩至极，使一切偏见都暴露无遗，然后将它们呈现出来。”

达德利·诺思的出发点是贸易是“过剩产品的交换”。最勤勉的、种植粮食最多的、生产物品最多的人，即使谁的手头都没有金银，也会是最富有的人。可是，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物品，这些人必须用自己过剩的物品交换其他人生产的物品。是人们之间的差异导致了贸易。

诺思接着把这个论点用于利息。他认为，有些人有很多（资本）储备，却缺乏使用技能，而另一些人具备所需的技能，却没有储备。储备太多的人将借给储备太少的人，以利息作为回报。土地的情况也如出一辙。有过多土地的人允许其他人使用土地，以换回租金。利息和租金本质上是一样的。接下来，诺思认为，如果资本储备和土地都很充足，利息和租金就会低；如果十分稀缺，利息和租金就高。他说，荷兰的利率之所以低恰恰是因为资本储备充足。

诺思继续论证，如果通过立法降低利息，贷款的供应量就会降低。很多出借人会不情愿接受更低的利率，因为这补偿不了他们所冒的风险。他们会偏向于储藏财富或者还原为金条银条。再不然，人们会求助于“秘密交易”，以规避法律。诺思这个论点

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出借人和借款人的情况不都一样，因此同样的利率不适用于一切交易。这一点与他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出借人和借款人应该自由地进行各自的交易。诺思主张，撇去了利息，也就撇去了借款。

诺思对货币的分析也遵循同样的路线。它的假设前提是，财富并不来自对货币的拥有，而是源自“农场的土地，有利息的货币，或者贸易中的物品”。金银“不过是重量和衡量工具，携带它，交换会更加方便；对于过剩的储备而言，它也是有待存入的合适的资金”。因此，假如有人卖不出货品，原因肯定是，要么可供销售的物品太多了，要么人们正需要海外的物品，或者贫困正在拖垮国内的销售。原因不可能是铸币短缺，因为一个富有的国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所需的货币。

这个观点的效果之一是使人们偏爱奢侈性支出。“重商主义”观点认为，要通过限制进口或限制奢侈消费的法律来抑制奢侈性支出。它认为，进口的奢侈品会不必要地导致货币流出这个王国。诺思却认为，只要物品是要被卖出去的，只要人是要被雇佣的，支出就是必要的。或许同等重要的是，奢侈性消费刺激了工作的热情：“贸易，抑或勤奋和独创，它的主要鞭策力来自人类的穷奢极欲，他们费尽心思满足自己，所以当任何别的事物都无法使他们满足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工作；因为一旦人们真的只用必需品满足自己，我们拥有的将是一个贫穷的世界。”

虽然达德利·诺思没有讲到这个程度，但在前言中，罗杰·诺思认为，任何有利于个人的贸易也有益于公众，因此管制贸易永远是有害的：

没有什么贸易不利于公众；因为如有任何这样的证明，人们自会清除贸易；凡贸易商兴旺的地方，以他们为一分子的公众也事业兴旺……什么法律都无法规定贸易价格，价格的比率必将是自身生成的；可一旦真有这样的法律来掌管贸易，贸易就有了很大障碍，因而产生偏见……偏爱一种贸易或一种利息，却反对另一种贸易或另一种利息，是陋习，会大大削弱公众的利益。

17 世纪 90 年代的重铸币危机

诺思的小册子和洛克对利息的描写，反映了 17 世纪初以来经济思想的巨大变化。当时写作的多数文章仍然是为了要对政策产生影响，积极从事贸易活动或有利益要捍卫的人们也还在继续写书，可他们使用的论据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芒和他的同代人的文章中，混杂了经济思想和做成功商人的建议，《得自外贸的英国财富》基本上就是一册生意经。相反，尽管洛克和诺思当然是有利益要捍卫的，但他们想方设法靠后站，和他们的研究材料保持距离，并用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方法加以分析。培根、笛卡尔甚至霍布斯之类的思想家，其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

同样重要的还有对待经济增长的态度的深刻变化。17 世纪之初，认为政府的作用是维持稳定而且确定的秩序的看法还占据主流。梅林斯之所以拥护皇家外汇局，自然是出于这样一个见解。把贸易差额论当做支持更大自由的论据的商人们，对这个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推出了一套经济观，认为经济的目的是增

长，而通过贸易收支盈余带来的货币会助燃这个经济。为了促进出口，要开发资源，政府的政策要服从于这个目的。经济是否增长，要纯粹从生产者和商人的角度来衡量，不取决于消费增长的目标。

都铎王朝、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强调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这与商人们的增长观大相径庭。可商人的增长观无法解释英国 1660 年王政复辟时期为何出现财富增长。包括配第在内的无数学者都对这件事作过评论。1666 年的大火灾之后，伦敦大兴土木，城市的繁荣吸引了批评者和欣赏者两方面的评论。特别是，自从 1663 年放松了金银贸易以来，印度棉花和丝绸的进口出现了巨幅增长，从 17 世纪 70 年代起，人们开始对此展开论战。英国布商开始利用贸易差额论，批评东印度公司的行为促进了印度的生产与贸易。

达德利·诺思等许多学者的作品拿出了一套关于财富与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作为对这个论战的回应。他们不通过生产者的眼睛看待贸易，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贸易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作用上。消费（而不是生产）渐渐被看做经济活动的目的。消费之所以与增长相联系，是因为人类满足欲望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其购买力。他们只能在受到供求关系作用的非个人的市场上售出更多物品，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必须降低成本，才能更有竞争力。结果，阐明人类事务受自利思想支配的文献问世了。这个论点挑战了长久以来的社会概念（人们之所以对霍布斯的思想如此反感，是因为他假设人类组成政府仅仅为了自利），其观点中可能含有激进的政治暗示，认为市场提供了组织社会的

一套方法。

可并非人人都能接受这套新市场观。当贸易扩张，商业关系越来越多地统治了经济生活的时候，有些部门却落后了。布商和地主们发现，他们的收入比不上商人的增长得快，何况他们还面临日益增加的（地方）税收负担，这些税收需拿来供养那些对他们一无帮助的人。这些人以穷人的困境为依据，否认个人与公众的利益相互一致。印度制成品物美价廉，英国羊毛毫无指望与之媲美，人们就认为做印度制成品的生意是害人的生意，导致了失业，制造了贫困。当时提供的解决办法是鼓励投资，限制进口。17 世纪 20 年代，人们用贸易差额论对抗传统的经济制度，可到了 90 年代，它又成了抵抗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带来的威胁，捍卫生产和本地利益的手段了。

这场冲突在 17 世纪 90 年代的重铸币危机中达到高潮。王政复辟以来，英国银币的重量大大下降，原因要归咎于边缘缺口和正常的磨损。人们普遍同意，重新铸币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因为，硬币边缘轧了凹凸花纹以后，可以防止造成更多的缺口。值得争议的话题是，新的先令（流通中的主要银币）应该含有多少白银？如果保留原来的银含量，那么流通中的铸币就更少了，会引起通货紧缩。所以，强调扩张需求的重要性的人，希望这次重铸币能够反映过去几十年间降低了的先令银含量。而债主们则希望发生通货紧缩，希望保留通货原来的银含量。这个话题在伦敦城四处传播。地主们就不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理解了贸易差额论以及贸易与就业之间的联系，却可能没能领会这次重铸币危机中包含的问题。

政府采纳（也是洛克倡议）的方案是按照先令的足值重新铸币。这么做本身就是紧缩性质的，而且政府还同意在最初的 6 个月中按照票面价值接受旧先令。结果，格雷沙姆法则生效了。这个法则以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Sir Thomas Gresham，1519～1579 年）的名字命名，他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金融家，却被认为是中世纪学者。法则通常简写为“劣币驱逐良币”。假如有人既有一枚足银含量的硬币，又有一枚磨损严重，周缘缺口的等值硬币，他会选择花掉坏的这个，留下好的那个。于是，良币被储藏起来，劣币加入流通。在 17 世纪 90 年代，这意味着，一边是旧先令进入铸币局重新铸造，一边是新的足银先令被大量熔化和出口。估计流通中银币的价值从 1695 年的 1200 万英镑降到了 1696 年 6 月的 420 万英镑。虽然流通中的金币和大额交易才用到的银行票据不存在相应的下降，但剧烈的通货紧缩还是发生了。物价下降了，地主和债主们捡了便宜。所产生的长期效应是，英国继续向实际上的金本位迈进，而如今被高估的白银，开始从流通中销声匿迹。这次变迁的背后是洛克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金银才是商业的工具。它们具有内在价值，这个价值取决于人们的共识。货币唯一不同的是，它含有确定其重量和纯度的标记。

对此，尼古拉斯·巴本（Nicholas Barbon，死于 1698 年）声称，是货币（铸币），而不是它含有的白银，在驱动贸易。就是说，当政府用一定重量的白银铸造更多（或更少）先令的时候，是在增加（或降低）货币的供应量。人们赋予其价值的是货币而非白银。可到头来，在地主和债主们出于自利动机的支持下，取胜的还是洛克的自然法理论。1717 年确定的金价是每盎司 317 先

令 10.5 便士，这个被人们视为几近神奇的数字，直到 1925 年才终于废止。诺思等自由贸易主义者的论点虽能解释英国王政复辟以来的繁荣现象，事实却证明，贸易差额论能更好地服务于政治统治阶级的需要。

17 世纪英国的经济学

17 世纪的英国不偏不倚地进入了所谓的“重商主义”年代。它产生了贸易差额论，说不定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特征，而芒的《得自外贸的英国财富》正是日后的亚当·斯密当做重商主义思维的代表作而加以抨击的对象。然而很明显，若说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特征就这么简单，大体是会使人误解的。就连曾在本世纪晚期用来为保护主义作辩护的贸易差额论，也被它的发明者——米塞尔登和芒拿来捍卫经济自由了。

整个 17 世纪中，英国经历了数不清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刺激了商人和政府顾问们为各自的利益而鼓吹各项政策。在多数领域免于审查制度的环境下，在理性观点有可能影响政策的政治制度下，他们撰写了数量空前的探讨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他们论证各自论点的方式受到了科学的深刻影响，而科学也正是人们同样有勃勃兴致的学科。与此同时，本世纪的政治骚乱向人们提出了关于社会组织力量的基本问题。尽管霍布斯的作品正好落入了政治哲学的领域，而不是经济学领域，但他提出的挑战与社会整体相关，特别到了 18 世纪，他的作品被许多无疑是研究经济学的学者所采纳。

5

18 世纪法国的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

专制国家的问题

导致 17 世纪的英国兴起如此多关于经济问题的作品的诸种条件，在法国找不到。那里保留了比英国更多的封建制度，只是有些封建职责实际上已经渐渐演变成了可交换的商品。国王掌握了绝对权力。整个 17、18 世纪，表达意见常常是十分危险的，国家可能把这样的人视为危险分子。本章所讨论到的学者中，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观，布瓦吉贝尔遭流放，米拉博被羁押。但在私下由皇室赞助的沙龙里，激进的观点确实是可以明确表达出来的。至于政治和社会批评，要么表达为一般原理来加以暗示，要么针对别国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指出来。于是，虽然 17 世纪法国在经济问题上的作品较为稀少，但在 18 世纪得到了蓬勃发展，截至 18 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黎已经成了欧洲经济思想的中心，

吸引了大多数领袖人物。

法国政府的政策框架是17世纪制定的，制定人是从1661年起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的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柯尔贝尔并不是经济学家。他没有写过经济问题的专著，甚至据说他也没有广泛阅读过这个学科的书籍。但他的政策代表了这个时期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类型的特征。他的主要目标不是提高人口的福利，而是增强国王的实力。在国内，他希望从政治和经济上联合整个国家，这么一来，比如说，不允许出现一个地区闹饥荒，另一个地方富得流油。对外，贸易总量被看做固定的，这样一国的收入必须与别处的相应损失相等。假如法国要取得收入，只可能是以英国或荷兰为代价。

柯尔贝尔的政策从逻辑上来自这些信仰。他努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样既实现了国内的自给自足，又积累了能够推动贸易的财宝。他作出多项努力，增加人口和保持工资低水平，这样就会强迫人们努力干活。他通过发放补助金鼓励外来的熟练工人移民至法国，同时试图阻止这样的人移居国外。贸易受到了精心管制，新的产业建立起来了，有时候外国工人也参与其中。

法国长期面临严重的金融和经济问题，柯尔贝尔的政策也没能解决。直到很久以后，因饥饿死亡的现象才成为过去。一整个世纪，食品短缺都是普遍现象，但该国其他一些地区时而出现食品富余现象。短缺的情形在城镇里特别厉害，因为这些地方的需要开始超过传统腹地所能提供的资源。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想尽，包括固定物价、禁止粮食投机，甚至直接威逼生产者，等等，却并没有废除税收，没有废除食品进口壁垒，其实这

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政府还面临长期的财政困难，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们的军事支出。这个国家总在破产的边缘徘徊。神职人员和贵族掌握了该国的大部分财富，却多半不必缴纳直接税。而对有责任纳税的人，这样的税收负担又极其不公平。征税过程任意武断，显失公平。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该国并没有负责自己征税的管理部门，而是把这个工作包给私人公司。这些公司将双方协议的税额送交国库，以换取征收某些税种的权利。这个过程缺乏效率，还常常使用不公平的征税手段。1738 年，这样的情形达到极致，某些地区的徭役制蔓延到了整个国家。

18 世纪早期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对路易十四的经济政策较早提出批评的有皮埃尔·德·布瓦吉贝尔（Pierre de Boisguilbert，1646～1714 年）。在《法国详情》（Détail de la France，出版于 1695 年，或许写作于更早时期）和以后 20 年中的一系列其他出版物中，布瓦吉贝尔努力解释了，在路易十四治下他认为危险的经济衰退现象。他认为，过去 30 年里收入减半了。他的分析出发点是：交易是必要的。当经济发展的时候，交易变得愈加复杂，所以有必要使用货币。但货币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若想取得这个效果，货币得流通活跃才行。假如货币能快速流通，或许汇票之类的货币替代品也来加大流通量，就能取得和加大货币供应量一样的效果了。纸币可以执行金属货币的功能，又具备零生产成本的优势。

是什么使货币保持流通？布瓦吉贝尔认为，是消费。因为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因而消费和收入相等。因此，法国的收入衰减可以有助于消费的衰减。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布瓦吉贝尔的回答包括：一、税收负担；二、收入分配轻贫重富，穷人花钱很快，富人却更可能储藏财富；三、不确定性，因为它的存在，有产阶级才不那么乐意投资。但更根本地说来，布瓦吉贝尔把繁荣和价格体系相联系：繁荣要求不同物品之间存在平衡或均衡，而且“不仅价格之间要保持比例，而且价格和创造物品所必需的成本之间也需保持比例”。

这个见解使布瓦吉贝尔总结出，能够维持秩序和和平的，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国家。买者和卖者固然都受到利润的驱动，但买卖需要之间的平衡迫使双方听从理性的安排。所以，虽然人们只关心各自的利益，但只要国家不予以干涉，他们会对公众福利有所裨益。国家的作用则是建立安全和公正的机制。

不过，虽然布瓦吉贝尔把市场看成正在建立的秩序，却认为市场有时也失灵。不确定性和不恰当的期望意味着产品价格会波动不定。这在粮食市场上特别引人注目。那里的价格总是动荡不定。高价说明连最差的土地也能有利可赚，从而导致粮食泛滥，推动价格降到所有农民都亏本的地步。因此，布瓦吉贝尔建议，给他的自由放任规则制定一个例外，即政府应当通过买卖粮食储备，干涉并稳定粮食价格。

布瓦吉贝尔提出，纸币能以更低成本完成金银的功能。苏格兰人约翰·罗（John Law，1671～1729 年）的《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A Pro-

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1705 年）采纳并深化了这个想法。和布瓦吉贝尔一样，罗从两个前提条件说起，一个是，物品价值不取决于货币数量，而是取决于物品数量与对物品的需求量的比率；另一个前提是，货币的作用是促进贸易。因此，增加货币数量会增加就业，使更多的土地获得收成，并增加产出和贸易。罗还研究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只要增加商业活动，平常没有利用的资源就可以投入使用。不过，当重商主义者的反应是坚决主张采取措施聚敛金银的时候，罗却主张扩张纸币数量。纸质的通货不但便宜，还有一个优势：它的供应量能够受到管制，以便稳定其价值和经济活动水平。要根据土地契据发放贷款，才能获得安全保障。据罗称，土地的价值比白银的价值更稳定，同土地的价值相联系，通货的价值就可以得到保障了。

罗设计这个提案，是为了复兴苏格兰经济，可他 1705 年向苏格兰议会提交议案，却遭到了失败。1706 年，他不得不逃离苏格兰。原因是 1694 年，他在一次决斗中杀了一个人，被俘后，在当局的默许（说不定还有协助）下，逃过了牢狱之灾。但 1707 年该国同英格兰的联合增大了他重陷囹圄的可能。他定居在法国，说服了路易十五的摄政王，将他的一些想法作为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的一条途径而付诸实施。

1716 年的巴黎，罗组建了国家银行，1718 年国有化，改称皇家银行。征税时，国家接受该银行发行的票据。反过来，罗承诺，要降低利率至 2%，把被路易十四的历次战争拖得虚弱不堪的法国财政恢复得井然有序。然而，银行资产总共 825，000 里

弗赫[①]，相形之下，政府债务总额达 4.5 亿里弗赫左右。所以银行对利率的控制力微乎其微。渐渐地，罗被拉进了债务管理。罗 1717 年成立了西部公司，有了在路易斯安那的独家贸易权，作为回报，他接管了大笔的政府债务，税收承包的任务也集中在这家公司。为了偿付政府债务，他开始发行股票。罗使尽营销手段，出售西部公司的股份，经 1719 年一年，在皇家银行借款的支持下，股票升值了。1719 年 5 月，这些股票还以低于票面价值 500 里弗赫的价格出售，到了 12 月，就卖到了每股 10，025 里弗赫，1720 年 1 月，罗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这是法国最高行政职位。从 1 月到 3 月，还制定了废止金银流通的计划。

然而到了 1720 年 5 月，罗意识到，还需要继续把财政局势纳入控制之中，他提交了一个议案，逐渐降低股价，从无法持久的每股 9，000 里弗赫降到年底的 5，000 里弗赫。这一举措激怒了公众，他们还一度指望股价上涨呢（当时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期货市场，有些贸易是基于股价涨到 15，000 里弗赫的预期才发生的）。到了 9 月，股价降到了每股仅 4，367 里弗赫。这段时间里，银行票据的过度发行已经大大降低了股票的价值，因此，此举掩盖了崩溃的程度。如果用英镑计算，同黄金相联系的话，那么每股股价从 302 英镑跌到了 47 英镑。大众的金融财产大半遭遇灭顶之灾，而政府债务却大大缩水了，因而政府受益了。虽然公司股价滑坡得厉害，罗依然坚信，若不是 1720 年马赛的那场瘟疫，公司一定能够坚持下来。这场瘟疫使人们不再需要银行票

---

① 里弗赫，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名，价值相当于 1 磅白银。

据，转而需要铸币，银行因此发生了流动性危机。

坎蒂龙通论商业的性质

有一个人，发现了罗的方案的缺陷，并及时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他的名字叫理查德·坎蒂龙（Richard Cantillon，约 1680 年或 1690～1734 年）。坎蒂龙是爱尔兰商业银行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住在法国。此人十分神秘。他的家毁于火灾，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他被大火烧死了；还有人说，是受迫害的仆人为了掩盖谋杀行为而纵的火。一年以后，他的一些文件被一个不知名的旅游者带到苏里南，于是又有了一个说法，说这场火灾是坎蒂龙掩盖其失踪的诡计。动机可能是逃避法律诉讼，保护 18 世纪 20 年代同罗共事时获得的财富。可这把火到底还是烧毁了他的绝大部分文件。他出版了《商业性质通论》（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 in General），可能写于 1730 年，却直到 1755 年才出版。这本书是以法文写的，假装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好绕过法国的审查法。有些学者把这本书看得非常重要，认为它标志着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诞生。

坎蒂龙的《通论》以土地是财富之源为开场白："土地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来源或物质。人类劳动力是生产财富的形式：财富不是别的，而是维系、便利、享受生活的东西。"许多经济学家把劳动力当做财富之源，其实劳动力只是根据需要而调整。假如一国有过多劳动力，他们要么移居国外，要么挨饿受穷。在一篇针对科尔伯特的政策的隐讳的批评文章中，坎蒂龙认为，多训练

工匠是不可能增加财富的。他把这件事比作光训练更多海员却不多造船。是土地决定了财富，而劳动力的数量将自动调整。

但是，坎蒂龙对一种劳动力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那就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购买物品以从事生产或贸易，却不保证一定获利的人。例如农场主，他们雇用人们为其劳作，耕种土地，却不知道谷物是贵是贱，也不知道收成是好是坏。商人成批地购买物品，却不知道消费者的需求是高是低，或者销出多少会输给竞争对手。不过，企业家在从事冒险活动的过程中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们依然和拿工资吃饭的劳动者一样，要依赖于土地所有者。

从把土地视为财富之源的观点引申出了两点暗示。一是，土地是价值之源。坎蒂龙的分析基于“内在价值”这个概念。这和市场价格不同。它是投入某种商品的生产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数量。假如是根据维持劳动力的生活所需的土地数量来确定劳动力的价值，它就会沦为土地价值论。比如生产谷物，一是需要种植谷物的土地，二是需要生产劳动力维持最低生活的物资的土地。相反，市场价格决定于供求关系，可能围绕商品的内在价值上下波动。

坎蒂龙从土地乃财富之源的观点中引申出的第二条暗示是，其他一切阶级都是以土地所有者为代价维持生活的。只有土地所有者才是“天然独立的”，因为是他们的支出决定了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因而决定了不同物品的价值。借用坎蒂龙某个章节的题目：“君主（尤其是地主）的爱好、时尚，以及生活模式，决定了土地的使用状态，造成一切事物的市场价格的多变

性。”他举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大型地产为例。这块地最初是由所有者自行耕种的，后来指派了监工来管理，好生产他想要的物品。这块地是否要分成牧场、耕地、公共用地、果园、花园，还是别的，全凭所有者的喜好而定。他当然得留出足够的土地生产物品，供他的劳动力消费。坎蒂龙接着考虑，假如所有者下放决策权，把监工扶植为独立的生产者，配给相应数量的土地，通过市场与之联系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他的结论是，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和从前一模一样。只有当所有者改变自己的消费模式时，经济活动才会有变化：

> 因为假如有些农民种植的谷物比平常多，他们必定喂养更少的羊，拿去卖的羊毛和羊肉就更少。于是就有太多的谷物和太少的羊毛供居民消费。因此羊毛变贵了，迫使居民穿旧衣的时间比平常更长，而且有太多谷物，下一年也有剩余。因为我们假设土地所有者规定，要以白银的形式将农场上三分之一的产品交付给他，所以，有太多谷物和太少羊毛的农民将无力付他地租……于是业已差不多达到这个消费比例的农民将把农场的一部分作为草地，好收成干草，另一部分收成谷物、羊毛等等。除非他看到可观的需求变化，否则不会改变计划；可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已经假设，所有人都像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土地的时候那样生活，于是农民将为了和从前一样的目的利用土地。

比方说，如果土地所有者要开除一些家里的仆人，增加地产上的马匹数量，谷物就会变得便宜（因为需求少了），干草变贵（需求增加了）。于是农民们会把谷物地变成草地。

纵观这场探讨，和坎蒂龙对价值的探讨一样，他说得很清楚，他只研究长期均衡问题："我不考虑年成好坏造成的市场价格的各种变化，也不关心外国军队或其他事件造成的额外消费，这样就不会把我的主题复杂化，我只考虑自然和统一的条件下的状态。"

坎蒂龙考虑过生产和财富之后，转而思考货币。这里，他的思想很大部分归功于洛克。他集中研究货币的流通，承认物价水平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联系。但是，他这样批评洛克：虽然"他清楚地看到了，充足的货币把样样东西都变贵了……但他没有想过何以如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坎蒂龙思考了货币进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货币的流通渠道。他考虑了可能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三种主要原因：金矿银矿、贸易平衡、外国势力的补贴。

如果货币来自矿藏，那么受到影响的首推矿产所有者和矿业工人。他们将增加收入，支出更多，而这将提高他们所购物品的价格。于是农民和所购物品生产者的收入也增加了，后者反过来也增加支出，从而提高其他物品的价格和其他人的收入。货币逐渐流散到全国各地，所到之处都提高物价。靠固定收入吃饭的阶级，比如由长期协议固定好地租的土地所有者们，除非他们能够重新协商租金，否则他们的日子就难过了。当价格上升，生产者会发现，自己的成本也涨了，不得不进一步提高价格。随着价格的持续攀升，人们将更乐意从海外购物，因为那里的物品依然便宜。这么做会毁了生产者们。当出于矿产资源耗尽等原因，新的货币不再流入国内，收入会下降，人们开始削减开支。货币变得稀缺，穷困潦倒的窘境接踵而至。由于大部分金银已经流出国

外，好偿付增加了的进口，该国的货币最后将并不比邻国多。坎蒂龙认为，西班牙自发现美洲以后出现的情形差不多就是这样。

反之，假如货币的流入是来自贸易顺差，就首先是增加商人的财富。于是生产出口品的那些人的收入也增加了。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也将提高。然而，由于货币是增值给热衷于创造财富的勤勉努力的人的，他们不但不会增加消费，反倒积存下来，除非他们有充足的货币投资，好获得利息，或者去购买土地，只有到那时候他们才会增加消费。物价的上涨导致物品出口，坎蒂龙认为，这样的情形可以持续多年。其效果将有别于来自矿产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结果。因为，货币是被不同阶级的人接受的，他们的支出行为不同。

外国势力给予补贴的效果决定于货币是被储藏还是被消费。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有效果，价格才会提升。

坎蒂龙认识到了当时所谓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这个观念是说，增加货币供应量将提高价格，结果产生贸易赤字，导致货币流出本国。纯粹从形式上说，这个机制的含意是，想增加货币供应量，纯属自我拆台。于是坎蒂龙可以这样写：当一国的货币供应量因而其财富达到顶峰的时候，该国“必然按正常情况陷入贫困”。这一点看似破坏了增加货币供应量能造就繁荣的观念。其实，坎蒂龙也可以写“显然只要维持充足的货币量，每一个比邻国拥有更多流通中的货币的国家都会更有优势”。国内价格更高，说明同等数量的出口品将换来更多的进口品。此外，拥有足够的货币，统治者征起税来就更加轻而易举。价格要按这样的方式上涨，就有必要把货币保留在本国。货币得自贸易，比

得自矿产资源更有可能，因为以货币得自贸易的方式发财的人，更有可能将货币用于投资而非用于奢侈性消费。

讨论过货币之后，坎蒂龙转而谈财政。他谈到的话题包括外汇，当做货币使用的不同金属的相对价值，通货降低成色的问题，最后还有银行问题。和罗一样，他也认为银行可以对一国有价值，这个价值是由进入流通的纸质通货来衡量的。据他估计，英格兰银行持有的储备相当于 100 万盎司左右的白银，但它的票据平均算来有 400 万盎司白银。他声称，货币流通的速度需要加快的时候，是对英国极为有益的。银行对于稀缺白银的小国特别有利。但是鉴于 18 世纪 20 年代早期的经验，当时英法两国都经历了戏剧性爆发的投机泡沫，坎蒂龙指出，如果银行增发太多的票据，会有无力偿债的危险。他曾经设法及时逃脱罗的计划的陷阱，这个前车之鉴，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背后有些最重要的思想，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的英国，追溯到洛克以及与培根、牛顿等相关联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是对理性、进步、自由和忍耐的信仰。理性，据信是人类的核心能力，人类依靠理性来正确地思考和行动。所有人因拥有理性而平等，因此每个人都应按照他的理性的指引而自由地行动和思考。所以，启蒙运动是对以前所谓的非理性的反抗——要用理性取代宗教当局、经文和传统，成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说到底，启蒙运动是以对进步的信仰为特征的。用理性取代迷信，使

人类无需神助便可以进步。牛顿已经展示了物质世界是可以用一套规律系统加以理解的，是可以通过理性加以领会的，而洛克也展示了人类的头脑可以利用感官经验的基本数据建立复杂的思想。按照同一精神，洛克还为道德提供了功利主义框架，为代议制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

针对传统思想的这些挑战遭到了法国路易十四的压制。审查制度一直存续到路易十五（1715～1774 年在位）时期，只是已不那么严厉。多年来印刷依然受到控制，如此一来，异端邪说只能以手抄的形式流通，不可能像印刷品那样传播得快。但是毕竟管制放松了，被禁锢已久的对于已有思想和制度的批评，如洪水一般迸发出来。18 世纪 40 年代中期，审查制度大大松懈，接下来的 10 年马上见证了大量新思想的涌现，它们来自研究知识与道德的相对性的狄德罗（Diderot，1713～1784 年）、研究法律准则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 年）、发展了洛克的心理学的孔狄亚克（Condillac，1715～1780 年），等等。狄德罗和达朗伯（d'Alembert，1717～1783 年）代表了这场运动最乐观向上的一面，他们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将人类所有知识都收录其中，为传播新思想服务。1751 到 1772 年间，尽管有当局的定期查禁，他们还是出版了 28 卷。《百科全书》涵盖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也包括了有关经济问题的条目。

重农主义

重农学派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经济学家团体。重农主义思想是

1756 年到 1763 年间得到发展的，发起人有两个：一个是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 年），一个是维克多·里凯马奎斯·德·米拉博（Victor Riqueti，Marquis de Mirabeau，1715～1789 年）侯爵。当时正是同英国的七年战争给予法国财政巨大压力的时候。他们定期开会，讨论重农主义思想。他们有一本杂志叫《农业、商业、财政杂志》（Éphémerides），1767 年和 1772 年间公开发表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农业哲学》（La Philosophie rurale，1763 年）可以看做重农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重农主义吸引了忠实的信徒，其中就有杜邦·德·奈德尔（Du Pont de Nemours，1739～1817 年）和梅西耶·德·拉里维埃（Mercier de la Ricière，1720～1793 年）。当时还有倾向于重农主义，但不完全赞同其思想的杜尔哥（Turgot）。从 1774 年到 1776 年，杜尔哥任职财政审计总长期间，发起了一系列改革，这背后就隐藏了重农主义思想。

魁奈转而研究经济学之际，已经赢得了医生的美名，他先是当外科医生，后来是内科（当时在英法两国，这个职业的地位非同一般）。他在法国王室的身份是路易十五的庞巴杜王后的内科医生，因其医疗服务而获得头衔和可观的财富。他的医疗背景十分重要，因为它影响了魁奈对于经济学的见解。魁奈转向经济学研究，努力分析社会病症的机理，并提出了疗救方案。他深受布瓦吉贝尔和坎蒂龙（米拉博曾大量借用他们的作品）的影响，将注意力放在货币流通上——这显然是由一个世纪前发现的血液在体内循环的道理类推而来的。这说明“重农主义”这个表达了自然规则的词汇反映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的态度，他深知治

病的时候了解自然机理的重要性。同等重要的是，重农主义体系是建立在对法国社会结构的明晰分析的基础上。

为了了解社会，魁奈和米拉博在《农业哲学》中声称，有必要了解社会得以维持下去的手段。政治和法律均有赖于此。他们强调了社会的进化，认为伴随着农业社会而成长的商业社会是社会发展进程的终点。贸易是重要的，因为贸易提供了维持生计的可靠手段，可农业仍然是根本大计。其中的主要原因，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才获得净收益，也就是获得超过生产必需成本的盈余。他们这样表述观点：农业是有效率的，其他部门（贸易和生产部门）没有成果。

重农学派关于不同阶级的假设是从魁奈对农业的观察结果发展而来的，这个观察结果最初发表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一篇文章上。多数土地是由收益分成的佃农耕种的，他们将收成的一部分（通常是一半）交给土地所有者，以便换取土地使用权，借得种子、家畜。比起采用最少资本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农民所有者来，采用他们的生产手段，效率一点也不高。反倒是在法国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英国，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农民阶层——农业企业家。这些人能够改良从所有者（通常是贵族或教会）手中租来的土地，能够生产大量剩余产品。农业企业家和收益分成的佃农之间，最关键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能获得资本，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能够采用更有效率的技术。反过来，为了生产人们所需的物品，勤劳固然重要，但勤劳并不产生剩余产品。它只能弥补成本。因此农业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农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魁奈的《经济表》

（Tableau économique）的好几个版本中得到了解释。第一版出版于1758年。这是一张图表，显示了货币和物品在社会的三个阶级（所有者、农民、工匠）中间循环流通的模式。假设条件是政策对于农业发展而言非常理想。不同版本的《经济表》中，魁奈列举了经济按照他所强调的思路运行所必须满足的24项条件。其中包括：（1）全部收益都进入流通。（2）人们并不是害怕不安全才储藏货币。（3）税收不会破坏国家收入。（4）农民有充足的资本获得起码100%的净收益（剩余）。（5）原材料自由地对外贸易。（6）一国完全靠国富民强来满足需要，而不靠金融家举债。（7）人们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办法耕种土地。既然这些条件没有一项得到满足，要实现它们，等于是安排一个巨大量的政策日程。

《经济表》的出发点是农民拥有200万英镑（谷物形式）的资本或“年预付”，而所有者拥有200万英镑的货币储备。农业产出100%的剩余产品，作为地租交给所有者。首先考虑货币流通的问题。所有者在食品上花了一半的收入（200万英镑），又在制成品上花了一半，于是每个部门流入了100万英镑。由此产生的收入又被花费出去，一半在食品上，一半在制成品上。每个部门因此又从其他部门获得50万英镑。如果将以后各个回合的收入加总，将得到每个部门200万英镑的结果（100 + 50 + 25 + 12.5 + ……）。因此，每个部门得到200万英镑的收入，又花去100万用于购买其他部门生产的消费品。但是两个部门存在重大差别。制造部门用剩余的100万购买农业原材料，结果它没有产生剩余。整个货币储备（200万英镑）因此将终结在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以 200 万英镑的财务剩余告终，这笔钱则交给所有者作地租。

为什么农业能产生这个财务剩余？原因是，它和制造部门不同，它生产了剩余产品。200 万英镑谷物的“预付”被用来生产价值 500 万英镑的产出。其中，100 万作为食品卖给所有者，200 万卖给制造部门，一半是食品，一半是原材料。最后留下价值 200 万的谷物，来补充下一年的资本储备。这样就平衡了。

魁奈详细探讨了这个以数字表示的例子，来证明一个重要论点。虽然关于收入循环的基本见解是来自布瓦吉贝尔和坎蒂龙，但魁奈努力以他们作品中所缺乏的缜密思维，来发展自己的观点。魁奈的数据看似武断，其实不然。它们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可以获得的法国经济的统计数据。例如说，100% 的剩余，就反映了魁奈确信，只要资本家有充足资本去采用最有效手段（例如使用马匹），是能收获如此多收益的。这些手段在英格兰南部和法国北部一些地方的大型农场就采用过，但很多法国农民花不起这个钱。这样的数据化案例也使得魁奈在后来几个版本的《经济表》中，揭示了经济制度对于各种变化的敏感性。比如，他向人们展示，如果对两个部门征收 2.5 万英镑的税，结果农业部门的年预付就从 200 万减少到 195 万。其中，农业部门直接损失 2.5 万，因制造部门销售量减少而间接损失 2.5 万。于是，下一年的产出将减少，经济将衰退。同样的，他还可以说明，（可能因政府干预或维持谷物低价而导致的）生产力的下降，或者从农业部门转移支出到制造部门，都会减少产出。

以《经济表》为核心的重农主义制度，被用来捍卫一套清晰

而且富有争议的政治日程。维持市场和收入的循环流动需要国家。魁奈用《经济表》演示说明了，若最初的假设条件得不到满足，产量将如何减少。税收，干预农业，人为地刺激制造业，保持食品低价——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政府的这一切政策都是有害的，应当废除。国家可以采取什么政策而不削弱它所依赖的繁荣，自然规律是给予了约束的。但自然规律并没有规范一切国家行为。对带给所有者的剩余是可以征税的（就好像有必要为支撑市场而筹资一样），但税收不能提得太高。理由是，所有者的支出对于维持年收入与年支出的流动是必要的。

杜尔哥

不是所有改革者都属于重农学派。有一个团体，虽然在经济政策上支持重农学派，但却站在另一个立场上。它的核心人物就是文森特·德·古尔奈（Vincent de Gournay，1712～1759 年）。古尔奈是商人，因买下商业监督官的职位而摇身一变成了公务员。这个位置他从 1751 年坐到了 1759 年。他的工作是游历法国各个地区，调查各地的贸易和制造业。古尔奈普及了“自由放任，由他去吧”这句话。可能他还安排了坎蒂龙的《商业性质通论》的出版事宜。他自己著述极少，却对其他人影响极大，其中就包括杜尔哥。

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 年）在 1759 年写的一篇颂词中说，古尔奈不认为自己是把理论系统化的人，而是提供常识性真理的人。重商主义制

度允许法国城市把其他城市的市民看成外人，不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干活，要么就是仅仅因为织工织的布比不上同业公会的，就毁掉织工的生活——这样的制度毫无意义。杜尔哥认为，虽然古尔奈把有争议的问题当成常识，但这背后确实存在一个基本原理："总的来说，谁都比不关其利益的人更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他认为，古尔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当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完全一致的时候，最好应该给予每个人随心所欲的自由。如今在商业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德·古尔奈认为个人利益不和大众利益共存是不可能的。

因此政府应该给一切商业部门恢复自由——除去贸易壁垒，简化税收，给予每个人工作权。这将"激励最大限度的市场竞争，这样制造业绝对会生产出最完美的产品，并给予买者最有优势的价格"。

杜尔哥对于经济学的首要贡献是批评罗 1749 年的货币理论。18 世纪 50 年代，他遇见了古尔奈，共同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乔赛亚·塔克（Josiah Tucker，1712～1799 年）的一本书，又陪同古尔奈巡查各省。1761 年，他受命担任法国一个落后地区利穆赞的监督官。在那里，他参与了改革过程。所涉及领域包括税收、收获季节的徭役制度、道路系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对经济学产生重要贡献的作品。他作为政府官员的义务决定了这些作品大多为信件和报告，只有两个例外：《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1766 年）和一部未完稿的文论《价值与货币》（Value and Money，1769 年）。

1774 年，杜尔哥晋升为财政审计总长，迁到巴黎居住。在这里，他又一次参与了改革。他对于终年不绝的食品短缺问题作出的回应是，放开粮食贸易。但他仍然禁止出口谷物，并对供应巴黎的粮食预先作了特别安排。对垄断了（生产弹药所需的）硝石生意的经营不善的私人公司，他用国有企业取而代之，交给化学家拉瓦锡经营。邮政服务也转交给了政府部门，类似的进一步改革也在酝酿之中。1776 年，杜尔哥设法进一步放开谷物贸易，对于设立了行业进入壁垒的很多同业公会，他予以取缔，又通过向土地所有者而非徭役征税，来为道路建设筹集资金。他还出面支持提倡隐忍做人的新教徒们。然而，这些措施触犯了众多既得利益者。结果，杜尔哥失去了其他朝臣的支援，在他的前任重建的最高法院，他受到了攻击。他设法利用国王的权威强行推进改革，对立方却想办法使路易十六反对他，他被逐出朝廷。许多改革措施遭到废除。

杜尔哥的改革注重实效，这与他在两本系统性经济学著作中强调的经济现象观也是相互一致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前几个部分都可以由重农学派来写。他探讨了交易的起源和农业的崇高地位，也探讨了农夫之于工匠的卓越地位，并对生产性阶级和非生产性阶级作了区分。和魁奈一样，杜尔哥也探讨了农业组织的不同方式，认为由租地的企业家来耕种是最有效率的，但也只有在资本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可当他讨论到借贷也能有益于财富的创造时，又采用了另一个方向的论点。由此引发了对货币在商业中的作用的讨论，最后，对于工业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问题，他产生了大不同于重农学派的见解。

人们存钱的时候，是在积累今后可派上多个用场的资本：可以有息借贷，可以购买土地（从而产生地租），可以当做预付用在工业上（以获得利润）。杜尔哥认为，由于人们有这样的选择，三种用途的资本的回报将互相关联。它们并不相等，因为各自的风险是不同的。假如你借钱给别人，借款人可能无法还钱，可假如你购买土地，还是可靠的。于是土地的回报低于有息借贷的回报。与此类似，投资于工业风险更大，将带来更高收益。于是竞争将在资本的不同利用方式的回报之间建立一个均衡。比方说，如果相对于资本的其他用途，土地的价值太高（相当于回报太低），所有者将换用资本的其他类型，土地的价格将被压低。

均衡利率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它“直接决定于借款人的需求和出借人的出价之间的关系”。节俭会增加出借人的数量，而减少借款人的数量，而奢侈性消费具有相反的效果。杜尔哥还认为，欧洲利率的下降说明，节俭战胜了奢侈，使资本数量增长了。这个观点引出了他的主张，即利率是和其他价格一样的价格，应该和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由“贸易过程”来决定。利率将决定耕种哪些土地或从事哪些工业活动会有丰厚利润。

这个观点的重要特征可见于 17 世纪的著作中，特别是洛克写利率、芒写资本的著作中。但较之先人，杜尔哥将这个理论的多种元素更好地结合起来。此外，他还利用这个理论，较之同时代人更加明晰地回答了国民财富的构成问题。换用现代术语来说，他的回答是，国民财富是土地净收益的现值（即土地的价值）加上可移动物品的存货。就其本质而言，这也是任何一位现代经济学家会给出的回答。杜尔哥明确指出，若是把“借贷资

本”（金融资产）包括在内，会发生重复计算，虽然货币是储蓄的对象，但铸币（一种可移动物品，因而是财富的一部分）其实是财富构成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在就财富性质的论辩过程中，杜尔哥揭示了价值的本质，这个主题在他后来未完稿的作品中得到了发展。他一开始就假设物品的价值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取决于物品是否适合服务于它被要求的用途，也取决于获得该物品的难易程度。价值的这个概念可以描述为“估计价值”，因为价值是决定于对持有物品的评价。杜尔哥认为，价值的衡量是没有自然单位的，一种物品的价值需用另一种物品来衡量。例如，我们可能说，多少捆柴火的价值等于一个单位粮食的价值。实际上，既然有这么多物品，价值就根据惯例所赋予的任意一个单位——记账单位——来衡量了。如果一切物品都用同一个记账单位衡量，就可以随便计算任何一对物品的相对价值。

杜尔哥对“估计价值”的探讨适用于封闭的个人。他由此出发，继续考虑一般会对物品作不同估价的两个人之间的交易。他假设，两个物品将按照双方“估计价值”的平均值来交换。如果不是这样，总有一方的获利少于另一方，就会迫使另一方向他的价格更靠近一点。这就确定了杜尔哥所称的“交换价值”。尽管从概念上，它有别于表示为一个物品付的钱的“价格”这个词汇，但交换价值和价格从数量上是相等的，在很多场合可以交换使用。最后，杜尔哥推出了第二对贸易商，这样他就有互相交流的四个人了。两个出售木头，另两个出售谷物。他强调了竞争是如何迫使每种物品的两个买者接受同一个价格的。

发展主观价值论的，杜尔哥不是唯一。相反，这些理论由来已久，可以从萨缪尔·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1632～1694年）和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年）这样的自然法哲学家们，一直追溯到经院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但到了18世纪，主观价值论的最明确表述还是来自意大利经济学家们，其中，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1728～1787年）可能是最杰出的代表。1751年，加利亚尼出版了《金钱论》（Della Moneta），这是杜尔哥在关于价值的论述中引用过的少数作品之一。1759年，他被任命为那不勒斯驻巴黎大使。在那里他一住就是10年。全亏了魁奈，这10年正好是政治经济方兴未艾的时候。但加利亚尼不是重农主义者，他批评允许自由出口谷物的政策，因为当时连内贸都存在大量壁垒。《金钱论》明确表述了这个理论，说明价值是主观的，只能和另一些物品的价值联系起来衡量。杜尔哥采纳了这个理论。效用和稀缺性是用于解释价值的重要因素。加利亚尼认为人类是衡量价值的普遍手段，杜尔哥声称这个论点是“价值的一般理论所包含的最新、最深奥的真理之一”。

旧制度下的经济思想

一旦一度严格的法国审查制度松懈到允许与政府对立的作品出版，改革就成了推动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议题。许多人把税收和管制视作沉闷的行当。在这个背景下，难怪涌现了如此多的学者，从那个世纪初的布瓦吉贝尔，到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杜尔哥，

都在发展自由放任学说。政府限制农业的结果，无疑为重农学派再三强调农业的生产力提供了部分借口（虽非全部）。资源必须转入生产过程这个柯尔贝尔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他们要考虑的。

虽然经济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的刺激而引起的，但还是发展了许多抽象的思想。坎蒂龙的主要著作就是从总体上探讨商业性质。重农学派走得更远，他们发展了经济活动的抽象的数字化模型。杜尔哥虽然亲身参与了法国的治理，并试图改革，但也探索了财富、价值之类抽象概念的含意。事实证明，这段时期的法国经济学家产生的思想能在下一个世纪的各大场合下被采纳和利用。法国的思想通过亚当·斯密和大革命之后著书立说的学者让·巴蒂斯特·萨伊等，灌输进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其中，亚当·斯密深受魁奈和杜尔哥的影响。《经济表》激发了卡尔·马克思的灵感，但他的经济观点很难说有什么不同。

6

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从欧洲那片落后地区兴起的、欣欣向荣的、引人注目的那场知识分子运动。当时运动醒目到连同时代人都有所觉察。1757 年，不独大卫·休谟一人观察到，它“真的美妙至极，这时候这个国家诞生了多少天才人物啊”。爱丁堡、格拉斯哥、阿伯丁的大学是这次运动的核心，那里涌现了对 18 世纪的经济思想（更一般地说，是社会思潮）作出了最杰出贡献的人。

同苏格兰启蒙运动相关的社会思潮有几大特征，即使不算独一无二，总比其他国家的思潮更深一步。这种社会思潮是长期的。它不否认已有宗教的原则（当时作这样的否认依然危险，特别对于在大学任教和身处那个世纪早些时候的人而言），但它关注穿衣吃饭，关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坚持不偏不倚的、科学而客观的立场，不拘泥于正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自认是培根、牛顿以及 17 世纪科学家们的继承者，同时也继承了自然法哲学的一些重要元素。此外，更特别的是，苏格兰启蒙运

动具有清晰的、社会的，尤其是历史的焦点。这场运动中的学者们都明白，不同社会有不同习俗，他们努力发掘其中的缘由。从中他们因循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1748 年）的思路（此书由休谟翻译成英文）。但苏格兰学者们，特别是亚当·斯密，比孟德斯鸠走得更远，他们还努力解释人类社会是如何变迁的。他们想记录下公民社会的历史。

这些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议题：人性亘古不变。休谟说得很清楚：人类可以通过历史来发现，什么是“连续而普遍的人性原理”。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学者们还想考察环境是如何受人性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虽然基本的人性不会改变，但人类的行为可以改变环境，并创造出发生不同行为的新局面。苏格兰学者们被引向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社会已经历了好几个历史阶段。原始社会是建立在狩猎和采集自然果实的基础上的，没有任何社会组织。随着野兽的驯化，出现了牧地，财产可以被个人拥有，于是社会地位出现了不平等和差异。接下来是农耕阶段，土地渐渐被视为财产，可以为人所拥有。这也是遗产变得重要的阶段。法律制度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最后出现了交换经济，社会分割为不同阶级，各以各的方式谋生。分工提高了生产力，也使人们更加互相依赖。这是一种社会组织的进化理论，经济、政治和法律交织在其中。

社会进化的事实使人们既相信进步，又相信历史相对主义。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 年），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历史学家，写下了“前一个时代的初始状况，正在当代得到完善；而当代正在开始发生的状况，又将有待未来一个时代

去完善”这样的话。这样的见解具有明显的政治寓意。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于 1745 年发动叛乱，想扶植斯图亚特复辟王位，是眼光落后的表现。未来不在这里，在别处。可与此同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者们渐渐认识到，根据每个社会各自年代下的习俗来判断社会阶段，是十分重要的。根据现代社会下的习俗来判断并不合适。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背后存在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认识到，相比英国南部和东部，苏格兰是落后的。1707 年联合法案的苏格兰支持者们曾经希望它能刺激经济发展。他们还得面对相对发达的低地地区和十分落后的高地地区之间的巨大落差。然而，虽然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了，但苏格兰在几个关键方面保持了差异性。苏格兰教会是长老会制，加尔文主义者强调决策要由个人自己定。更重要的是，苏格兰的法律制度和英国的不同，它是以罗马法律为基础的。自然法虽不是普遍应用的法律，但却是基本法。封建元素依然存在（到了 20 世纪依然如此）。在英国，罗马法律无人知晓，在这里，人们却对它兴致盎然。

哈其生

弗朗西斯·哈其生（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 年），从 1729 年直至去世，一直在爱丁堡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被公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其实他的成就大半归功于前辈格申·卡迈克尔（Gershom Carmichael，1672～1729 年）。正是卡迈克尔向苏格兰推荐了德国自然法哲学家萨缪尔·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并出版了一辑他最重要的著作，并加上大量有影响的注释。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中间的联系是普芬多夫和卡迈克尔贯穿起来的。卡迈克尔的学说认为，商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商品的稀缺性，又取决于获得该商品的难易程度。他还认为，物品要么本来就有用，要么是人们认为它有用，否则没有价值。这些看法都不偏不倚地落入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

哈其生的人性观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他对曼德维尔的批评中。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rville，1670～1733 年），荷兰人，1699 年定居在英国，因《嗡嗡不平的蜂箱：流氓打翻了蜜》（The Grumbling Hive：or Knaves Turned Honest，1705 年）而在当时声名狼藉。这首 26 页长的诗后来扩成了《蜜蜂的预言：个人的恶行颠覆了大众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or Private Vices turned Public Benefits，1714 年）。这本书唤醒了大众为此大声疾呼，它不仅为自由市场和竞争作辩护，还给了视节欲为美德、视奢侈性消费为恶行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当头一击。曼德维尔还挑战了认为基督教道德是社会组织力量的观念。

曼德维尔的《寓言》讲的是一个兴盛的大蜂箱里住满了蜜蜂。所有蜜蜂都受到虚荣贪欲的驱使，恶行泛滥一时。财富分配不公，可所有蜜蜂，就连最穷的，都比其他情况下过得好。原因是，高消费创造了就业。甚至犯罪和欺诈都为诚实的就业创造了机会，比如夜贼为锁匠提供了就业机会。可是，虽然繁荣了，虽然经济增长了，蜜蜂们还是感到不安全。于是有一天，爆发了清教徒的道德革命。它们停止了犯罪和军事支出，摈弃了奢侈。结果是失业和整个工业的崩溃。很多蜜蜂弃蜂箱而逃。

故事的寓意很明确。人类生来自私，可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他们被引导着自愿做最好的事。个人的恶行产生了大众的利益。恶行不应受到鼓励，但人类能够认识到它的存在，并加以扭转，从而产生好的效果。曼德维尔却不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他认为，可以允许市场协调大部分经济活动，但他依然倾向于对外贸进行管制，以创造就业和为国家储存货币。政府也可以采纳很多计划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他对市场重要性的认识，反映了他的重商主义思想。

哈其生批评曼德维尔的观点，向人类纯粹自利的假设发起了挑战。哈其生说，人类是利他的，关心同伴的。这就是说，曼德维尔的奢侈性支出是国家繁荣昌盛所需的论点是错误的。人类会努力保证别人拥有各自需要的物品，于是，除非对必需品的一切需要都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需要奢侈性支出。曼德维尔假设人类自私，哈其生却和他的很多苏格兰同胞一样，认为人类受到各种动机的驱使，其中就包括生活自理的渴望，为他人着想的愿望，改善条件的渴望。正如人们希望从受到普芬多夫和卡迈克尔影响的人身上看到的，哈其生有一套关于价值的供需理论。几年以后，詹姆斯·斯图亚特采纳了这个观点。哈其生还强调分工的重要性，并把这一点同洛克推导出的财产的劳动力理论结合起来。而这个分工理论对于后来的亚当·斯密极其重要。

休　谟

如今，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 年）以其哲

学著作最为出名，但在他的同代人眼里，他因《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1754～1762 年）而被看成历史学家。历史的视角渗透到他的经济学方法中，形成了由 9 篇论文编辑而成的书，1752 年出版，并被收入《政治对话录》（Political Discourses）的一卷中。同时代的人还在怀疑经济学中抽象推理的价值，你却能发现，休谟在这一系列论文的开头，都是把他所谓的“精确而微妙”的推理，应用到如商业、货币、利息、税收和公共信用等“普普通通”的课题上，从而为抽象推理作辩护。这真是非常有趣。他请求读者，不要仅仅因为他的思想“脱离常规”，就对他不得不说的话产生偏见。休谟认为，公共利益取决于很多缘由，而不有赖于机会和少数个人的奇谈怪想。这说明，比如解释外交政策的时候，人们会用到某一类历史记录，但这一类记录并不适宜这个主题，这也说明，人们需要的是更一般的推理，只是这些推理可能导向一些陌生的结论。

休谟在这些论文中关心的是国家的强盛问题。他一开始就对国家强盛与国民幸福作了区分。奢侈性消费会提升国民的幸福，而如果国家把资源转移到国防和对外探险上，就会削弱国民的幸福。从这个意义上，国民的幸福与国家的实力、影响力之间存在平衡。然而，奢侈性支出对国家非常重要，因为有必要用它劝说人们从业。这就是需要制造业的原因所在——较之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制造奢侈品更能刺激农民从事生产。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他们宁肯整日无所事事。对奢侈品的渴望有利于国家，是因为，如果农民的收获比维持生存需要的多出一个剩余，国家就有资格并能获得资源，来供养舰队和军队。在农民自给自足的社会

里，将得不到合适的剩余。休谟从古希腊和罗马历史中取得了证据，以支持这个主张。

休谟的商业论和财富论的基础是：劳动力是财富的基础，仅当人们受到刺激时，才会提供劳动力。他写道："世间万物都是由劳动力购买的，我们的强烈喜好是劳动力的唯一缘由。"制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储备劳动力，以供一时之需。

> 制造能提高国力，仅仅因为它储备了如此多的劳动力，那种东西公众都有资格拥有，而无需剥夺任何人的生活必需品。因为从事制造的劳动力很容易转而为公众服务，因此，利用的劳动力越多于最低所需，国家越强大。没有制造业的国度，或许有同等数量的人手，却没有同等数量的劳动力，他们不是同一类型。那样的国度给了所有劳动力少得不能再少的必需品。

多半出于同样的原因，对外的商业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提高了一国的劳动力储备。

既已确定国家实力在于劳动力和商业，休谟接着推翻了货币即财富的观点。他说，货币仅仅是"推动（贸易的）轮子更润滑更好开动的油"。拥有更大数量的货币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价格也会按同一比例升高。唯一的例外就是，假如金银充足，最高统治者就拥有更多资源可供战时所需。而从其他方面看，货币数量大是劣势，高物价将导致制造业转向成本更低的海外。国家将失去劳动力。因此，休谟反对使用纸币，认为纸币损害制造业，即使它能提高国家金银储备，也不足以抵消其损害。

货币数量固然无关紧要，提高货币供应量则另当别论——通

货膨胀有好处。“我们发现，凡货币开始以更大更充足的量流入的王国，万象更新：劳动力和工业呈现生机，商人愈加有创新精神，制造者更加勤奋更加熟练，就连推着犁干活的农民都更敏捷更专心了。”对此的解释是，虽然货币能提高物价，但不会这么快。中间有一个间隙，货币供应量提高得快于物价提高的速度，在此间隙中，工业将受到刺激。而相反，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将对工业产生破坏性后果。对这个结论，休谟能拿出很多历史证据加以佐证。

休谟总结道，保持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才是最好的政策。但他又强烈反对利用“重商主义”政策达到这个目的。保持贸易盈余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为流入的货币会提高物价，使制造业转向海外，因而损害这种政策。他把货币比作海水：只有切断海洋的其他部分的水源，才能提高某个地方的水位。假如各个地区之间存在流动，货币将像水一样找到自己的水位。因此，重商主义政策的唯一结果就是干预贸易。进一步说，假如有人为了战时之需而提高金银储备，正确的方法是储藏而不是花销。如果货币从流通中消失，进入储藏，就不再影响物价。这一点和芒示范的重商主义观点相反，芒认为，提高货币供应量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流通量。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在世人所称的第一部英文版系统性经济学论述的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哈其生和休谟的著作中的许多主题。这本书的全名是

《政治经济原理调查：论自由国家的国内政策的科学，其中特别考虑人口、农业、贸易、工业、货币、铸币、利息、流通、银行、交易、公共信用以及赋税》（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which are Particularly Considered Population, Agriculture, Trade, Industry, Money, Coin, Interest, Circulation, Banks, Exchange, Public Credit and Taxes, 1767 年）。这个书名把“政治经济”一词引入了英文，它是由安托尼·蒙什雷蒂安（Antoyne Monchrétien，约 1575 ~ 1621 年）使用的“œconomie politique”翻译而来的。从 19 世纪开始，经济学逐渐成为具备独立特征的一门学科，从此，这个词成了它的标准名称。这本英文书籍也成了第一本使用“供求”二字来解释价格决定原因的书。

> 需求的本质是鼓励工业；只要定期生产，就可以发现，大多数产品的供给和它成比例……如果不定期，也就是无法预期，或者不能像往常一样供应……就会产生买方之间的竞争并提高货币，也就是平常的价格。

对价格作出解释之后，作者对竞争作了详细记录。他对自己所称的“双重竞争”给予了特别关注，也就是买方之间的竞争和卖方之间的竞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确定了价格的上限和下限，使不同个人的利益得到相互平衡。但这种平衡摇摆不定，对于平衡的结果，买方和卖方不可能明察秋毫。他们的决策以他们预期能转卖出去的价格为基础。因此结论是，囤积居奇（为了等物品短缺时倒卖出去而购进物品）是一项罪恶，因为本应存在竞争，应该保证物品按照真实价值售卖出去，而囤积居奇却消除了

竞争。

本书的作者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1712～1780年）。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分子，却和其他学者立场不同。他是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支持1745年的叛乱。觊觎王位的查尔斯·爱德华·斯图尔特（Charles Edward Stewart）任命他为驻法大使。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在库洛登失败后，斯图亚特一直流亡，遍游欧洲，直到1763年才返回苏格兰。

斯图亚特的流亡经历影响了他的写作。他开始非常怀疑政治事务的一般准则，因为考虑一个国家的事情，就需要把与该国环境相关的一切事物都考虑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习俗，这些都得纳入考虑范围。因此他写道，如果说这本书有任何美德的话，这些美德来自“我屏弃了英国观念，这样就能暴露在公平的光芒下，根据外国各自不同的情况来看待外国的观念和政策”。受欧洲大陆的影响，斯图亚特强调政治家（国王、议会或国家统治者的简称）的作用。正如他所说，他的书是“向政治家致敬”，虽然写作的目的是“影响他所治理的人们的精神”。这一点倒是和当时偏向自由、贬低国家行为的重要性的流行思潮相左。

斯图亚特的历史观和哈其生前后呼应，但他只区分了历史的三个阶段：狩猎采集阶段、农业阶段和交易阶段。从人口的增加来看，经济是增长了，但受制于食品供应量。在第一个历史阶段，人口受到土壤上自然出产的果实的限制，可一旦“劳动力和勤劳”用到土壤上，就能生产更多数量的食品，所以能保证更多人的生存。不过，如果农民生产的多于他们自身消费所需的，就得为他们的产品提供市场了，这就是第三个阶段。由此，斯图亚

特表述了两个原理：

> 自由民族从事农业，将增加人口，只有当贫困人口要靠出卖劳动力，才能换取生存所必需的物品时，人口才成比例……这种农业，如果要为了扩大居民数量而鼓励农业生产，它就必须跟上工业进步的步伐，否则必须为所有奢侈品寻找出路。

他声称，实践经验证实了这些原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主张在更为极端的重商主义观点和重农主义观点之间实现平衡。这两种观点，一个支持工业，另一个支持农业。这些观点，当他居留欧洲大陆的时候显然都遇到过。

和休谟一样，斯图亚特发现劳动力和财富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是，与 17 世纪晚期以来的英国经济思潮一致的是，他更加强调保持人们就业的需要。他认识到，失业是常有的事。他相信，国家应当想办法尽可能减少失业。想保持就业，就应该在供给与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应当给予最大的关注，来保证工作中的人手与对其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存在完美平衡。"需求一定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监察这一点实现与否，正是政治家的责任。

斯图亚特还具有当时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增长观。生殖和人口扩张不是一码事，因为如果出生率太高了，存活下来的孩子就会更少。人口可以为了回应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增长，但也只可能是在农业能生产更多食品的情况下。然而，农业所能提供的食品也是有限的，主要的限制就是农业成本在提高。食品价格的提高将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及工资成本。于是，政治家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一方面要鼓励"昂贵的土壤改良计

划”（这就要求高昂的食品价格），另一方面，鼓励便宜的进口，这样工资成本就能保持在低水平了。斯图亚特认为，只有“正确地使用公共货币”，才能解决这个困境。至于其中的办法，他举了一例：他相信国家必须利用政府支出或其他方式来左右货币供应量，以便实现供求平衡。可以利用公共货币提高需求，降低失业，但要注意不能矫枉过正。

既然是这样的态度，难怪斯图亚特不接受货币数量论。他承认，孟德斯鸠和休谟提倡的货币与价格关系论，“如此简单，如此全面，看到它被几乎所有的后来者接受，我并不奇怪”。但他又认为：“在这里，在政治经济科学的其他每个领域，很少制定像一般准则这样的东西。”他给出的理由是，需求和竞争决定价格，这些又取决于财富和经济环境，而不取决于人们碰巧拥有的铸币。

> 尽管让一个国家的铸币，按非常大的比例或增或减，商品依旧会依据需求与竞争的原则或升或降；这些价格一直将决定于拥有财产或任何等值物品的人的偏好，而从来不决定于他们拥有的铸币的数量。

纵观斯图亚特的《原理》，他自始至终强调政治家的作用。但是，把他看成极权主义策划者，或者仅仅是留恋前市场时代的人，就错了。他不仅假设人类是自利的，还认为，政府的政策要想奏效，这个假设很重要：

> 自利的原则将作为一把总钥匙而服务于这个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当做我的主题的统领原则……它是主要

的原动力，是政治家为了使自由民族在他为其政府制定的计划中通力协作，而应当加以利用的唯一动机……假定人人都舍己为人，政治家就会心智迷乱，这样的假定真是荒唐可笑。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斯图亚特坚定地站在霍布斯、洛克，乃至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方法论的立场上。

曾有几年，斯图亚特的《原理》被广泛接受。休谟欢迎这本书，连英国政府都寻求斯图亚特的建议。可很快，这本书就被遗忘了，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几年以后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显然是主要原因。斯密的作品远远比斯图亚特的更能抓住公众的想象力。斯密措辞得当，全然不提及早先出版的这本书。当然，斯图亚特的散漫风格也是原因之一，他并不总能表达清楚自己的看法。然而在德国，斯图亚特的重商主义思想找到了更乐于接受的读者，他的书依然有人看，他对供求关系的讨论在 19 世纪早期依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年），出生于有势力的苏格兰家庭，曾受教于哈其生，一年后担任逻辑学教授，从 1752 年到 1764 年，在格拉斯哥当道德哲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还讲过修辞学和纯文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他的经济学作品就脱胎于此，并构成了对社会科学的更广泛质询的一部分。这种质询不偏不倚地落入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中，关注的焦点对准了

公民社会的历史和基础。使斯密在后来好几代人中维持了崇高名誉的这本书，不仅主导了19世纪的经济学研究，还使其他经济学家的作品莫能望其项背，它的名字叫做《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首次出版。这一年美国发表了《独立宣言》。但斯密一生的荣誉并不是来自这本书，而是《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年到1790年间出版了6个版本。斯密把两本书都看成他对社会科学更博大质询的一部分。两者的关系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开头作了描述：

> 现在这个作品的第一版中，我曾说，我应该在另一个论述中，努力给出有关法律、政府的一般原理的记录，以及它们在不同年代、不同社会阶段遭遇的不同革命，不仅要写有关公正的事，也要写和警察、收入、武力有关的事情，写与法律的目的有关的其他一切。在《国富论》中，我已经兑现了部分承诺，至少兑现了警察、收入、武力这部分，剩下的就是法学理论了。

可惜，他计划的最后一部分未曾完成。

《道德情操论》主要关注道德判断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他揭示了得体感、认可感的基础，揭示了如何判断优点和美德。同情这个概念，即从别人的立场出发看待事物，以及从旁观者的公正视角看待自身行为的能力，为他的方法提供了关键因素。这一点之所以能和社会科学联系起来，是因为斯密一边提出疑问，一边在解释人类之所以可能生活在社会中的原因。究竟人们是怎样约束自利的渴望，以避免互相伤害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人类

同时也在渴望取悦他人，即得到他人嘉许。我们从旁观者的公正角度检讨和调整自身的行为。但是，这种动机还不够强烈。当我们思忖将要付诸的行动时，所谓的“冲动”，即做事情的渴望，将使我们置理性判断于不顾。另一方面，等我们付诸行动之后，不把自己想得太坏的渴望又进一步导致了偏见。所以，不论前思还是后想都不能使我们对自身的行为产生不偏不倚的看法。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指引。道德准则提供了指导。这个道德准则，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对受赞同或不受赞同的行为类型作出的概括。但是，道德准则本身还不够，它还需要得到支持，有时候，就靠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认可的实在法。

人类聚在一起，互相影响，唯有“从感激、友谊、尊重”中，互相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支持，社会才会繁荣。但是斯密认为这些动机并不是必要的：

> 从社会的功效而言，社会可以存在于不同的人之间，就像存在于不同商人中间一样，而没有相互间的爱或情感。虽然无人应承担任何义务，也无人应对他人心存感激，社会依然依据共同的价值观而受到唯利是图的物品交易功能的支撑。
>
> 即使人们相互间不存在强烈情感，商业社会依旧可以繁荣。

另一方面，需特别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行为不受限制的社会也能繁荣。

> 但是社会，无法存在于随时准备伤害和损害他人的人们中间……即使抢劫者和杀人犯中间存在任何社会，他们至少

一定会……禁绝互相抢劫和杀人。因此，仁慈对社会存在的重要性不及公正。没有仁慈，社会还会存在，虽然不是最令人舒坦的状态，但普遍的不公正必将彻底摧毁这个社会。

这便是《国富论》的背景。斯密认为，即使在人人都追求各自利益的情况下，商业社会也会繁荣，他探究的正是其中的原因。但他又在假设一个公正的框架，若没有这个框架，社会将被摧毁。他所谈论的这种社会有别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那个状态下，霍布斯假设人们受到道德的指引和公正法律制度的约束。斯密则在这个公正的框架内，揭示了自由制度的好处。

分工与市场

斯密比以前的学者更加明显地关注经济增长过程。构成《国富论》的五本“书”中，第一本探讨了“劳动力提高生产能力的原因”以及产品如何在社会不同阶级中间得到分配。第二本书思考了资本积累，第三本书讨论了斯密所称的“各国致富的不同进程”。接着，他转向政府政策，在第四本书中对“重商主义制度”和“农业（重农主义）制度”都作了批评。第五本书则探讨了政府收入和税收。总体而言，这个作品是理论、经济史和政策建议的大纲。经济学家们能用不同方法诠释它，原因之一便是它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

斯密声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分工。介绍这个看法的时候，他用了“十分琐碎的制造业”——制针业——来说明问题。他指出，在没有受过相关培训，也没有相应机器的协助情况

下（培训和机器都是分工的结果），1 名工人 1 天造的针可能只有 1 枚，肯定不超过 20 枚。相反，在现代工业条件下，制针的任务被分成 18 种不同操作流程（拉线、撅直、切线、打磨、装头、白化、订纸，等等），10 个人的小组每天可以造 48，000 枚以上。斯密认为，最发达的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分工。

斯密介绍分工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分工在简单工厂中的应用，但其实他的例子对劳动力的社会分工同样重要。在社会上，不同的人执行不同任务，再通过交换各取所需。他认为，分工“虽是为了以物易物，由人性中某种倾向缓慢而逐渐形成的结果，却是必要的结果”，从而提出主张，认为分工受到市场程度的限制。在小村庄里，人们不得不自己完成许多任务，而在城市，各种任务由专家完成。据斯密观察，乡村的木匠不光做木匠，还当细木工人，做家具，雕木头，做四轮马车，每个活计在更大的市场中都会是一个独立的行当。斯密发现，水运的发展对于更广泛市场的开放进程至关重要。

既然确定了经济增长与市场扩张之间的联系，斯密转而研究市场如何运行的问题。这个问题把他带入了价值和收入分配的领域。有三个概念对于他这些问题的分析特别重要。头一个是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之间的区别。在交换经济中，使用货币比以物易物更加方便，于是，价格用货币（即名义价格）来衡量。其实，“获取物品所费的气力和麻烦”才是商品的真实价格。它是劳动力的数量而不是货币的数量。不过，既然衡量劳动力存在各种问题，所以最好还是用其他商品来衡量。金银价值的多变性会导致各种商品的名义价格和真实价格不同。重要的是真实价

格，这也正是他的价值理论努力解释的。

斯密的价值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把商品价格拆分成各个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租金，也就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报酬。这个概念是第三个关键概念，即市场价格与商品的自然价格之间的区别的基础。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它拿到市场上的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假如供给不足以满足当前价格上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上涨；假如物品有剩余，市场价格就会下降。由于价格可以拆分成各个组成部分，于是，假如市场价格上升，价格的至少某一个组成部分也上升。因此，商品的自然价格被界定为其中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都实现了其自然价格时的价格。斯密认为，“它是把所有商品价格不断吸引过去的核心价格”。导致这种现象的机制就是竞争。例如，假如生产帽子的利润率高于其自然利润率，又假如资本家可以自由地将资本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他们就会转向制帽业。这将增加帽子的供给，把帽子的价格压低至自然价格。或者，假如矿工们赚的钱多于自然工资率，其他工人就会当矿工，把工资压下去。

这种机制为斯密的结论奠定了基础。他总结道，市场可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运作，甚至在人们无意为他人服务的情况下，也能促使他们生产其他社会成员需要的物品。这就是自利能够制造有利于社会的成果，即使人们并不相亲相爱，商业社会也能繁荣的原因所在。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斯密所称的“自由”——个人转移资本的自由，劳动力随意改换工作的自由。正是出于对促进自由的关心，斯密谴责重商主义者限制了工业和贸易。这些限制措施有益于某些个人，却会损害竞争。

资本积累

《国富论》第一卷强调分工，强调劳动力与财富之间的联系，正好落入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而在第二卷中，斯密强调资本的作用，这样一来，他更接近杜尔哥，而不是哈其生和休谟。斯密主张，分工的前提条件是他所称的“预蓄资财”的积累。这就包括工人需要用到的工具以及干活时需要的供应品。如要有增长，就得增加预蓄资财，如此，有必要有效地利用劳动力。这就引向了斯密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

这个区别的背后，存在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生产性劳动“增加它所赋予的对象的价值”。它在“一个固定对象或者可销售的商品”中作自我“调整”，当劳动完成时，这个对象就存在了，接着被售卖出去，以便获得更多劳动力。而非生产性劳动并不增加任何物品的价值。制造者的劳动增加他所生产的物质的价值，到了年底，农民的劳动产生了有形成果，这都是生产性的。相反，仆人的劳动，甚至说统治者、法官或军队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假如说所有劳动都必须靠年复一年地生产而得以维持，那么资本积累就决定于用于生产的那部分劳动。再考虑一些极端案例。如果整个劳动大军都被用于非生产，来年会一无所获。在另一个极端，如果劳动力都被用于生产，产量必定更高。

斯密发现了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对资本积累的需要就是其中的原因。“资本增加，因为节俭；资本减少，因为奢侈和恣意妄为。”他坚信，不必用奢侈性支出来维持需求，因为花

出去的储蓄额恰好和花在消费品上的支出相等。

每年存起来的和每年花出去的一样，被定期消费掉了，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只是它是被不同人群消费的。一个富人的收入中，每年花出去的部分，多数情况下是被游手好闲的客人和仆人们消费了，他们的消费没有任何回报。他每年存起来的那部分，被立即用作资本以便获得利润，这部分也以同样方式消费了，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只是被不同人群，被劳动者、制造商、手工业者消费了，然后，他们再生产出每年消费的价值，并加上一个利润……一样是消费，不一样的是消费者。

换言之，对于斯密来说，储蓄意味着投资，否则储蓄者无法获得利润，而利润才是他们的目标。储蓄是在利用生产性劳动，而消费是利用非生产性劳动。

斯密与自由主义

斯密倡导他所谓的“天赋自由”制度，与之相比照的是他讨论的另外两个政治经济制度，一个是重商主义制度，一个是农业（重农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任何人都有自由将其资本投入与其他人的竞争中。他反对垄断，在他那个年代，垄断一般是政府赋予特权的结果：“垄断……是良好管理的大敌，除非是自由和普遍竞争，迫使每个人出于自我保护而采取对策，否则不可能普遍确立良好的管理。”自由竞争导致资源被转移到最需要的活动中。个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促成某个结

果，而这个结果并不出自他的本意”。尽管斯密很少利用“看不见的手”这句话，但人们仍然认为，它是对一个世纪前霍布斯开创的关于社会组织力量的争论的贡献。然而斯密并没有一心为自由主义辩护，因为他还看到了政府的重大作用。

之所以需要政府，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国富论》中认为司法制度是先决条件的那些论点。若没有司法，天赋自由制度无法产生功效。人类没有安全，会不断地互相侵害。用于法律制度和军队的支出或许被划分到非生产性一类，但对于制度的运转至关重要。因此，对于斯密而言，维持法律和秩序是统治者的首要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涉及了自由主义原则的一些重要例外。特别是，斯密支持航海法（严格限制航运竞争），因为它有助于巩固皇家海军的力量。

然而，国防和司法还不是斯密发现的自由主义原则的唯一例外。统治者的第三大职责是：

> 建立和维护那些公共机构和工程，虽然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一个伟大社会，却就其性质而言，其利润永远无法抵偿任何个人和少数人群的费用，因而，无法指望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群来建立和维护它们。

他的例子主要包括交通（桥梁、道路、运河）和基础教育。不过，虽然他举这些例子来支持政府的干预，却又想尽可能地利用税费。原因有二：他希望用户尽可能多地付费（例如道路），也想要给雇员（例如教师）一定刺激，让他们忠守岗位。因而，说过教育成本可“并无不公地”由公共基金出资之后，他随即宣称，最好是由受益于学校教育的那些人支付。他的观点是，在他

那个时代，私立教育优于公共教育。他对大学的批评十分严厉，认为大学里的老师不精通教育，学生不善于学习。

但有一个领域，斯密没有看到政府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维持就业水平。从17世纪早期的米塞尔登到仅早于斯密几年的斯图亚特等学者，都曾看到贸易波动产生的损害，也都曾努力设计政策，以便减轻它所导致的就业不足的程度。重商主义政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可被看做通过增加货币循环来减少失业的尝试。17、18世纪，针对大家认为需求不足的那些时期，有无数学者为奢侈性消费提出辩护。另一方面，斯密带着储蓄构成支出的学说，否认这会成其为问题。假如有完全的自由，人们自会转而从事需要其服务的职业。所以货币经济学在斯密的体系中扮演了次要角色。这种货币经济学与价值、收入分配、增长问题的分离，与重商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它即将主导整个19世纪的经济思想。

18世纪末的经济思想

不管是对同时代人，还是对以后的几代经济学家而言，18世纪经济思想的巅峰成就当属斯密的《国富论》。它起源于长期以来对基督徒道德在社会组织过程中的作用的争论，霍布斯和曼德维尔对此问题曾作出显著贡献。斯密由道德哲学的视角出发探讨这个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同对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关注结合起来。在英法两国18世纪的思想中，这是一个普遍深入的主题，人们甚至发现，它可以追溯到16世纪（和《论英国本

土的公共福利》中一样），可正是斯密的这个版本抓住了他同代人的想象力。然而，久而久之，《国富论》起源于商业社会的道德争论这个事实渐渐被人淡忘，人们开始用不同眼光看待斯密的作品。他渐渐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这个看法恐怕令他的同辈人惊讶，他们若泉下有知，会觉得斯密已经离很多法国学者所处的那个位置十分遥远了。

斯密受益于他的前辈和同辈非常多，所以有些评论家一致认为《国富论》包含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创性思想。用供求关系解释价值的历史实在久远，很难一言蔽之。劳动力价值理论中的某些成分也可追踪到配第和一些经院派作家。“分工”这个词是哈其生杜撰的，但这个概念早在色诺芬那个时代就已经被广泛理解了。资本的重要性是杜尔哥认识到的。自发秩序的观念在曼德维尔和坎蒂龙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踪迹，如此等等。然而，唯有斯密对这些话题的诠释，才能在 19 世纪的经济学（特别是在英国）中找到踪迹。无视过去的态度，曾经使人们付出了高昂代价。例如，主观价值理论虽然在法德两国保持强势，却被斯密和他在英国的多数追随者们置之不理，他们把需求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缩到了最小，所谓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种子已种下了。

7

古典政治经济学
（1790～1870年）

从道德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斯密的《国富论》是对社会基础的极广泛质询中的一部分。自从教会不再对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等问题提供无可置疑的一系列答案之后，这本书就与道德哲学这个努力发现使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基础的课题密不可分了。所以，应该把斯密的经济学视为对曼德维尔和他之前的霍布斯的回应，也是对重农学派或重商主义学者们的回应。可是到了斯密去世后半世纪左右，政治经济学虽然依然由脱胎于《国富论》的框架主导着，却渐渐独立于道德哲学了。它获得了更加“科学”的特性，吸引了一群激进派，其中很多人希望不借由“神”的指点来解释社会现象。

理解这个变化需切记，在这个时期，这门学科是同政治息息相关的，而且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斯密面对的政治经济问题中，有大不列颠帝国与美洲殖民地（尤其在贸易和税

收政策上）之间的关系，有垄断引起的内贸与外贸限制措施，还有为了防止饥荒而对食品市场进行的适度干预。18 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当人口增长率提高之时，贫困问题及其缓和方案也增多了，“穷劳工”这个词被广泛用于描述可能属于新一类的劳动者，他们手脚齐全，又有工作，却无法过上像样的生活。（人类倒是从未怀疑必须向老幼病残提供公共援助。）18 世纪 90 年代公布的“斯宾汉姆兰制度”就是与低收入者购买的面包价格有关的补助。这些补助的资金来自地方税收，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个制度压低了工资，反倒加剧了贫穷。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和相继发生的历次战争（1793 ~ 1815 年）对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大革命提起了人们对于共和主义的恐惧心，尤其 1793 年的战争爆发之后，人心不定成了英国统治阶级心头挥之不去的忧虑。战争还引发了剧烈的经济问题。1797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英国当局中止了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直到 1819 年以前，还在使用纸币。中止兑换之后的 15 年间，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增加了，物价上涨了。粮食价格上涨是个特别的问题，它增加了农业租金，扩大了耕地数量。农民和地主发家致富了。与此同时，人们渐渐明白，“制造体系”正在迅速增长。尽管蒸汽还只在小范围使用，却正在推广之中，历史悠久的羊毛业正在发生来势汹汹的机械化变革，使新兴的棉布行业实现巨幅增长成为可能。高价食品导致的社会动荡局面与工业革新形成的社会断层交织在一起，尤其还加上人们对法国共和主义的恐惧心理，形成了相当的影响。

从休谟和斯密的道德哲学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变迁过程中，

有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 年）。18 世纪 90 年代的激进派中，最杰出的当属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 年）和康多塞侯爵（the 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 年）。这些激进派认为，私有财产是社会问题的症结，应该更平等地分配资源，好让人人过上像样的生活。既然康多塞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推行的一些政策有牵连，这个观点被英国统治集团认作有煽动性的学说。马尔萨斯，英国教会的一名牧师，借他的《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对这些论点作出了回答。这本书 1798 年匿名出版，之后广为传播，1803 年出版了第二版，并署了他的名。其中，马尔萨斯针对乌托邦式的观点，特别是针对葛德文，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论点。马尔萨斯认为，私有财产远远不是有害之物，反而非常重要，否则爱己之心将无法向斯密曾指出的那样产生有益的效果。除非有别人乐意少消费一些，否则靠扶贫济困是无法改善穷人的境况的，因为这对可利用资源的数量毫无影响。进一步说，任何扩大救济的措施都会增强穷人对国家的依赖，马尔萨斯对此忧心忡忡。根据穷人法，穷人要“服从于令人气恼的、麻烦的、残暴的法律，同宪法的真实精神全然不协调……与一切自由思想完全相悖……（还增加了）自力更生的人们的困难。”

虽然人口有超过资源增长的持续趋势的观点只是《人口原理》众多思想中的一个，但人们还是逐渐普遍地把马尔萨斯同这个观点相联系。他是这样表述的：如果不加遏制，人口将按照几

何级数（1，2，4，8，16，……）增长，而食品供应量只会按算术级数（1，2，3，4，5，……）增长。抑制人口有两种方法：预防性抑制法，即降低出生率，还有积极抑制法，即提高死亡率。这两个抑制法分为两大类：不幸（战争、饥荒）和恶行（战争、杀婴、卖淫、避孕）。《人口原理》的第二版中添上了第三类，即道德约束，其中包括不伴有“不检行为”的推延婚期。第三类抑制法使他的理论同他 1798 到 1803 年间收集的证据相吻合，而他先前的理论就没有得到这些事实的支持。道德约束相当重要，因为它开创了进步的可能。然而，虽然马尔萨斯松动了原来的《人口原理》中坚不可摧的界限，却还是不赞成葛德文或康多塞的乐观主义，因为他不相信他们人性本善的观点。人类需要道德的指引，而马尔萨斯想办法提供这个。“道德”约束这个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所以说，马尔萨斯是在 18 世纪道德哲学的范畴内作研究。他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制定的社会法则——财产的安全及婚姻制度——确立论点，认为社会主义打破了自然规律，所以是有缺陷的。马尔萨斯沿着这些路线论证说，基督教如果得以适当诠释，是同启蒙运动一致的，事实上，基督教便是启蒙运动的最高形式。虽然他不同意葛德文和康多塞的结论，却和他们一样信仰理性，并表示自己是在把牛顿主义原理应用到政治艺术上。他批评他们是在助长无法兑现的进步的希望，因而损害了开明的牛顿主义科学观。

马尔萨斯的“浪漫主义”批评者们没有和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 年）、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 年）等“湖畔派诗人”分享对于理性力量的信仰。他还在世的时候，“马尔萨斯主义”一词就被当成骂人的话来用，意指崇尚物质、精神匮乏的观念，又称“现代政治经济学”。这个看法一直贯穿 19 世纪，其中突出的有首创了“沉闷的科学”这句短语的托马斯·卡莱尔[①]，以及约翰·罗斯金[②]。“经济学家”一词渐渐代指掌握了可确认的政治学方法，又天生一副铁石心肠的人。

对增长的前景抱乐观态度的《国富论》，没有为政治家们提供解决战时问题的指导。马尔萨斯对政治经济学作了一番调整，以便答复这些问题，在此过程中，他协助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他一直在 18 世纪的传统下作研究，那时候，政治经济学还与道德哲学、政治学紧密相关。其他经济学家虽然承认自己一样地从《国富论》中受益匪浅，却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努力把政治经济学改造成一门长期的科学。

功利主义与哲学激进派

继亚当·斯密之后，对古典经济学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 年），一个被其追随者奉为偶像的人物。边沁反对自然法的思想，但他的功利主义正是源出于自然法传统。道德准则并不反映自然法，但它是应社会需

---

①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 年，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

②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 年，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反对经济放任主义。

要而产生的。社会需要公民法来规范公民行为。这些法律应该建立在道德准则的基础上，但两者都可能逐渐过时，需要革新。判断道德准则和公民法的标准是“效用原则”，也就是说，要使构成社会的个人实现最大幸福。这也是应该用来判断政府行为的标准。

边沁对功利主义的诠释建立在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1）社会利益是社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2）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3）每个人的幸福容量都和其他人的一样大。这就引出了一种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哲学，并为边沁精心设计的法律和刑事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对于边沁，效用原则并没有把政策的制定缩略成一个简单原则。效用有好几个方面（强度、耐用性、确定性、近似度），必须使它们相互平衡。不过，效用原则还是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大致的方向。

边沁著书研究了很多经济问题，并承认受到了斯密的启发，但他的主要影响还是间接的，借由追随者们，即哲学激进派来传播。其中最杰出的是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年），穆勒的门生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以及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詹姆斯·穆勒曾在爱丁堡研读神学，执教之前，曾经当过长老会传教士。1802年，他搬到伦敦，开始了记者和作家的生涯。他的代表作是《不列颠印度史》（A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1818年），此后，他在印度局谋到了一席职位，并升到了总检察官，这是在印度政府的高级终身官职。在伦敦，他成了边沁的密友。李嘉图，股票经纪人的儿子，出身犹太家庭。他娶了一位贵格会教徒，为此被父亲断绝关系。在穆勒的鼓励下，李嘉图当上了下院

议员。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詹姆斯·穆勒之子，接受了父亲极其严格的教育。3 岁学习希腊语，8 岁学习拉丁语、代数、几何、微积分，12 岁开始学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他在印度局工作多年，晋升到父亲的那个职位，1865 年也成了下院议员。

哲学激进派热衷政治，把功利主义当做批判社会制度和鼓吹政策改革的基础。用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们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但他们的设想与葛德文、康多塞或同时代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 年，新拉纳克社会主义试验的缔造者）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他们和马尔萨斯一样，依旧是自由党保守分子。然而，虽然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在很多问题上与马尔萨斯看法接近（李嘉图与马尔萨斯过从甚密，总是就经济问题争论不休），却并不赞成他关于经济学依然是道德学科的主张。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可他们也努力使之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下过一些有如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确凿无疑的结论。所以，李嘉图手下的这门学科比斯密或马尔萨斯手下的多了些抽象，少了些归纳。

李嘉图经济学

李嘉图经济学针对的是拿破仑战争（1804～1815 年）期间的英国局势。当时，粮食（小麦）价格和农业地租飞涨，耕地的利润扩大了。李嘉图试图阐明两个主张：第一，与斯密的论点相反，他认为地主的利益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是相悖的；第二，利润率下降的唯一原因是缺少可耕种土地。英国的战时经历中如

何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是一目了然的。受詹姆斯·穆勒的影响，也因为渴望使政治经济学像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严密，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1823年出版了三个版本）中，李嘉图构筑了一个空前的、逐渐形成严密分析特点的体系。

李嘉图的体系有三大立足点：斯密的资本积累与增长关系的观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以及级差地租论。这最后一个理论显然是马尔萨斯、李嘉图、爱德华·韦斯特（Edward West，1782～1828年）、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1780～1864年）于1815年各自独立研究得出的。这个理论以两点假设为前提：第一，不同土地肥力不同，因而投入同样的劳动力和资本，会收获不同数量的粮食；第二，农业用地没有别的用途。竞争将确保最贫瘠的耕地得不到地租，因为它所产出的粮食卖出去，仅够补偿生产成本，剩不下什么给地主。只要有剩余，地主就会购买更多土地用来耕种，而如果连成本都收不回，就不会种这块地。除此以外的其他所有土地肯定肥沃一些，所以有剩余。作为土地所有者，地主便可以要求将这个剩余作地租。于是，地租作为比最贫瘠耕地肥沃的土地上收获的剩余而出现了。

级差地租理论解释了地主得到的国民收入份额。接下来，马尔萨斯人口原理被用来解释劳动者得到的收入份额。虽然随着人口的增减，工资可能高于或低于这个水平，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与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率还是有关。扣除地租和工资以后，剩下的便是利润，也就是归资本家所有的收入份额。这里离经济增长理论只一步之遥。高额的利润将鼓励资本家投资，增加资本储备。这将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工资维持在高水平，导致人口

增长。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粮食价格也会提高，于是，耕种的利润将得到扩大，人们会耕种更多的土地，已耕种的土地也会种得更密。当此情形发生时，地租就会上涨，吃掉利润（工资不可能下降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至少在非常长的时间内是这样，所以不可能缩减工资）。利润一下降，导致资本积累率乃至增长率一同下降。

这个理论显然离李嘉图的两大主张仅一步之遥。随着资本的积累，地租涨了，但利润降了。既然资本创造就业，那么这种情形对劳动者来说也是糟糕的。此外，李嘉图已经说明了，人们需要将肥力越来越差的土地投入耕种，使农业的生产力下降了，而这正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不过，还有更复杂的情况。首先是，发生增长的时候，对食品的需求增加了，于是有可能进口食品，这就减少了扩大耕种利润的必要性。这些进口品将通过制成品的出口进行偿付。这个情况本身分析起来，倒不会有什么问题：资本家会要么投资农业，要么投资制造业，取决于两者可以取得的利润率，所以，假如利润不降低，农业不可能得到扩张，资本就会流入制造业，从而引起必要的进口。

不过，如果把一个制造部门引入李嘉图的模型，从理论上会产生重大问题。首先，假如有两个物品（食品和制成品），李嘉图需要解释它们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他需要用到价值理论。为此，他转向了劳动力价值理论，也就是商品价格与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力的价格成比例的理论。问题是，他绕过了一个十分技术性的问题，亦即，在竞争条件下，价格会与生产成本成比例，而生产成本将取决于所利用的资本，而不仅仅取决于劳动力数量。于是，一个行业中，价格与劳动力成本的比率将根据资本与

劳动力的比率而浮动。劳动力价值理论就不再适用了。李嘉图想方设法突破这个问题，可最终他不得不求助于一种显示信念的行动——他以数据为例说明，实际上，劳动时间的变化解释了相对价格中的几乎所有变化（他的例子中有 93%）。

制成品的存在也引发了对李嘉图的主张的质疑。他认为，下降的农业生产力是利润率降低的唯一缘由。但只有当劳动者只消费粮食的时候，这才成立。这样，农业是自给的（粮食是唯一产出品，也是唯一投入品），利润率不依赖于制造条件。竞争将确保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利润率等于农业利润率。另一方面，假如劳动者维持最低生活的条件中，既包括食品，也有衣服，那么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就既决定于生产衣服的成本，也取决于生产食品的成本。农业就不会是自给的了。于是，利润率将取决于制造条件和农业条件两方面。李嘉图关于农业生产力是利润率的唯一决定因素的法则就不成立了。

显然，即使从这一点考虑，在李嘉图的经济学中，我们仍然看到的是一种缜密的分析，这种缜密，在他之前即使发现有人这么做，也少得可怜。李嘉图把他所分析的领域简化到足以用很强的逻辑说明他所得出的结论。他的体系的有些方面，这里没有讨论到（特别是他的国际贸易与货币理论），如果一并考虑进来，就更不用说了。

李嘉图的两个主张虽然植根于战时条件，却对 19 世纪战后的世界有着明显的政治寓意。战后，谷物法严格限制进口，防止了价格下跌，使粮食价格维持在高水平。李嘉图关于地主的利益与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相悖的看法得到了许多政治煽动者的共鸣：劳动者希望得到更便宜的粮食，好用同样多的工资买到更多

粮食；制造商想要更便宜的粮食，因为他们相信这会降低工资水平。李嘉图理论进一步阐明，除非废除谷物法，否则利润会下降，增长将停滞。然而，即使谷物法遭到废除，各种各样的问题仍然存在，原因是，假如李嘉图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制造业相对于农业的渐进式扩张也会带来增长。英国将成为世界大工厂，出口的是制成品，而进口的是粮食。这对马尔萨斯这类保守派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李嘉图的预测中，最有深意的一点是，这些预测都是建立在他推理的谬论之上。他认为，推动土地改良的不是地主们的利益。生产力之所以提高，仅仅因为耕种土地的边际利润在缩小，导致地租不再上涨。不过，这是指作为整体的经济的地租。李嘉图没能看到的是，即使总地租不上涨，改良土地仍然是个体生产者的利益所在。就是说那些改良措施仍将得到推广。如果土地得到了改良，他对利润率下降以及阶级矛盾的预测就不成立了。这个显然十分微小的技术性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李嘉图错就错在方法上。他把总体理论化了，把农业视为一个巨大的农场。这种方法使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可事实上误入了歧途。

其他经济学理论

李嘉图经济学铭记在后人心中。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它“给古典经济学观念留下了深刻烙印”。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以及 19、20 世纪更为正统的经济学中采用的许多概念的鼻祖。可以证实，利润率决定于粮食的边际成本（每增产一个单位的粮食所增加的成本，一般要高于增加的粮食数量的单位成本）的思

想是李嘉图经济学的明确主题，这个思想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通行于英国经济学界。从这个意义上，李嘉图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不过，最纯粹的李嘉图经济学，包括劳动力价值理论，李嘉图演绎法，人口理论，只在19世纪20年代，短暂地主导了这门学科。

1825年，劳动力价值理论受到了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1791～1870年）的强烈抨击。贝利提出了主观价值论，认为价值不是决定于成本，而决定于“物体所含有的值”。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1790～1864年），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把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劳动力价值论统统摒弃了。他提出了一种思想，认为利润不是剩余，而是对资本家放弃物质消费的奖赏。他还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物品消费得越多，那么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其价值（19世纪70年代把这个概念称为边际效用）就下降。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1789～1864年）1828～1837年任伦敦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是《辉格爱丁堡评论》（Whig Edinburgh Review）最多产的经济撰稿人，一度是坚定的李嘉图派。可他大刀阔斧地修改了李嘉图的理论，较之李嘉图的做法而言，他特别强调历史和归纳研究法。他反对李嘉图的阶级矛盾观。李嘉图认为作为个人的地主永远有改良土地的动力。在他看来，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这将提升土地的生产力，从而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简而言之，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不单单是李嘉图经济学。它反映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心血，包含了在大多数问题上的数不胜数的观点。假如说有一个作品占主导地位，那也不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而是斯密掺和了理论和历史的、更加开明

的《国富论》。即使到了1900年，仍然有教科书采用斯密的思路组织编写。

在英国之外，李嘉图经济学的影响力愈加弱小。在法国，斯密的主要诠释者是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年），他是拿破仑时期的议政院议员，后来成为理论经济学家。萨伊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中的领军人物。他虽然是斯密思想的支持者，却又倡导主观价值论，赞同至少可以追溯到孔狄亚克时期的悠远的法国传统。他还发展了市场规律。这个观点，先前由边沁和詹姆斯·穆勒提出，为李嘉图所接受。它是说，就总体而言，不可能存在需求短缺的情况：供给会创造对自身的需求。衰退并不源自总需求的缺乏，而是因为对某些特殊商品缺少需求。

同样重要的是，法国发展了将数学分析应用于经济问题的悠久传统。孔狄亚克分析选举理论的时候，就遵循了这个方法。比如说，他曾阐明，即使某个候选人在所有只有两个候选人的选举中落选，只要他参加有三个或以上候选人的选举，还可能以多数票当选。可是，对于现代经济学家而言，贡献最突出的却是安托万·奥古斯丁·库尔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1877年）。库尔诺在里昂大学只做过短时间的数学教授，当大学行政官员却当了大半生。他假设每个生产者都使利润最大化，市场上的销售量受到需求的约束，由此推导出一些公式，表示一个行业存在不同数目的企业时所得到的产出。他从一个生产者（垄断者）开始，说明产量是怎样随着企业数目的增长——1，2，乃至无限多——而变化的。对于库尔诺，当企业数量接近无限多的时候，就到了竞争状态。在竞争性市场上，没有哪个企业能够对其

产品的售价施加影响。

库尔诺还被认作第一位采用图表解释竞争性市场上供求关系如何决定价格的经济学家。需求曲线（MN 线）表明当价格上涨时人们希望购买的数量。供给曲线（PQ 线）表明当价格上涨时生产者希望卖出的数量。市场价格（OT）就是供给量等于需求量时的价格。库尔诺接着说明了，当遇到对商品征税等情况时，图表是怎样能体现市场价格的变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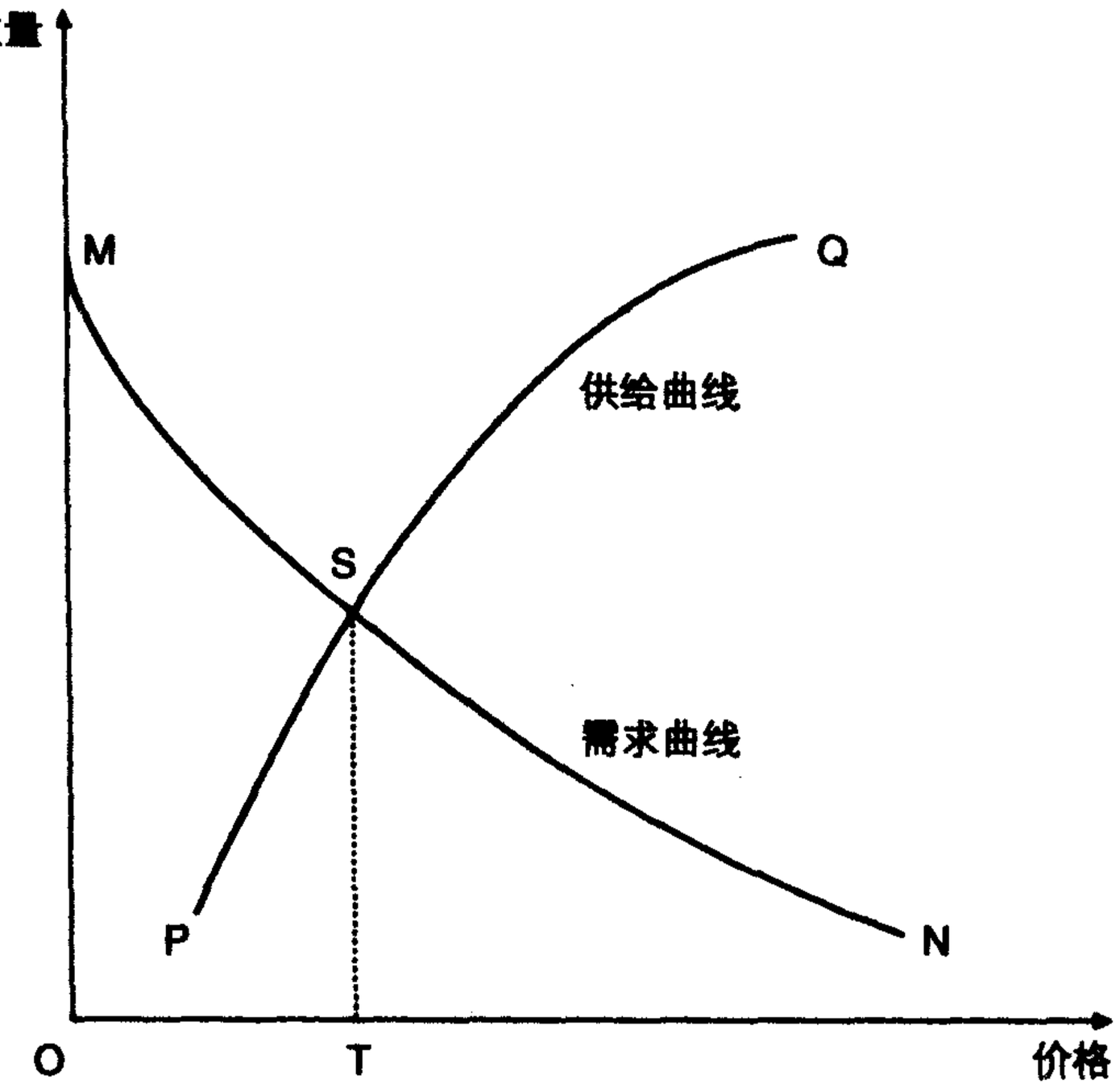

图 1　供求曲线

强调对物品的需求，这一点也是桥梁道路学校的工程师们笔下的特征。他们当时正在为确定公共工程项目的好处寻找依据，出于这个需要，他们推动了这项工作。19 世纪 20 年代的传统看法是，这样的工程应该是自偿的，即应该完全偿付自己的成

本。因机械工程而在工程界闻名遐迩的克洛德·路易·马里·亨利·纳维耶（Claude Louis Marie Henri Navier，1785～1836年），1830年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挑战了这种看法。他的观点是，如运河、桥梁之类的公共工程可以提升公共福利。纳税人会得到更便宜的物品，而工程引起的贸易扩张会提高税收总收入。他用一条运河或桥梁运送的物品数量乘以它所减少的运输成本，估算了这项工程的收益。如果这些收益大于正在发生的项目年成本，那么它的修筑成本应该从税收当中出资。纳维耶认为通行费应为零，即使不得不征收通行费，也应该只弥补利息和定期维修费就可以了。他在以后的文章中，在桥梁道路学校的历次演讲中发展了这些看法，还考虑到了成本与铁路线长度之间的关系等因素。他还想到了公共工程该由国家修建还是该特许给私人企业的问题，也思考了应该采取的制度类型。

除纳维耶之外，工程师约瑟夫·米纳尔（Joseph Minard，1781～1870年）也在独立解决这些问题。他写了一本书，自认是国内工程师们修建公共工程项目的实用指南。他采用了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思路，论证说，纳维耶的方法（运送的物品数量乘以节约的成本）将过高估计一个项目的收益。原因在于，如果不修建运河或桥梁，有些人本来是不会计划这趟行程的。这就是说，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将小于所节约的成本。他采用了这样一个论点：在使用运河的人和不同意用通行费弥补年成本的人之间分配收入，还提出了一个涉及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公式，得出结论：费时费力建造的项目，收益不会持续永远，却要每年产生维修成本。不过，米纳尔的手稿写于1831年，他计划照这个手

稿来讲课，但多年来得不到同意，所以直到 1850 年才出版这本书。而那时候，这个课题上的另一些文章也已经问世。

朱尔·迪皮（Jules Dupuit，1804～1866 年）也是工程师，也在关心估算公共工程项目的收益的方法。他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也认为，纳维耶的方法高估了收益。首先，重要的不是工程削减了运输成本，而是削减了产品价格。随着新的桥梁或运河的修建，产量上去了，物品被运输到更远的地方。于是，在既定的运输距离下，生产成本不像运输成本那样降得快。第二点与米纳尔相似，迪皮认为，多出一个单位的物品的效用可以用消费者乐意支付的价格来衡量。随着消费的增多，这个价格会下降。迪皮接着论证，修建运河或桥梁得来的收益可以这样衡量，即从需求曲线下方区域减去项目成本。被库尔诺单纯用于分析行为的需求曲线，还可以用作衡量福利的手段。

三位工程师在此讨论的内容构成了 19 世纪中叶桥梁道路学校的悠久传统的一部分。他们的出发点是解决评估国内工程项目的实际问题，却发展出了一套和斯密、萨伊的正统价值理论不同的理论。迪皮日后的一些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但这位工程师的大部分作品仍旧发表在经济学家不会看的杂志上。1831 年，萨伊的确表达过对米纳尔的文章的兴趣，但他一年以后就去世了。

另一种传统，李嘉图对它鲜有贡献，却在德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当中找到了踪迹，特别是卡尔·海因里希·拉乌（Karl Heinrich Rau，1792～1870 年），弗里德里希·赫尔曼（Friedrich Hermann，1795～1868 年），汉斯·冯·曼戈尔特（Hans von

Mangoldt，1824～1868 年），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 年）。他们都是斯密主义者，接受了斯密关于储蓄的重要性以及分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思想。但是，他们反对劳动力价值理论，反而采纳了斯图亚特的观点，认为价格决定于供求关系。他们不同于大多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赋予了需求极高的重要性。例如赫尔曼，他明确指出，需求的变化可以怎样引起成本的变化。他们的教科书讨论需求在先，供给在后，还探寻了需求与人类需要之间的联系，从而得出了主观价值论，认为物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为了得到它而打算放弃的其他物品的价值。这就是后来世人所称的机会成本理论。

如同法国工程界的传统一样，这里的供求关系也是用图表示的。拉乌没有借助于库尔诺，他在第 14 版课本中使用了自己的供求曲线。（他开创了横轴为数量，纵轴为价格的传统，为大部分现代文献所因循。）他和库尔诺不同的是，他不仅分析均衡（需求量等于供给量的那个点），还分析这种均衡的稳定性。假如价格过高，供给将超过需求，从而抑制价格；假如价格过低，需求将超过供给，推动价格上涨。这些思想被曼戈尔特在其课本（1863 年）中进一步采纳。他认为，供给曲线的形状取决于产量增加时的成本行为，他用自己的曲线看到了价格是怎样随着供给或需求的变化而改变的。

19 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德国不是一个单一国家，而是由各个邦国拼凑而成的。所以出现各种经济学研究方法可以并存的现象毫不奇怪。其中一个传统以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 年）为代表。杜能原是农场主，

1827 年成为世界知名的农业权威。他的代表作《孤立国》（Der isolierte Staat）于 1826 和 1863 年间分三期出版。它最有名的是对地点的分析，也就是农业的获利性（因而地租的高低以及耕种类型）取决于农场和城市之间的距离。他以一座位于肥沃的大平原中央的城市为出发点，那里既没有河流，也没有其他影响运输成本的自然因素。在这样的平原上，种植将采取一系列同心圆的组织形式。离城市最近的搞园艺和栽培商品蔬菜，这些产品无法运得很远。最远的搞狩猎，因为它需要广袤的土地，而运输成本不成问题。介乎两者之间的搞各种林、耕、牧业。

或许与杜能的地点论同样重要的是他的方法。他把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用量的问题当做一种最大化问题加以解决。农场主雇用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以使利润最大化。杜能引入了代数学，用微分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些方法，他得出了结论：被雇佣的最后一位工人的产量等于所支付的工资。这就是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些方法还引导他看到了森林管理问题其实是涉及时间和利率的问题。假如说人们认为资本的精髓在于它使生产得以连续（奥地利经济学家日后发展了这个观点），那么也可以认为他的理论就是利率的边际生产力理论。

政府的政策与国家的作用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写下那些著作的时候，经济学才刚刚开始制度化，逐渐成为一门学术类学科。政治经济俱乐部（成立于 1821 年，每月聚会，讨论经济问题）、皇家学会、皇家统计学

会、不列颠协会等组织，把他们集合到了一起。发表了他们各自思想的杂志并不专攻经济学，而是为一切受教育阶级准备的，常常以各自的政治倾向为特征，却不按照学科范围设置。像《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是辉格党的，《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属于边沁主义，《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则属于托利党。有些经济学家拥有学术职位（常常是短期任职，非终身职业），多数人没有。比如李嘉图就是个股票经纪人；托伦斯在军队任职，也是一家报纸的所有人，韦斯特和芒蒂福特·朗菲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1802～1884 年）是律师，麦克库洛赫当过短期教授，当过公务员，也为《苏格兰人》（Scotsman）做过一小段时间的编辑。许多人受过法律培训，很多人在某个人生阶段持有政府任命书。他们讨论的内容虽抽象，政治经济学却从未远离经济政策问题的范畴。许多经济学家和很多政治经济俱乐部的成员都是下院议员。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构成了政策制定者们活动圈子的一部分，并在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只是不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而已。19 世纪 30 年代，自从 1832 年的改革法扩大了大部分有产阶级的特权之后，哲学激进派形成了下院中可识别的一个群体。

虽然各位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我们可以相当稳妥地将他们概括为一般意义上的讲求实效的改革者。他们和斯密一样反对重商主义。就意识形态的范畴而言，改革者的初衷决不是信奉不干涉主义，而是反对伴重商主义而来的腐败。他们普遍赞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但有限的作用。就连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偏好激进式改革的哲学激进派，也是功利主义者——主

张功利高于自由。只要立法不损坏私有财产的安全性，他们很乐意看到政府管制，这一点，他们视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考虑过这个世纪头 25 年间出现的一些主要问题，如贸易政策，扶贫济困，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之后，再勾画他们的态度以及在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变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他们举出了相当多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他们不仅在《国富论》中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论点，还指出，保护主义为腐败提供了机会，使国内工业发生了有利于强势集团的扭曲。在自由贸易应由单边实行，还是以商业条约为基础的问题上，他们虽有分歧，但总体而言，他们支持单边自由贸易。贸易政策方面争议最多的问题还是谷物法。李嘉图的理论瞄准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支持废除该法案。但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以此为背景展开论述。他们受斯密的影响更深。因此，麦科库洛赫和西尼尔都反对李嘉图关于地主的利益有别于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的观点。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赞同以征收关税来提高收入的想法，只要关税不高到扭曲贸易流的程度即可。

穷人法是马尔萨斯理论直接涉及的一个问题。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倾向于废除穷人法，但又都希望渐次进行。另一些人则认为此举并不可行，而倾向于激进的改革。西尼尔就是一个，他为体现在穷人法修正案（1834 年）中的这个政策辩护，根据这个修正案，对有劳动能力的穷人的救济局限为生活在贫民习艺所的人，法案还试图加强资格审查原则（不工作的人应该比有工作的任何人都生活得差），却徒劳无功。不过，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

都对扶贫济困的条款更随意些，他们质疑马尔萨斯的论点，认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刺激乞丐数量增多。他们想继续在“户外”（济贫院以外的地方）救济穷人，不那么坚持要加强资格审查原则。

工业化正在给日益增多的人口的工作条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政府的管制带来了压力。此外，自从 1824 年废除了联合法（此法案认定联盟、协会为非法），工会开始形成。对工厂条件作出了规定的第一个法案，是 1802 年通过的，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一连串的法案获得通过，都是在增强管制的程度。这项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以规范妇女儿童的工作实践和工作条件为主要目标，但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男性。当时有个倾向，尽量避免规定成年男子的工作时间，因为这会干扰合同的自由原则，但总的来说，经济学家还是讲究实际的，就事论事的。他们跟上大众的看法，并不引导大众。在工会问题上，经济学家的立场一般是偏向高工资，把工会视为对雇主们较强的谈判能力的一种抗衡。

古典经济学家接受斯密主义的自由创业观，他们中的很多人带着极大的质疑眼光看待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侵蚀行为。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们都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根据功利主义原则评判特定的案例。所以，他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上，认为自由主义的作用受到了严格限制。

货　币

18 世纪 90 年代以后，货币政策成了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主

要话题。自休谟写下关于这个课题的著作以来，银行系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1793 年和 1794 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一切构成了《论大不列颠纸质信贷的性质与影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he Paper Credit of Great Britain，1802）的写作背景。作者是银行家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1760～1815 年）。桑顿把钞票和汇票看做人们持有的财产，所以他十分强调信心。如果人们不肯定手中持有的财产（汇票或者伦敦以外的银行发行的钞票）有多少价值，就会增加更安全的财产的持有量。在桑顿那个时代，英格兰发行的钞票是更安全的财产。桑顿因而察觉到，银行体系也有等级之分。发生危机的时候，乡村的银行（地处伦敦之外，一般较小）会经历挤兑风潮，会向伦敦的同行求援，还会向英格兰银行索要流动性资产。因此英格兰银行是站在信用金字塔的塔尖。

这一点对英格兰银行采取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启示。面临储备金损失的银行一般会采取措施，削减银行贷款。桑顿却认为，这对于英格兰银行而言，恰恰是个错误的政策。既然它损失储备金给乡村银行，就应该多放贷才对。因为如果存在信心危机，那么增加英格兰银行可获得的贷款数量，会帮助人们恢复信心，从而为银行系统的其余部分提供所需的储备金。乡村银行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它们发行的钞票越增加，越降低人们对它们兑付能力的信心。换言之，桑顿认为，英格兰银行应该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担起整个金融系统的重任。

1804 年后，金价涨到了明显高于牛顿确定的票面价值，即每盎司 317 先令 10.5 便士的程度。这就是说，英格兰发行的钞票

贬值了。李嘉图1810年主张，金价上涨说明英格兰银行发行了太多钞票。他信不过该银行董事们的钞票发行管理能力，他说，应该恢复金银的可兑换性，但是要逐渐恢复。这是标准的金本位主义者的立场——认为钞票应该可兑换成金银。这也是桑顿的立场，但他又和李嘉图不同，他承认钞票的发行与金价的关系在短期内可能很弱。短期内可能有各种因素影响贸易差额，比如坏年成（导致粮食进口量增加），对外国政府的补贴，或者海外军备开支，这些都会使金价不顾钞票发行的情况而上涨。

而反对金本位主义的立场可以从英格兰银行董事们的著作中找到踪迹。他们否认流通中的钞票数量与金价产生任何关系。其论据就是所谓的“真实钞票学说”。这个理论是说，假如银行针对“真实钞票”，即为真实的商业交易而不是为投机融资而发行的钞票放贷，这些钞票将在交易完成之时自动偿还。这样，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就恰好等于所需要的量。这个理论是假设，只要不需要，就无人会借款和支付利息。桑顿的《纸质信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是否向银行借款，取决于贷款利率与用借款投资而得的利润率的高低。如果利率低于利润率，人们就有动力增加借款数量，钞票的流通量就会增加，价格将上涨。只要利率一直低于利润率，这个过程就将持续。反之，如果利率超过了利润率，钞票的发行量和物价水平都会下降。所以，真实钞票学说假设一旦必须付息，就没有人会不必要地借款，是经不住推敲的。

1810年，一份主要由桑顿起草的通货情况报告呈向议会，其中他支持金本位论点，于是，政府决定回归可兑换政策，于1819年实施。然而，对货币政策的探讨并没有因此终结。1815年以后

是一段严重的紧缩时期，经济萧条，物价下降。虽然人们并不怀疑，应该维持英镑兑换成金块的政策，但渐渐明白，光靠它是不够的。英格兰银行安排的政策应该确保其金银储备总能足够维持其可兑换性。这就引向了时下被称为反周期政策的一种争议，经济学家就如何应对信贷需求的波动情况，展开了争论。

银行派认为，应该根据国内经济的需要制定货币政策。不景气的时候，信贷短缺，应该扩大发行钞票。如果发行的钞票太多，它们会返回英格兰银行，这就是所谓的“回流说”。它强调，钞票仅仅是信贷的诸多形式之一。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1774～1858年）是银行派的主要支持者，他反对桑顿关于低利率导致通货膨胀的论点，他用大量统计数据说明，往往是利率很高的时候发生通货膨胀。奥弗斯通勋爵（Lord Overstone，1796～1883年）是反对这个观点的通货派中的一员，他们倡导所谓的“通货原则”或者“金属波动原则”。它是说，既然造出纸质通货来，就应该把它当金属通货一样地用。也就是说，假如英格兰银行损失了金块，应该一磅金子对一英镑地减少钞票发行量。这样，货币供应量就会和贸易差额挂钩了。如同银行派主张满足贸易的需要一样，这个原则也是反周期的，设计这个原则，是为了保证趁经济扩张得太快之前采取正确的政策。通货派认为，不遵循通货原则，就会措手不及。因此说，银行派关注缓解衰退的政策，而通货派努力设计预防性政策。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李嘉图经济学的影响力能跨越19世纪20年代，归功于两个

人，他们都是19世纪知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首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受教于其父，后成为边沁的忠实信徒。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是哲学激进派的一员。1830年前后，他以李嘉图经济学为研究方法，写了一系列经济学论文，却苦于找不到出版商，直到1844年，他的《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1843）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才得以出版。1836年，父亲去世，1851年他娶了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1807～1858年），受其影响，他偏离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渐渐对“社会主义”抱有更大同情，但他所指的社会主义是与这个名词当今的含义差之千里的一种形式，因为他并不提倡生产手段的国家所有制。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年至1873年曾出版了好几个版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之前，这本书曾被多数英国经济学家和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当做论辩的起点。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成就是既保持了李嘉图式的框架，又考虑了李嘉图的批评者们的很多观点。穆勒从未自认创新，称自己只不过为斯密的《国富论》添加了现代内容，所以这是一本一直被草率地认作折衷主义的书。其实，这是有意轻描淡写穆勒的创新。关于价值、收入分配、增长的基本理论的确是李嘉图式的，但穆勒作了重大修改。解释价值问题的时候，他重点强调需求，他把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作成图表，以此来观察需求，这标志着与斯密和李嘉图式的概念的重大偏离。这种强调应用到国际贸易（他的相互需求理论）方面，演变成了从两个方面

远离李嘉图的一种理论。它认可成本随产量而变的可能性，还解释了物品的贸易额。他同意西尼尔的意见，认为想要资本家储蓄的话，利润是必要的。

然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要意义或许在于，虽然它保留了李嘉图的基本框架，却体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哲学。穆勒在写作中努力将政治经济学从旧的学派中解放出来，使它较之多少年来渐渐形成的风格，显得不那么教条主义。在此过程中，他深受社会主义作家的影响，其中突出的是一个名叫圣西门主义者的团体，因克劳德·亨利·圣西门（Claude Henri Saint - Simon，1760～1825 年）得名。此人提倡一种社会主义形式，在这个社会下，阶级结构发生改变，生产由产业工人控制。穆勒开门见山地介绍了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的特征，从这里出发，将他对李嘉图理论的忠诚与社会主义的社会视角和谐起来。经过一番对社会演变的调查和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回顾，他认为财富的生产决定于超乎人类控制的一些因素：

> 财富的生产……显然不是一件妄下断言的事。它有自己的必要条件。其中，有的是物质条件，取决于物质财产和所有者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下掌握的知识量……综合外界这些自然的因素以及有关人性的事实，它（政治经济学）试图遵循决定财富生产的第二规律或派生规律。

这些生产规律以这个物质世界，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还有人性为基础。与此相反，财富分配规律决定于人类制度。

和生产规律不同的是，分配规律是人类制度的一部分：

任何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都由这个社会的法令或财富的用法来决定。

但他又补充道，

> 虽然政府有决定制度存在的权力，但这些制度应该如何运行，它们无法自作主张。

政治经济学可以识别规定经济行为的规律，使政府得以制定合适的制度。因而社会改革就是重新设计资本主义制度。

穆勒试图用来改良社会的制度是给予个人掌握各自生活的权力的制度。他支持农民所有制，认为这给了小农户改良自己土地和提高收入的刺激。他提倡生产合作，提倡工业合伙制（包括分享利润），认为这些制度使工人能够分担责任，促进商业行为的成功。这些方案无不具备使各集团保持刺激的特征。他把这些方案称为社会主义做法。他依然认可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论，但他相信，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包括关于人口控制的教育，会使他们看到限制家庭规模的好处，认识到生活水平将因此而提高。这个看法也影响到了他对静止状态的看法。虽然增长会减缓，但只要工人自己能改善生活，就没有理由为此挂虑。

正如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所阐明的，从 19 世纪这个古典主义的意义上看，他是位自由主义者。他信仰个人自由。他甚至乐意论证说，应该有一个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的一般假设。他列举了国家必须采取的五种行为，其中既有个人不是自己利益（比如教育）的最佳评判者的情况，也有当没有国家参与的时候，个人必须为他人的利益而服务（比如救济）的情况。他认

为，合股组织需要进行委托管理，凡这些组织必须做的事，只要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国家也经常可以这么做。甚至更激进的是，穆勒认为可能存在有望由国家包揽一切事务的环境："在既定年代或国家的特定环境下，很少有任何对大众利益真正重要的事情应该由政府自己来做，政府做这些事，或许不是人们希望的，也不必要，但这不是因为个人无法完成好，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做。"穆勒证明了经济自由主义，给它作了大幅修改，使它为许多人称作社会主义的国家行为留下了可能的空间。

卡尔·马克思

19世纪中期，另一位以李嘉图经济学为基础的重要人物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不过，穆勒依然停留在斯密和李嘉图设置的古典主义框架内，马克思却对正统的"平庸的"政治经济学提出激烈批评。他先是在柏林大学研究古代史，后来接受了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的思想。黑格尔著作的核心是辩证法，根据这个辩证法，由一个论题和一个反题的对立面产生一个合题，由此发展出各种思想。不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用在思想领域，马克思却用辩证法分析物质世界以及社会进化（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在自身产生张力，推动历史走向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阶段。封建主义让位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又让位于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个社会最高阶段。对物质世界的辩证分析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

法。

马克思的写作分成几个阶段。19 世纪 40 年代初，马克思在莱茵兰当记者，那时候，他不得不应对自由贸易和对偷盗木材的立法之类的经济问题。埋藏在他日后的作品中的理论框架当时还全然不见踪影——他认为剩余价值观是“经济幻想”。可到了 1844 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 年），在英德两国都拥有产业的棉花生产者，成了马克思的终生好友、支持者和合作者。他向马克思介绍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在前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恩格斯曾论证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他们日益贫困。资本家可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靠租金和利息增加其实业收入，工人却无能为力。1844 年，马克思直接采用了斯密的语汇，进一步解释了低工资现象。假如某种产品的需求下降了，那么其价格的至少一个组成部分（租金、利润或工资）必定降到自然率以下。他认为，由于分工，工人们越来越专业，也就越来越难以转换职业。结果，一旦价格下降，收入减少到自然率以下的恰恰就是工人。资本家有办法使其产品的竞争性价格高于自然价格——只要索要的价格高于产品价值即可，这样，剩余就缩水了。

接下来的三年中，马克思进一步研读了李嘉图经济学，采纳了劳动力价值理论。但李嘉图用“价值”这个词表示商品的价格，马克思却把价值界定为藏在价格背后的某种东西：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价值与价格不同。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就如何产生剥削（甚至在均衡条件下）的问题上，它给了马克思一个严酷的解释。剥削固有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关系中。

1848 年见证了《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和马克思参加的历次革命（特别是发生在巴黎的那次），这以后，他流亡到英国。在伦敦，他重新开始对经济学这门学科进行更加系统、科学的研究。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末，他所出版的还只有一本对这个学科的简单介绍：《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 年），这也是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他给恩格斯通信时，曾经粗略说明了一项六卷本的著述计划，论及资本、土地财产、劳动力、国家、国际贸易以及世界市场。因此，他的代表作《资本论》（Capital）被认为是这项大得多的研究项目中的第一卷。《资本论》本身又扩展成三卷，只有一卷在马克思生前出版，那是 1867 年。其余两卷由恩格斯分别于 1885 年和 1894 年出版。马克思还撰写了经济思想史的材料，计划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日后出版了《剩余价值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资本论》的特点是调查法，这个方法被有些学者称为“系统”辩证法。他用这个方法从各种思想自身着手，从抽象到具体，分阶段地提出批评（如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来分析资本主义）。由于这些分析始于非常抽象的范畴，在早期阶段只能解释非常一般的现象。在每个阶段，它都没能解释更加复杂的经验主义现象。然而，就是这种缺陷把这个分析带向了更为复杂和具体的范畴。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变化反映在《资本论》三卷本的组织结构中。第一卷从商品的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开始，探讨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分析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对抗。第二卷探讨了资本循环和资本的多种形式。第三卷对竞争以

及资本家之间的对抗作了一番调查。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把资本和剩余价值当做非常抽象的概念，到了第三卷，这些概念愈发复杂了。这样他就可以对资本主义更多的经验主义特征，比如利息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分配，以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作出解释。

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论点建立在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上。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和任何别的事物的价值一样，就是它的生产成本（用劳动时间衡量）。比如说，如果生产一个工人生存和再生产所需的物品，需要花费 6 小时劳动时间，那么他的劳动力价值就是 6 小时。当然，这个工人有可能被强迫工作 10 小时，这 10 小时就是他的劳动。工人生产了价值 10 小时劳动的物品，但因为他的劳动力价值只有 6 小时劳动，所以他的工资只有 6 小时劳动。于是，剩余价值就创造出来了，等于 4 小时劳动。马克思主张，这个剩余价值就是利润的源泉。资本家可以用这种方法剥削工人的劳动，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手段。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手段，工人无法自行生产，被迫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所以，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它绝不是可以消灭而不影响整个制度结构的偶然特征。

从工人的劳动中减去不付工资的劳动，并固定在商品中，从而得到的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以货币数量的形式实现的。但资本不仅仅是货币。货币为了实现资本的功能，必须首先转换成生产手段和劳动力，接着转换成资本用到生产过程中，然后变成商品存货，最后，一旦商品卖出去，再重新变成货币。这个循环的最简单形式被马克思简写成“M—C—M′”（货币—商品—更多货币）。他分两个阶段对此作了分析。第一阶段是“简单再生

产”，经济以不变的规模进行自我再生产。第二阶段是“扩大再生产”，即资本在不断增加。他赞同斯密的观点，认为资本能积累起来，不是因为资本家在储藏货币，而是因为资本家用货币雇佣了有生产效率的劳动力。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对资本循环以及资本在循环过程中采取的不同形式作了深入探讨，然后用数字案例描画了这个过程，这就是受魁奈的《经济表》的启发而作的再生产表。前提是把经济分为两个部门。第一个部门生产资本品，第二个部门生产可能被资本家和工人消费的消费品。他还区分了资本可能采取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不变资本（设备等），一种是可变资本（用来雇佣劳动力）。经济开始于既定的不变资本量和可变资本量。当资本家用其剩余价值购买消费品之后，就发生了简单再生产，生产中用尽了的资本，恰好可以由两个部门的产量进行再生产而弥补。当这个过程结束时的资本储备大于过程之初的时候，扩大再生产就发生了。资本家把部分剩余变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是在用现在所谓的“两部门”模型来分析资本积累的过程。

第一和第二卷停留在十分抽象的层面，分析资本整体的运动。在第三卷中，马克思考虑了资本的具体形式，特别是生产成本、价格和利润。他分析了剩余价值是怎样转换成各种形式的利润和租金的。在这里，他提出了李嘉图得出劳动力价值理论时曾遭遇到的一些问题。使用不变资本比例较高的行业，其价格比价值高一些，而较少使用不变资本的行业，价格低于价值。所以价格和劳动力价值是不成比例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是个转换问题，即价值怎样转换成价格的问题。当初这个问题没有破坏李嘉

图的劳动力价值理论，现在，马克思用劳动时间界定价值，这个问题也同样没有对马克思的理论造成损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远远超出了他的再生产表。这里不可能一一赘述，却有几点务必讲到。首先是，马克思预测到资本主义生产会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集中化。日渐形成的机械化会引起马克思所称的“资本的有机部分”的增加，即更大比例的资本采取不变资本的形式，而采取可变资本形式的资本所占的比例更低。由于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生产的（通过剥削劳动力），这就是说，每个单位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将下降，其利润随之下降。资本家将想方设法通过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来抵消这个趋势，比如增加工作日长度，强迫工人更紧张地工作。

从这里出发，马克思还被引向了对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分析。他证言，资本家永远都在努力积累资本。资本时不时地得到迅速积累，以至于资本家无法把生产的所有产品卖出去。于是，利润无法实现的危机产生了。有些企业破产，有些还只是无法抵补所耗费的资本，要清算债务。最终，利润率将上升到某个点，在这个点处，人们开始新的投资，整个经济摆脱衰退，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期。因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分为衰退、复苏、高涨、危机相继发生的几个时期。经济存在周期，资本品的周转率或生命周期决定了经济所处的阶段。他还猜测，截至他写作时，这个周转率提高了，在“现代工业的要害部门”大概是 10 年。

另一个重要之处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积存引向自我覆灭的力量。其主要力量便是资本主义集中大生产。这种集中同时会加剧工人阶级的困境，使这个阶级日益组织起来：

大资本家篡夺和垄断了这个变革过程的种种好处，随着其数量的不断减少，受迫害、受奴役、受剥削的规模不断增加；可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与日俱增，这个阶级的数量在不断扩大，他们由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机制训练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来。

到最后，一度是进步力量的资本主义渐渐成了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被推翻。

一度刺激和促进了生产形式的垄断资本，渐渐成了它的束缚。生产手段的集中化以及劳动的社会化最终达到了与其资本主义外表不相调和的程度。这层外表支离破碎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被剥夺。

马克思未能完成《资本论》，也就再也没有什么书能对他的资本主义制度分析作出补充了。在他死后，恩格斯把他的未竟手稿整理成《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等这三卷被译成英文，又耽误了 20 年左右。马克思的早期作品直到 1932 年才在德国出版，至于这些书的英文版，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才问世。出版事宜受到延误，是因为他的作品多年来无人问津。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早已写就，而且反映的是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是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广为人知。20 世纪期间，随着人们获得新的线索，也改变了对他作品的诠释。马克思的著作从经济学远远延伸到了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以这里对马克思的任何诠释都显得有限至极，它只是许许多多不同诠释当中的一种。

关于马克思首先要说的一点是，他是在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

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的，他的经济学属于古典范畴。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显然多半归功于对李嘉图理论的研读。我们因而有可能把马克思视为李嘉图主义者。可这样做却忽略了一点，虽然他是从古典分析起步，却作了改变，生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类型。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生产规律是自然规律。而对于马克思，生产规律的基础是处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规律和制度。资本之所以可以存在，是因为人们有权拥有他人的劳动产品。雇佣劳动制度是处于剥削过程核心的制度，在英国工业领域普遍实行，但在马克思那个年代的传播范围远不及现在。因为它，剥削、货币和物品的循环、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纠缠到了一起。

马克思经济学虽然扎根于古典经济学，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经济思想主流而发展。他的另一个基础黑格尔哲学，对于逐渐占据经济学职业主流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言，是陌生的。马克思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结合，1917 年以后与俄国乃至苏联的结合，使这个壁垒愈加森严。随着经济学逐渐远离社会思想的其他分支，混合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的马克思理论逐渐偏离了多数经济学家的视线。

不过，马克思的经济学即使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也是重要的。原因一目了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努力反驳马克思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回应。最突出的例子或许要算《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后，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 – Bawerk）和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尔弗丁（Rudolf Hilferding，1877 ~ 1941 年）之争了。但是最重要

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为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养料，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马克思用固定资本的积累来分析经济周期，借俄国经济学家米哈尔·伊万诺维奇·塔干—巴拉诺夫斯基（Mikhail Ivanovich Tugan - Baranovsky，1865 ~ 1919 年）的作品，渗透进了关注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 20 世纪经济周期理论。据他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了极大浪费，日后当人们争论起应该如何合理地计算一战到二战期间的社会主义经济时，这个理论成了至关重要的依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展望刺激了各个经济学家提出各自的设想，其中就有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3 年）。

小　结

古典政治经济学包含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和思想。这些思想因它们的根基——斯密的《国富论》——结合在一起。李嘉图基于抽象得多的推理，创建了一个严密得多的体系，但他的演绎法没能赢得广泛的支持。当 19 世纪 20 年代人们对李嘉图式传统的兴趣渐渐衰竭的时候，穆勒却在苦心维持，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重新回到了《国富论》特有的归纳、历史分析与演绎式推理相结合的方法。

古典经济学从未远离经济政策问题。学问家和政治家、记者、作家一样，是同一知识团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政治经济学谱系的一端是教条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支持者，另一端是李嘉图主

义的社会主义者。但多数经济学家处于两个极端中间。他们继续用斯密设置的框架，先是对付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产生的政治问题，后来又解决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和社会巨变中的问题。在斯密那个年代，英国被一个寡头小集团统治着，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虽然还没有清除腐败，但在扩大选举权范围、匿名投票、公务员考试等改革措施的作用下，其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从1867年的改革法开始，选举权范围扩大到工人阶级。1884年，范围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在政治日程上的地位远远超出了斯密和边沁的年代。穆勒和马克思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示了经斯密创立、李嘉图修正的结构，如今，环境虽然变了，但还可以应用这个结构。

古典理论虽然被证明有应用性，却逐渐过时了。就连穆勒也没有合适的分析工具来处理垄断问题。到了19世纪末，大企业问题日益凸现，德国和美国尤甚。各工业国之间的竞争说明，不能像迟至那个世纪中期那样，对自由贸易不予重视了。毕竟至少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实际工资已经大幅上涨，就连撑起整个古典经济学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也越来越难以抗辩了。除此以外，罗斯金等浪漫主义批评家也在质疑这门学科所赖以成立的价值判断。西尼尔曾把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描述成政治经济学取得的胜利，可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对这门学科的信念灰飞烟灭了。

8

欧洲的历史与理论的分裂

（1870～1914年）

经济学的职业化

19世纪的后几十年里，经济学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逐渐职业化，由一群在这个领域学有专长的人（很少有女性）主导着，其中大部分是全职学者。这与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及其同代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个变化在英国和美国都有发生。此外，专业杂志开始刊发研究论文，比如创办于1886年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890年创刊的《经济日报》（Economic Journal）和189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在欧洲大陆，这些变化发生得更早。德国有着悠久的经济管理科学传统，为的是培养公务员。这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是学者领导了经济学的发展。正如人们日后所知，创立于184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已经建立了牢固的研究传统，为教授们创造了安

全和毫无压力的环境，让他们讲授专门学说。这种自由日后由俾斯麦扩展到了德国的其他大学。德国发行专业学术类杂志的时间更比英语世界的早得多，像 1844 年创刊的《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1863 年的《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在法国，经济思想是由萨伊、库尔诺等大学教授和桥梁道路学校这样顶尖专科学校的工程师们推动发展的。

发展经济思想的知识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牛顿主义的思想鼓舞了 18、19 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斯密和马尔萨斯都把各自的著作看成牛顿规律在社会领域的应用。甚至早在 17 世纪，科学就已经影响了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然而直到 19 世纪，“科学家”这个概念才逐渐确立。人们不再指科学为“自然哲学”，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距离拉大了，这一点从几个方面影响了经济学。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人转向了经济学研究。他们努力仿效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这门被视为最成功的科学的成就。有些则把经济学扎根在实验心理学（与边沁的心理学相差甚远）之上，以此来巩固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受到达尔文思想（《物种起源》出版于 1859 年）的鼓舞，将这种思想应用到经济学的演变上。

伴随这些发展而来的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发展。用经济学解决的许多问题没有变，但这门学科变了，或者说至少看起来如此，它偏离了政治哲学这个鼻祖。到了 1900 年，“经济学”这个词开始取代“政治经济学”，成了这门学科普遍认可的标签。数学的应用虽然仍在少数，毕竟越来越普遍了，而人们越来越时兴认为，学生应该能够专攻经济学而不是借由数学或哲学来学习。

杰文斯、瓦尔拉斯与数理经济学

纵观19世纪，法国、德国的经济学家曾经用到过数学。在法国，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康多塞的社会数学，库尔诺和桥梁道路学校的工程师们也应包括在内。德国的例子有杜能和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9年）。但大量的研究者依然不用数学。在英国，如果抛开李嘉图应用的数字例子不说，那么没有哪个古典经济学家用到过数学。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经济学家努力仿效物理学，数理分析才开始得到广泛得多的应用。随之而来的还有另几样变化：更加关注个人行为，从长期发展这样的古典命题转而关注狭窄些的问题。领头的有两个人，一个在英国，叫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年），一个在洛桑，是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年）。

杰文斯是气象学家、化学家，也是《科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的作者。这本书拥有广泛读者，是一本论述科学方法的专著。他还是功利主义者。所有这些背景因素对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重大影响。他所受的经济学训练来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年）中大肆批判穆勒和李嘉图式的经济学传统。他不赞成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李嘉图曾附和斯密的意见，认为一件物品要有价值，必先具备效用，但决定价值的是生产成本而非效用。杰文斯则认为这是错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具

体来说，价值是由消费者从最后消费的一单位物品上得到的收益——边际效用，或杰文斯所说的“最后效用程度”——来决定的。价值和生产成本之间有联系，但是间接的。他这样总结道：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量，

供给量决定最后效用程度，

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开门见山地说，经济学与数学是和谐一致的，因为它也是分析数量。他对衡量经济数量的可能性十分乐观，指出：数据到处都是，在账本里、在价格表上、在银行回单里，还有政府数据等等。问题不是缺乏数据，而是经济学家不懂得怎样用它，并且光有数据还不够。对于杰文斯而言，把经济学确立为一门科学，就是要和精确测量经济数量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杰文斯的出发点是边沁的效用理论，把效用界定为提高快乐和减少痛苦的能力。虽然感觉和动机是不可能直接衡量的，但杰文斯认为，间接的测量还是有可能的。某人买进或卖出什么物品，是由从各种物品中得到的快乐相比较而决定的，就是说，可以通过观察市场行为来衡量和比较快乐程度。他从用钟摆的运动测量重力的方法类推，集中精力解决效用的定义问题，并想出了可能的测量手段，即大量利用当时的心理学方法。这样，他就可以用这个理论分析经济现象了。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杰文斯用效用解释行为。也就是假设个人努力追求效用最大化，即尽可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他提出了四种实现方法，并一一分析：（1）以尽可能好的方

法配置不同用途的物品的储备；（2）与他人交换物品；（3）生产物品；（4）利用资本。他用微分表示了每一种方法中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以交换为例，他推导出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两种物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其价格之比。比如说，假如一个苹果的成本两倍于一根香蕉，从买来的最后一个苹果中获得的快乐必然两倍于最后多出来的那根香蕉的快乐。如果少于这个数，人们会放弃一个苹果，多拿两根香蕉。劳动也有对等的结果，即工人劳动一定的小时数，以使每多出一个小时的劳动的痛苦恰好等于用那小时劳动买到的商品中获得的快乐。

同样的，瓦尔拉斯也在通过推动经济学的数学化，使经济学科学化。正如杰文斯关注消费行为和竞争性市场的价格决定问题，瓦尔拉斯也得出了很多同样的结论。但他是经由截然不同的路线得出这些结论的，而且他的关注点也大相径庭。瓦尔拉斯不是功利主义者，他继承了法国从萨伊追溯至孔狄亚克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以稀缺性决定价值的观点为出发点。他用“稀少性”这个词，即最后欲望的满足度，对稀缺性作了衡量。他由此推导出与杰文斯近似的结论。但是，杰文斯用两个人的交换行为来分析市场，容许与其他潜在交易方进行竞争，瓦尔拉斯的关注点却是在每个人都要面对市场价格的有组织市场。在此情形下，一个人将决定他希望买或卖的每种商品的数量。瓦尔拉斯由此建立了供求曲线，把希望购买的量或销售的量与价格挂钩：价格上涨，则需求量一般下降，供给量一般会上升。两者相等的时候，市场实现均衡。

从这一点看，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结论只有些微差别。他们

的主要区别在于，瓦尔拉斯继续探讨了多市场均衡的问题，即同时存在大量市场的情况下，怎样确定价格的问题。他从推导两种商品交易的供需曲线开始。人们各有两种商品的存货，在相对价格既定的情况下，互相交换到最后各自占有所偏好的两种商品的组合。接着，瓦尔拉斯把这个分析扩大到很多商品的交换过程中。这之后，他引入了生产，假设企业家在各种活动之间移动资源，直到所有活动的机会成本都消除为止。引入生产意味着引入要素服务市场（租用劳动力和机械设备用于生产的市场）。最后，他还添加了信用市场，以便对利率作出解释。他用这个市场来联结资本品的租金率和它们的购买价格。

最后的结果是，瓦尔拉斯有了一个数学模型——联立方程组，以此可以说明经济整体原则上是环环相扣的。例如，流行的某种变化或许会使人们减少对啤酒的需求，而增加对茶的需求。这个变化可以不仅影响到啤酒和茶的价格，还影响到所有其他物品、工资，甚至利率的价格。由于这个方程组十分复杂，瓦尔拉斯的分析又极其抽象，他把注意力限定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他极力阐明他的那个方程组有一个解：有一组能满足他所有方程式的价格和数量。这就是均衡的存在问题。他计算了方程式的数量，说明这个数等于未知数（价格和数量）的数量。第二，他努力说明他这个方程组的解是稳定的，即使经济始于任意的一组价格，也会以满足他的方程组的一组价格告终。这就是均衡的稳定性问题。瓦尔拉斯的方法是假定商品的供给一旦超过需求，其价格就会下降，反之亦然。这就是经济向均衡“支撑”行进的过程。

瓦尔拉斯明白，真正的经济并不存在多个联立方程组的解。

他声称，这个支撑过程描述的虽是真实的经济中价格决定的试错过程，经济学家却可以通过解这个联立方程组，得到同样的结果。两种方法得到的是同一个答案。他所推导的理论是“纯”经济学，需要得到应用。但当他把他的理论应用到各种政策问题上时，却没能引起多少关注。他最激进的提议是对土地价值或租金的增加部分征税。他用模型论证了和李嘉图类似的结论，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租金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将增加。就是说，对租金的增收部分征的税会收获越来越多的收入。这样的税与瓦尔拉斯的公正观是一致的。对劳动收入征税是不公平的，因为人们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但土地的价值来源于社会，因此社会以税收的形式得到这笔收入是合法的。

杰文斯也把抽象的数学理论仅仅看成经济学的一部分。他应用到经济学上的是统计方法和归纳方法。这与他的科学与测量有关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因《煤的疑问》（The Coal Question，1865年）而闻名遐迩。书中他分析了英国煤炭储备逐渐衰竭的后果，总结道，一旦英国的煤炭耗尽，增长就将中止。他用了详尽的统计数据，不仅有煤炭储量，还有英国工业的扩张速度，来得到这个论点。但他错了，他没有看到技术革新会如何扭转这个局面。19 世纪 60 年代，他还分析了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这件事情对金价的影响。这部作品的主要特征是他应用了指数来确定 19 世纪 50 年代发生的物价上涨程度。然而，杰文斯最富有创新的成就或许当属他的贸易周期研究。他利用统计级数确定了经济活动每 10 年有一次波动。当时，人们相信太阳黑子会影响气候，于是他基于气候与收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设法确立了太阳黑子的活动和经

济周期之间的相关性。为了检验这个想法，他还收集和分析了大量物价数据。

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各自独立地得出了边际效用和价格理论（杰文斯约早 10 年发表他的看法，但当时无人注意）。他们是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才互相发现对方的著作的，于是同意在深入研究数理经济学和反对李嘉图学说的进程中通力合作。但是接下来的 10 年中，数理经济学的传播十分缓慢。两个人都是社会改革者，瓦尔拉斯根据自己的土地税观点，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杰文斯则把效用主义当做给予改革的一连串零零碎碎的、实用主义的建议，和詹姆斯·穆勒的方式颇似。

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学

19 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经济学以历史运动为主流，这场运动一般被一分为二，一个是“旧”历史学派，由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领导，另一个是“新”历史学派，由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1838～1917 年）领导。和“新”历史学派相比，“旧”历史学派远远不那么像个学派。在德国也能找到古典经济学，但它借用的是斯密和孔狄亚克等法国理论家的理论，而不是李嘉图的。历史学派出现之前，德国经济学界派别林立，如所谓“浪漫”学派等，但相互之间很少有共同点，更不存在什么标准。数不胜数的自由主义派别都和“斯密主义”这个词有关系。

德国经济学界的历史运动是因罗雪尔 1843 年写的《历史方

法的国民经济学纲要》（Grundriss zu Vorlesungen über die Staatswissenschaft nach geschichtlicher Methode）而确立起来的。在这本书中，罗雪尔没有指认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错误的，他指出，德国在他那个年代所具备的政治、工业条件下，不适宜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否采用一种经济理论，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所处的具体环境。进一步说，重要的是要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阶段。然而，旧历史学派虽然有这样的观点，但是比较起来，斯密、穆勒既有理论依据，又有深入的、经验的、历史的材料加以佐证，旧历史学派还是没能形成自己鲜明的特点。

新历史学派则更为激进。施穆勒对待古典经济学的态度和旧历史学派一样，他还想办法扩展这个课题，把今天被称为经济社会学的内容都囊括了进来。他对历史规律的观点表示怀疑，认为那往往不过是令人生疑的归纳总结或是人们心里认定的事实，和自然科学的规律毫无关系。他认为，经济命题要建立在详细的经验性的观察基础上，这一点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对特殊年代、特殊地域的环境加以适当考虑。他并不反对理论，但在下任何一般性结论之前，一定要非常谨慎地确定个案的各项事实。必须进行详细的历史研究，才能在必要的实证基础上确立方法。

施穆勒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是霍亨索伦王室的支持者。但他又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主张经济学家应当参与经济与社会变革的过程。为此，他在 1872 年成立的社会政策联盟内部，组织了一些委员会，制定理想的社会政策。这个组织的成员渐渐被称为学术社会学家。他们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现行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极端自由主义。他们致力于工作时

间、社会保险、工厂立法等能应用到社会改革中的零星问题的研究。

在奥地利，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年）在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中，提供了另一种研究理论经济学的方法。尽管他身处奥地利的维也纳，却也采用了拉乌、赫尔曼、罗雪尔等人确立的德国传统的供求分析方法。与杰文斯、瓦尔拉斯相比，门格尔并不想依照现代物理学的标准使经济学科学化。相反，他的方法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推崇揭示经济现象的精髓所在，发现经济现象的真实特性。不过，虽然视角截然不同，但他还是主张边际决定价值，也就是由多出的那一个单位的商品的价值决定商品价值。

门格尔假设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由此出发研究经济学。商品就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东西：

假如一种东西要成为商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种前提：

1. 人类需要。
2. 这个东西有这样的特性：它提供的东西与人类这种需要的满足发生因果关系。
3. 人类了解这种因果关系。
4. 能驾驭这个东西，足以引导它满足这种需要。

一件东西要拿来当商品，不但必须满足人类需要，人类还必须知道怎样用这件东西满足需要，而且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它。

那么那些看起来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东西呢？门格尔的答案

是，商品可以直接（他称之为低级商品）或间接地（高级商品）满足需要。因此，商品可以排出等级，直接满足需要的商品位于底层，非常间接地满足需要的商品位于顶层。面包在底层，钢铁厂的位置就高得多。

从这里出发，门格尔接着界定价值就是商品满足需要的重要性：价值是驾驭商品而产生的满足程度。某种商品的价值也就是当人们无法获得该商品时的需求。门格尔假设这种价值随商品数量的增长而下降，这也就是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容易扩展到高级商品，即不直接满足需要的商品的概念："特定数量的某种高级商品的价值……等于当我们无法驾驭这些特定数量的高级商品时，所没有生产出来的那部分产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重要性。"门格尔在这里说的是，假如我们无法获得一种高级商品（例如1千克小麦），就生产不出一定数量的低级商品（例如两个面包）。1千克小麦的价值就等于两个面包能满足的人类需要。

根据门格尔的定义，价值这个概念和交换或价格都没有关系。价格只随着交换而出现，并且由价值决定。两个独立个体发生的一次交换中，唯一要说到价格的就是，价格处于双方为所交换的商品确定的两个价值限度之间，否则交易的一方就会退出。哪里有竞争，不确定的程度就更小一些。

门格尔对价格决定的文字分析堪比杰文斯、瓦尔拉斯的数理分析。他们三个人都假设价格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都反对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如果把门格尔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简单地划归为一类，就会忽略他那不太正式的分析中所强调的

重要观点。门格尔并没有假设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不认为每个人都在使效用最大化。相反，个人对摆在面前的各种可能往往了解有限。当人们找到并利用盈利的机会，创造出先前没有的商品，或者找到生产现有商品的新方法时，企业家就诞生了。因此，对于门格尔来说，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瓦尔拉斯或杰文斯的静态观相比，门格尔的观点与亚当·斯密的竞争观的共同点多得多。在门格尔看来，竞争不是没有垄断，而是渐渐消除垄断的过程："只要没有社会障碍或其他障碍，对于竞争的需要就能唤起竞争。"

门格尔经济学更深入的特征是他强调制度是从商品的性质衍生出来的。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私有财产本身。财产，据他说，"不是任意的存货，而是我们对于一切经济物品的需要以及所能获得的数量之间的差异所强加于我们的问题……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法律秩序因而有了经济起因。但是，虽然制度或许曾经有经济起因，但制度通常不是任何个人设计出来的。它们总是作为个人行为的意外后果而出现的。例如货币，门格尔声称（似乎忽略了国家在设定货币标准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量证据），货币就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个人在寻求尽可能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意外出现的。

门格尔的《原理》是献给历史学派创始人罗雪尔的。他的主观价值论承袭了早先的德国传统，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和过去发生断裂并没有意义。然而在 1883 年，门格尔出版了一本方法论论著，对正在施穆勒领导下的（新）历史学派提出批评。他设法在理论经济学和历史经济学之间划定一条严格的界限。他认

为，理论经济学是在纯粹自利、无所不知、活动自由的假设前提下，揭示“精确的”规律。验证理论经济学得出的理论，是对它的误解，因为它的基础是抽象的：在现实世界里，“纯粹自利”的存在无异于“纯氧气”状态。门格尔还反对数理经济学，因为数学能说明的只是数量关系，无法确定经济现象的精髓，而这个精髓才是他关注的。像瓦尔拉斯曾经作的那样分析相互依赖性和互相决定性，是无视因果关系。门格尔还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学说，虽然它们在书中是无关大局的命题，日后却在奥地利经济学界变得非常重要。一个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认为一切分析必须从个人开始，不能从总量或集合概念开始。另一个是认为社会现象的背后有着天然的规律。

施穆勒十分挑剔地读了门格尔的书，结果是一场大战——方法论大战。在随后的讨论中，很多问题都被混淆了。人们一直认为，这场论战既针对政策（施穆勒赞成保护主义，门格尔反对），是谋求主导地位的论战，也针对了基本问题。至于施穆勒和门格尔能否一致同意，解决不同问题需要不同方法，就值得商榷了。总之，他们之间的分歧对德国经济学界的分裂造成了影响。

英国的历史经济学与马歇尔学派

在英国，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 年）提倡历史方法，还用它批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他和马尔萨斯一道，创立了伦敦统计学会，即日后的皇家统计学会。然而，在经济学应不应该是历史课题的问题上，挑起争端的最大责任人当属

托马斯·爱德华·克利夫·莱斯利（Thomas Edward Cliffe Leslie，1827～1882年）。1870年，莱斯利吸收了这个由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观点，认为经济规律不是普遍适用的，因地而异。他还对斯密《国富论》中盛行的概念提出了挑战。他辩称，斯密采用的是归纳法（虽然没有尽其所用），而且没有假设人类行为是自私的。莱斯利提倡用更加归纳性的、历史性的方法取代抽象的政治经济学，通盘考虑各种人类动机和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演变过程。竞争和资本活动正在把这个世界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确定，侵蚀着正统理论的各项假设。

莱斯利认为经济学已变得过于抽象，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结论之间的关联性有限，这些观点在以后的岁月里被其他学者发扬光大。19世纪80年代还见证了索罗尔德·罗杰斯（J. E. Thorold Rogers，1823～1890年）、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1849～1919年）、威廉·詹姆斯·阿什利（William James Ashley，1860～1927年）在英国经济史方面创作的先驱著作。而最有影响的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年），或许是因为英年早逝，他被很多同龄人视为圣人。是他把“工业革命”这个词传播开来。汤因比致力于社会改革，鼓舞了牛津大学的一代学子研究经济学，以实现这个目标。至少在分配问题上，他拒绝承认伦理道德可以和经济学相分离，他还坚持认为，要想理解现在的经济、社会问题，必须考虑其历史状况。他主张，虽然经济、社会史有赖于其他历史类型，却又脱离于其他历史类型。

尽管理论经济学和历史经济学的倡议者之间存在尖锐分歧，

但英国经济学界避免了像德国经济学界那样四分五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的态度是原因之一。这位经济学家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在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位置上领导着英国经济学界，一直到1930年左右。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大学制度的结构有所不同，没有集中任命教授的过程。

马歇尔自从19世纪60年代末承担了用数学语言解释穆勒学说的任务以后，便开始了经济学研究。这项任务是用数学表达式表示供求关系。在此过程中，他深受德国学者，特别是劳、赫尔曼、杜能的影响。读过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后，他把效用理论移植到他的供求理论上，用它来解释需求曲线。和杰文斯或瓦尔拉斯的方法相比，他是用一套方程式描述一个静态的均衡。但是，瓦尔拉斯的分析维持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面，而马歇尔一直在努力使之符合现实。特别是，他希望对时间加以适当考虑。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分析符合经济中一切相互依赖的情况的一般均衡了，他不得不处理一个时期的一个市场。为此，他发展了局部均衡分析法，也就是就经济中的一个部分本身进行分析。

马歇尔采用这个方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对生物学，特别对进化的观点很有兴趣。他认为，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时候，用生物学的语言比用机械方面的比喻更有用。这就意味着，他十分怀疑杰文斯、瓦尔拉斯使用的和机械学十分接近的数学工具。他对进化观的喜好可以从好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他采纳了“自然界不搞跳跃式”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把持续、渐进的变化当做经济学的典型特征。他不把个人的行为视为

既定事实，而是假设人们会根据环境的变化修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如果劳动者用收入购买有益健康的物品，从事有益健康的活动，就能增强体力，提高智力，生产力就会得到提高。反之，如果他们沉迷于对身心不利的生活方式，就无法改善效率或性格。

进化观还影响到了马歇尔的企业观。他把企业看做和个人一般无二的循着一个生命周期而进步的实体。开始时它们年轻而强壮，一个成熟期过后，它们开始变老，更新更有效率的企业取而代之。所以，一个行业有如一片森林，整体看来似乎一成不变，其实每棵树都无时不在变化。

马歇尔经济学的基础是供求理论。通过清晰的时间段划分，时间被纳入考虑范畴。这里的时间不是指日历上的时间，而是根据每个阶段上自由变化的物品来界定。在不同的问题上，每个阶段上的日历时间可能相去甚远。他把最短的时间段定义为市场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没有时间生产更多物品，所以可获得的物品数量是一定的。假如商品是易腐物质，比如鱼（冰箱问世之前），就会有多少卖多少。价格完全决定于需求。可如果商品的储存不必花多少费用（例如小麦），价格就主要由卖方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来控制了。即使需求很低，卖方也不情愿接受低价。于是需求将决定销售量而不是价格。

马歇尔的下一个时间段也是短期，但足以使生产水平发生变化。短期内，企业能改变所雇用的不熟练工人的数量，但改变不了熟练工人和设备的数量，也改变不了生产手段。于是，产量可以增加，但单位成本也在增加。因此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如果需求增加，价格会上涨，原因是熟练工人和设备的有限存量使生

产成本增加了。

但是到了马歇尔下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长期，企业有时间改变所雇用的熟练工人和设备的数量，也有时间以不同方式组织生产。在此情况下，马歇尔相信，产量的扩大会引起成本下降。于是需求的增长会导致产量增加、价格下降。

最后，马歇尔假定了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段，在此期间，“由于知识、人口、资本、供求关系不断变化，经过一代代人逐渐实现增长，使正常价格发生渐进或漫长的变化”。

马歇尔和汤因比等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因为相信经济学提供了改善社会的方法才开始研究它。社会改革为正在逐渐消失的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种部分取代的方式。但马歇尔同样关注经济学应该确立为一门科学学科。他非常不愿意卷入公开的论战，因为他相信这样做会损害这门学科的权威性。经济学家的作用不在于提出关于经济的真相，而在于发展出一个众人认可的、能用以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原理架构。这也是他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 年第一版，1920 年第八版）中，在正文里用文字叙述结论，把图表转移到脚注中，把代数公式发配到附录中的原因之一。这本书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还在当教科书用。他希望这么一来，这门学科既能为职业经济学家接受，又能被商人们掌握。这样的安排和他对数学论据的怀疑态度也是一脉相承的。

马歇尔接受过数学教育，又利用过数学发展他的经济学。他是个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发展了许多迄今已成为现代经济学标准的理论概念。但他始终对经济学中应用的数学深感怀疑。他

想让经济学变得符合现实，可数学的应用使人们很容易得出没有现实基础的结论。只要以数学方式得出的结论无法用英语表述出来，他就表示疑问。例如他的论文虽包含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但由于他对这些公式的价值表示怀疑，所以没有公之于众。他发表的方法论的声明虽然强调数量和统计手段，但他和杰文斯不一样，他所采用的经验性的证据似乎更像是讲述逸闻趣事，而不是提供统计数据，更像是图说性质，不是非它不可。《经济学原理》是这样，含有工业组织的大量信息的书籍《工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1919 年）也是这样。对待证据的这种态度至少有一部分源自他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强烈渴望。

马歇尔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含糊不清。作为年轻讲师，马歇尔对历史满怀热情。《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就是从经济史开始写的。他在大多数章节中综合了事实材料和历史材料，还认为只有一个部分，即供求的一般关系和价值那部分，才称得上“理论”。可是在以后的版本中，历史性材料的分量减少了，被挪到附录中。他为自己在剑桥大学的位置指定继任者的时候，在庇古（A. C. Pigou，1877～1959 年）和历史学家福克斯韦尔（H. S. Foxwell，1849～1936 年）之间，他表示支持前者，说明他强烈地倾向于理论。《经济学原理》第一版中的历史内容曾经受到坎宁安的强烈批评。他的这篇批评文章名为《被曲解的经济史》（The Perversion of Economic History）。马歇尔也许是觉得，回避争端，接受惩戒性的劳动力分配，把历史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来得更安全。

欧洲经济理论（1900～1914年）

20世纪伊始，边际主义经济学，即建立在边际效用和个人最大化基础上的经济学，已经稳固确立起来了。瓦尔拉斯在洛桑的继承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年）发展和完善了他的一般均衡体系。他的意大利同行，恩里克·巴龙（Enrico Barone，1859～1924年）应用一般均衡理论，对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在瑞典，克纳特·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年）整合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在他们的著作中，边际生产力理论取代了古典的工资、利润理论。在英国，马歇尔的经济学观在剑桥大学大行其道，甚至主导了这门学科，他还大力推广以法、德传统和英国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供求分析。经济学不再是政治经济学了，它正在逐渐被一种抽象的、“纯粹的”经济理论所驾驭。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比阿特丽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Beatrice & Sidney Webb，1858～1943年，1859～1947年）创立了伦敦经济学院，而在牛津，人们正在追寻一种历史意识略多一点的经济学，可这些机构和马歇尔的剑桥大学比起来，全是小巫见大巫。伦敦经济学院虽然有着社会主义的起源因素，但却致力于自由发问，还接收了许多经济理论家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因素随着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加入而变得十分显著。马歇尔渴望把理论和历史放在一起，但两者还是分道扬镳了。英国不像美国，英国的历

史经济学准备改成经济史，把经济学抛在一边。而在德语世界，方法论大战把经济学界四分五裂，合作的可能性降低了。

不但数学，特别是微分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且经济学几乎丧失了对于长期动态的古典式关注。已经有经济学家开始采用静态理论，何况用数学工具来分析这种理论更加得心应手，自然受到了更多关注。但还是有些经济学家在关注动态理论。几位经济学家调查了经济周期，其中著名的有施穆勒的学生阿瑟·斯皮索夫（Arthur Spiethoff，1873～1957 年），受马克思影响的俄国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塔干—巴拉诺夫斯基（Mikhail Ivanovich Tugan－Baranovsky，1865～1919 年），还有一位保加利亚出生的法国教授阿尔贝特·阿夫塔利翁（Albert Aftalion，1874～1956 年）。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奥地利人，沿袭了门格尔的两名门徒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庞巴维克的传统，1912 年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书中论证技术进步是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动力。革新促使经济偏离均衡，为企业家创造新的赢利机会，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经济就实现了扩张。当这些机会消耗殆尽，增长就会放慢，发生萧条，经济落入到新的均衡状态，然后，这个均衡又被新的一轮革新浪潮打破。但这些观点只是正在愈加突显的纯理论的一点补白而已。

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分裂还延伸到了经济政策问题上。理论家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英、德两国的）历史学家则更加同情保护主义。1903 年英国发生的一次事件更是惊人地暴露出了这个分歧。当时，包括马歇尔、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斯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年)、庇古在内的14名英国经济学家联名致信《泰晤士报》，表示支持自由贸易。此举是为了在紧迫的政治问题上施加职业权威。可结果说明，英国的经济学界已隔江而治。除了两人以外，其他理论家都支持自由贸易，历史学家依然支持保护主义。

投身这些学术发展活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社会改革家。虽然他们远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对现状十分不满。他们一旦受到意识形态的推动，就把工作目标转向促进制定能减少贫困、改善工人阶级条件的政策。可是他们一般都偏向于零敲碎打的改革，反对像马克思或美国人亨利·乔治[①]那样的激进方案。不过，他们倒也不是想人非非的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和捍卫者。就连对马克思提出尖锐批评的奥地利人，也著书提出资本主义需要改革。然而，经济学已然变成了一门学术学科。多数经济学家固然是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驱使，但这门学科早已脱离了古典时期的面貌，变得和政治越来越泾渭分明了。

①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年，美国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他的《进步与贫困》提倡用单一地价税取代一切土地税种，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流传。

9

美国经济学的兴起

（1870～1939 年）

19 世纪晚期的美国经济学

回顾 19 世纪末，经济思想在美国的迅速发展算得上当时最重大的进步。至于 19 世纪中叶的美国经济学究竟算不算是欧洲经济学彻头彻尾的衍生物，至今还有争议。不过，至少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为止，这门职业已经在美国各地迅速繁衍，美国经济学家们正在为这门学科作出独创性的贡献。并且，美国经济学的背景迥异于欧洲。随着这个新领域的扩张，很多州都设立了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很多机构都正在创建一种以研究为重的文化。然而，美国学术界面临的压力和他们的欧洲同行有所不同。研究只在为数较少的几个机构占有主导地位，而各个机构的教研质量又参差不齐。高等教育缺乏集中控制，个人和机构的竞争力量十分强大。学者们被视为雇员，一旦与赞助人意见不合，就会遭到随意开除，而另一方面，人们又指望他们从事与社会问题相关的研

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还坚持说，他们的经济学家不打算支持自由贸易。大众对经济和社会问题饶有兴趣，希望理论经济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给出“合理的”意见，使业界产生了职业性而不是政治性的保守主义倾向。

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关税一直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主流问题。制造商往往偏爱对进口制成品征收高关税，农民则抱怨这样的关税提高了他们必须购买的物品的价格。不论如何，到了19世纪90年代，大家渐渐明白，撤销保护性关税是不可能的了，而货币和商业管制问题受到了比它更多的关注。

美国历史上，对货币问题争论已久。通过发行不可兑换的货币（美钞）来提供资金支持的南北战争抓住了人们的焦点。疆域的快速扩张，虚弱的银行系统，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深度萧条，乃至80年代的持续萧条，无一不确保了货币问题始终停留在议事日程上。意见有两种。一种把纸币视为假货的代名词，大多数投机活动的缘由，另一种对纸币能创造更多的购买力表示欢迎。前者要么是希望严密封锁纸币发行的行为，要么是希望把这种做法废除个干干净净，至少也希望使所有通货都百分之百得到黄金储备的支持。后者包括农民在内，希望提高物价。最后还有白银问题，与之相关的是白银应该和黄金一道进入流通领域。既然出产这两种金属的一些州有利可图，而且农业和制造业情况在这块大陆上的分配是不均匀的，因此存在着很强的地区利益。

美国的商业管制之所以比在英国重要，是因为随着铁路的增长，出现了集中。不仅铁路本身就是大型组织，而且其他行业的大亨们为了强化自己的利益，也多在控制铁路。人们利用合伙、

托拉斯等经营形式对付竞争可能造成的损害。农民和工业家们有充分的理由抱怨货运价格又高又不公平。消费者和竞争性行业的工业家们反对托拉斯，因为托拉斯利用垄断地位抬高价格。卡特尔的操纵者们则回应道，有些行业采取这些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无休止的竞争会迫使价格降低到成本以下，使行业动荡无序。因而，竞争也是摆在经济学家议事日程上的大课题。

随着经济学在19世纪80年代的扩张过程，美国经济学界取得了重大发展。1879年，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系在哈佛大学成立，为几年以后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作出了贡献。美国经济学会成立于1885年，并很快设计成一个广泛的、包容性很强的组织，只要有足够兴趣，愿意交纳会员费，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该协会成了人们认真讨论经济问题的一个中心。虽然这个协会直到1910年才出版自己的刊物，但它确曾缔造了一系列学术性出版物。

在此期间，欧洲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德国，而不是英国。历史学派主张经济理论必须为了适应不同的历史情况而作出调整，这个观点强烈吸引了那些相信美国的经济条件不同于欧洲的人们。虽然美国也发展了研究生教育，特别是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以后，但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经前往德国接受研究生教育。强调社会改革的德国社会政治协会，曾经是美国经济学会的榜样。虽然协会表示不搞派别，但它的第一个章程上曾表示过反对教条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造成好几位“旧学派”的经济学家拒绝加入协会。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协会清除了有侵犯意义的条款，大多数“旧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了会员。

约翰·贝茨·克拉克

美国经济学界这时候最杰出的一位经济学家是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年）。他和同时期的很多美国经济学家一样，在德国的海德堡接受教育，导师是旧历史学派成员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1821～1898年）。因此，人们对他在处女作《财富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Wealth）中想办法扩展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并不感到意外。他想把人性的一些特征考虑进去，比起传统理论所考虑的人性，他考虑的更加有道德感，不那么机械。此外，他想方设法把社会组织概念应用到经济学上。所以，尽管他提出了边际效用的理论（这一点他是受教于克尼斯，而非杰文斯、门格尔或瓦尔拉斯），但他对“有效的效用”的理解和旁人有所不同。他认为，市场衡量的是整个社会而非个人赋予商品的价值。从对个人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的关注，反映了他的社会组织观，这一点，恰恰是欧洲的边际效用理论家们没有考虑到的。

美国当时的环境背景诠释了克拉克对竞争的态度。他把道德因素考虑进来，对“保守的”竞争和“惨烈的”竞争作了区分。一个是竞争者努力提供更好或更便宜的服务，一个是竞争者抛弃了行为上的道德约束。对于克拉克来说，没有道德约束的竞争思想是荒谬可笑的。要找到这样的竞争，我们只好回到“与世隔绝、与熊共眠”的穴居时代。当他分析他视为现代美国社会的主流问题的时候，也考虑了道德因素——企业之间攻势逼人的“竞

争”会最终导致只剩一个企业生存下来，从而引起垄断。他主张的解决办法是开办合作型企业，实现利润共享，实行仲裁调解，最后使这些企业得到更广泛的发展。这样的制度安排才会有公平的结果，只要强制实行，社会是可以接受的。

在总结过去 10 年的基础上，克拉克著述了《财富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1899 年)。书中提出了收入分配的一种理论，使每一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都得到等同于其对产量的贡献的边际价值的收入。例如工资率等于雇主少雇佣一个工人所损失的收入。克拉克把资本类同于资金，从而把这套理论用到了资本问题上——个人的资本品（如设备、厂房等）是来来去去变化的，但资金量总保持不变。他认为利率就是资本的资金量的边际产品，即增加一美元的资本所可能得到的多余的收入。至于土地和资本品之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它们都是由利率决定收入。和前一本书一样，他这次也得出了道德性结论：假如竞争存在，那么每一个生产要素都得到了它有权得到的收入。这是一个可能有些保守的学说，它为资本家赚取的利润进行辩护，因而遭到了激进分子的批评。社会主义者主张资本家享有了本该属于劳动者的所得，而这个学说反其道而行之。

克拉克用海洋作类比，为静态理论作辩护。虽然海洋是在不断运动，但只要我们不去关心细枝末节，用静态理论就足够了。

> 静静的海洋是想象出来的，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海洋。但即使是最狂暴的海洋，它的历史上也总有这样的时刻：如果把控制海洋的主导力量单独放到一边考虑，它总能把海水运动降低到一个静止的状态。重力、浮力、压力，无非这

些，它们都有保持海水水平不动的效果……如果我们从一只鸟儿的视角看海，就很容易说，用静态的哲学说海洋是十分充分的，我们可以把潮起潮落说成是“干扰因素”造成的微小的失常。

这是对克拉克观点的清晰阐述。这个观点后来遭到了凯恩斯的反对。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家说什么“待风暴过去，海洋恢复平静”之类的话是废话。克拉克不关心短期的波动，只关心他认为这背后存在的现象。

和欧洲同僚马歇尔、熊彼特一样，克拉克把静态的研究看成动态研究的前奏。他认为，一项革新会使经济偏离均衡，为企业家创造利润，但工资早晚会跟上，使利润削减到正常水平；不过不等那种情况发生，另一项革新往往已经出现了，又一次干扰了均衡。

克拉克十分清晰地描绘了美国经济学在这段时期的特征。他的研究方法中渗透了道德因素，虽然他是美国社会的批评者，但他的姿态可以说是保守的，并没有尖锐地突破既有的方法。他关心大企业问题，受此驱使，他采纳了竞争的方法，而竞争正是关注大企业问题的结果。他在早先的书中，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都警惕到了垄断的问题，但他提出合作是解决垄断问题的办法。“潜伏的”或者潜在的竞争，可以防止企业抬价过高，而资本的增长会导致新的竞争。而且高价增加了消费者的成本，会抵消资本积累所自然增加的收益。他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越来越偏离年轻时候的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观了。

数理经济学

克拉克之外，拿出数理性更强的边际主义理论版本的还有一批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1835～1909年），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十分维护杰文斯的方法，但认为库尔诺的方法更胜一筹。他还对反对数理分析方法的旧学派的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声称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批评数学理论，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虽然他们不用数学方法，其实他们自己的理论如出一辙。纽科姆本人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是受到了通货问题的推动，特别是1878年通过了布兰德—阿利森法案之后，重新引入和增加了银铸币的数量。他论证道，物价波动是有害的，因为当价格变动的时候，人们还意识不到美元的价值早已改变了。在物价下跌时期，比如19世纪80年代，工人们认识不到物价的下跌幅度甚至大于他们工资的削减程度，因而还会抵制削减工资的行为。假如物价下跌，工资却不减少，就会减少雇用人数和产量。纽科姆的方法是，创造出价值和物价指数相关的美元来。这在当时的美国算是别出心裁的思想。这种美元会是纸币，它所代表的贵重金属的数量将随时变化，用以弥补物价的变动。以这样的美元计算的合同将和物价指数相联系，这就减少了无视物价变动所带来的问题。这个方案早在欧洲就有人提出过，但纽科姆丰富了它的内容。

纽科姆还提出了货币数量论的一个数学公式。这个公式是 $V \times R = K \times P$。意思是，在任何时期，投入流通的通货数量 R 乘

以它的流通速度 V（每一美元用在一次交易上的平均时间量），等于贸易数量 K 乘以物价水平 P。（在数量论的另一些表述中，K 可能表示交易总量或总收入。各种表述的诠释不同，但精神一致。）纽科姆利用这个公式来论证，假如通货的数量增加了，而其他条件不变，则物价上涨。不过，纽科姆的主要兴趣依然放在天文学上，虽然他一直是数学方法的热情倡议者，但他并没有发展自己的经济思想，大约在 1886 年以后，他不再继续出版经济学著作。

第一位接受了严格的数学训练，并把经济学研究作为毕生使命的美国人是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 年）。他所受的影响来自威拉德·吉布斯（Willard Gibbs，1839～1903 年），他是一位化学家、物理学家，因统计机械学著作而闻名。费雪的博士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研究》（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Prices，1892 年），用严密的数学方法分析了价值的边际效用论。不过，他虽然用数学解释了效用概念，却切断了效用和快乐、痛苦的任何联系，认为效用不过是描述个人行为的一种方法，不存在心理学的基础。这个理论唯一需要心理假设的地方是“每个人渴望做什么就做什么”。效用的意思不过是“渴望的程度”，人们对不同物品的渴望背后有什么心理问题，它并没有作出任何暗示。费雪比杰文斯、瓦尔拉斯更精通数学，意味着他的理论更加全面，他有能力解决他们曾经忽略了的一些技术问题。

费雪研究价值论所用的数学方法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逐渐主导了这门学科的方法有颇多共同之处。但在当时，费雪得到的支持很少。边际主义理论的其他版本，如克拉克的、弗兰克·艾

伯特·费特（Frank Albert Fetter，1863～1949年）的，都对效用作了道德或心理学上的解释，都回避了数学方法，都应用得更加广泛。人们一度认为，特殊天才必须既有能力用数学方法解决经济学问题，又不会误入歧途得搞不正当的投机。因此，阿瑟·哈德利（Arthur T. Hadley，1856～1930年）的意见是，利用数学方法，就有可能构筑一个假设的框架，最后盖棺定论，说它是“经过严密检验的命题”。只有杰文斯、瓦尔拉斯或费雪这样天赋的人物才能有幸避免这个陷阱。有趣的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和马歇尔对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保留意见何其相似。

费雪早先的价值理论著作没能获得众人的赞赏，相较之下，他在货币、资本、利息方面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注意和尊重。1895年，他从耶鲁大学的数学系转到了经济学系，从此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其中包括《增值和利息》（Appreciation and Interest，1896年）、《资本和收入的性质》（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1906年）、《利率论》（The Rate of Interest，1907年），又在后来的《利息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1930年）、《货币的购买力》（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1911年）中进一步拓展了思想，解决了经济理论中和资本、价格、利率、货币有关的一系列基本概念问题。《增值和利息》发展了真实利率的思想。比如，如果利率是10%，通货膨胀率是8%，那么贷款的真实回报率就只有2%。既然真实利率才是事关重大的问题，那么如果通货膨胀的情况要发生变化，人们就会期待名义利率发生同样的变化。于是，根据人们的储蓄和投资决策，他提出了真实利率理论。决策取决于两件事。一件是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消

费的态度。如果人们没有耐心推迟消费，就得有更大的动机去储蓄（比如要有更高利率）。第二件是资本的生产力问题。即延迟消费，以便对资源投资，能多获得多少收人。费雪给出了一个数学理论，证明真实利率是如何由时间偏好和生产力这两种力量决定的。

在《货币的购买力》中，费雪采纳了纽科姆用数学表达式表述的货币数量论，并将它延伸到了银行存款、通货等问题上，还给出了更加全面的解释，使它和自己的资本、利息理论联系起来。他还努力用统计方法验证了这套理论。他的核心论点是，在长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使物价水平产生相应的变化，但那会是他所定义的“过渡期”，在此期间，一切都会变化。他提出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之间关系的理论，对于他这些“过渡期”和导致生产水平变化的过程的分析，起到了重要作用。

费雪像数学家那样研究经济学，他关注的是如何使经济学沿着物理学、机械学的路子实现科学化。这么做的效果是，他能够利用在他那一代经济学家看来十分先进的数学方法。或许更重要的一个效果是，他坚持采用机械学的类推方法。这在他的货币著作中大概表现得最为明显。书中他始终采用两类类推法。一类是天平法（见图 2），好像秤一样，货币在一端，商品在另一端。（在这里，费雪一心只放在商品买卖的交易上，没有考虑用货币从事金融资产、财产等的交易的情况，因而把问题简单化了。）秤的臂长和流通速度、物价水平有关。

另一类是用水槽里的液体水平进行类推。图 3 中，金银储备是由两个桶里的液体水平表示的。两个桶都有出水口，相应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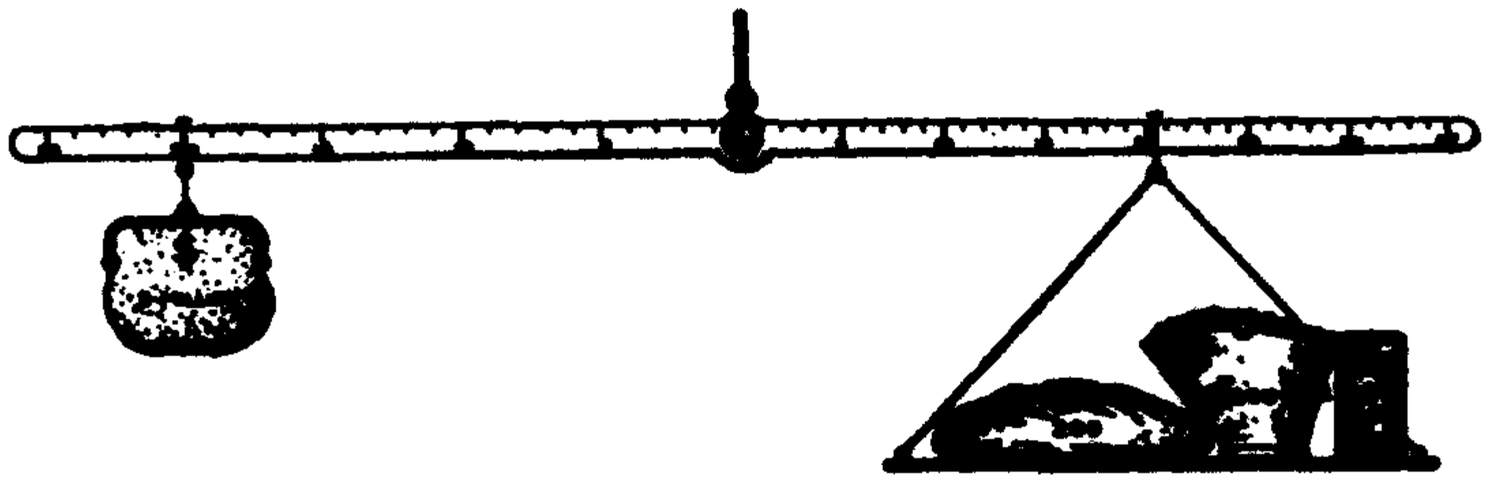

图 2　费雪用天平模型表述的货币数量论

示没有当做货币使用而损耗的金属，也有进水口，表示进入流通的金银。液体自由地从每一个出水口流进中央的水槽，水槽中间有一个可以移动的膜使金银相隔。液体的压力确保三个容器里的液体水平一样高。这说明了双金属制度的运行模式。一旦这样一个模型建立起来，能说明货币流通的变化对均衡的影响，比如说发现一座银矿这一类的事件会怎样影响均衡。利用物理模型的图，也是费雪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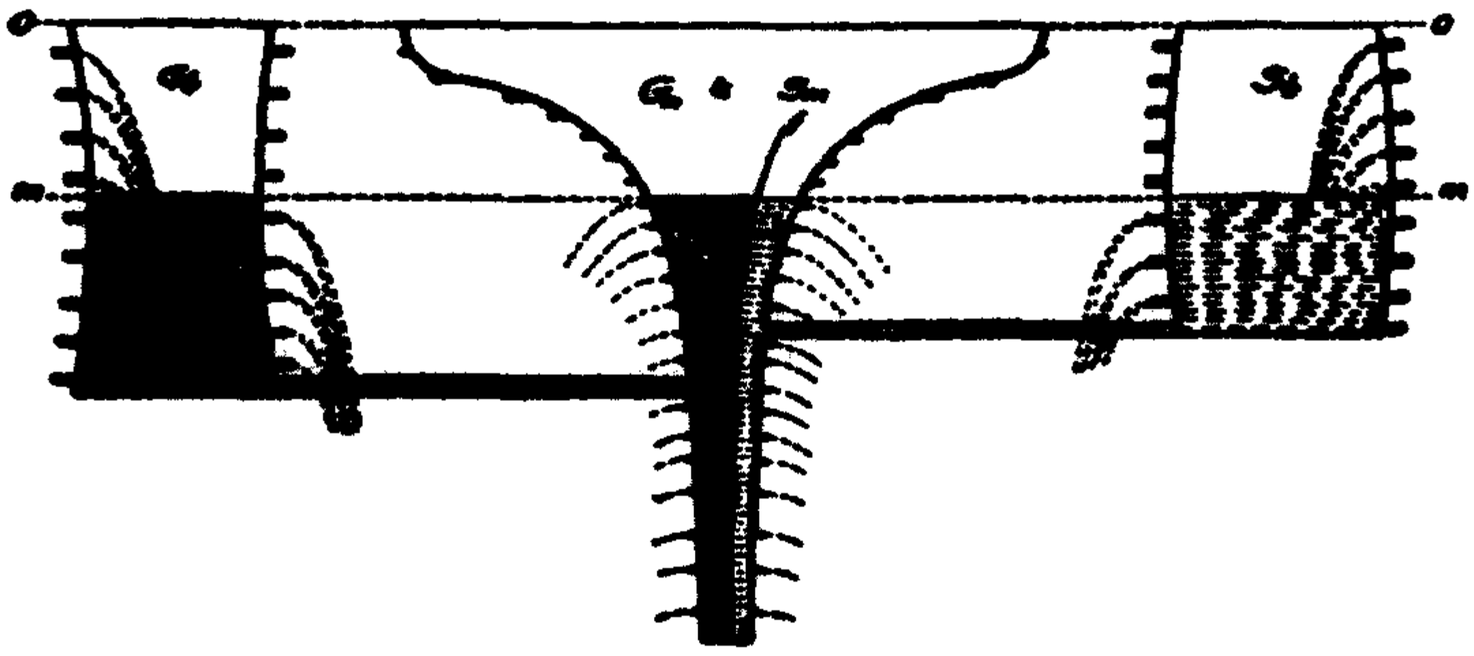

图 3　费雪的金银流通水槽模型

费雪的大多数工作是研究较为抽象的概念性问题。但他也是一位热情澎湃的改革者，甚至感到不得不为他在书里讨论到或者没有涉及的问题给出解决办法，就连同事们都抱怨，说他给出

的办法有时候是权宜之计，并不解决实质性困难。他的经济政策研究形成了一项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囊括了健康、优生、禁售（反对销售酒精）和世界和平等事业。从事这些事业时，他是积极的活动家和组织者，有些事业上，可以说他如痴如狂。负责宣传他的货币观的“稳定货币联盟”，还只是他参加的很多组织中的一个。他殚精竭虑想实施他的“补偿美元”方案。一旦实施这个方案，会为了稳定物价值数而改变美元的金含量。

索尔斯坦·凡勃伦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学家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索尔斯坦·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 年）。他和马克思一样，也强烈批评中产阶级社会和正统的经济学。但马克思的研究背景是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这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里面描绘得淋漓尽致。凡勃伦关心的却是 19 世纪行将结束时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他一生的头 16 个年头里，一直住在威斯康星州一个挪威人的社区里，那里与世隔绝，几乎自给自足。后来，面粉行业实现了技术革新，使农民们转而种植单一农作物，还引来了铁路，延伸了货币经济的范围。这个社区从此遭到破坏。直到他离开童年时生活过的社区，进入学院研修，他依然游离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之外，做一名旁观者。这一点显然反映在他的写作中。他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 年）中，对当时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大加讥讽，还发展了炫耀性消费和钱财攀比等概念。对于富得流

油的人而言，早已不再是为消费而消费，消费反而成了人们追求社会地位的过程之一。他们崇尚某些消费，因为花钱多，而且能说明他们财源滚滚。他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掠夺社会里面野蛮人的遗风。

凡勃伦努力把达尔文的进化思想系统地引进到对社会的分析当中，他对美国富有阶级的见解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类依照环境的变化，包括当下的技术环境变化，而发展其行为。但是思维习惯，或者凡勃伦所称的“制度”，却能依然如故，甚至在产生这种思维习惯的环境已然消失的情况下，它仍能维持不变。人类习惯于接受某些思想，而这些思想之所以得以坚持，往往因为存在既得利益。人类对待环境和能源利用的态度或许可供现代人借鉴。这些态度起源于资源充沛的年代，早已在社会制度下根深蒂固，纵使现在环境遭到破坏，并不适用这态度了，它还是没有变。但有时候，技术进步也会引起新的足以颠覆现行制度的思维习惯。不过或早或晚，这些思维习惯又会变得根深蒂固，落后于物质环境的变化。

凡勃伦所分析的美国工业社会是处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他的分析是基于对两种制度的区分：一个是机械操作，一个是企业经营。机械操作代表应用机械化操作的整个生产制度，它包括了一系列精妙制衡的次操作过程在内，其中哪一个次过程都不能自给自足。它所要求的价值和它所产生的价值反映了工人制度的天性——精确而且整齐划一——为了使机器有效率地操作，机械的标准化比工匠式的技巧来得更重要。这些价值与企业经营的金钱标准大不相同。企业经营关心的不是制造商品，而是赚钱。商人们

或许不是通过让机械操作过程顺利运转来赚钱，而是通过破坏这个制度，开创投机的机会来赚钱。市场萧条或者操纵市场，都可能使商人买到便宜的商业资产，使购买者不必从事任何生产性活动就赚到钱。企业合并，或者打广告，都可以创造垄断力量，从而赢取利润，但这样做对生产毫无贡献。比如做广告能赢得竞争力，哪怕广告根本不增加商品的价值，企业也不得不做广告。凡勃伦因此而诟病现存的一批“寄生”企业，它们普遍有百害而无一利，却令商人有利可图。

接下来，机械操作和企业经营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机械操作，执行的是标准化的行为，会产生凡事讲究因果的习惯：“它的根本哲学是物质主义，它的观念是因果观。”与之相对应，企业经营注重的是所有权和财产的概念：“企业经营的思想背景……是由所有权制度赋予的。‘经营原则’是所有权这个主命题的必然结果，是财产的原则，即金钱原则。”凡勃伦主张，在美国，企业经营是主导力量，因为把机械操作过程的各部分有机联系起来的机制就是由它创造的。机械操作虽有其自身的逻辑，却为了迎合企业经营的目的，为了赚钱，而早已被扩大化了。企业经营的思维习惯早已影响了美国文化，富豪们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不过是这种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然而，这个过程可能存在一个干扰因素。机械操作总是劝导人们养成和企业经营思维习惯相冲突的思维习惯。所以凡勃伦预测会出现两类人：一种受雇来经营企业，另一种是执行机械操作。这两个群体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遵循天赋人权，后者按因果关系行事。工人阶级将不再按天赋人权的原则思考问题，从

而不再能够理解企业经营正当与否。他们会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对现状造成威胁。凡勃伦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1921年）中，看到了企业主权可能不是被工人推翻而是被工程师推翻的可能性，企业制度有赖于这些工程师，但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为之工作的商人们的价值观有天壤之别。

事实就是这么明显，行业的技术专家举行一次全面罢工，这样的事情只需要1%的人数，只花上一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然后它将迅速摧毁旧秩序，横扫陈腐的金融结构，一次怠工就（把企业主不在场管控的行业）破坏得一干二净。

凡勃伦和马克思都提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将最终推翻资本主义。至于这些矛盾的性质，资本主义被推翻的方式，两个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凡勃伦很自然地从进化的观点出发批评正统经济学。正统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经济学在内，是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前的经济学。它把人性看成既定的，不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它根据自然法则解释社会现象。它是享乐主义的理论，假设人类的动机只是追求快乐；它是技术性的理论，解释社会的变化是朝着理想状态而前进；它是分类学理论，只分类不解释。它出现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比企业经营出现得还早，虽然已经不合时宜，却还是受到层层保护。或许人们会辩称，正统理论是理论假设上的投机，但无论如何，它影响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当然，这种假设“经济人”品行端正的完全竞争制度……只是抽象推理的权宜之计；唯有存在这种抽象条件……他所说的能力才存在。但，正如这些例子所示，一旦吸纳了真实情况进去……就逐渐变成提问者思维习惯中的一个有效要素，并形成了他对事实的理解。

凡勃伦的这些批评既适用于斯密、李嘉图、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适用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现代经济学家，凡勃伦曾新创了“新古典主义”用来指称马歇尔。凡勃伦认为，需要用带有达尔文进化思想的经济学取代这些经济学形式，要考虑人性的变化，要以因果关系推理为基础。可他自己从来没有讲清楚这种方法。

约翰·康芒斯

约翰·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1862～1945年）是一位热情的社会改革家。他是伊利（R. T. Ely，1854～1943年）的学生。伊利曾师从卡尔·克尼斯，在海德堡取得博士学位，其经济学研究方法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康芒斯的激进观点使他很难找到一个长期的学术职位，直到1904年，伊利想方设法为他在威斯康星开设了一个职位，他在那里一直干到1932年退休。他在早期著作中，曾设法把奥地利人的效用理论和历史学派强调法律和统计学的做法糅合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康芒斯的研究改变了思想基础，认为经济活动要依靠活动背后的法律、制度上的联系，而这样的联系

是随时间而发展的。经济学家不应该把这种联系当成既成事实，应该要给出解释。这种思想把康芒斯引人了详尽的历史研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从伊利那里接手的四卷本著作《美国劳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1918～1935 年）和《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1924 年）。康芒斯固然强调经验性研究，但他也发展了一套独特的理论框架，巅峰之作是《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1934 年）。

康芒斯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基础有一个主要特征，即他把交易当做分析的基本单位。交易涉及财产权的转移，但不一定通过市场。除了“以物易物”（的确要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以外，他区分了“管理”交易和“配给”交易，前者是管理者命令下属做事时的交易，后者是国家征税时发生的交易。以物易物交易的主要特征是，交易双方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人，实现两次所有权的转移，这一点是和另两种交易类型不同的。交易双方都有法律权利决定不参加交易，双方都要把某件东西给对方。康芒斯关注交易活动，从而不光分析市场，还分析到了使交易得以组织起来的整个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参与方”，比如国家、公司、工会、家庭、教会等等，每一方都有各自的“工作原则”。这些原则不断发展变化，使组织得以发挥功效。

康芒斯的观点是，为了维持秩序，有必要集中行动。社会要依靠制度，但若没有包括武力威胁在内的外部制裁，个人就不会尊重这些制度。这么一来，他立刻和反对控制个人自由的保守分子有了矛盾，他们指控他将社会主义思想引人了研究工作。其

实，他否认自己有社会主义思想。相反，他强调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必须采取集中行动。集中行动可以防止人们互相干扰他人的自由，为人们设定行为规范。例如市场制度下，唯有当存在财产权，而且签订的合同有可能受到尊重的情况下，才称得上有自由。

外部制裁主要来自法律制度。康芒斯特别强调了财产权，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中，他详尽解释了外部制裁是如何作为法庭裁断的结果而发展变化的。比如他向人们展示了，美国高等法院是如何在 19 世纪末戏剧性地扭转了人们的财产观的。过去对财产权的法律解释仅限于有形财产的权利，后来演变成有形财产的预期盈利能力。他认为法院作裁决的时候，一贯是考虑了经济后果的。

康芒斯讲求实际。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在改革上。他不打算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只寻找有效果的方案。在这方面，他卓有成效，对威斯康星州和联邦政府的立法都产生了影响。他的工作包括国内服务改革、工厂立法、工人赔偿、失业保险、利率控制、农村信贷、遗产税、财产评估法、移民政策，以及行业关系等。他的学生有很多进入政府工作，20 世纪 30 年代，他通过他们对罗斯福的新政产生了间接影响。这个新政是重要的经济措施计划，包括了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在内，旨在使美国脱离大萧条。

两次大战之间的多元主义

20 世纪初的美国，将要发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很多，克拉

克、费雪、凡勃伦、康芒斯是其中的四个代表。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门学科真正成了多元化的学科，没有哪一种方法占据主流。从“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分裂看待这种多元主义，属于传统的方法。新古典主义，包括克拉克和费雪，强调个人的最大化行为和竞争性市场的作用。而制度主义者受到凡勃伦的启发，抨击这种方法，并提出一种更加全面的观点，认为经济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不过，这样的描述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实际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就连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内部，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公然挑衅这样的分类法。甚至把制度主义当做一场自觉运动的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1884～1963年），这位制度主义的奠基人，人们也最好认为他是站在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分水岭上。他支持制度主义，但他认为自己是在延续他父亲约翰·贝茨·克拉克的事业。阿林·扬（Allyn Young，1876～1929年），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执教的短暂时光里，产生过巨大影响。他是另一位难以界定派别的经济学家。

新古典经济学显然包括了费雪之类的数理经济学家在内。但他的研究方法和克拉克有很大区别，克拉克的方法更加传统，不用数学方法，更讲究道德方法。对于数学的应用和效用概念的含义，费雪和克拉克也持有不同态度。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更接近于马歇尔，甚至接近于英国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比如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892～1970年）、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1859～1940年）、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年）。如果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单单用一个词来描述，或许用

“传统主义”比“新古典主义”来得更恰当。

是人们把经济学科学化的努力才使得制度主义整合起来。他们把经济学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又摒弃了一些以简单公理为基础的理论，这些公理对人类行为的假设缺乏证据。威斯利·克莱尔·米契尔（Wesley Clair Mitchell，1874～1948年）或许算不上这种方法的开创者，但他显然算得上代表人物。当他1924年向美国经济学会作主席发言的时候，谈到了量化经济理论的必要性。现在，经济学家可以估算诸如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直接联系了，“假想的人来到假想的市场，按照已经安排好的出价和竞价购买物品，看起来不太可能让数量工作者产生兴趣。他们的理论是衡量客观过程的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

米契尔用类似的风格解释了凡勃伦对商业和工业的划分情况，他用的是两个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一个衡量物品的实物数量，另一个计算钱数。数量工作者喜欢解决这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问题。全国经济研究局成立于1920年，米契尔在这个部门所起的作用和他的研究计划是一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的统计数据不够用，全国经济研究局就是这种情况产生的挫败感的产物，它对收入、财富、经济周期展开了广泛的统计和实证调查。

两次大战之间的竞争研究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经济学界的特征可以用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加以概括，他们分别是弗兰克·奈特、约翰·莫里斯·

克拉克（以下简称小克拉克）、爱德华·张伯伦。竞争理论似乎还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观察到的人的行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方法各有不同。

奈特是兴趣广泛的社会科学家，涉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但在经济理论上是个保守派。他发表的博士论文题为《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 年）。文章中，他称自己的任务是“精炼而非再造”，说他的论据从本质上和穆勒、马歇尔的没什么区别。他认为，竞争理论的批评者们从来没有正确地理解过竞争。他还是一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1927 年他来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任职。在那里，他和瓦伊纳一起成为由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James Laurence Laughlin，1850～1933 年）创建的芝加哥学派的中坚力量，致力于维护自由市场和竞争的长处。奈特因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只是他采用的是多元化的方法，所采纳的思想也很难纳入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方法的范畴。

奈特的经济分析最有名的是他剥离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个思想是从 19 世纪德国学者那里，特别是从杜能、曼戈尔特那里继承来的。风险是可以估量的，可以用可能性大小来表述。所以打牌总是蕴含了风险在内的：一堆洗好了的牌里，你不可能预测对方将出哪一张牌，出某一张牌的可能性恰好是 1：52。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是不可能衡量的。例如，你不可能用一成不变的方法计算出某一个新产品是否成功，因为它取决于太多的未知而且不可预测的因素。接着，奈特论述了不确定性和利润之间的关系。既然理论和需要加以解释的现实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在

资本的正常回报之上还存在利润，奈特便可以声明，他的理论解释了理论所描述的竞争和美国所经历的竞争之间的区别。

虽然奈特捍卫传统理论，但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传统理论的限制所在。他和马歇尔一样，主张人类是复杂的生物，是受到一系列动机和价值观驱使的生物。经济分析关注的仅仅是直接满足欲望的行为，这还只是人类活动的一小部分，甚至只是经济行为的一小部分。对于这种限制，他认为：

> 它的范围和含义，比你随便想到的还要笼统得多。它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人类行为从本质上到底有多么容易用科学加以论证。在他看来，作者是荒谬之极。在他看来，说什么生活就是直接抓住贪念之物的行为，这种解释完全是人为的、不真实的。

人类行为不可预测，所以只能大略地制定经济法。奈特声明，如果科学就是衡量、量化，那么经济科学是不可能实现的。

奈特还否认有可能剥离实证经济学和标准经济学，也就是否认有可能区分对待“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对此，他的理由就在他的知识论中。“现实不是符合逻辑的东西，而是符合我们当成现实来对待的目的的那些东西。”知识不过是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既然人的动机复杂多样，就不可能有严格的客观现实。反过来，这说明用科学手段分析经济学，其用处是有限的，因为你必须考虑人类的情感和态度，可这些又不可能量化或者用科学方法加以分析。

关于完全竞争的正统理论描述了一个供给等于需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源能得到有效配置，劳动力和资本自由地流入

最能体现其价值的活动中。奈特捍卫这样的理论。小克拉克则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企业管理成本的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the Economics of Overhead Costs，1923 年）中，试图解释为什么现实中的经济制度不是像那样运行的。为什么很多市场都不稳定，资本、劳动力往往被闲置起来？他发现答案就是“企业管理成本”。这是指生产者不论产量有多高都会发生的费用。如果企业管理成本足够高，那么产量一上去，单位成本就会降下来。根本没有什么确定价格的“标准”成本。小克拉克认为，固定资本投资的巨幅增长已经大幅度地提高了企业管理成本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要实现全面生产能力，必须把价格降到企业管理成本以下才行。他还进一步提出理论论据来巩固这个结论，主张竞争会导致价格下降到仅够弥补劳动力成本、材料成本等可变成本的水平。

小克拉克认为，企业用两种方法对付这种情况。它们可以搞价格歧视政策，对不同顾客实行不同价格。例如，它们可以创造品牌，对批发零售定不同的价，还可以在不同地方定不同的价。或者，它们可以参与残酷的竞争，把价格压低到把竞争者逐出市场的地步，以便树立垄断地位，执行更高价格。如果这样的话，高价就会反过来吸引新的竞争。

小克拉克在书中还提出了一种和完全竞争条件相去甚远的竞争观。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企业不得不接受现行的市场价格，任何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不足以对市场形成影响。克拉克提出的情况则是，不受约束的私人企业具有太多优势，所以无法形成大规模生产。必须想办法在管制企业的同时不削弱竞争。在《企业

的社会管制》（The Social Control of Business，1926 年）中，他披露了这么做的办法和美国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步骤。其中包括了反托拉斯法、公用事业条例、劳动立法、最低工资法、食品标准、城市规划以及其他很多措施。显然，他并不认为这是强加于企业的管制办法，只是代替自由放任主义而已。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是不可能做到的。此外，社会管制也是企业活动的一部分，法院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非正式的协议和习俗、立法、规定，也都包括在社会管制的范畴内。这一点和康芒斯的见解十分相似。

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1899 ~ 1967 年），1927 年提交了一篇论文，出版时题为《垄断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1933 年）。文中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理论中的竞争和现实中的竞争之间的矛盾。但他的办法是把焦点放在市场结构上。他把垄断定义为企业通过改变供应量来控制价格的能力，他所定义的“纯粹”竞争是不存在垄断因素情况下的竞争。纯粹竞争不一定就是完全竞争，因为人们对未来的了解有限，抑或人们从一种活动转为从事另一种活动的自由要受到限制。他认为现实世界里的竞争之所以和纯粹竞争产生差距，是因为现实中的企业多多少少都有垄断经验。市场既是竞争性的（企业相互竞争），又是垄断的（企业能控制所出售的物品的价格）。

大部分人心目中那个简单的词汇“竞争”其实就是垄断竞争。其实，几乎可以说，即使在纯粹竞争情况下，买方和卖方也没有按照这个词汇的现行含义那样真正进行竞争。人

们从来没有把“竞争”和巨大的市场（比如农产品市场）联系在一起过，像“削价”、“亏本销售”、“不公平竞争”、“迎接竞争”、“保障市场”这之类的词汇，人们闻所未闻。难怪这些市场上的原则一旦用到这一类词汇有了用武之地的“商业”社会，就显得那么不真实。

所以，要解释企业领域的情况，就必须构建一套理论，以便在（缺失竞争的）垄断市场和纯粹竞争市场，也就是商品市场或金融资产市场这一类有组织的市场之间架起桥梁来。张伯伦认为，小克拉克、奈特等人对市场结构的假设不够清晰，使人迷惑。他得到的结论是，经济理论之所以看起来远离现实，不是因为方法错误，而是因为它的假设离事实太过遥远。

张伯伦从两个方面分析市场结构：一是行业内的企业数量，一是每个企业的产品的差别程度。这两个数字小的话，就导致寡头垄断，这样，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竞争对手会对它的定价或销售政策作出什么反应。产品差别意味着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力量，使它在不失去顾客的情况下提高价格。在这样的条件下，广告和销售成本就显得重要了，所以不是纯粹竞争。

为了找到介乎纯粹竞争理论和垄断理论之间的理论，张伯伦想发展一套比马歇尔的理论更为通用的价值论。他的理论假设是，大多数价格决定的过程中，垄断因素和竞争因素都在互相作用，而分析企业的定价行为，需要用到两种理论的混合物。因此他的书解决的是整个价值论问题。他考虑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一些现象，如广告和产品差别，从而把马歇尔的理论引入了新时代。

欧洲学者的移民潮

1914 年到 1945 年是欧洲政治上的多事之秋。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战后的重建又使得很多国家重新划定疆域。很多人流离失所，被迫寻找新的家园。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德国兴起的纳粹党使这个问题激增。随着希特勒一步步征服邻国，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德国，离开欧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很多经济学家移民到美国。20 世纪 20 年代，移居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来自俄国，三、四十年代，多半来自德语国家。不仅为数可观，而且不乏声名显赫，对这门职业有过重大影响的人。

哈佛大学吸引了两位最杰出的移民者。他们是里昂惕夫和熊彼特。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06～1999 年）是俄国人。1925 年他前往柏林完成博士学位，1930 年移居美国，1931 年接受哈佛大学的任命。他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论证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系统还可以简化，以便分析现实经济。他的余生致力于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所谓的“投入—产出分析”。其思想精髓就是，经济可以分为一定数量的行业或部门，可以用一张图表说明每个行业从其他部门购买了多少物品。好比说存在三个行业，那么图表上就有三行三列。假如其中一个行业是矿业，另一个行业是钢铁业，表中就有一格显示钢铁业购买的煤炭和铁矿石数量，另一格显示矿业购买的钢铁数量。如果假设每个行业购买其他行业产量的这个比例不变，就有可能用投入—

产出表计算所有行业发生的各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例如，假如钢铁的出产量减少了，经济中的其他各部门都会有反应，它们会少买煤炭和铁矿石，而反过来这些行业又会减少从其他行业购买的数量，如此等等。用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这些变化来。这种方法的有限性在于它没有考虑价格的变化，这就限制了它为更大范围的问题给出有用的答案。

里昂惕夫毕生都在从事投入—产出分析，而在奥地利接受教育的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的研究范围就广得多了。他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12 年）把企业家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核心位置。企业家为创新——新产品、新的供应来源、新的生产手段、新的组织形式——作出了贡献，开创了赢利机会，从而干扰了系统平衡。成功的企业家赚取高利润，吸引一批模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模仿者将消弭最初的创新者赚取的利润，使系统稳定在新的均衡状态，这之后，另一次创新又将再一次干扰这个均衡。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见解就是这样，资本主义是持续运动的一个制度，是由企业家推动变革的制度。

熊彼特有过短暂的政治生涯，曾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1932 年迁居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他研究经济周期问题，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他对经济周期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一批一批的革新所创造的利润逐渐被模仿者消磨殆尽。他的研究成果是两卷本的《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1939 年）。然而，这本书遭到西蒙·库兹涅茨的强烈批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前，它没能获得支持。而他自认粗制滥造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3 年）反倒大获成功。在这本书中，熊彼特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将会灭亡的论断是错误的。兴旺的资本主义将提高各个阶级的生活标准。无产阶级没有理由发展壮大，而且推翻这个制度。不过，到头来资本主义终将自己破坏自己，因为它将破坏它赖以兴旺发达的价值观。企业家将让位于官僚阶级，利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会破坏劳动者的忠诚，而资本主义价值观将让位于渴望安全、平等、制度的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弱化了人们对变化的抗拒心理，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一样。

熊彼特还是经济学史典籍的作者之一。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 年）由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1898～1953 年）编辑，在他死后才出版。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经济学

毫不夸张地说，自从 19 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经济学的地位开始有所改观。但直到 1914 年，美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还的确移植于欧洲，虽然产生了一些见解独特、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但美国的经济学界还是落在欧洲后面。但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这个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就拿本章所举的例子来说吧，新的竞争理论是在剑桥大学发展起来的，领头人物是马歇尔的对手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 年）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 年）。寡头理论也是在德国发展起来的，

创始人是海因里希·冯·斯塔克伯格（Heinrich von Stackelberg，1905～1946年）、弗里德里希·措坦（Frederik Zeuthen，1888～1959年）等。然而，美国的经济学理论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其特征使它们有别于欧洲的理论。美国经济学界展示出来的研究宽度是规模较小的英国学界无可望其项背的。随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经济学家从德国等欧洲国家移民美国，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经济学日渐形成影响，美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了。

货币与经济周期
（1898～1939年）

魏克赛尔的积累过程

20世纪早期，货币、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核心人物是瑞典经济学家克纳特·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他在《利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1898年）和《政治经济学讲义》（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1906年）中，发展了一套理论，用来分析货币、信用和价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他所谓的“积累过程”。魏克赛尔的理论基础是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年）的资本理论，其要义是，利率其实就是时间的价格。它有两方面的意思。假如有人得到一笔收入，他有权作出选择。他可以立即用来购买消费品和服务，也可以存起来，以便未来的某一天购买消费品。人们通过购买金融资产来储蓄，也就是把收入借给别人，从而得到利息回报。利率越高，就有越多的收入储蓄起来，放到未来消费，而不

是现在就花掉。利率上升时，人们更有动力把部分收入存储起来，延迟消费。

另一方面是投资。企业不得不作出选择，是投资于很快就有收益的生产过程，还是投资于更有生产力但获益时间更长的生产过程。例如，葡萄园主可以选择是一等收获就马上卖掉葡萄，还是让葡萄发酵，酿成酒。等葡萄酒生产出来，葡萄园主还要选择储藏多久。一旦葡萄酒酿成，价值就更高了。魏克赛尔同意庞巴维克的看法，也假设“较长”的生产过程（获益时间较长）比“较短”的生产过程更有生产力。但是由于这样的过程需要投入资源的时间较长，所以需要更多资本。这就是说，如果利率上升，相对于短过程，较长的生产过程需要花费更多。

因此，利率影响着消费者决定现在消费（短过程）还是未来消费（长过程），也影响着生产者决定投资于现在生产物品的过程还是投资于未来才生产的过程。利率上涨导致储蓄率上升，这是因为消费者觉得延迟更多消费是值得的，相反，投资率会下降，因为生产者变得倾向于较短的生产过程。魏克赛尔认为，存在一个利率点，使这两类决策互相平衡。这就是他的“自然”利率。在自然利率上，消费者希望借出的钱数恰好等于生产者希望贷到的数量，存在跨期均衡。

魏克赛尔的这部分理论取自庞巴维克。下一步是引入一个创造信用的银行制度。银行贷款的利率称为“市场”利率或“金钱”利率。当出于某种原因，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就出现了积累过程。企业将增加投资，它们会从银行系统贷到无法从储蓄者手里贷到的款项。增加的投资会引起资源需求的上升，从而

拉高价格。与此同时，贷款供应量的上升使得“购买”贷款的人付得起这些高价。魏克赛尔继续说明，在他所谓的“纯粹信用经济”中，人们买卖物品时不用金银，只用银行货币，这个过程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只要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价格就更会持续攀高。反之，高于自然利率，价格就会无限期下滑。这就是他所说的积累过程。如果有关国家实行金本位政策，那么一旦银行的黄金储备告罄，这个过程就结束。这就迫使银行提高利率，削减贷款数量，使这个过程告一暂停。

魏克赛尔的经济周期理论是“真实”周期理论。这就是说，他相信之所以出现周期，是因为自然利率有变化。例如，提高生产力的发明创造能引起自然利率上升，这就像战争会摧毁资源一样。但是利率不会对这样的变化立即作出反应，于是物价出现累积的涨跌过程。进一步说，通货（黄金）数量在这个过程中纯粹起消极作用。在这个系统中，银行系统才是积极的因素。贷款数量和通货供应量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联系。虽然如此，魏克赛尔却不认为自己是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反而觉得自己在苦心完善这个理论，在说明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如何改变价格的。

魏克赛尔的基本理论虽然简单，但它存在几个严重问题。其中两个问题对于以后的理论发展特别重要。第一个关系到如何应用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来决定自然利率。在生产期问题上，他固然抓住了一个重要见解，即资本和生产物品所需的时间有关系，因此十分吸引人，但这个问题和生产工艺问题搞到一起，使人迷惑不解。生产期和利率之间恐怕没有什么明确联系。利率下降可能导致生产期延长，也可能缩短，这对跨期均衡的观点有毁

灭性影响。第二个主要问题可以这样解释：请注意自然利率就是以下情况下的利率：（1）储蓄等于投资；（2）没有创造新的贷款量；（3）物价稳定。但是一般而言，谁也不清楚，上述三个条件是否在同一利率情况下得到满足。例如，在一个正在增长的经济中，要想物价稳定，需要增加贷款数量才能为日益增长的交易量募得资金。这就是说，存在一定的贷款创造量，导致储蓄和投资不平衡，这一点或许和物价稳定是相互矛盾的。此外，如果生产力上去了，银行利率等于真实利率，物价就会下跌。

魏克赛尔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精心地作了回避它们的假设。但他的后继者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从而发展了一些大不相同的理论。为了理解这些理论，有必要先了解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一些经济事件。

经济环境的变化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环境前所未有地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显然成了世界经济大国。它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1920 年经历了短暂的高涨期，接下来是 1921 年十分惨烈的萧条期，物价下跌，失业率上升。然而 20 年代剩下的几个年头里，这个国家出现了无与伦比的百业兴旺局面。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电力传送到全国各地，对工业和国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登记在册的汽车数量从 800 万辆上升到 2300 万辆，新建筑鳞次栉比。20 年代末，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赫伯特·胡佛声称，这个国家眼看就要战胜贫困了。股票市场涨势

喜人，投资商们以为繁荣的景象永无止境。大部分国家在20年代都十分繁荣，但美国的境况几乎无人能及（只有日本、意大利超乎寻常地在快速增长）。当时处于萧条的国家很多地处东欧（包括新建国的苏联），还有德国和英国。

英国和美国一样分享了战后随即而来的高涨和随后的萧条形势。1920年物价上涨了24%，接着1921年下降了26%。1921年的失业率占到了劳动大军的15%，20年代剩余的年头里一直保持在10%。物价下跌，工业停滞。1925年，当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上升到高出1913年48%的地步时，英国的工业生产还是低于1913年水平的14%。英国经济并没有走出战争的影响。

然而，20年代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中，最惊人的是在中欧。在德国，1919年物价几乎翻了一番，1920年翻了两番以上。1921年情况有了短暂的缓解，紧接着，1922年，物价上浮程度超过1600%。1923年，通货体系完全崩溃，物价上涨486万倍，真正是超速的通货膨胀。马克贬值的速度之快，1913年还是1美元兑换4.2马克，1923年1美元竟可以兑换42亿马克。与此同时，失业率上涨到几乎10%。该年年末，国家发行了一种新通货，这以后的几年中，物价上升还算温和。但失业率依旧在高位，平均超过10%。

1929年10月，股市大崩盘。那年夏天就开始了的萧条局面发展成大衰退，工业生产、农业价格、世界贸易全面崩溃。失业率大幅上升。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工业生产跌落到刚好超过1929年水平的一半，失业率上升到25%。直到1937年，失业率才下降到15%的水平，接着更严酷的衰退把这个数字又推回到了

19%。其他很多国家有着类似的失业率数字。1933 年，德国的失业率是 26%，荷兰是 27%，瑞典是 24%，挪威 33%，英国 21%。这是一个困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一个贯穿了整个 30 年代的问题。有些国家，比如荷兰，直到 1939 年还保持了差不多的失业率。其他国家，如英国和瑞典，到了 30 年代末，总算把失业率缓慢恢复到了略多于 10% 的水平。唯有在 1933 年的一场危机中上台的纳粹党治理下的德国，失业率下降到了低水平（1938 年达到 2%）。

这些事件几乎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全球经济学家的目光。虽然对这段时期经济不稳定的缘由众说纷纭，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越来越清楚，用战前的主流理论是不足以解释当下发生的事件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明白，有必要拿出一套关于经济活动水平的一致理论来。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人们开始用统计数据计算工业生产水平和失业率的变化，这些变化十分关键，不能视之为次要的现象。而且显然，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是以某种方式和货币、金融发生着联系的。德国或许要算极端个案，那里超速的通货膨胀全面摧毁了通货价值，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完全无法进行，但这个例子十分重要，是个有用的案例。同样，引起美国股票市场高涨然后破灭的金融活动和随后前所未有的萧条程度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人们很难不去一探究竟。

此外，这一切的背后是和战前截然不同的全球经济。特别是，政府间的债务问题 1914 年以前还不为人知，现在却成了重大问题。欧洲政府曾经互相债务累累，其中欠美国的债务为甚。它们想从德国榨取赔偿，来弥补这些欠债。赔偿对于德国超速的

通货膨胀起到了什么作用，抑或股市大崩盘和大萧条的缘由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从德国和东欧追根溯源，对这些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分歧不断。但毋庸置疑的是，1929 年以后的国际金融新局面成了脆弱的世界贸易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不同经历说明，在美国人和欧洲人互相利用文献资料的问题上，有关经济学家固然站在一个战壕里，但他们的见解不一样。整个 20 年代的美国，人们很自然地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局面持乐观态度。当大萧条来临，人们又很自然地，至少最开始时很自然地，把大萧条看成反常的周期性倒退。相反，到了 20 年代末，英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把失业看成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了。进一步的差异还体现在，英国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还没有过金融恐慌和银行破产的经历，而这些在当时的美国屡见不鲜。1913 年美国创建的联邦储备体系还有待树立名望，像英格兰银行那样，成为借贷者的“最后一招”。于是，美国人对找到能缓冲周期的政策原则投入了更大兴趣。欧洲大陆又一次呈现出不同形势。例如德国，1922 年和 1923 年超速的通货膨胀即使在事后也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经济周期理论在奥地利和瑞典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研究构成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部分。他们都来自维也纳，但哈耶克 1931 年迁往伦敦经济学院。米塞斯的主要思想是在《货币和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中提出的，首次

出版于 1912 年。但他的思想为人所知却是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早期。显然，德国的超速通货膨胀和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高涨以后的突然崩溃，给他的思想提供了证据。

米塞斯和哈耶克从魏克赛尔的理论出发，并将其发展成关于周期的货币理论。他们十分强调以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为基础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很容易干扰信用市场的正常运行。在信用经济中，如果没有金本位的约束，银行家就有压力要把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如果他们服从于压力，市场利率降到自然利率以下，那么不仅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会干扰资源的跨期配置。低利率下会发生什么情况？相较于适当的储蓄水平，低利率会使企业家投资于时间过长，资本过于密集的生产过程。由于资本品上的投资太高，资本品的价格就会涨得比消费品价格高。虽然生产者正在把资源投入未来才能获得回报的生产过程，但由于消费者没有获得延迟消费的刺激，就会引起对消费品的过度需求。

只要持续不断地扩张信用，这样的局面就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信用扩张的过程终将结束。一旦结束，利率会上升，引起产量下降，失业率上升。原因是，资本密集型生产过程费时较长，当利率较低时开始生产，等到利率上升时，就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只得停止生产。投入到这些过程的资源一般不适用于新的、时间较短的、有利可图的过程，只好闲置起来。

利用这套理论，米塞斯和哈耶克谴责了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提升经济活动水平的做法。他们认为，虽然有可能利用信用扩张来维持高涨局面，但结果将是更大的经济灾难。这个分析很适合 20

年代的美国。在大规模信用扩张的支撑下，美国曾经历了格外长的高涨时期，接下来是同样大规模的衰退形势。根据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理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倡导不干涉主义，提倡“中立”货币政策，即把利率维持在使货币收入稳定的水平上。即使在严重如1929年到1932年的大萧条情况下，降低利率、扩张货币供应量仍然是愚蠢的行为，重要的是要允许生产结构作出调整。

与之相反，瑞典学派，包括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1891～1960年）、埃里克·伦德贝格（Erik Lundberg，1907～1989年）、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年）、贝蒂尔·奥林（Bertil Ohlin，1899～1979年）等，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发展了魏克赛尔的理论。他们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所涉及的生产工艺问题说明，不可能论证自然利率是由资本生产力决定的，也不可能定义这样一个概念。他们采纳了先前由欧文·费雪发展起来的思想，认为资本应该被理解成预期中的收入流量的价值。贷款需求将由对未来的预期决定。这个见解把他们引向了和中立货币论对峙的局面，声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均衡是和任何程度的通货膨胀都一致的。原因就是，只要对通货膨胀有正确的预期，就会把这个膨胀率考虑进未来的所有合同中，因而不一定产生影响。破坏了储蓄和投资之间关系的其实是意料之外的价格变化。

于是，这个思想引导瑞典学派的成员们摒弃了魏克赛尔定义自然利率的做法，使他们不再关注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调查动态过程，追踪收入、支出、物价等在不同时期的相互

作用，来进行分析。其中他们分析了，储蓄者和投资者的计划（所谓“事前”）之间的矛盾，到了期末（所谓“事后”）时是如何转化为均衡的。他们分析的大部分过程都是从充分就业条件开始分析的，结果推导出了和魏克赛尔相似的积累过程。但他们坚决主张，物价和工资可能变化得非常慢，对产量可能有影响。他们还调查了失业状态下的生产过程，这样就能说明降低的利率可能使生产的增长延迟发生。

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没能对周期问题提出一个更加明确的看法，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理论太宽泛。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模型，说明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都是可能的。这一点倒是和他们对待政策的务实态度十分一致。他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思想，认为要降低失业率，不仅要用货币政策，还要用政府支出。这一点显然和奥地利学派严格的自由主义观点相悖。

从马歇尔到凯恩斯

暂且把哈耶克和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追随者放到一边不论，英国人对货币和经济周期的看法是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笔下扎根的。马歇尔就这个问题的第一本著作是《工业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dustry，1879 年），这本书是和他妻子玛丽·佩利·马歇尔合著的，深受穆勒的影响。当需求上升的时期，人们信心十足，贷款水平也就上升，物价上涨。但是到达某个点以后，贷款者审时度势，开始削减贷款，引起利率上升。这时，信心不足了，物价猛地下跌。企业被迫售出库存商品，导致物价的进一

步下跌。为什么会引起产量的波动呢？因为物价比成本，特别是比工资和固定成本的波动幅度大。高涨时期，物价涨得比成本快，使企业纷纷增产。危机过后，物价又比成本降得快，使企业减少产量。

马歇尔考虑经济活动的波动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信心。马歇尔夫妇针对萧条阶段这样写道：

> 这个厄运的起因主要是信心。只要信心得以回归，用她那神奇的权杖触摸所有行业，让他们继续生产，继续需要别人的盆钵……厄运的一大部分就可以几乎在瞬间消失……只要贸易商觉得物价不再下跌，（工业复苏）就开始了，而且工业价格重新开始上涨。

之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从事提供贷款等活动的商人们太自信满满，导致经济扩张太快。

接下来的40年里，马歇尔把他对货币数量论的论述和对真实利率、名义利率的区分整合起来，共同纳入了对周期问题的考虑之中，但是理论精髓不变。特别是，他继续论证需求波动导致物价波动。仅仅当价格和成本的变动能造成利润增加或降低的时候，产量才会变化。他的追随者就是以此为框架开始研究工作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继任者阿瑟·塞西尔·庇古、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1890～1963年）、拉尔夫·霍特里（Ralph Hawtrey，1879～1975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他们的理论都深深地扎根在马歇尔主义传统中，都强调预期的作用，解释周期问题时都强调商人的错误。只是这个传统涵盖的观点也五花八

门。

霍特里最具影响的著作是《通货和信用》（Currency and Credit，1919 年出版，1927 年、1950 年修订）。对于周期，他有一套纯粹的货币理论。他的理论有几大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他强调所谓“有效需求”，即总支出水平，包括消费者支出和投资在内。他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影响有效需求的水平，由于物价和工资对此的反应较慢，所以产量将发生变化。既然其中的各个过程存在时间上的滞后，说明信用的扩张和紧缩会超过应有的水平，于是出现的是周期，而不是稳定的增长。

和霍特里相反，罗伯逊在《工业波动论》（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1915 年）中，用提高生产力的发明创造所造成的震动来解释周期。他解释这样的震动何以产生周期时，用到了“酝酿滞后”（从开始投资到获得产出，这中间需消耗的时间）这个词，还利用了投资的其他特征。10 年过后，他在《银行政策和物价水平》（Banking Policy and the Price Level，1926 年）中，改变了理论重点。虽然并没有放弃是投资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思想，但他转而论证，由于货币因素的存在，周期性波动幅度大大强于它本来应该有的幅度。采取适当的银行政策可以减轻波动程度，但他不像奥地利学派，他不相信这么做就可以使经济完全稳定。

庇古则描绘了英国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应对 20 年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局面的，对后人有启迪作用。他先是在《财富和福利》（Wealth and Welfare，1912 年），后在《工业波动》（Industrial Fluctuations，1927 年）中，发表了经济周期理论。他和同时

代的好几个经济学家一样，强调企业家对利润的预期的重要性，也和霍特里一样，强调需求的作用。如果需求足够低，恐怕企业家希望把劳动大军全都雇下来时的那个工资率就是负数了。但在讨论周期时，庇古主要考虑的是1914年之前的周期。当解释20年代的失业经历时，他没有考虑自己，因为那样需要用到另一种方法。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他更多的是关注工资和劳动力市场，1933年出版了《就业理论》（The Theory of Employment）。其中用劳动力供求关系来探讨就业问题，属于十足的马歇尔主义风格。

20年代最正统的马歇尔主义者当属凯恩斯。他早在1919年就闻名遐迩，当时他退出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财政部团，写了一本十分畅销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Peace），对和约和谈判方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他认为，盟国政府向德国索要巨额赔偿是不道德的行为，何况德国也无力赔偿这笔巨款。接着，1923年，他在《货币改革论》（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把注意力转向货币政策和周期。他采纳的分析框架是马歇尔的货币数量论，但他和剑桥大学的同事们一样强调预期的作用。既然现金需求（马歇尔货币数量论中的关键因素）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就很容易随时改变。当货币供应量没有变化得当的时候，物价水平就会发生波动。物价水平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只有在长期内才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关于货币供应量翻倍会造成物价水平翻番的观点，凯恩斯是这样说的：

> 现在说“在长期内”可能是对的。但这个“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长期内”我们全都会死。经济学家给

自己设定了一个太容易而且毫无用处的任务，身处暴风雨频仍的季节，他们却只能告诉我们，暴风雨过去已久，大海平静如初。

另外，外国物价通过汇率和英国物价建立联系，从而也会干扰英国的物价水平。

他的观点使货币当局骑虎难下。假使当局稳定国内物价水平，也就是当货币需求上升时增加货币供应量，当货币需求下降时减少供应，结果可能是汇率发生变动。抑或，当局选择稳定汇率，正如英国当时正在采取的措施那样，回归金本位，那么国内物价水平就会不稳定。凯恩斯论证了两点。第一点，物价上升，或者汇率波动，再糟也糟不过物价下跌。20 年代初的时候，政府想把汇率提升到战前的水平，导致物价走低，这使得凯恩斯反对回归金本位。第二点，当局必须对汇率作出决断，有必要让它们认识到，必须对经济加以管理，不能说物价水平的决定力量凌驾于它们的控制之上。

> 说真的，金本位制度已经成了残垣断壁。我们所有人……现在主要对保持企业、物价、就业的稳定性感兴趣，即使强迫我们作选择，也不大可能处心积虑地为了过时的教条而牺牲这些……古老标准的捍卫者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多么疏离了时代精神和要求。一个被管制的非金属本位的制度已经悄无声息地飘进来了。它真的存在。当经济学家还在打盹的时候，这个百年学术梦想，褪去了帽子和睡袍，披上了纸钞外衣，靠着一贯比善良仙女更有手腕的坏仙女，也就是邪恶的财政大臣的力量，悄悄溜进了这个世界。

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1926年）中，凯恩斯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认为执政者要有意识地采取决策对经济加以管理。

20年代，凯恩斯就货币和周期问题，和罗伯逊等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密切合作，1930年他出版了《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成为他在货币问题研究上的定论。他的分析核心完全是魏克赛尔式的。他认定储蓄和投资不一定要相等。只有当“暴利”（高于维持企业运转的正常利润的那个利润）等于零的时候，它们才会相等。接着，他用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例如，低利率会导致投资上升，储蓄下降。这将提高价格和暴利，使企业增产。反之，假如利率提高，投资就会少于储蓄，暴利变成负值，使物价水平降低，产量缩减。他延续了先前的研究论调，强调预期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货币和利率之间的关系是取决于“悲观”程度的，也就是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担忧程度。如果悲观程度很高，人们就想要持有更多货币，好确保不受未来不确定性的困扰。于是就需要更多的货币供应量来防止利率上升。

1931年，哈耶克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和凯恩斯在周期理论上发生了矛盾。他们的理论都是从魏克赛尔传统出发的，却对货币政策的作用得出了恰好相反的结论。双方争执不休，毫无沟通的余地。

美国传统

基于上述各种原因，在货币经济学方面美国形成了一套独特

的传统。20 年代是空前繁荣的年代，联邦储备体系才刚开始琢磨出，它应该如何运转。所以和欧洲不一样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对于要设计哪些原则来治理货币政策行为，给予了极大关注。然而，虽然人们广泛支持利用货币、财政上的扩张政策来对抗 1929 年以来的萧条局面，连一贯反对这些政策的米塞斯和哈耶克也没有提出强烈反对，人们还是没能在这背后的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用最近一位评论家的话说：

> 对这次事件（大萧条）本身，抑或对如何进行政策定位，从而解决这次事件，很难作出一个解释，哪一个解释都找不到支持者。此外，实际上在欧洲争论不休的每一个命题……在美国人的谈论过程中，总能找到共鸣。

有各种思想可供探讨，我们只可能提纲挈领地阐述其中的几个。

整个这段时期，货币数量论最杰出的代表是欧文·费雪。他对称得上经济周期的任何事物的存在性，表示了高度怀疑。物价波动说明物价时高时低（他用“美元的舞蹈”来形容），不足以形成一个周期。所谓周期，暗示了有因果关系存在的常规模式。经济需要稳定物价，这就是他 1921 年积极组织稳定货币联盟的原因。（这个联盟后来发展成全国货币协会和稳定货币协会。）20 年代他还力促当局推进立法，要求联邦储备体系施展力量，促进物价稳定。与此相一致的是，30 年代初，他主张施行一系列方案来提高物价，以促进物价恢复稳定。他依然认为周期思想是不现实的想法，但还是提出了几个可能解释衰退何以如此严重的理论。其中最突出的是债务贬值论。根据这个理论，物价下跌使债

务的真实价值上升了，迫使债务人削减支出，而支出的减少又迫使物价进一步降低，使局势加剧恶化。

争论的另一端是另一群人，他们凭借真实票据学说，主张货币政策和物价水平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他们认为，物价的变化一般都是有着非货币原因的，假如货币供应量不能扩张到消化物价变化的地步，就只好提高流通速度了。假设银行系统只借款给适当的商业交易活动，就不会有通货膨胀。股市大崩盘时，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信用已经过于扩张（和奥地利学派所见略同），货币扩张行为不会行之有效的。因此，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1886～1949 年）写道："显然我们并不乐意采用这个代价高昂（货币跌价）的措施以换取再一次的短暂繁荣。全球商业还没有僵死到要依赖人工刺激的地步。"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在美国得到了体现，但很少有哪个经济学家吸收了它。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1900～1997 年）1931 年来到美国，他利用哈耶克关于资本的论点，解释了大萧条为什么不仅仅是货币现象，为什么长时间持续的原因。熊彼特 1932 年来到哈佛大学任教，但他没有采纳哈耶克的办法。他对大萧条的解释是，大萧条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它标志着很多长度不同的周期发生了巧合。所谓周期，存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大约 40 年之久），朱拉尔周期（约 10 年）和米契尔—珀森斯短周期（约 40 个月）。这些周期都曾有经济学家声称找到了统计数据加以证明，而且所有周期都在 1930 年到 1931 年间结束一轮。这个见解得到了阿尔文·汉森的支持。汉森还补充了一个假设，他假设这次三个周期的巧合还十分逼近一次为时

很长的物价下跌时期，这次物价下跌是黄金的全球性短缺，以及法、美两国积累的黄金储备造成的。熊彼特和汉森都对用货币扩张法消除萧条症状的可能性表示了怀疑。大萧条或许来得痛苦，但它为改善生产手段、提高生活水平铺平了道路。

另一种激烈的反数量论观点是消费不足理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威廉·特鲁芬特·福斯特（William Truffant Foster，1879～1950年）和瓦迪尔·卡钦斯（Waddil Catchings，1879～1967年）。他们认为，要扩张货币，只有先刺激消费者支出，才能刺激经济活动。任何其他货币扩张形式，即使和政府支出有关系，也起不到效果。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 A. Hobson，1858～1940年）1889年第一个提出消费不足理论，正是他1896年发明了“失业”这个词。他的著作广为人知。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采纳了更为温和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阿林·扬。他在哈佛时，门下有很多学生。而他本人又深受霍特里的《通货和信用》的影响。扬认为，稳定经济需要采用货币政策，但要求先确立合理的传统，而不是像费雪等人提出的那样强加一个简单原则就可以的。他赞同利用政府支出来缓解周期。他采用详尽的统计分析法，说明了随着纽约和全国各地之间发生的季节性资金运动，银行储备金率发生着大幅波动。继霍特里之后，他强调信用是不稳定的，对这一点，严格的数量论者无法接受。扬死于1929年，但他的门生劳克林·柯里（Laughlin Currie，1902～1993年）把霍特里的理论应用在大萧条问题上，找到了证明货币因素重要的证据。他统计了大量衡量货币供应行为的数字，论证了只要联邦储备体系愿意，它本可以很大程度上防止这

次灾难。说它无能，是没有根据的。

这时候，最坚决地主张用实证的方法研究经济周期的是威斯利·克莱尔·米契尔。他是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是他把周期观推向大众，并设法用统计方法记录周期中发生的事件。他很怀疑用单一原因解释周期的那些理论，喜欢对单个的周期逐一分析。但他也确信发生周期的原因就在凡勃伦所说的经济生活的“金钱”方面。虽然货币因素不是周期的全部，但周期离不开货币。1929 年的大萧条来临之际，米契尔认为唯一的谜团就是它为什么来得这么严重，又这么长久。他的解释是，几大打击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农业萧条，股市过度投机产生了事后效应，政局不稳，关税壁垒提高，如此等等。又因为经济中的一些变化降低了经济体系自我稳定的能力，这些事件的效应被加倍放大：人们在购买更多的半耐用品（比如汽车、电器），以便收入减少时更容易降低开支；农业不再那么自给自足了；即使需求减少，大型企业也越来越不情愿削价。对此，米契尔的回应是：自由放任主义被证明是不够的，需要规模更大的全国性规划。不过，他只提出了支持公共工程政策、发布信息和预测，除此以外，他没有制定出任何详细的计划。

30 年代初，所持理论观点大相径庭的一批经济学家都承认，必须让银行系统持有 100% 的储备金。支持这样一个原则的有柯里、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1892～1976 年）、费雪、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1899～1946 年），但原因各有不同。柯里支持这个原则是因为，假如由政府发行全部货币，就会使政府最大可能地管好货币。只要需要，政府很容易扩张或紧缩货币

供应量。相反，西蒙斯赞同这个原则，是因为他把“缺乏明确的、稳定的立法原则的货币管理”看做最危险的“计划”形式。在1933年的“芝加哥规划”中，西蒙斯赞同让100%储备金、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和政府支出实行平衡预算双管齐下。他相信，如此一来既能稳定物价，又能约束政府支出。可是到了1936年，他的观点变了，说这个原则只能引起“准货币”（不算货币却能替代货币使用的资产）的多样性。于是，他转而把物价稳定当做政策目标。

支持银行储备100%货币的这个进程说明，此时的美国货币经济学界固然存在很大差异，但也有不乏共通之处。西蒙斯从支持货币增长原则转而赞同费雪的物价稳定原则。与此同时，费雪采纳了芝加哥学派关于100%货币储备的见解。100%货币储备这件事是人们对大萧条作出货币解释的结果，以后又和西蒙斯以及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产生了联系，但这个解释最初是柯里提出来的。柯里所作研究的理论框架是由霍特里制定，由他在哈佛的导师扬发展起来的。其他的共通之处还有：美国学界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分享了共同的货币政策观，他们都提倡真实票据学说。

凯恩斯的《通论》

20年代及这以前，凯恩斯在早期的著作中，还反映出他是在马歇尔主义传统下写作的数量理论家。但在《货币论》中，他开始偏离这个传统，从更接近于魏克赛尔的视角，关注货币、储

蓄、投资和支出水平之间的联系。只是他依然把物价水平看成这整个过程的核心。支出的变化引起物价和利润的变化，使企业修改生产计划。这么一来，就向他分析的核心提出了一个技术性问题。他发展了一套理论，假设当产量不变的情况下物价和利润是如何变化的。接着，又用这个理论解释产量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个做法不能令人满意，著作出版后不久，他在剑桥大学的年轻同事的协助下，开始反思这个理论。反思的结果最终于 1936 年出版，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通论》最关键的转变或许要算凯恩斯的思路变化。原来他把价格当做经济中针对需求变化而变化的第一个因素，现在成了销售量。如果需求下降，企业会发现，销售量减少了，库存量比预想的多了。于是企业会调整生产计划。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一次关于就业政策的讨论促成了这个思路的转变。一般认为，公共工程支出可以提高就业率，但怎么计算出就业率提高的比例，缺乏一个基础。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1905～1989 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 1931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乘数的思想。（这个想法在霍特里 20 年代的著作中也能找到影踪，但他没有这么命名。）他提出如下问题：如果公共工程项目多雇佣一个工人，这个工人所购买的物品需要由别的工人制造出来，那么要多出多少个工人才会使项目不再雇工人？他发现用数学方法可以给出明确回答，并且，是新创造的收入中花在消费品上的那部分决定着工人数量。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丹麦经济学家延斯·瓦明（Jens Warming，1873～1939 年）指出，如果有 1/4 的收入被储

蓄起来，那么投资额增长 1 亿元，会带来 4 亿元的收入增长额。储蓄额将增加 1 亿，恰好足够供应最初的投资增长额。乘数（增长的收入与最初投资之比）的规模是由收入的储蓄份额决定的。

乘数给凯恩斯提供了经济中的投资和需求水平之间的联系。他以他所谓的“基本心理规律”为基础，建立了这个联系，也就是说，当某人的收入增长时，他的消费量也增多了，但没有把增加的收入全部消费掉。他把消费的增加额与收入增加额之比命名为“消费倾向”。接下来他还需要一个投资理论。他采用了和费雪相似的方法，论证了投资水平是由预期投资回报（他称为“投资边际效率”）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当投资的边际效率已定时，利率上升会引起投资下降，反之亦然。不过，凯恩斯虽然谈到了投资和利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但他对预期的作用，以及不确定性对投资的重大影响给予了同样的强调。

凯恩斯论证了资本边际效率是由他所谓的“长期预期状态”决定的，从而分析了不确定性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涵盖了决定一项投资的可盈利性的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消费者需求的强度、消费者爱好可能发生的变化、成本的变化、可获得的资本品类型的变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应在投资时进行全程评估，它们都是投资者知之甚少的事情。

令人注意的是，我们赖以对预期收入进行估量的知识基础，其实非常不稳定。我们对控制一项投资今后多年的收入的要素，知之甚少，甚至少到可以忽略的地步。开诚布公地说，对于如何估量一条铁路、一个铜矿、一个纺织厂、一种专利药品、一个飞越大西洋的航班、伦敦城里的一座建筑今

后10年的收入，我们的知识积累太少了，有时甚至一无所知。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投资就不是靠对未来收益的理性计算来决定的了，决定它的是信心。

实际上，预期是被习惯左右的，特别是认为“现状将无限延续，除非有特别的理由才可能变化”的习惯。它暗示的是，由于预期是以习俗为基础的，很容易因新闻里讲的细微变化就大为改观。形势越来越糟，正如凯恩斯在周遭发现的那样，投资政策被一群职业投机家们左右着。这些人不打算制定最好的长期决策，却一心想知道股市会如何变化，这就是说，他们永远试图猜测别人会对新闻作出什么反应。经济动荡由此而生。

投资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利率。凯恩斯为了解释这一点，引入了一个观点，即不仅物品交易和服务需要融资，为了保值也需要用到货币。人们之所以持有货币，因为他们拿不准未来，所以想延迟支出决策，抑或因为，他们希望身揣货币能获得比投资于金融资产更好的回报（一旦债券或股票的价格下跌，回报就是负值，比持有货币的回报还低）。这就是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受到这个理论的指引，认为货币需求将决定于利率。他甚至声称，在某些情况下，货币需求可能对利率非常敏感，以至于货币当局不可能通过提高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利率，这就是流动性陷阱。

把消费倾向、投资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三部分合到一起，形成了产量和就业理论。例如，在流动性偏好已定的情况下，提高货币供应量会使利率下滑。长期预期状态一定时，这将导致投

资上升，因而产量和就业水平都有提高。这就是有效需求决定产量的理论，它不考虑企业希望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数量。

凯恩斯发展自己理论的策略是把发给工人的工资作为既定的条件。该书收尾部分考虑了工资发生变化时的情况，提出了大量论据证明工资率的变化为何不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削减工资并不能提高就业率，除非这么做能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他仔细检查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的《通论》像一把利刃，刺向正统的、“古典的”理论，如他所言，这种理论自李嘉图时代以来已经统治了这门学科百年之久。根据古典理论，就业水平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存在失业，必是因为工资过高。因此“古典”理论的核心就是削减工资。如果采取灵活工资还存在失业，就只可能是和劳动力市场更替有关系的摩擦性失业和某些行业衰落等原因引起的结构性失业。古典理论还以萨伊定律为特征，根据萨伊定律，不可能发生总体意义上的总需求不足。凯恩斯接着论证古典理论只是一个特例，他自己的理论才更具有一般意义。“此外，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例恰好不具备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的特征，所以它的教义误导人，一旦应用到活生生的事实上，后果惨重。”

以凯恩斯负有盛名的身份，说出这么有戏剧性的话来，难怪《通论》一经出版，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它特别吸引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就喜欢推翻前人支持的正统理论。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可能是战后初期最杰出的凯恩斯主义者。《通论》问世时他还在哈佛求学，他把凯恩斯经济学比作传染了所有40岁以下年轻人的疾病，40岁以上的人却几乎人人免疫。和老一代一般苛刻的反应相比，萨缪尔森的态度似乎比较公正。老经济学家找到了凯恩斯的逻辑错误，说他的宣言是要革这门学科的命。不过，凯恩斯革命远不止于此。

30年代晚期或40年代初第一次阅读《通论》的经济学家都觉得这是本艰涩的书。对于老一代学人而言，难就难在数学上。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一本数学书。但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凯恩斯谈到了古典的正统学说，但没有明确什么是古典的正统学说，其实看看本章所调查的一系列理论就不会奇怪了。第二个难点在于，《通论》涵盖了很多条论点，却没有明确说明哪些重要，哪些可以弃之不顾。这不仅对于期待凯恩斯的职业同行给予评判的业余读者来说是个问题，就连读到这本书的职业经济学家也迷惑不解，所以经济学家必须解读凯恩斯的话。

一批经济学家试图把凯恩斯的观点表述成一系列公式，用这种办法解读他的核心观点。头一个就是戴维·钱珀瑙恩（David Champernowne，1912～2000年）。1936年，《通论》出版才数月，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凯恩斯的体系缩减成三个公式。以后的几个月里，另一些经济学家利用类似的方程组，试图解释凯恩斯的意思。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04～1989年）。希克斯的方程式和钱珀瑙恩等人的非常接近，但他设法把凯恩斯经济学缩减到一个简单图表，这个表显示了产量和利率之间的关系。LM曲线显示了使货币市场实现均衡的产量和利

率的组合，IS 曲线显示了使储蓄等于投资的产量和利率的组合。希克斯接着说明，假如 LM 曲线非常平坦，凯恩斯就是对的。因为政府支出的增长会使 IS 曲线右移，产量会提高。另一方面，如果 LM 曲线非常陡，政府支出的变化对 IS 曲线的改变就只影响到利率，不会影响产量。希克斯揭开了谜团，说明了凯恩斯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差异究竟在哪里。他的图表还是个有价值的教学工具，学生可以借助 IS 和 LM 曲线说明一系列政策变化的影响。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周期论曾是个谜宫，现在显然被简单化，成了一个简单的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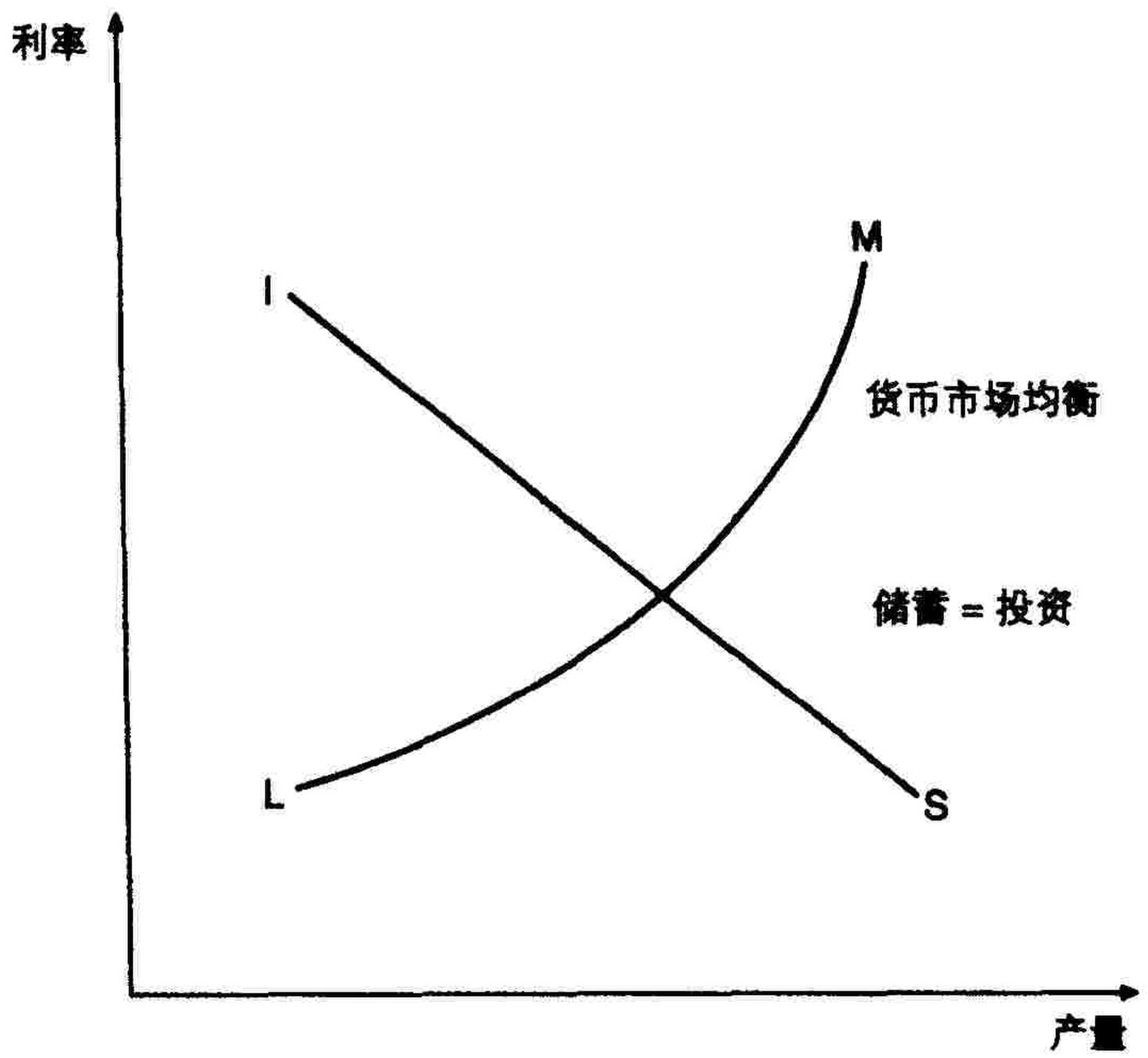

图 4　希克斯曲线，反映产量和利率之间的关系

汉森采纳了希克斯的图表，他后来在 40 年代成了凯恩斯思想的一名旗手。他完善了希克斯的图表，以两条主要曲线的名字

来命名，叫做 IS－LM 模型。同时，弗朗哥·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1918 年～）、唐·帕廷金（Don Patinkin，1922～1997 年）等人还在继续解释凯恩斯的理论。他们把这个理论表述成数学模型，解释了微观层面的问题，还研究必须作出什么假设才能得到凯恩斯式的结果。凯恩斯思想还进入了基础教科书的行列，其中萨缪尔森的教科书取得了最大成就。40 年代末，美国经济学会为了培训回国军人，曾组织了一次对现代经济学的调查，凯恩斯稳列榜首，是最常被引用的作者。

凯恩斯自己把这场革命叫做凯恩斯革命，它的神话在于它推翻了所谓“古典经济学”。是他第一次说明了，如何可以利用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化来稳定就业水平，从而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但这严重背离了当时的状况。20 年代、30 年代的文献提出了一大批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各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英国、瑞典的经济学家都在为此努力。那些文献注意到了预期，也就是储蓄、投资和有效需求的关系问题，很多文献都支持利用货币政策和控制政府支出或许可以缓解失业问题的想法。《通论》脱胎于那些文献；没有宣告和它之前的思想全然决裂。这就解决了一个谜团：如果《通论》像这个神话所说的那样具有革命性，为什么早在《通论》出版前就有好几个国家推行了凯恩斯主义政策，例如开始于 1932 年的罗斯福新政。

二次大战后宏观经济学的转变

与战前的货币经济学、经济周期论相比，战后的宏观经济学

有了很大不同，主要原因是，自从 30 年代晚期以来，宏观经济学史无前例地开始以有明确定义的数学模型的特征为研究的基础，其中包括了和希克斯、钱珀瑙恩有关的凯恩斯经济学数学模型，还有萨缪尔森、拉格纳·弗瑞希的动态经济周期模型。这个过程不仅影响到了宏观经济学，还影响了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当时能全面主宰这门学科，是因为它提供了可以用一个万能的数学模型加以表述的框架。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凯恩斯革命的成果便是 IS－LM 模型。说到这里，有两点需要保留。其一，IS－LM 模型是否抓住了《通论》的理论核心，这一点尚可商榷，但它的确遗漏了很多理论要点。这是把理论公式化的必然后果。就《通论》而言，模型遗漏了凯恩斯关于动态和预期的探讨。所以，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最重要的见解不见了，用琼·罗宾逊的话说，IS－LM 模型像是凯恩斯主义的“私生子”。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战后的经济学和整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周期文献，就会发现，似乎有更多东西被遗忘了。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 60 年代时，很多经济学家开始（错误地）相信，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把经济周期变成了旧皇历。

其二，或许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保留是，凯恩斯主义虽然取得了胜利（至少胜在了 IS－LM 模型上头），但早先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撤出舞台，只是变得边缘化了。例如哈耶克，他淡出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转而从事一般被视为政治哲学的研究。但是到了 70 年代，人们对他的思想重新燃起了兴趣。更重要的是，米契尔所代表的制度主义传统留下了一笔厚重的遗产。汉森自视为凯恩斯主义者，但他提出的论点可以回溯到《通论》问世前他所作的研

究。更加重要的还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经济学不偏不倚地处在米契尔在全国经济研究局时建立的传统之下。他强调进行详尽统计的重要性，这是和现代经济计量学大相径庭的一种方法。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年，1963年）很有影响，这本书是十足的米契尔风格，而他对大萧条的解释，和柯里早在30年代初的解释十分相似。也可以说，“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政策观点一直和弗里德曼有着密切联系，这个观点可以经由西蒙斯回溯到柯里，然后从柯里回溯到霍特里。当然，费雪把利率作为连接现在和未来的价格的这个分析，也是深入人心的。

经济计量学和数理经济学

（1930 年至今）

经济学的数学化

3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经济学家至少在相互之间，开始利用数学推导论点和提出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经济学渐渐变得数学化了。他们往往用几何学（教学时特别重要）和代数学（特别是用微分和矩阵）。30 年代的时候，还只有少量用数学方法的文章发表在一流学术杂志上，但到了 70 年代，文章不用数学方法而能具有影响力，就是很不寻常的事了。各领域的变化速度各有不同，但整个学科，包括理论和应用两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经济学采用了两种数学方法。一种是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代数、几何甚至数字举例，都能使经济学家推导出用别的办法推导不出的结论，而且这么做比纯粹的文字推理严格些。数学的应用由来已久。魁奈和李嘉图都曾深入地利用数字案例来推导理

论，他们当时受到的批评，和今天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所遭的批评何其相似。批评家认为，数学方法使他们的论点不为外人所理解。马克思也曾深入地用数字举过例。代数方法的应用可以至少追溯到19世纪初。回顾当时，这方面最重大的发展当属杜能（1826年）和库尔诺（1838年）采用的微分。此后，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世纪之交时以费雪为首的追随者们，应用数学，特别是应用微分和联立方程式，使数学方法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调研方式得以确立起来。

数学的第二种应用是当做实证研究的工具，根据观察结果加以概括（即归纳），用实际数据（一般指统计数据）检验理论。既然算术平均、比率也算在数学方法之列，所以数学的这种应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用这种方法的先决条件是能搞到统计数据。19世纪早期，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大量收集这方面的数据，从而使这种研究的范围急剧扩大。他们中间就有麦克库洛赫、图克，还有与图克合作出版了《价格史》（History of Prices，1838～1857年）的威廉·纽马齐（William Newmarch，1820～1882年）。19世纪晚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年）、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年）、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斯（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年）开发了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更加正规的统计手段。杰文斯曾经设想，说不定有一天可以利用统计数据来计算需求曲线。20世纪初，欧美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曾试图这么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期，经济学家开始提出，如何在不同曲线中间作出选择，使之可能和统计数据一致。

演绎也好，归纳也好，经济学论据应用数学的历史都很长，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的数学化说明这门学科出现了新的大转折。原因在于，数学化使人们表达经济学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学渐渐地不再围绕真实生活中的问题而构建理论框架，而是围绕着一系列分析方法，其中包括理论方法和实证方法。理论方法不仅包括了“有约束的最优”或矩阵代数等数学方法在内，还吸收了一些假设，比如用“1”代表个人或组织的行为，以便采用标准的方法加以分析。实证的方法和理论方法相似，也涉及一些假设，比如“1”是如何把理论概念和实证数据、统计方法联系起来的。

这样的发展对经济学学科的结构造成了深刻影响。渐渐地，人们把经济学看做以一个理论（既有经济理论，也有经济计量学方法）为核心，四周围绕着该理论所适用的各领域的一门学科。理论从应用学科中分离出来，同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逐渐分离。由于非常容易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之间转换数学技能，同一个人往往同时从事这两种研究，但它们分属不同的事业。这样的变化还使经济研究和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松动，而两者的联系在以往是非常密切的。大部分研究即使无益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莱昂内尔·罗宾斯在1933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性质和意义》（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Theory）中，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书中论证，经济学不是根据研究主题来区分的——它不是讲商品买卖，或是讲失业和经济周期的事情。经济学研究的是某方面的行为。它讲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用

途之间的配置问题。从本质上看，它讲的是选择。因而选择理论才是核心，需要应用到各种问题上。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可以应用到各类问题上，这个论点在保罗·萨缪尔森影响深远的《经济分析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1947年）中也得到了巩固。不过，萨缪尔森关心的方面和罗宾斯不一样。他没有把收集数据和数据分析贬为低级活动。萨缪尔森先是提出有约束的最优理论，然后应用到消费者和企业的问题上。他通过这些分析，强调数学结构对看似不同的经济问题其实是普遍适用的。

罗宾斯也赞同，即使人们了解的经济学知识不比知道“资源稀缺”这个事实多多少，也可以推导出大部分经济学理论来。这就是说，这门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实证研究。此外，经济学家多年来发现，一大批研究工作都是在分析非常普遍的理论模型的性质，而详尽的实证分析工作往往被看做多余。经济学家被划分为理论家、经济计量学家或应用经济学家（这些人往往就是经济计量学家）成了愈加寻常的事情，理论家可以忽略实证工作，因为检验理论是经济计量学家的任务。当经济学家写下包含了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内容的文章时，越来越通行的做法是：把文章分成不同部分，一部分讲理论，一部分讲实证。

国民收入核算法的革命

经济学学科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另一个重大变化也出现了。这就是大规模地、系统地收集经济统计数据和国民计算。迟

至 20 世纪 20 年代，还没有哪个国家存在全面的国民收入账。配第、金在这方面率先作了尝试。他们对国民收入作了具有启发性的猜测，也提供了详细的证据，但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性框架作基础。甚至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英、美等几个国家出现了粗略的国民收入账，但数据的差距非常大，不可能进行详细计算。在美国，最全面的一次尝试是威利福德·金（Willford I. King，1880～1962 年）的《美国人民的财富和收入》（The Wealth and Income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1915 年）。金是欧文·费雪的门生。他指出，美国的国民收入在 60 年内翻了两番，工资、薪水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从 36% 上升到了 47%。他的结论是，现行的经济制度正在良性运转，并没像社会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行将就木。在英国，鲍利（A. L. Bowley，1869～1957 年）以税收、人口普查数据，1907 年生产普查数据以及工资、就业方面的信息为基础，作了估算。但这项工作和别处正在进行的工作一样，范围十分有限。20 世纪 50 年代，总算有全美的政府机构参与统计，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协调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问世了。截至 1950 年，近 100 个国家有了国民收入估算数字。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整个欧洲构筑了国民收入统计体系。二战后重建过程中千头万绪的问题，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30 年代的大萧条，为了下一次战争而转移资源的需要，无不刺激人们对国民收入核算产生了兴趣。30 年代期间，德国每年对国民收入进行一次估算，延期仅一年。20 年代的大多数时候以及 30 年代早期，苏联都要制作投入—产出表，显示经济体的每个部门从别的部门购买的物品量。意大利和德国曾经制定

出国民收入核算的概念性基础，在当时属世界领先。截至 1939 年，有 10 个国家由官方提供国民收入估算数字。可是因为战争，这些国家中，长期以来最有影响的还属英美两国。德国从来没有把国民收入用于战时规划，也不再作这方面的统计。

在美国，早期从事国民收入核算的有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和米契尔 1920 年建立的全国经济研究局有关系。它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研究国民收入的变量以及收入的分配问题。1921 年发表的报告提供了从 1909 年到 1919 年的年国民收入数字。20 年代，这项工作仍在继续，1926 年，又补充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的数字。但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没能持之以恒。随着大萧条的到来，联邦政府也卷入了这项工作。1932 年 6 月，威斯康星州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提出了一项议案，决定由对内对外商务局（Bureau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mmerce，简称 BFDC）承担 1929 年、1930 年、1931 年的国民收入核算任务。

对内对外商务局一无所获。6 个月之后的 1933 年 1 月，这项工作移交给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 ~ 1985 年）。库兹涅茨自 1929 年以来一直在全国经济研究局从事国民收入核算的工作。在那里，他曾制定国民收入核算的计划，后来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33 年）中广为人知的一篇文章上作了总结。他和他的团队在一年的时间内就计算出了 1929 年到 1932 年的国民收入。由于认识到统计最新数字的重要性，他们除了统计拉福莱特议案所要求的年份以外，还统计了 1932 年的数字。库兹涅茨回到全国经济研究局以后，开始研究储蓄和资本积累问题，以后又研究长期增长问题。

在罗伯特·内森（Robert Nathan，1908～）的领导下，对内对外商务局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成了永久性任务，负责对原始数字进行修订和延展，制定新的数字（例如1938年开始按月提供国民收入数字）。

这时候，国民收入的定义备受争议。库兹涅茨和他的团队发表了两种数字："制造出的国民收入"，表示整个经济的净产品，"得到的国民收入"，包括了生产净产品的人的所得。为了在可信的数据基础上进行核算，他们排除了很多当时受争议的项目。这样，国民收入核算只包括市场经济（买入和卖出的物品）以及按市场价格估算价值的物品。库兹涅茨框架的基本特征是介于消费者支出和资本形成之间。

与此同时，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克拉克·沃伯顿（Clark Warburton，1896～1979年）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法。他第一次使用这个名词是在1934年。这个定义是把出现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移交给消费者和企业的最终产品进行加总。它比库兹涅茨计算的国民收入大得多，因为它还包括了用来替换已磨损的资本品的那些资本品，政府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以及政府购买的资本品。沃伯顿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NP）减去折旧，才是衡量可以消耗的资源的正确方法。他第一次提供了证据，证明资本品支出的规律比消费品支出规律更不容易发现。经济学家早就明白这一点，但以前只拿出过间接的证据。

美国人在国民收入研究方面的第三股力量是劳克林·柯里。1934～1935年间，他开始计算"启动油泵赤字"。这个概念的基

础是，为了让私人部门产生足够的商品需求，以治愈失业病症，政府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支出水平来“启动油泵”。柯里和同事们的注意力放在每个部门对国民购买力的贡献，也就是每个部门的收入和开支差异上。政府需要作出正数的贡献，才能抵消其他部门的储蓄负数。

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国民收入统计工作是由一小群没有政府援助的学者完成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05～1989 年）。1932 年，克拉克采用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概念，并估算了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后，这项工作日显重要。《通论》一经出版，克拉克就计算出了乘数的量。他的主要作品是《国民收入和支出》（National Income and Outlay，1937 年）。他的一位追随者曾写道，这本书“恢复了政治算术家（配第、戴夫南特）的洞察力……把收入、产出、消费者支出、政府收入和支出、资本形成、储蓄、外贸、国际收支等方面的数字汇总到一起。虽然他没有把数字放在一个核算的框架内，但很明显，这些数字来得非常和谐。”

克拉克的研究没有得到政府支持。就连他 1930 年被任命进入经济顾问委员会秘书处时，财政部还拒绝为他多买一部机器。对于政府来说，收入分配问题太过敏感了，它不敢公开这些数字。工业家们不想让这些数字曝光利润。1929 年，英国政府确曾核算过国民收入，但因为得出的工资数少于当时已有的数字，政府只好否认此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正式有官方参与国民收入核算。凯恩斯在《怎样为战争付款》（How to Pay for the

War，1940 年）中，曾引用克拉克的数字。

1940 年夏，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13～1991 年）和战时内阁中央经济信息处的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1907～1994 年）联合起来，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受到了凯恩斯的鼓励和支持，制定了 1938 年和 1940 年的国民经济核算数字，随 1941 年的预算报告发表在白皮书上。关于他们的合作还有个故事，说明他们当时多么捉襟见肘。一开始，身为上级的米德读数字，由斯通敲进他们机械式的计算器里，但很快两人就发现，如果把角色倒过来会更有效率。财政大臣说他们发表的数字是空前的，从此每年发表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收入核算转变成了由一批相关账目组成的国民收支账。美国在战争中的地位，连同库兹涅茨、内森在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工作一道，确保美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保持了领先地位。然而，这个体系最终很大程度上由于英国人的功劳而发生了转变。1940 年，希克斯引入了一个公式：GNP = C + I + G（收入等于消费加上投资加上政府在物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这个公式逐渐变成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公式。他还区分了市场价格和要素成本，认为要素成本等于市场价格减去间接税。或许更重要的是，米德和斯通为整个经济做了一个复式簿记账，从而为国民收支账提供了更坚实的概念基础。他们的复式簿记账上，一列是要素支出（国民收入），另一列是开支（国民支出）。和所有的复式簿记账一样，只要计算正确，两列就能平衡。

自从 1941 年以后，美国不再采用库兹涅茨和内森的国民收入核算法，转而按凯恩斯的方式，采用米德—斯通的框架。马

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1909～1979年）负责此事。他以前是库兹涅茨的学生，1941年至1951年任美国商务部国民收入局局长。这个转变有一个原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得到了广泛传播，为这种新的核算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库兹涅茨的核算法是纯粹从实证观察得出来的，没有什么经济理论支撑它。这种变化之所以看起来受到推崇，还有一些原因。打仗的时候，人们关心的是短期内如何获得资源，没有必要保留资本，这就是说GNP是衡量产出的手段。此外，对包括政府支出在内的收入进行衡量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采用米德—斯通的体系提供的框架，可以开发出范围更广的账目。战后的1947年，斯通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出台了一份报告，其中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好几国政府开始编纂有可能对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的国民收支账。此后，斯通还参与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的组建工作，1953年，联合国出台了关于国民收支账的标准体系。

经济计量学会和现代经济计量学的起源

1930年，在查尔斯·鲁斯、欧文·费雪和拉格纳·弗瑞希（Ragnar Frisch，1895～1973年）的鼓动下，经济计量学会在芝加哥成立了。学会章程是这样描述其目标的：

> 经济计量学会是为了促进经济理论和统计学、数学有关的进步而成立的一个国际性学会……主要目标在于：一、推动旨在把经济问题研究中的理论性数量方法和实证性数量方

法结合起来的研究；二、推动贯彻了富有建设性的缜密思维的研究，这样的思维方式业已在自然科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弗瑞希评论这段话的时候强调，学会所使用的“经济计量学”这个词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把经济理论、统计学、数学“结合”起来。就它本身而言，光有数学是不够的。

学会成立的头几年里，规模非常小。20 年前，费雪曾努力唤起人们成立这样一个学会的兴趣，均告以失败。所以，当鲁斯和弗瑞希找到他，谈论成立学会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很怀疑人们对这门学科有足够兴趣。不过，他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能开出 100 个未来成员的名单，就会支持此事。出于费雪的意外，他们找到了 70 个人。费雪本人又在名单上添了一些人，这就是学会成立的基础。

学会成立不久，就和阿尔弗雷德·考尔斯（Alfred Cowles，1891～1984 年）有了接触。考尔斯是个商人，曾经创立一家预测机构，但连他自己也怀疑预测者不过是在作猜测而已。所以他开始对数量研究有了兴趣。考尔斯写了一篇题为《股市预测者会预测吗?》（Can stock market forecasters forecast? 1933 年）的论文，他给这篇论文写的摘要只有四个字：“值得怀疑。”他对比了听从 16 家金融服务机构的建议和根据 20 家保险公司的业绩而得到的收入以及如果听从随意的预测可获得的收入，从而得到了证据。1928～1932 年间，没有证据表明，专业的预测比随意的预测更强。有了考尔斯的支持，经济计量学会才能够在 1933 年创办《经济计量学杂志》（Econometrica）。1932 年，考尔斯还支持创

立了考尔斯委员会，这个组织是对经济学进行数学分析和统计研究的中心。从 1939 年到 1955 年，这个组织设在芝加哥大学，和经济系分庭抗礼，此后，被搬到耶鲁大学。事实证明，这个组织为经济计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计量学脱胎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一个是美国人的传统，以费雪和鲁斯为代表，另一个是欧洲人的传统，以挪威人弗瑞希为代表。美国传统分为两大派别。一派对货币和经济周期进行统计分析。费雪等人曾经努力检验货币数量论，试图找到分别测量交换公式里面货币、流通速度、交易、物价水平的方法。米契尔却不去寻找证据支持某个周期理论，他曾经试图描述经济周期中发生的事件，从而为这个问题重新下定义。在米契尔的领导下，全国经济研究局承担起了这个和数量有着天然联系的项目，发布在题为《经济周期及其原因》（Business Cycles and their Causes，1913 年）的报告里。项目的成果是开发出了一套计算“参考周期”的办法，以便和任何周期中的波动进行对比。预测周期的另一个方法是沃伦·珀森斯（Warren Persons，1878～1937 年）在哈佛大学开发的“经济晴雨表”。哥伦比亚大学的亨利·勒德韦尔·穆尔（Henry Ludwell Moore，1869～1958 年）和杰文斯一样，也想在经济周期和天气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几年以后的 1923 年，他不说天气了，转而用金星的运动表达他的观点。穆尔所用的统计手段比当时的经济学家采用的都来得广，他的研究因此受到了瞩目。美国传统的另一派是需求分析。穆尔和亨利·舒尔茨（1893～1938 年）为农产品及其他产品估算了需求曲线。

这些工作都没有把数量经济理论和统计分析结合起来。费雪

的论文包含了对消费者和需求理论作数学分析的内容，但和他对利率、货币的统计研究不搭界。米契尔则疑心，只强调某个原因的简化了的经济周期理论有何价值。对于他来说，统计工作提供了整合不同理论和提出新的调查思路的途径。米契尔和穆尔一样，对标准的消费者理论表示怀疑。过去的理论认为消费者是带着早已准备好的出价、竞价来到市场，他希望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好让过时的理论模型暴露出来。换言之，统计工作将取代抽象的理论而不是贯彻这些理论。穆尔批评标准的需求曲线，认为这样的曲线是静态的，它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例如消费者品味、收入等变量保持不变）。只要统计学家对有关数学的某个理论表示怀疑，这个理论就不大可能和统计工作整合起来。而包括凯恩斯、摩根斯顿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对大部分统计数据的精确性和相关性表示怀疑，于是，和数学有关的理论就更不大可能和统计学整合了。

欧洲传统在经济周期、需求等很多方面，都和美国传统重叠，但它的重心有所不同。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一大批学者的研究工作唤醒了人们对涉及采用相关性、时间序列等统计手段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乔治·尤德尼·尤尔（George Udny Yule，1871～1951 年）是卡尔·皮尔逊的学生，他提出了“无意义相关”这个问题，即时间序列上看似紧密联系，实际毫无关联，比如印度的降雨量和巴黎街头的裙子长度之间。他认为，这样的相关性往往并不反映两个变量发生变化的共同原因，只是巧合而已。他还采用实验的方法，揭示了时间序列上随意的冲击和定期的波动之间的联系。俄国人欧根·斯鲁斯基（Eugen Slutsky，

1880～1948年）进一步说明，把（国家发行彩票而引起的）随意冲击的次数加总，也可以造成和经济周期非常相似的周期，它们似乎也有定期的、规律性的波动。弗瑞希也解决了时间序列问题，他用的方法接近于米契尔、皮尔逊的方法，试图把周期分解为各个部分。

弗瑞希、丁伯根和考尔斯委员会

第一个关于整个经济体的经济模型的缔造者是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年）。他先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为荷兰政府的中央规划局效力了大半辈子。要理解丁伯根的这个模型，有必要先看看弗瑞希1933年发表的经济周期理论。他从魏克赛尔那里继承了一个观点，即经济周期问题必须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冲击”问题，一个是“传播”问题。冲击问题关系到经济体系发生震动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技术变化，也可能是战争或体系外发生的任何事情。传播问题则涉及这些震动的后果在经济体如何传播的机制。弗瑞希制作了一个模型，说明假如没有外部震动的话，这个模型会产生逐渐衰减的振荡——周期越来越小，逐渐消失。但因为震动是定期的，这个模型才有规律性的周期产生。他把这个模型称为“木马模型”。如果把木马放在一边不管，它会渐渐停止运动，但如果时不时地加以干预，木马就会继续摇动。弗瑞希认为，这样一个模型会产生定期但是速率不均的周期，符合经济周期的特征。

传播问题和冲击问题之间的区别很容易用弗瑞希所采用的数学工具加以解释，传播机制是由方程式里参数的值以及经济结构决定的。1933 年，弗瑞希只是对这些参数的值作了看似合理的猜测，并且很有信心地说，很快就能用统计手段得到这些数值了。模型所假设的初始条件代表了模型发生的震动。弗瑞希用他猜测的系数和适当的初始条件进行模拟试验，来说明他的模型所产生的周期看起来是符合现实的。

1936 年，丁伯根制作了荷兰经济的模型。这个模型从两个方面大大超越了弗瑞希的模型。他用 16 个方程式和足够多的核算恒等式来描述荷兰的经济结构，这些方程式决定了所有 31 个变量的值。模型所解释的变量包括价格、有形产品的数量、收入和支出水平等。弗瑞希的模型只有三个变量：消费品产量、新创造的资本品、从前一期移交过来的资本品。所以丁伯根的模型比弗瑞希的模型详细得多。最重要的是，弗瑞希只对方程式中出现的数值作了看似合理的猜测，丁伯根却用统计手段估算出了他的大部分变量的值。这样他就能说明，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他的模型会产生逐渐衰减的振荡，由此可以解释周期问题。

三年以后，丁伯根出版了两卷本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Statistical Testing of Business - Cycle Theories）。其中第二卷提出了美国第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内含的方程式是早先的荷兰模型的 3 倍之多。这项工作得到了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赞助。当时，国际联盟委派他检验哈伯勒的《繁荣与萧条》（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1936 年）中所调查的经济周期理论。不过，虽然丁伯根设法塑造了一个可以用来分析美国经济周期的模

型，但是事实证明，对相互冲突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统计检验，这个任务实在是奢望。当时只能得到有限的统计数据。大多数周期理论都是用文字表达的，不完全精确。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理论只讨论了周期问题的某个方面，要获得一个充分说明问题的模型，就必须把各个理论组合起来，而无法一一检验。丁伯根想方设法做到的是，他阐明了一种理论要想成为一个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这个模型必须完整（包含了足够的数量关系，以便解释所有变量），必须有定值（每一个数量关系都要加以全面说明），必须是动态的（要充分说明时滞）。

随着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人中止了对周期的经济计量模型的研究，经济计量学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在美国，由考尔斯委员会的成员们完成的。只是，在那里工作的很多人都是欧洲移民。自从 1943 年雅各布·马沙克（Jacorb Marschak，1898～1977 年）当上委员会科研主任以后，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就开始了。马沙克正是很多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被国际大事件所左右的生动写照。他是乌克兰犹太人，出生在基辅，经历过 1917～1918 年的骚乱。他在德国研修经济学，在那里开始了学术生涯，可是 1933 年眼看着纳粹制度对自己步步进逼，只得迁居牛津。1938 年，他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战争一爆发，他便留在了美国。在他治下，科研不再追求具体的结论，而是转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的主要特征考虑进去。这些特征有四点：（1）经济理论讲的是联立方程组。例如一种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以及当供给与需求不等时价格发生变化的过程来决定的。（2）其中很多方程式包含了“随机”的

项，这是因为经济行为既受到震动的影响，也受到经济理论无法左右的一些因素的影响。（3）很多经济数据都是以时间序列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某一期的价值决定于之前各个时期的价值。（4）很多公开数据都是指总量，并没有指向个人，国民收入（或国民收支账上的任何其他项）和就业水平就是明显的例子。这四个特征都是老调重弹，早已尽人皆知。新鲜的是，经济学家和考尔斯委员会联手，努力用系统的方法，开发出考虑了所有四个特征的新方法。

考尔斯委员会的很多会员和准会员都涉足了新方法的开发过程，但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当属特里格夫·哈福尔摩（Trygve Haavelmo，1911 年～ ）。哈福尔摩论证了统计方法必须建立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之上，否则用统计方法来分析数据毫无意义。早先的经济计量学家反对使用概率模型，他们相信，这些模型只能用在彩票等可以精确计算概率的场合，以及诸如对不同地块施肥等受控制的试验场合。哈福尔摩反驳道："如果统计理论发展出的工具不指向一些随机计划（这背后的一些概率模型），就毫无意义——或许只剩下描述性用途。"同样重要的是，他论证了，不确定性之所以进入经济模型，不光是因为量度方面存在错误，还因为大多数经济关系本来就存在不确定性：

> 在经济关系中引入"错误项"之所以必要，不仅是统计的量度错误造成的，还因为，与我们理论中显而易见的项相比，它同样是经济行为的内在属性造成的，同样依赖于大量因素而存在。

于是，整个 40 年代，哈福尔摩等人发展了各种方法，给联

立方程组中的系数配上数字。既然给这些方法假设一个概率模型，说明他们可以评估这些方法，例如考察一下他们得到的估算数字是否公正和前后一致。

到了40年代晚期，这个项目开始收获有可能为执政者所用的结果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1920年～）。他利用美国经济模型来预测国民收入。克莱因的模型堪称马沙克1943年制定的方法的一个代表。这些模型是一套联立方程组，旨在阐明美国经济结构。克莱因采用了考尔斯委员会最新发展的统计学方法来设计这些模型。克莱因的方法引出了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这样的模型往往由上百个方程式组成，60、70年代被广泛用来进行预测。

经济计量学会和考尔斯委员会的创始人致力于整合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数学和统计学渐渐成了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盼望的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合未能实现。采用考尔斯委员会的研究方法构造一个经济体的结构模型，究竟有多大价值，人们依然存疑。谁也不清楚，应用了如此复杂的数学方法的结构模型，究竟是不是胜于应用更“朴素”方法的简单一些的模型。如何从个体的行为推导出诸如某个产品的市场需求这样的总量上的行为，这些总量问题遭遇了重重困难。结果，到了40年代末，考尔斯委员会转而开始研究经济理论。（对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仍在继续飞速进行，但多半是在考尔斯委员会之外，而且再也没有早先的乐观情绪了。）委员会原来的座右铭是“科学就是测量”（引自凯尔文勋爵），1952年改成了“理论与测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到50年代为止，

创立经济计量学的理想，把数理经济学和统计经济学整合成一个真正的综合经济学的理想，灰飞烟灭了。”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还有两股潮流需要细细道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空军开始雇用平民科学家解决军事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和物理学、机械学有关，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某些问题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从 1939 年起，科学家们开始向经济学家寻求建议。举个例子来说，要不要多生产防空炮弹这个问题，就必须在打下敌方轰炸机的数量（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和生产炮弹所需资源之间进行权衡。这就是一个经济问题。美国军方紧随其后，通过战略服务局（CIA 的前身）雇用了一批经济学家。这些人参与执行了各式各样的任务，从估算敌方装备的设计和生产能力到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不一而足。最后还有一项任务：选择轰炸目标和鱼雷袭击的角度。这些问题不算经济问题，但涉及统计和最优问题，对此，经济学家在数学、统计学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结果证明他们颇能胜任。当然，这些都是在经济学家制定国内生产计划、控制物价等更加传统的经济任务之余的事情。

很多任务涉及最优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了获得精确的数量答案，要求经济学家发展新的数学方法。由于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都存在随机误差，统计学家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于是一些最好被归类为统计决策理论、运算研究和数学规划的活动开始紧锣密鼓地

进行。尤其是美国军方，直到战后还继续雇用经济学家，并为经济研究提供资助。

经济学家的这些活动对战后的经济学起着重大影响。他们提升了经济学家的名望。虽然他们不如发明了核武器之类新技术的自然科学家那么声名显赫，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直接参与了战争，其重要性得到了公认。此外，经济学家还参与了和物理学家、机械学家紧密相关的活动。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他们的专业工作变得更接近于机械学，反倒不那么像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了。

军方投入了特别有兴趣的一些研究事后证明具有更广的应用范围。最重要的一例就是线性规划。举些例子来说就清楚了。假设物品要从一系列工厂运到一批零售店去，应该怎样安排运输才能使运输总成本最小化？假如一个人需要某些养分才能活下来，而不同食品含有这些养分的比例各不相同，那么什么食谱能以最小成本提供这些养分？要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类似问题，就要假设问题所涉及的关系（例如成本与运输距离之间，健康和摄入养分之间）都是线性关系。

线性规划这个概念是由两名统计学家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一位是为美国空军效力的乔治·丹齐克（George Dantzig，1914 年～），一位是加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1910～1985 年），他是对运输问题怀有兴趣的统计学家，曾在考尔斯委员会任职，对经济计量学作出过重大贡献。战争期间，库普曼斯参与了盟军货运计划，丹齐克则努力改进后勤计划和军事力量部署的效率。战后，线性规划及其冠以“活动分析”名头的一系列

相关方法有了很广的应用前景。

这些方法的发展得益于战前。丹齐克是从瓦西里·里昂惕夫编制的投入—产出模型出发开始研究的。它假设每个行业总是按固定比例从其他行业得到投入品，这就把复杂的模型简单化为线性结构。库普曼斯对运输的兴趣也可以追溯到战前。他们俩都不知道，在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已有较长历史的列宁格勒，利奥尼德·坎特洛维奇（Leonid Kantorovich，1912～1986年）早已运用线性规划来制定生产过程的计划了。甚至可以说，战争期间开发的另一些研究方法更为直接地出自战前的民用问题。例如数量控制的统计学方法在战前就早已用在了工业领域，只是到了战时，才被军方采用并加以发展。

一般均衡理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般均衡理论渐渐被视为构成经济学框架的核心理论基础。它始终是少数人的活动，需要更精深的数学专业知识，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无法掌握。但是，这个理论享有崇高声望。它的源头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20年代期间，马歇尔在这个理论上起了主导作用。人们一度忽视了它。30年代，人们对一般均衡理论兴趣索然，当时只有几个经济学家团体开始对此展开探索。

其中一个团体是二、三十年代在维也纳组织起来的一个研究小组的基础上开始活动的。组织者是数学家小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1902～1985年）。请不要把他和他父亲卡尔·门

格尔（Carl Menger）搞混。这个所谓的“维也纳圈子”的宣言——《世界的科学视野》（The Scientific View of The World）发表于1929年。维也纳吸引了全欧洲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其中一位是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1902～1950年）。他是罗马人，喜欢几何学。他和卡尔·施莱辛格（Karl Schlesinger，1889～1938年）的见解一致。施莱辛格的《货币和信用经济学理论》（Theorie der Geld－und Kreditwirtschaft，1914年）发展了瓦尔拉斯的货币论。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斯尔（Gustav Cassel）在《社会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1918年）中，去除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方程组中提到效用的部分，简化了这个方程组。瓦尔德和施莱辛格对此进行了探讨。施莱辛格注意到，如果物品并不稀缺，其价格就是零，于是他把这些方程式重新表示成一套等式和不等式的组合。价格为正数的物品，其供给等于需求，价格为零的物品，供给量大于需求量。从小门格尔的研究小组所讨论的一系列论文中，瓦尔德证明了，只要需求函数具有某些特征，这套方程式就有解。瓦尔拉斯曾经试图通过计算方程式和未知数求得结果，现在，瓦尔德用高等数学方法（特别是2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动点定理）和施莱辛格重新表示的方程组，可以作出来了。他证明了，一般均衡方程式足以决定系统中所有的价格和物品数量。1937年，瓦尔德和小门格尔一样被迫离开奥地利，前往考尔斯委员会就职，在那里他一直用数学方法研究统计学。

还有一位数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产生了兴趣，他是约翰·冯·诺依曼。冯·诺依曼是匈牙利人，在柏林待过几年，1930年

作为访问学者来到普林斯顿大学，1931 年正式进入这所大学。1932 年，他撰写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可以用一组方程式描述正在增长的经济，而且这组方程式存在均衡状态。这篇论文发表在和瓦尔德合编的《数学学术讨论会成果》（Ergebnisse eines mathematischen Kolloquiums，1937 年）上。此后，他在小门格尔的研究小组里面也讨论了这篇论文。冯·诺依曼很重视选择生产手段，他发展了一套十分新颖的分析资本品的方法。而瓦尔德关注的焦点是在配置既有资源的问题上。不过，他们解决是否存在均衡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是相似的数学方法。

瓦尔德和冯·诺依曼等数学家还不是唤起了人们对一般均衡论的兴趣的人。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比当时的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更加了解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动态。他把约翰·希克斯介绍给了瓦尔拉斯和帕累托。30 年代初，希克斯和艾伦（R. G. D. Allen，1906～1983 年）一道，重新用公式表达了需求理论，这样，这套理论离开了效用概念也行得通，因为效用被认为过于玄奥抽象，没办法测量。他们把个人偏好换了个称谓，叫做“无差异曲线”。这就仿佛地图上的等高线：无差异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物品的一种组合，每一条无差异曲线都是由偏好相等（得到同样福利）的点组成的。就像在地图上移动等高点说明海拔高度发生变化一样，从一个无差异曲线移动到另一个无差异曲线，说明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发生了变化。消费者的物品组合要么改善了，要么更差了。无差异曲线的意义在于，描述选择问题，不一定要量度效用，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多少，看看高度的变化就知道了。只要知道等高线的形状，就可以从低到高一一排

列出来，就可以从中找到消费者可以获得的最高点。希克斯和艾伦认为，用这个描述消费者行为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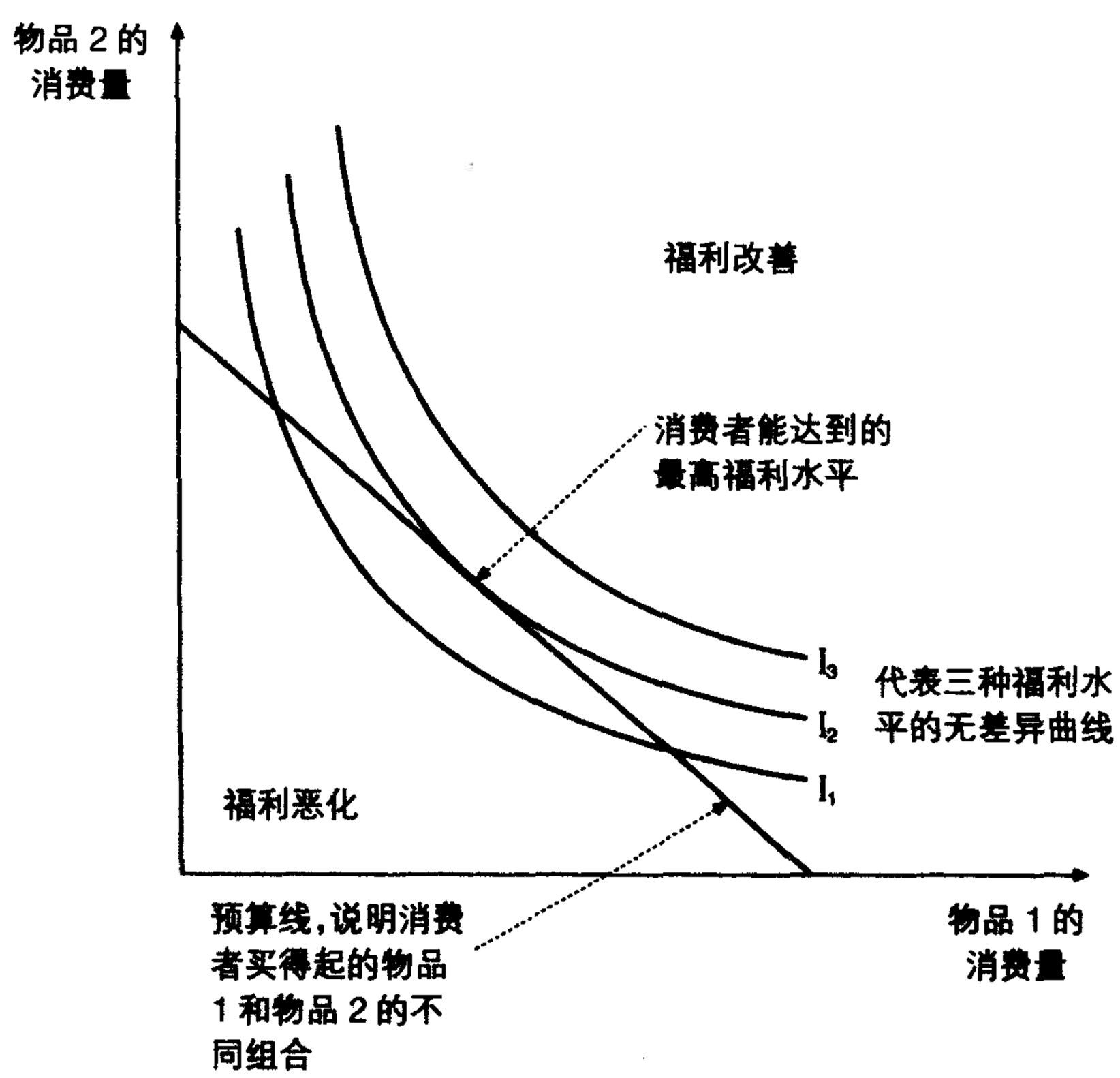

图 5　无差异曲线

希克斯随后出版了《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1939 年），这本书用英文揭示了一般均衡理论。它在希克斯—艾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用现代语汇重新描述了一般均衡理论，所使用的数学方法也远比瓦尔德、冯·诺依曼、萨缪尔森的简单。它还整合了资本理论，为探讨动态问题提供了框架。虽然希克斯在书中没有参考 IS－LM 模型，但至少到 40 年代末的时候，绝大多数读者都认为，它说明了宏观经济学可以被视为缩略

的一般均衡系统。简言之，这本书说明一般均衡理论可以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

然而，一般均衡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是完全竞争状态下的理论。希克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他认为别无选择。不完全竞争状态下提出的困难之多，如果要摒弃完全竞争的前提，就会毁掉绝大多数经济理论。这实际上等于承认失败。他效仿马歇尔，把文中涉及代数的部分放到附录里面，正文中涉及数学的部分仅限于几个图表，这样一来，数学水平有限的经济学家也能读得懂这本书了。《价值与资本》广为流传，帮助多个国家的人们恢复了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兴趣。

就在希克斯撰写《价值与资本》的同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年～）也在钻研后来的《经济分析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这本书1941年就完稿了，但由于战争，耽搁到6年之后才出版。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在哈佛大学完成研究生课程，师从威尔逊（E. B. Wilson，1879～1964年）学习数理经济学。威尔逊既是数理经济学家，又是统计学家，但他对物理学也有浓厚兴趣。物理学家威拉德·吉布斯奠定了化学热力学的基础，对电磁学和统计力学作出过贡献。欧文·费雪曾受教于吉布斯。威尔逊便是吉布斯的关门弟子。萨缪尔森所受的影响还来自另一位物理学家，即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1882～1961年）。此人提出了“操作主义”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任何有意义的概念都可以简略成一系列操作，也就是由操作界定概念。萨缪尔森把操作主义应用到经济学中。在《经济分析基础》中，他对这个概念的解释

是，经济学家应该寻求“有操作意义的定理”。于是，这本书的主体部分都是在推导可以验证的结论，而这些结论讲的是可以观察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萨缪尔森以两个假设为出发点。其一，均衡相当于某些数值的最大化。因此，企业的均衡可以表示成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均衡可以表示成效用最大化。第二个假设是，系统是稳定的，即使系统受到干扰，也会回归到均衡状态。萨缪尔森从这两个假设出发，声称有可能推导出很多有意义的定理。所以这本书一开头就是用数学方法讲述的章节，一章是讲均衡以及分析干扰均衡的因素的方法，一章是讲最优理论，随后他把这些方法应用在企业、消费者和一大批标准问题上。

《经济分析基础》和《价值与资本》不同，它十分强调数学方法。萨缪尔森和导师威尔逊都相信，研究理论物理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经济学上，萨缪尔森试图说明用这种方法能解决多大程度的经济问题。不过，两本书还是有重要的相似点的。希克斯和萨缪尔森都强调，分析消费者理论的时候，不必假设效用是可以测量的，便可以推导出所有有趣的结果来。他们都探讨了一般均衡的动态问题和稳定性问题。萨缪尔森评价两本书之间的关系时说：“《价值与资本》是非常具有独创思想的叙述性力作，为《经济分析基础》所尽力解决的问题，也为即将开始的数理经济学的扩张过程确立了读者基础。”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复兴的一般均衡理论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卷入这个过程的人们背景十分复杂。希克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分析一般均衡理论，他带来的思想深受罗宾斯以及欧洲

大陆的经济学家的影响，他们具有英国背景，后来都被马歇尔的思想主导着。萨缪尔森的背景是吉布斯、威尔逊发展起来的数学物理学，他试图把他们的数学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他分析可观察的变量时，强调动态的因素和预测的作用。和他们相反的是，瓦尔德和冯·诺依曼研究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直接来自他们的数学背景。

20 世纪的头 30 年里，数学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渐渐接受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19 世纪初被发现，但直到 1899 年才成为公理），有关数学基础的问题由此而生。人们不再能辩称，几何学只是把有关空间的直观观念公式化。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日常经验相违背，可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却是颇能接受的。欧几里得几何学逐渐缩减成了几何学很多分支中的一支，自从出现相对论以后，这门学科甚至不再能论证它就是和有形世界相一致的唯一一种几何学。早先人们对数学和现实世界之间关系所持的观念面临另一个打击，那就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和其他理论是有可能结合起来的，但前提是人们可能拿出一套更抽象的数学理论来，使那两个理论都可以由这个数学理论推导出来。在此过程中，数学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日常经验。

面对这个形势，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 年）努力把数学缩减到以公理为基础。他计划解决集合论的几个矛盾之处，在他的计划中，数学就是研究公理体系的蕴涵。这些公理体系包括给基本符号下的定义和为了操作这些符号而制定的规则。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公理体系能独立于赋予它们的各种解释之上而存在。就是说，一旦一般均衡理论被

视为公理体系，就失去了和现实的联系。理论所使用的符号虽然可以解释成代表价格、产出等等，但不必这样解释。从中推导出来的任何定理不必依赖符号的解释来决定有效与否。因此当瓦尔德和冯·诺依曼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公理式的解释时，人们理解这个理论的方式发生了巨变。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瓦尔德和冯·诺依曼处在这门学科的边缘位置。40 年代晚期，已经摆脱了经济计量理论的考尔斯委员会开始鼓励人们分析一般均衡理论了。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1921 年～）和杰勒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1921 年～）是在考尔斯委员会工作的两名经济学家。他们 1954 年发表了证明存在一般均衡的更好方法。此后，阿罗—德布鲁模型渐渐被视为一般均衡模型的典范。有关这个模型的说明文字写在德布鲁的《价值理论》（Theory of Value，1959 年）中。德布鲁在前言里写道：

> 这里是按照现代数学的形式主义流派的严格标准来分析价值理论的……遵守严格的标准，从而规定了分析的公理形式，这样的分析使这个理论在严格意义上说，其逻辑和对它的诠释完全脱钩。

德布鲁从数学转而研究经济学并非巧合。作为数学家，他曾加入了所谓的布尔巴基团体，这个团体由一群法国数学家组成，他们研究数学非常精密严格，假借“尼古拉斯·布尔巴基（Nicolas Bourbaki）”的名字发表论文。《价值理论》可以说是这个团体的项目在经济学方面的应用。

德布鲁的《价值理论》提供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公理化公式。

与瓦尔德和冯·诺依曼的方法相比，它以更加普遍的假设来证明均衡的存在性。做到普遍性和严格性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这个理论不再能描述人们所感知到的现实经济。例如，它解决时间问题的办法是，假设所有商品都存在期货市场，所有代理商都在这些市场上买卖商品。同样，不确定性也被带入了这个模型。它假设有一套完整的保险市场，其中，发生任何不测事件时都能给商品安排一个价格。显然，任何现实经济中都找不到这样的假设条件。

60 年代初，人们对一般均衡理论以及连带着对整个经济学的信心，都达到了巅峰，人们广泛认为德布鲁的《价值理论》处在这门学科的核心位置，为学科提供了严格的公理性框架。这个理论很抽象，没有描绘任何现实经济，它所用到的数学也只为少数经济学家所理解，但人们相信，它为编制应用型模型打下了基础。对阿罗—德布鲁模型的诠释可以应用到经济学的很多（即使不是全部）分支。但这个模型也存在重大问题，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它不能证明稳定性。不过人们信心十足地认为，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的，而且会使理论一般化，从而应用到新的经济制度中。这个模型提供了研究时间表。但这样的乐观情绪稍纵即逝。结果证明，从这样一个一般框架只能得出很少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先是有个反例，然后有一般性证据证明，它不可能如人们早先希望的那样证明稳定性。这种方法存在基本缺陷。

此外，阿罗—德布鲁框架内部也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货币、信息和不完全竞争问题。人们曾试图发展货币的一般均衡理论，但以失败告终。经济学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

用了不那么一般化的模型，却往往只能分析经济体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一个问题。《价值理论》标志着人们寻求更加普遍的一般竞争性均衡模型的努力达到巅峰，这种努力终于还是结束了。

博弈论

经济学家们远离了一般均衡理论，继续寻找经济学赖以成立的统一框架，终于在博弈论里找到了。现代博弈论已有较长的历史，但主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冯·诺依曼的研究上。当时他发展了一套理论来解释客厅游戏。其中最简单的游戏有两个选手参加，他们不能互相合作，每个人都有两个对策可供选择。这时，有四个可能的结果。冯·诺依曼能证明总是存在一个均衡，使双方的选手都不愿意改变对策。但为了确保这个均衡，必须假设选手可以随机选择对策（比如用投掷硬币的办法决定用哪一种对策）。于是，社交关系和物理学中的概率理论有了相似点。这个工作是试图说明，数学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界的问题，也可以解释社交问题。

从1940年到1943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44年）。摩根斯特恩是经济学家，从1931年起，继哈耶克之后担任维也纳的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职务。1938年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研究预测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他提出了

福尔摩斯—莫里亚蒂[①]问题。小说里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教授总是在互相猜测。如果福尔摩斯相信莫里亚蒂会跟踪他到多佛，他就在阿什福德下火车，甩掉莫里亚蒂。可是莫里亚蒂也算到福尔摩斯会这么做，于是他也在那里下车，这时，福尔摩斯会前往多佛，而莫里亚蒂知道这一点……如此下去，了无终局。冯·诺依曼分析的是两个人采用两种对策的博弈问题，只是他用了另一种语言阐述。

摩根斯特恩在维也纳结识了小卡尔·门格尔，慢慢地，他同意经济问题必须用公式求证才能得到精确的解。他和很多奥地利经济学家不一样，他相信，数学可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一席（他曾受教于瓦尔德），他一直在关注数学可以从中起作用的观点。但他又和冯·诺依曼有所不同，他批评一般均衡理论，不相信这个理论可以为这门学科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框架。博弈论提供了另一个框架。他一边和冯·诺依曼合作，他一边总是向冯·诺依曼提出尖锐的问题，就均衡问题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给冯·诺依曼施加压力，使他发展自己的观点，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摩根斯特恩和冯·诺依曼发展其理论的时候，他们面临的知识环境和一般均衡理论发展过程背后的环境一样，都是崇尚公式的数学家们。事实上，两种理论采用了一些相同的关键性数学定理。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是一部开拓性著作。它分析了博弈过程，一种是游戏方可以相互合作，形成联盟，一种是游戏方不合

---

① 福尔摩斯—莫里亚蒂：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都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Sir Arthur Conan Doyle）笔下的人物，出自他的著名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

作。它提出了一种可能衡量效用的方法。最有意义的是，它提出了均衡的一般概念，这个概念不依赖市场、竞争，也不依赖对游戏方可以采取的对策所作的任何特殊假设。这个均衡概念的基础是优势概念。某个结果（用 x 指代）和另一个结果（用 y 代表）相比，“如果有一群参与者，每个人都更喜欢 x 形势下的个人处境，而且都确信他们可以组成一个团体”，那么 x 比 y 有优势。均衡，或者博弈的结果，就是由最有优势的一组结果组成的。换言之，它的结果能保证参与者相信他们不可能更喜欢别的什么结果。既然优势这个概念可以用很多方法加以解释，也就提供了非常一般化的均衡概念。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赢得了喝彩，但只限于一小群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迟至 1950 年，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对把数学应用到经济学上怀有抵触情绪。另一个原因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对现行的经济学著作嗤之以鼻。（摩根斯特恩曾发表对《价值与资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冯·诺依曼私下里十分鄙夷萨缪尔森的数学水平。）结果，多年来一直是数学家，特别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家，以及美国海军研究处在采用博弈论，经济学家反倒没有注意到它。接受过数学教育的经济学家主要出自考尔斯委员会，其中有几位写过有关这本书的大量评论，但就连他们也没有接受博弈论。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中，有一位接受了博弈论，他就是约翰·纳什（John Nash，1928 年 ~ ）。他的一系列论文和 1950 年到 1951 年的博士论文，对博弈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冯·诺

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理论出发，也区分了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前者是说，选手可以相互交流，结成同盟，协调行动，后者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协调。他证明了，任意数量的选手参加非合作性博弈，都存在均衡（冯·诺依曼则证明这个均衡只对两个选手的博弈有效）。在此过程中，他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是后来世人所称的纳什均衡：其他选手选择的对策已定时，每个选手都满意自己的对策。他还形成了解决合作性博弈的思想概念（即纳什谈判）。

经济学的再次数学化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在发展变化。30 年代时才乍露苗头的数学化倾向，如今铺天盖地地袭来。人们渐渐认为，高等数学课程是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技能，尤其是，不掌握数学技能，就没办法跟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在学术杂志上应用数学成了家常便饭。这种变化如此深刻，说它是革命也不为过。之前的 30 年为这个变化打下了基础。伴随左右的还有经济计量学、线性模型、一般均衡理论和博弈论。这四个领域的思想和分析手段撒播到了经济学的各个分支。

数学模型的应用使经济学家得以解决许多曾经困扰了很多人的问题，他们光用文字和简单数学，解决不了那些问题。经济学家以前插不进嘴的一些话题，如今也对他们开放了。然而代价是有的。不合适放进数学框架的一些问题即使不遭到忽略，至少也被边缘化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理论变狭隘了。理论变得更

加简单，逻辑性更强，为数也更多了。经济理论搭配经验数据的方式也发生了同样戏剧性的变化。虽然老套的、不那么正规的办法没有被一网打尽，但对数学模型进行统计检验的方法逐渐成了标准程序。

光是参与这个变化过程的经济学家的数量，就是对此作出的最好解释。丁伯根、弗瑞希、希克斯、萨缪尔森、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他们的动力和目标各不相同。但我们依然可以作出一般化的概括。这门学科目睹了无数受过数学、物理学良好训练的人蜂拥而入。他们各有手段和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不仅如此，他们在数学、物理学上的经验还影响了他们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像冯·诺依曼这样显著的例子还有数不胜数。经济学的数学化也和两次大战间隔期间经济学家的被迫移民有关系。20 年代，主要从俄国、东欧移民，30 年代从德语国家，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身经两次动乱。50 年代，又发生了经济学家从中东欧向美国的大规模迁移。一些数学家曾参加门格尔在维也纳的研讨会，（包括门格尔本人在内）他们只是移民潮的冰山一角。1945 年前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撰稿人中，40% 出生在中东欧，他们多数居住在美国，有很多人接受过高等数学教育。

经济计量学会的早期工作涉及数学和经济学，其目的是整合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的目标实现了，或许还超出了它的创始人的愿望。如果不掌握高等数学和统计学，那么研究经济学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然而，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合工作却成效不大。40 年代末，在经济学内部，经济计量学

和数学理论作为相当独立的活动各自得到发展。有时它们也结合在一起，也有相当多的交融和促进，然而，人们希望采用经济计量手段，使经济理论能稳固地建立在实证数据而不是抽象假设的基础上，这个目的没能实现。这部分反映了形式主义数学家的影响，也部分地说明了早先的经济计量学家过于自信，不承认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的艰巨性。经济理论中所用的关键假设还像马歇尔及其同辈人使用的那样，其合理性主要凭直觉判断。

针对这种局面，经济学家有几种方式去应对。最恭维经济理论的一个说法是，理论“先于”测量。就是说，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是开发测量经济的新方法，以便使理论和反映真实经济活动的证据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对于同一现象，另一种说法是，经济理论和实证数据失去了联系，理论的上层建筑根基脆弱。从这个视角来看，理论家的责任是开发和现实证据的结合更密切的理论，而实证工作者的任务是开发新的证据，两种任务一样重要。

对经济学数学化的质疑周而复始。战后长时间的高涨期里，人们增强了对经济学的信心，60 年代达到顶峰。一般均衡理论是个联合性的框架，影响了很多领域，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本不断下降，经济计量研究也日益普遍。但是到了 60 年代末，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提高了，越来越多的人对数学化倾向提出质疑。随着 70 年代中期滞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步上升）的出现，大规模经济计量模型不能精确地预测经济前景了，于是人们对经济学的信心更加动摇。80 年代，博弈论为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联合性框架，功能强大的个人计算机问世了，革新了经

济计量技术，这时，信心得以回归。不过，日益滋长的信心一直和持久的异议如影随形。局外人也好，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局内人也好，都一致认为，30 年代以来，为了把经济学放进数学的模子里而采用的一些假设，已经蒙蔽了经济学家，使他们无视一些不适宜放进这个模子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林林总总，包括苏联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人口增长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会造成什么样的环境灾难。

12

福利经济学
（1870 年至今）

边际主义

19 世纪行将闭幕之际，人们目睹了一场大规模运动的兴起。欧洲各国都组建了新的政党，并且在很多国家，支持者的队伍迅速壮大。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乃至于他们在欧洲议会中的议席扩大了。从政党本身，到保守主义者，都面临巨大的社会变革压力。保守主义者，如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ck）、英国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想方设法减轻发生激变的压力。政府活动延伸到了很多新的领域，出现了新的组织，国家的作用也增强了。劳工组织在扩大，不仅吸收技术不熟练的工人，也吸收手工业者进来，并开始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工会的兴起与新社会的兴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当然明显的例外也是有的。

横扫欧美的这场运动采取了多种形式。从改良主义到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各有不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新社会的兴起代

表了两种类型的挑战。一种是制定什么样的研究原则，去研究国家的适当作用。何时、何地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生活？又如何干预？第二是如何评估新社会重组方案。按照新社会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体会运行成功吗？虽然这些问题明显相互重叠，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让我们考量这期间的主流经济思想。

新社会掀起挑战的时候，正是经济学家日益采纳边际主义理论之时。这些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工业管制、福利供应、成立政府企业、税收政策等问题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解决，这是前面几代经济学家不可能做到的。斯密和穆勒曾经探讨国家干预的问题，但他们的分析集中在长期增长问题上。他们制定了评价国家活动的一般原则，对特殊案例的观察见解深刻，但他们解决资源配置这样特殊问题的能力十分有限。而边际主义有了效用和利润最大化这些数学武器，似乎能填补这个沟壑。

对于其他人来说，早期的一些边际主义学者虽然可能一直以来普遍偏好自由放任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注重实效的考虑压倒了这样的偏好。大多数边际主义者都站在改革一边，不过，有时候他们的方法带有家长作风，或者对激变满怀敌意。例如，杰文斯是作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开始职业生涯的，但在他 1882 年的封笔之作中，他已经站在了这样的立场上——“几乎看不到立法者的干预受到任何限制”。当时的事实是，19 世纪 70 年代，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为国家干预作辩护的背景条件，像公共健康、工作条件、教育、交通以及其他种种，这些方面大多得到了持续增长的地方税收的资金支持。接下来的一代经济学宗师马歇尔，他所发现的国家干预作用比杰文斯来得少。但他仍然为国家

赋予了重要作用，并且对支持累进税率（富人税重，穷人税轻）的运动表示赞同。

国家与社会福利

在英语国家，好几十年来，一直主要沿袭剑桥传统来解决社会福利和改革问题。这个传统的创始人是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年）。西奇威克的观点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区分“财富”这个词在使用时的两种不同意义。一种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货品总量。另一种是个人效用的总和——这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福利。他还列举了理由说明两者为何不同。其中免费品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也就是不要钱的物品。这样的物品能提高个人效用，受到器重，价格却为零，所以根本不属于财富的第一个概念的范畴。从更加一般的意义上看，对于消费者而言，物品的市场价格衡量的是他所消费的最后一个单位物品的价值。假如随着消费量的增加，增加的那个单位的价值在下降，这个价值就会小于物品对于那个消费者的平均价值。如果说所有物品的价格与平均效用之比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就无足轻重了。可问题是，价格与平均效用之比是由边际效用下降的速度决定的，而且假设所有物品的价格与平均效用之比都相等，是没有道理的。有些物品的平均效用和价格比起来比较高，比如按照市场价格来计算财富，这样的物品就被低估了。免费品价格为零，价值却是正数，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西奇威克利用了杰文斯的效用主义思想，根据他个人效用可

衡量、可比较的思想，来发展这些论点。这就是说，同一种物品如果对一人而言比对另一人而言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用，那么通过物品的再分配，把物品分配给最看重它的人，就可以提高总效用，这时候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财富没有变。例如多发给穷人一块面包，其价值可能高于给富人的情况。因此，把富人手中的面包拿走，交给穷人，有可能提高福利水平。换言之，一个社会的福利状况是由物品的分配情况决定的，而不光是由社会所消费的物品价值决定的。

西奇威克给出了财富和福利有所区别的理由之后，论证道，出于实践上的原因，财富还得用市场价格来计算，除非有些特例中，“市场标准无助于我们”。这就为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类似于斯密、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这个论点提供了辩词。他们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分析福利问题，总是先分析生产，再分析财富分配的问题。西奇威克在政府作用问题上，也沿袭了穆勒的分析方法。总的原则是自由放任主义，但他详细揭示了大量的例外情况。其中包括对社会的贡献大于回报（如灯塔、造林、科学发现），以及个人所得超过对社会的贡献（现有铁轨改双线）的情况。还有一些例子，如疾病控制，就需要个人和社会的合作。西奇威克虽然捍卫古典经济学的见解，但他对财富两个概念的区分，使人们或许第一次有可能把福利经济学看成和一般经济学有所不同的门类。

马歇尔沿袭了这个传统，但他使西奇威克的分析愈加精确。他明确定义财富是货币价值的总和——国民收入抑或他所谓的国民效益。这一点和效用或福利是有区别的。不过，他的主要贡献

在于，他开创了用货币衡量效用的一种方法。这就是消费者剩余理论。个体消费者的剩余是消费者愿意为某个商品付的钱和实际付的钱之间的差异。马歇尔说明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样的剩余可以进行加总，并用来衡量社会福利的变化。特别是，所有人增加的一个收入单位的价值必须都一样。其实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对此的回答是，他是要把消费者剩余仅用在某些大致可称真实的情况下。

然而总体而言，恰好经济学分析的最大多数事件，都按同等比例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一来，如果用货币来衡量两个事件所导致的幸福，得到的值是相等的，那么一般来说，这两个事件中的幸福的量就不会有多大差别。

马歇尔限定消费者剩余仅用来计算一小部分消费者支出。这就是说，价格的变化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微不足道，只对消费者增加的那个收入单位的价值产生微小影响。

福利经济学的效用主义的务实方法在庇古的著作中达到巅峰：一本是《财富与福利》（Wealth and Welfare，1912 年），另一本是《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1920 年）。这门学科正是庇古命名的。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效用主义的经济学，因为他认为福利的决定因素是可以互相比较的“意识状态”。他和西奇威克、马歇尔一样，关注国民收入及其分配方式。国民收入和他所谓的“经济福利”有关，“那部分福利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和货币的衡量标尺发生关系”。换言之，他承认有些方面的福利，经济学家无话可说。

庇古的主要创新在于，他用边际私人产品和边际社会产品

替换了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如果某个活动的边际私人产品，即参与这个活动的人获得的好处，不等于它的边际社会产品（给社会带来的利益）的话，就不大可能获得最大福利。庇古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边际私人产品都不等于边际社会产品。一种情况是，某人拥有一项资产（土地或建筑物），归租户管理。如果改善或维护资产的好处归地主，那么租户可能没有动力去改善甚至维护这个资产。于是，改善土地的边际社会产品会大于租户的边际私人产品。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到其他人的福利。污染和交通堵塞就是明显的例子。垄断也会使边际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产生差异。垄断者并不是简单地盯住多生产的产量的价值，他们还会考虑到增加的销量对现有产量下的价格的影响。这样一来，经济政策也就要将消除私人产品和社会产品的差异纳入自己的范畴。庇古用这种方法为经济政策提供了详尽的方案，实际上也是为福利国家制定了蓝图。

洛桑学派

和剑桥的经济学家们不一样的是，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不认为不同个体的福利可以进行衡量和加总。瓦尔拉斯从公平交易的思想出发，认为这一类公平要求每个商人对既定产品采取统一价格，而且这个价格是不变的。接下来他说明，既然交易是公平的，自由竞争会产生最大化的福利。这个结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从此以后，福利问题不必再考虑不

同个体的福利加总或比较了。这个方法是帕累托开创的，他把社会最优化定义为一种任何改变都会受到一些人的赞同、另一些人的反对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一些人的福利不恶化，另一些人就不可能改善福利。

瓦尔拉斯和英国的同行们一样，提出了详尽的社会改革政策，重点在于消除垄断。他也在更加抽象的层面上考虑过新社会的问题，其中的核心是土地国有化提案。他主张，这个提案为个人和社会达成和解提供了途径。帕累托进一步深入讨论了社会的问题，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上。据他观察，即使国家拥有了所有资本储量，也禁止了一切买卖活动，依然不得不保留物价和利息，至少是作为计量实体加以保留：

> 要求解均衡方程式，价格是最简单也最容易的办法。如果有人坚持不用价格来解，到头来他还是可能采用价格，只是把它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而已。

没有物价和利息，“管生产的部长会盲目行事，不知道该如何制定生产计划”。一个集中组织的社会，将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面临同样的个人欲望、同样的满足欲望的障碍。结果是，两个社会都不得不解决同样的问题。这两个社会的差别在于收入分配的原则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收人和生产手段的所有制（因而也是社会的发展形成方式）挂钩，而社会新制度下，收入的分配结合了道德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因素。

帕累托的学生恩里克·巴龙（Enrico Barone，1859～1924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论点。巴龙指出，在一个集中化的经济体中寻求成员的福利最大化，和在完全竞争的均衡状态下一样，必

须满足同样的条件。生产部长可以从前一政权下的物价和工资出发，要么提高物价和工资，要么降低，经过一段时期的试错过程，最后满足两个条件：价格等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最小化。根据这些论点，他宣称这样一个部长将要面对海量任务，可倒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

经济核算之辩

1918 年到 1921 年，人们进行了简短尝试，以集中计划代替资本主义的基础——市场和价格——实行完全分配。结果引起了混乱，这之后的 20 年代初期，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对很多物品重新引入了市场概念，但国家对经济保持了很大程度的控制。对经济进行更加详细的考察的时机成熟了。前苏联进行的构筑非市场经济的尝试告以失败，究竟是战事的巨大压力造成的，还是理论缺陷的缘故？几位经济学家接受了挑战，说明了原因来自后者。

一位名叫古斯塔夫·卡斯尔（Gustav Cassel）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适用于任何交换经济的观点。国家经济的优势在于它是最简单的经济，因此它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评测更复杂的经济的基准。通过比较，能揭示出哪些制度是必要的，哪些可以舍弃。这就使他进一步发挥巴龙的观点，认为即使国家想要摒弃物价和工资，这两样东西还会势不可免地卷土重来，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基本经济事实。然而，他比巴龙更进一步论证道，若没有私有财产和完全成熟的交换制度，这些国家将无法按最佳方式指挥

生产，也就没办法得到必要的价格。

对此提出最激烈批评的经济学家是米塞斯。他的文章《经济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1920 年）唤起了后来所谓的经济核算之辩，当时有很多顶尖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辩论。米塞斯在文中坚决地指出，对任何经济进行合理核算，都需要存在自由设立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的货币价格。没有这样的价格，任何人都无法知道应该如何最好地利用资源。米塞斯强调，这并不像一些人似乎主观臆断的那样，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困难主要不在消费品上，比如可能用不着价格就可以说明 1000 升酒比 500 升油更有价值。困难主要在于投资品。例如铁路，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为别的行业减少了成本，使这些行业生产了更多消费者需要的物品。没有货币价格，就无法计算该不该修筑铁路。

在静态的一成不变的经济中，有可能进行合理的核算。问题是这个世界不是静态的。品味和技术永远在改变，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米塞斯认为，资本主义企业里的经理人对于他们管理的企业怀有兴趣，这和在公共事业中发现的兴趣是迥异的。当人们从企业进入公共组织，就不再存在“商业头脑”了。即使人性发生了改变，人们能像在自由竞争的压力下一样竭尽所能，问题依然会存在。没有价格，人们就不知道节约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如何在从事某些活动的成本和利益之间进行平衡。

对米塞斯的回应主要来自一群被称为“市场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弗雷德·泰勒（Fred M. Taylor，1855 ~ 1932 年），迪金森（H. D. Dickinson，1899 ~ 1969 年）和奥斯卡·兰

格（Oskar Lange，1904～1965 年）。他们被赋予这个称号，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可能设计出一个国家拥有生产手段的经济，但同时又存在消费品和劳务市场。因而为了回应市场工资和价格，家庭也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和购进消费品。工厂经理负责组织生产，他们的任务是，以最小平均成本进行生产和把边际成本当做价格。这些工厂经理的背后是行业经理，他们负责制定投资决策，包括何时开设新工厂，何时关闭旧工厂等。中央计划委员会将监控整个过程，设定价格，作为行业经理人的决策基础。

他们对这些原则的推理是，如果遵循这些原则，就有可能模仿完全竞争经济条件下的行为。假如市场主义制度管理得当，两种制度将得到一样的结果。

哈耶克在 1935 年以来陆续发表的系列文章中，对争论作出了最强有力的回答。他认为，市场主义者们并没有阐明，在这种制度下有没有可能进行合理核算。他们只说明了，如果通盘掌握了所有有关数据（包括了解了消费者的品味和投资品在技术上的所有可能性），就有可能求解一组方程式，来决定应该生产什么物品。但它并没有解决社会制度能实现多大效率的问题。在真实的经济中，全盘掌握生产技术条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真实的情况是，工程师们掌握了必要的思维技巧，使他们能在遇到新问题时发现新的解决办法。换言之，制订计划的人所需要的知识并不存在，这种知识是需要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采纳新方法、开发新产品等的创新力不是来自制订计划的人，而是来自经理人，是他们了解新的发展情况，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对新情况作出反应。这个制度的问题不仅仅是计算上的问题，而是如何产生运转

这个制度所需要的信息的问题。市场主义者们把技术条件当成了既定条件，想当然地把这个问题抛在了一边。

哈耶克进一步指出了市场主义者论点中的问题。在均衡状态下，解出一组联立方程式就可以算出价格。但经济永远不会处在均衡中。制订计划者该如何在非均衡状态下操作，市场主义者并不清楚。从现行的价格出发恐怕也不合适，因为没有理由相信在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均衡价格不会出现巨大变化。而新产品问题又使得上述问题愈加复杂化。计划者不知道应该生产哪些新产品，生产多少。在这种制度下，再也没有私人部门作参照物，所以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作比较，也就失去了指导意义。

对计划问题的“竞争性解决方案”提出的批评，被哈耶克发展成了一套迥异于30年代主流思想的竞争理论。完全竞争理论关注的是均衡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没有哪个企业能够左右价格，而哈耶克关注的是竞争对手。竞争的精髓在于企业相互竞争，发现组织生产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手段，使个体企业分散作出的决策能够相互协调。价格所传递的信息是制定决策的人获取不到的。竞争不仅是促使经济向均衡状态移动的手段，也是发现做事的新方法的过程。

福利经济学（1930～1960年）

经济核算之辩与30年代兴起的另一场争论交相辉映。这一次争论的是福利经济学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认为，对个体之间的福利进行比较缺乏科学基础。人类虽然无时无刻不在作这

样的判断，但不应该构成经济学科学的一部分。这个论调损害了福利经济学的剑桥传统的基础，需要重新构筑这门学科。于是“新福利经济学”应运而生。发起人有兰格，还有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较年轻的一群同事们，其中较著名的是希克斯、阿巴·勒纳（Abba Lerner，1903～1882年）、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年）。新福利经济学和核算之辩有着密切联系，因为不考察清楚资源有效配置是个什么样子，就没办法询问社会主义能否有效率地运行。兰格是市场主义的设计师之一，也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功臣。

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它发展了一个概念，伊恩·利特尔（Ian Little，1918年～ ）1950年把这个概念称作“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效率”（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根据帕累托的描述，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不损害某个人的福利，另一个人就不可能增加福利。30年代，希克斯、兰格、勒纳等人研究出实现这个状态必须满足的条件。但是，帕累托最优这个标准及其相关的帕累托改进（某个改变能至少使一个人改善福利而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的概念存在一个问题。它们没能对现实世界的政策变化提供任何指导，实际上，任何政策变化总是有益于某些人而有损其他人的。人们需要更强有力的一个标准。

希克斯和卡尔多再次从帕累托思想中吸取了一个概念，试图引入“补偿检验”这个概念来强化帕累托标准。假如发生某种改变后，受益人在补偿受害人之后仍然增进了福利，那么这个改变就是有益的。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结果就是“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当然，这不会是真正的帕累托改进，除非真的作了补偿；

但他们认为补偿检验这个概念提供了一个途径，使有效利用资源这个问题可以和收入分配问题分离开来。但结果证明这个概念是有缺陷的。蒂博·塞托维斯基（Tibor Scitovsky，1910 年～）1940 年阐明，很容易找到例子证明，两种相反的情况都能通过补偿检验。说明它得到的结果是矛盾的。

展开讨论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从很多不同方面分析了社会福利问题，往往推导出了各种版本的社会最优条件。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虽然经济学家写的是“最优化”和“理想产量”，却从未明确社会最优条件下实现最优的是什么。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1914 年～）给出了一个回答。他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这个概念，指的是社会福利与决定它的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就这个函数本身来说，它毫无内容可言，只是说明社会福利是由决定它的变量来决定的。但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使人们可以用不同方法对这个问题加以分析。利用这个社会福利函数，人们有可能分析不同价值判断或道德标准的含义。例如说，个人主义意味着唯有影响个人的福利水平的变量才纳入社会福利函数。帕累托标准的含义是，其他人福利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某个人的福利增加，则社会福利必定增加。利用这样的论点，就有可能澄清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的含义，可以解决围绕补偿检验的各种矛盾。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学家对福利经济学展开了广泛研究。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1951 年）提出了一个和伯格森大不相同的社会福利函数，从而对福利经济学作出了全面调整。阿罗对社会福利函

数的想法和选举机制有些相似。每个选民都偏好某个政治党派，而选举机制就是把这样的个人偏好转变成社会选择（选择一个政府）的一种规则。可以选择的机制既有简单多数选票机制，也有复杂得多的选票程序。阿罗看待社会选择问题，一如从个人角度思考如何按社会的决策来组织社会。

阿罗探讨这个抽象问题的时候，总是举出一系列选举程序或者社会选择函数必须满足的条件来，如“A 与 B 之间，每个人都偏好 A，则应该选择 A”（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原则），“谁都不应该当独裁者”，等等。他接着证明，虽然每个条件都看似非常合理，但没有哪个社会福利函数会满足所有条件。这就是他的所谓“不可能”定理。这个定理推动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领域的出现，即社会选择理论，它和政治分析家们的选票分析有着密切联系。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阿罗和杰拉德·德布鲁一起，把现在所称的两个“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作成了方程式，使 30 年代新福利经济学的发现有了正式的形式。第一个定理是每一个竞争性均衡都是帕累托优效配置。换言之，在竞争性均衡下，不可能使任何人增加福利而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第二个定理从另一个方向来分析问题。即资源的任何帕累托优效配置状态都可以导致竞争性均衡，条件是收入得到合理分配。

阿罗—德布鲁定理创造了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顶峰，而他们俩也创造了一般竞争性均衡理论的巅峰。他们明确了完全竞争作为资源配置方法的种种好处。但他们的局限性在于，帕累托最优是一个非常经不起推敲的最优性标准，并且，他们也没有说明

某个最优标准未得到满足时会发生的情况。比如说，如果别的几个行业存在垄断的情况下，撤销某个行业的税收，使其恢复正常的经营动力，对社会有没有好处？1956 年，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1928 年～ ）和凯尔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1924 年～ ）得出了“次优”理论，指出一般而言，不是所有最优标准都能得到满足。如果经济的其他部分发生扭曲（比如垄断或税收），那么取消一种扭曲状况很可能使全局发生恶化。

这些学术进步使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福利经济学看起来前景惨淡。新福利经济学没能提供任何比帕累托最优更好的福利标准。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没办法使人们接受从个人偏好推导出社会偏好的方式。利普西和兰开斯特渐渐摒弃了认为零敲碎打的改革能证明对社会有用的想法。阿罗和德布鲁确立了完全竞争和帕累托优效之间的精确关系，但就总体而言，对于现实的政策变化是增加还是降低社会福利，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指导。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新”福利经济学代替了西奇威克、马歇尔、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并不意味着旧的问题被忽略不计。1951 年，萨缪尔森推出了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是像灯塔、健康的环境、公开的焰火表演这样的服务，只要提供这种服务，就是为所有人提供的。人人都从中受益，而且一个人的收益并不削减他人的收益。（够得上“纯”是说这些条件描述的是理想状态。比如说交通堵塞的情况说明，高出一定点之后，许多物品不再展示这些特

性。）如萨缪尔森所言，公共物品的重要性在于，这些物品的供应量一般会少于社会的需要量。虽然人人受益，但没有人愿意为此付账。类似的问题随着外部性（主要以污染为例）一起出现，它是说一个人的行为伤害（或可能有益于）第三方。

公共物品和外部性都是市场失灵的例子。市场失灵是说竞争性市场没能按照帕累托优效的方式配置资源。如果没做到帕累托优效，说明各方都赞同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至少可以有一人增加福利）。这些概念一直被广泛用于评判政府干预。有些物品，市场不会提供足够数量，那么政府有责任提供。还应该利用政府的权力征税，以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20 世纪 60 年代，配合着这样的信念，人们还相信，政府必须从宏观层面上进行干预，以保障充分就业。然而自那以后，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一直遭到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随着后来所谓的“科斯定理”出现的。这个定理是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60 年提出的。科斯的看法是，庇古等多数人对外部性的讨论都没有考虑到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框架。科斯认为，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不怪竞争失灵，而要怪没有对财产权给予清晰的定义。如果明晰定义财产权，市场就可以发展到保证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例如，如果明确某条河流的使用权，那么想污染河流的工厂主就会和希望在清水中垂钓的渔民就允许的污染程度进行磋商。如果工厂主有权使用这条河流，渔民可以付钱给他（她），以限制污染；如果渔民有权利，工厂主可以买下污染权。科斯带着这样的见解，比庇古看到的市场范围更大，国家作用的范围更狭窄。

第二个挑战大约也是1960年，随着关于选民、政府、官僚行为的各种理论的发展而出现。它针对的是对政府作用的传统看法。这些理论是由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年～）、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1922年～）、曼柯·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年）、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1930年～）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他们摒弃了政府是参与公益活动的无私组织的看法，代之以这样的观点，认为政府是由谋求个人利益的一群人组成的。政治家提出能在选举中得到最多支持的政策。经理人则运营他们的组织，好提高自身地位和收入。人们渐渐地把税收和政府支出看成竞争各方表现自我的政治性过程的结果。于是渐渐地，政府失灵这个概念和市场失灵放在了一起。

小　结

至少从18世纪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关注，市场机制是不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有效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一直在关注福利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主题是，天赋自由制度，抑或后来所称的自由竞争，能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提高福利水平。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生产者提供公共物品，虽然他们只关心如何增进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关于竞争和经济福利的原理。

到了本章所讲的时期，人们对福利经济学的认识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边际效用理论提供了分析市场的新方法。经济学家开

始注意人类能获得的资源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而对资源增长的关注退到了幕后。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思考竞争。斯密的天赋自由观点把竞争看做与他人积极开展竞赛，现在，人们开始把竞争当做市场权力（即影响价格的权力）出现真空的一种状态。经济核算之辩正是这种改变的写照。市场主义者捍卫的理由是，人们有可能设计出一种制度，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他们旗开得胜了。但他们没有看出，对于竞争所涉及的内容以及如何判断经济制度的有效性问题，米塞斯、哈耶克和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持不同见解。

经济学家也正在努力使经济学更加“科学化”，一如这门学科历史上常发生的那样。20 世纪 30 年代，很多经济学家对此的诠释是，应该把价值判断从这门学科的核心去除掉。这一点他们可能受到了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论点的影响。这些论点被艾尔[①]译成精彩的英语，推向英语世界。西奇威克、马歇尔和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遭到猛烈批评，以帕累托最优原则为基础的新福利经济学取而代之。然而，新的学派也没能得出明晰的结论。帕累托标准作为福利经济学的基础，实在太不堪一击。不过，阿罗—德布鲁定理揭示了竞争性均衡的有效性，它有可能声称，斯密关于无形的手的问题如今得到了确凿的证明。但人们不大注意到，对无形之手的理论的解释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它不再像斯密所说的那样，论述现实世界里竞争对手的动态效应，相反，它变成了缺失市场权力的抽象世界里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原

① 艾尔，A. J. Ayer，1910～1989 年，英国哲学家，新实证主义代表，英国科学院院士，著有《语言、真理和逻辑》。

理。

从20世纪70年代起，形势又开始变化了。我们已经提到布坎南、塔洛克等人的著作。除此以外，社会选择理论作为一门抽象的学科，在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深刻影响下，在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科学之间的某一个地方蓬勃发展起来了。约翰·哈桑伊（John Harsanyi，1920年～）、阿马提亚·森（Amartya Sen，1933年～）等理论家们揭示的问题中，既包括有没有可能测量个人效用的问题，也有私人权利的属性，以及社会决策赖以为基础的道德标准问题。更广泛地说，经济学家开始使用模型来揭示不同价值判断下的结果，而不是给出一个去除了价值观的科学。

人们对市场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70年代中期，“奥地利”经济学派重又兴盛起来。它作为传统经济学的替代物，以截然不同的知识观念和市场过程观念为基础，得到了大力推进。然而，虽然这种研究方法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且哈耶克在业界再次声名鹊起，它仍然是非常小范围的一种学科传统。而主流经济学家们正开始构筑在不确定未来和资源稀缺条件下的模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年～）论证，一旦引入信息，市场就不可能完全有效。只要有人试图利用他所掌握的信息（比方通过股票交易），这种交易行为会向他人暴露信息，从而降低其价值。研究显示，不同机构所获得的信息之间的差异会产生与完全竞争理想状态下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银行如果不能对它所贷款的企业的业绩予以合理监控的话，那么保持较低利率和限定借款人就是理性的选择。经济学家也试图构筑更加动态化的竞争模型，在这样的模型中，企业之间积极竞争，努力抢先

取得新技术的专有权。

事实证明，本章所述的经济学的种种进步没能为社会转变提供设计上的帮助。人们可能说，改革家需要的最大教训要到亚当·斯密的书里面去找，是他强调任何资本主义制度都必须安排一个安全的法律、道德和财产权框架。经济核算之辩和大多数福利经济学完全没有领会这一点。

经济学家与政策
（1939 年至今）

经济学职业的作用在扩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这个职业一直在飞速成长。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和研究生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这既反映了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增长，也说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数在普遍扩大。对学士和博士生的需求不仅来自学术界，也日益来自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而在大战以前，经济学家一直作为技术专家受雇于人，其雇佣范围不为人知。随着这些变化，人们对这门学科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

为什么在很多国家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这门职业发生增长的分水岭？因为正是在这时候，经济学家第一次在政府确立地位。在美国，劳夫林·柯里 1940 年当上了总统经济顾问，他是第一位被委以如此重任的经济学家。随着 1946 年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立，经济学家在美国政府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它的作用

范围和效率随着经济趋势和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变化而波动，但它的存在说明经济学家已经取得了新的地位。效力于委员会或者和它有联系的经济学家中，有一些人成了战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们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24 年～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18 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1941 年在战时内阁秘书处成立了经济组。但是这个经济组和以后代替它的政府经济局在战后保持了小规模，只有 20 人左右，直到 1964 年才有所改观，到 1970 年，雇用人数猛翻了 10 倍。随着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日益参与国民生产核算和经济统计活动，统计学家的人数也在大幅增长。

国际组织也雇佣了经济学家。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ILO）都有过雇用经济学家的先例。国际联盟还曾赞助哈伯勒、丁伯根从事经济周期的研究。1945 年以后，这样的组织急剧增加，与此同时，经济学家的雇用数量也猛增。除了战前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以外，还有设有地区性办事机构的联合国，另外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前身是国际重建与发展银行）和关税总协定（GATT）。接着还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前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

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实际政策问题，经济学家并不总是具有影响力。虽然这些组织的基本目标是技术性的，身处其中的经济学家还是从事了重要的经济研究工作，包括理论研究工作，能对经济思想产生影响。雅克·波拉克（Jacques Polak，1914 年～ ）就是一例。50 年代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在

汇率和货币对于决定一国国际收支的作用的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劳尔·普雷比什（Raúl Prebisch）又是一例。他在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工作，发展了一套关于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

世界银行在发展早期，更多地关注如何确立它作为一家合理的银行机构的信用，而不是应用经济分析，结果如其他多数国际组织一样，经济学家靠边站。直到 60 年代，局面才有所改观。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1916 年～）1965 年到 1969 年任期内，雇用经济学家的人数从 20 人增加到 120 人。麦克纳马拉还鼓励人们这样思考：既然世界银行的贷款和任何国家的总投资量相比，永远是个小数字，那么传播思想就成了它的重任。于是，经济研究的重要性提升了，截至 90 年代初，世界银行雇用了约 800 名经济学家，其中很多人从事的研究可以和大学相提并论。哪里都不会有这么集中的经济学家群体。由于他们都在研究和发展问题有这样那样联系的课题，其影响引人注目。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计划

经济学职业发生的上述变化和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但这中间的联系并不简单。凯恩斯的《通论》极大地促使人们认为，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对监控经济活动水平负起责任来。发展国民收入统计也极其重要。人们能利用利率政策和政府支出、税收上的变化，把失业率维持在低水平。20 世纪 40 年代，美英两国都曾明确表态要实现充分就业。不过也没必要扩大凯恩

斯主义思想对这些进步的影响。罗斯福早在凯恩斯的书出版前4年就开始实施新政了，他的新政多归功于大力倡导经济计划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oxford Tugwell，1891～1979年）。30年代，制定政策的那个圈子里在广泛探讨“美国计划”这个概念，它和前苏联或纳粹德国的计划不是一回事。同样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两国的情况都说明，可以利用经济计划来实现国家的目标。经济学家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为盟军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一大批经济学家（或日后进入经济学界的人）在战时承担了统计学家的工作。虽然他们处理的是技术问题，诸如控制军火产量，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运输资源，甚至设计瞄准器等等，但他们开发的分析手段，他们的研究态度直到战后还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影响。

更深入的原因是，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横扫各大学，政府却抱着抗拒的态度。1940年，英国沿着凯恩斯的思路引入了预算报告。凯恩斯在1940年的《如何为战争付款》中描述过膨胀性缺口这个概念，它被英国用来核算不引起通货膨胀时的支出量，以及为避免通货膨胀而应该从经济中征的税收和补偿性储蓄。但是可以说，凯恩斯主义思想直到1947年才完全被财政部接受。而在美国，一直到60年代，肯尼迪任期内，政府才系统性地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至于欧洲大陆的大部分疆土（特别是法德两国），凯恩斯主义思想从未占据政策安排日程的主流。

两次大战间隔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账户和统计设备发生了革命，政府这才有可能在战后几十年中采用这种宏

观经济计划。英美两国的战时经验清晰地说明，国民收入分析可以构成宏观经济计划。在英国，米德和斯通估算了国民收入，用它来核算膨胀性缺口。在美国，库兹涅茨和内森用国民收入来表述罗斯福的“胜利计划”，他在计划中承诺，1942～1943 年间军火产量的大幅增长是可以实现的（的确实现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军事装备的需求量剧增，库兹涅茨和内森继续采用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但这时的目标不得不调低一些了。负责国民收入核算的吉尔伯特一心一意提供能即时反映战争经济状态的信息。

人们把库兹涅茨和内森的工作说成“经济学学科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胜利”。事实证明他们设定的目标可行，四年间军火产量从占美国国民收入的 4% 上升到了 48%。它不仅对于打胜仗是个不可估量的贡献，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用国民账户工具是可以制定经济计划的。它几乎是把军事装备的生产推向了一门科学：如果需求量太少，战争就会不必要地拖延下去；如果需求量太多，生产成本就会上升，产量却不增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国民收入核算在经济计量模型中相遇了。60 年代，电子计算机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和丁伯根、克莱因的早期模型相比，这些模型不论规模还是复杂程度都在增长。1964 年，克莱因以季度数据为基础做了一个美国经济模型，它由 37 个方程式组成，大概还使用了比原先更加高级的统计手段。模型规模之所以增大了，是因为克莱因为各种变量做了详细得多的模型，比如消费，分解成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投资方面，克莱因考虑了库存和新的订货。不过，最核心的发展还属 1965 年初次发表的布鲁金斯模型。这个模型最初有大约 200

个变量，以后发展到超过400个，和小模型相比，它能对经济条分缕析。比如说，它设了单独的方程式，分析汽车销量和食品、饮料开支。住房也和非住宅建设有所区分，另外还分析了几个行业。同样重要的是，它是各大学、各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合作研究的结晶。此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还出现了一系列规模相当的模型。与早期的模型不同的是，好几个新模型是由商业组织做出来的。这样一来，人们不再重视开发新手段和发展新概念，转而强调要让模型保持最新版本，好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预测信息。人们企盼的是，利用日益精细的模型，采用日渐复杂化的统计手段进行估算，能得到更加精确的预测结果。这样的发展在世界各国大同小异。

这些模型在大的架构上都是凯恩斯式的，但也有例外。它们都把物品、服务的总需求模型化，而且做得十分详尽，照着国民账户分解成很多类。这些账户采纳凯恩斯式的分类法，分成消费、投资、政府在物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进出口。每一类又分成更细的类别。总需求水平决定国民收入，这是核心；而其他方程式决定生产能力、物价、工资、利率等变量，是补充。

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明。发明人是菲利普斯（A. W. Phillips，1914～1975年）。他曾经是工程师，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转学经济学，发明过“菲利普斯机器”，这是一个由透明水箱组成的系统，彩色的水借助泵的力量通过这些水箱，水的流动反映凯恩斯主义系统中的收入流。这就是可以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水利凯恩斯主义”，用水的流动比喻收入的循环移动。菲利普斯曲线发表于1958年，它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

在负相关，高失业率和低膨胀相联系，反之亦然。由于不论膨胀率高到什么程度，失业率都不可能低于零，再加上即使当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达 20%，工资也只是略微降低，所以这条线是个曲线，不是直线。

菲利普斯曲线是菲利普斯从英国数据中发现的经验性的一种关系。但它很快被利普西赋予了理论上的解释。1960 年，利普西还对这个曲线的独特形状作出了解释。他的解释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如果任何物品的供应量超过需求量，其价格就会下降，一旦需求量大于供应量，价格会上涨。这就是说，工资膨胀率和劳动力供求缺口之间存在负相关。经过所谓“摩擦性失业”（由于人各有异，在寻找合适的工作过程中发生磨合所造成的失业）调整的失业率，是衡量劳动力供求差异的一个手段。

同一年，萨缪尔森和索洛发现了美国也存在类似的关系。他们还论证了，菲利普斯曲线可以提供考虑经济政策的一个框架。政府要平衡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但它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和政府支出、税收上的变化来达到曲线上它偏好的某个点。有些政府或许乐意以高膨胀率为代价选择低失业率，另一些则偏好低膨胀，情愿发生高失业率。

菲利普斯曲线和政策的制定有关，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如此热情地接纳了其中的思想的原因之一。当然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其一，它“闭合”了当时所用的宏观经济模型，使人心悦诚服。IS－LM 模型一度成为决定产量和就业水平的标准模型，但它没有解释物价水平，而菲利普斯曲线补上了缺失的这一环，使模型得以完整。只要大型经济计量预测模型是沿着凯恩斯主义思路塑

造的，菲利普斯曲线就对它们起到同样的作用：把菲利普斯曲线补充进来后，这些模型能预测物价，而这显然正是人们需要的。其二，60 年代期间，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接触到大型计算机，他们从事经济计量研究的过程中，多了一项理想的日程安排，那就是估算菲利普斯曲线。人们很快发现，菲利普斯曲线原来的公式没办法配上非常合适的数据，于是经济学家呕心沥血，添上了新的变量，修正了方程式的形式，从而完善了这个曲线。

通货膨胀和货币主义

60 年代见证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高潮。当时的美国正处在肯尼迪总统治下。60 年代末，人们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把经济向充分就业的方向推动。可当时正碰上越南战争日益升级的形势，军费开支大幅增长。而在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世界的其他角落同样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开始发生快速的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从 1944 年开始实施的，在过去的 1/4 个世纪里，它曾经固定了汇率，现在它的瓦解意味着各国可以不必担心扩张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了。这次高涨有一个重要特征：商品价格上涨了。1973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达成了削减原油供应量的协议，从而为这次涨价推波助澜。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赎罪日战争[①]更是中断了石油供应。结果，1973 年 10 月，油价上涨 66%，1974 年 1 月，油价再次翻番，到处石油告急。此外，

① 赎罪日战争，指 1973 年 10 月 6 日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游击队对抗以色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由于石油收入增长太快，石油输出国还来不及花掉，所以石油进口国突然出现了需求短缺状况，它们的国际收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逆差。全世界一头栽进了衰退状态。

这一次萧条很独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发生增长。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负相关消失了），而凯恩斯主义理论不再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充分的框架了。失业率提高，暗示着应该增加支出，高通货膨胀率又要求降低支出。接下来还有一个后果。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渐渐明白，曾经用来作预测的大型经济计量模型不那么好用了。经济学家分析现状的思路发生了严重错误。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界对货币主义着实产生了兴趣。它的阐述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 年～）。

弗里德曼从 1956 年的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起步，一直努力唤醒人们对货币数量论的兴趣。这个理论讲述了货币数量（流通中的货币存量加上银行存款的存量）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这和当时的凯恩斯主义舆论反其道而行之，后者是强调财政政策胜于货币政策。弗里德曼通过大量的实证工作，试图证明货币、物价和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个努力集中体现在他与安娜·施瓦茨（Anna J. Schwartz，1915 年～）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 年》（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 年，1963 年）中。他还特别论证了，货币供应量不是被动地对经济的其他发展作出反应，相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施加了强大影响。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会增加产量，但产量终将回归到初始水平，唯一的影响将是在物价水平上。然而人们

不可能利用这种关系来控制经济周期，因为货币变化的影响唯有经过很长并且不可预测的一个时滞，才能为人所感知。假如央行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其影响恐怕一两年以后才感觉得到。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制定政策目标，防止货币成为干扰源，而实现目标的途径是，确保货币存量以持续、已知的比率增长。

1968 年到 1973 年间，许多政府允许增加货币供应量，在这种背景下，弗里德曼对通货膨胀的分析显得十分有说服力。1971 年左右，发生了快速的货币扩张现象，大约两年之后，发生了同样快速的通货膨胀。（1973 年的通货膨胀显然和当年的油价上涨有关，但是货币主义者可以论证，要不是因为货币扩张，物价不会上涨这么多。）因而整个 70 年代，一届届政府摒弃了凯恩斯主义，开始贯彻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目标。有些国家，比如英国，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协助完成这个过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货币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还只是颠覆凯恩斯主义舆论的一小步。三大理论进步至关重要，它们是弗里德曼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凯恩斯主义预测模型失效、理性预期。第一个理论是弗里德曼用来替代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的。他在 1967 年向美国经济协会发表主席演讲时提出了这个理论。他的论点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没有得到正确的说明。人们就工资水平协商的时候，要紧的不是货币工资率，而是实际工资率。就是说，他们对工资讨价还价的时候，会考虑到预期中的通货膨胀。如果人们预期通货膨胀是 5%，会比膨胀率为零的情况下要求多 5% 的工资。于是，一旦通货膨胀率上升，菲利普斯曲线就会上移同样的百分点。这就意味着，

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平衡。

弗里德曼声称，存在一个单一的失业率，即自然失业率，它是和持续的通货膨胀率相一致的。他认为，假如政府试图把失业率定在自然失业率之外的某个点上，通货膨胀率就会无休止地上升或下降。不可能以高膨胀率为代价换来低失业率，只能是以持续加速的通货膨胀率作代价，等到达一定点之后，就无法支撑了。政府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它们或许能短期内（趁人们还没明白通货膨胀的情况）影响失业率，但不可能持久。失业率最终会回归到自然率的状态。这个观念彻底侵蚀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

有趣的是，人们发现，原先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发明人，菲利普斯、利普西、萨缪尔森、索洛，早都心知肚明，工资的增长有赖于预期中的通货膨胀。他们的经济理论说得明白无误，只是60年晚期还没有在数据上发现这样的关系。通货膨胀率很低，波动也很小，所以察觉不到预期和工资增长之间有任何联系。所以他们从方程式中省去了物价膨胀这个因素。但到了7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上升了一段时间，经济计量研究开始揭露，预期的通货膨胀对工资有显著作用，之后的70年代中期，研究发现，正如弗里德曼预测的那样，它们之间强烈相关，从而为弗里德曼的学术地位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因此，70年代末，经济学家开始承认，长期内菲利普斯曲线肯定是纵向移动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平衡关系。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巩固了弗里德曼早先的货币数量论论点。只要政府控制不了失业，面临加速的通货膨胀的危险，就

大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它们可以控制的变量，即通货膨胀率。后来，卡尔·布鲁纳（Karl Brunner，1916～1989年）把他支持的这个学说取名为“货币主义”。虽然这个学说讲的只是货币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但很多支持者把它和对于自由市场和非干预主义的更一般意义上的支持联系起来，弗里德曼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渐渐地，“货币主义”和私有化、取消管制、削减所得税、减少社会福利供应等措施联系到了一起，在非经济专业人士心目中更是如此。80年代，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期间，曾努力贯彻所谓的“货币主义”政策，但她采用的措施（即削减政府支出）和弗里德曼所倡导的相去甚远。这时，货币主义这个词汇的含义愈加宽松，几乎变得没有意义了。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刚刚过去，宏观经济剂量预测模型开始胡乱预测了。人们引入了新的方程式，对现有模型进行重新设计，却收效甚微。人们渐渐明白，虽然对模型投入了大量心血，但其效果并不比原先简单得多的模型突出多少。其中的原因，罗伯特·小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1935年～）1976年给出了解释。后来所称的“卢卡斯评论”中有一个核心论点，即私人部门的行为是由人们对政府未来行为的预期决定的。例如，消费模式就是由消费者预期的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决定的。就是说，当整个税收政策发生变化，根据一个税收制度估算出的消费函数就不再有效。所以，即使说60年代塑造的预测

模型对当时的经济运行作了精确记录，等到70年代，政策发生变化，它们的崩溃就是注定的了。卢卡斯总结道，该需要另一种模型了。

从1972年开始，卢卡斯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证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应该是，个人完全理性，能利用摆在面前的一切机会。他这么解释的意思是，所有市场都必须照着均衡状态，即供求相等，来构筑模型。例如一旦供给大于需求，有些供应商就无法把想卖出的货售光，于是他们有动力削价竞争，导致价格下降，从而使市场归入均衡。所以假设市场不均衡就等于假设人们不完全理性。同样，卢卡斯还认为，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他们预期的时候会考虑到自己获知的所有信息。卢卡斯在这里补充了一个新思路，认为塑造模型的人应该假设一点：模型中按自由意志行事的人是了解其模型的真实结构的。可以有几种方法为这个假设作辩护，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如果不这么假设，自有人就会犯错误，改变行为。因而只有人们了解经济的真实模型，才能实现均衡。

“连续的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这两个假设有着戏剧性的暗示。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人们失业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但上述两个假设侵蚀了这个思想观念。它们的暗示是，只要人们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就找得到工作。其实他们是“故意”失业的，因为他们认为从工作中得到的工资回报不足以补偿他们损失的闲暇。产量和就业率的波幅增大，是因为经济发生了意外的震荡，使人们错误地估计了通货膨胀。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对政策进行系统性的调节，例如遵循失业率高时扩张经济，失业率

低时紧缩经济的原则调节政策，是没有效果的。这样的原则是可以预料的，因而不会影响产量。私人部门会预先采取措施应对政策变化。

经济周期是对这样一个理论的主要挑战。虽然没办法十分精确地预测产量的变化，但经济一般大致遵循高涨和衰落的周期性模式，而且一个周期持续几年。70 年代，卢卡斯试图把这个现象解释成货币震荡的结果。一发生货币震荡，需求就提高或降低，使人们犯下导致产量围绕长期趋势而上下波动的错误。人们投入大量精力测量这些震荡，并解释它们何以产生与现实世界里观察到的相类似的波动。最后，人们放弃了卢卡斯的解释，接受了用“真实”震荡来解释周期的方法。这个真实震荡主要指技术震荡，新发明等。于是，法因·基德兰德（Fynn Kydland，1943 年～）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 年～）率先推出了“真实的经济周期”理论。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卢卡斯的理论一样，特别是关于连续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不同之处在于，它对系统发生震荡的原因的假设不同，而且它采用了一组新的经济计量手段（所谓的“调整”手段）。

世人所称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出了极端的政策性结论，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质疑，但它的主旨，即经济模型应当假设人们的行为完全理性，广为认可。70 年代，凯恩斯主义者们还一直在揭示市场总是处在不均衡状态，商人面临定量配给，现在他们改变了研究战略。他们开始寻求对失业的新解释，以便不破坏假设的合理性。他们用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竞争来构筑模型。不对称信息是指，除非雇佣一个工人，否则企业不可能知道他

（她）的生产力有多高。不完全竞争是说，企业或联盟有权力影响其买卖的物品价格。这些模型的基础是新古典主义的主要假设，但得出的结论是凯恩斯主义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它是微观经济学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第一，分析这些问题所要求的数学难度越来越高。人们作了足够简单的假设，以便不论在分析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能应用严格的数学手段。第二，个人行为按最优化的模式模型化了，即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这样一来，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一切都建立在技术和个人品味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个研究私人企业和家庭的行为，另一个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影响的结果之一是，这两种经济学不再有差别。

发展经济学

有个领域展现了和宏观经济学的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发展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以其现代形式出现了。日后当之无愧的西方大国——美国——反对殖民主义，从 40 年代起，许多殖民地获得独立，通过联合国取得了政治上的发言权。从此，两次大战间隔期间兴起的“殖民经济学”，强调宗主国资源发展的经济学，显然落伍了。二次大战期间，人们也曾关注过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 – Rodan，1902 ~ 1985）曾经以不发达经济理论为目

标，关注过东南欧的问题。科林·克拉克和西蒙·库兹涅茨的统计工作第一次解释了穷国与富国之间收入差距的程度。最后，北美和西欧国家政府一直在饶有兴致地分析和采取可能促进世界其他国家增长（和资本主义）的措施，从部分意义上，这也是响应和前苏联展开的竞赛。联合国的众多机构从一开始就承诺实现经济发展，以后世界银行的职权范围从“重建”扩展到包括“发展”在内。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变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发展问题的早期理论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如果不施以援手，经济可能陷于大规模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局面而无力自拔。同样，人们认为不发达国家一直陷在困境中，需要援助才能摆脱困境。（“不发达国家”是当时的称谓，一直以来，对穷国的委婉说法有“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第三世界”，最近又有“南方”这个称谓。）

关于这个领域，有好几个理论。其中最普遍的一个理论关注的是经济整体增长和某个经济部门的增长之间的差异。假如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企业）要进行扩张，很快它就会碰上一些障碍，比如市场对其产品缺乏需求，缺少熟练工人等。相反，如果有可能发动整个经济进行扩张，那么每一个行业都能为别的行业的产品创造需求，能贡献出大批熟练工人，为各行各业所用。世界银行建行初期，罗森斯坦—罗丹曾任经济顾问，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1907～1959 年）曾是国际联盟的经济学家，战后成为平衡增长的倡导者。他们俩的理论背后就隐藏着这样的

思想。

对不发达现象的解释并不属于这个类型。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劳尔·普雷比什是这样解释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的：工业国是“核心”，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品；穷国身处“外围”，初级制品是主要的出口品，两者交往中的关系不平等。工业国的工人们谈判力量很强，生产力带来的收益使他们的真实工资得以提高。而不发达国家的工人就没有这样的谈判力量，也无法将生产力收益转化为提高的工资。所以工资维持原状，物价下跌。这样的差别使初级产品和工业产品相比愈加便宜，交易条件也就越来越有利于工业国，身处外围的国家也就越来越难逃贫穷的厄运。普雷比什的结论是，一国要发展，必须借助国家干预来发展工业（借助关税壁垒来保护），以便和现在进口的商品竞争，这就是“进口替代”战略。

另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二元”发展理论。例如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15～1991 年），他区分了经济中的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现代部门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采用机械化的生产手段；而传统部门依赖家庭关系，即使成员的存在并不增加产量，也要确保人人有饭吃。就这样各部门经济四分五裂，其表现特征是传统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是由现代部门的增长推动的。劳动力从生产力为零的部门流动到更有生产力的部门。

这些理论很少有哪个没有遭遇挑战。“大推进”平衡增长理论就曾遭到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15 年～）的强力挑战。他认为，必须有非均衡——不平衡的增长，才能实现

发展。某一个行业的扩张会为其他行业创造机会，会推动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普雷比什的理论也受到了挑战。他所说的商品价格下降的趋势，有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持，这一点争议很大。二元理论遭到的指责是，理论所要求的部门差距实际上是很难鉴定的，对此，它显得苍白无力。

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结构性”理论。它们把不发达问题要么归结于经济本身的结构，要么归罪于世界经济结构。这些结构性特征说明，光靠市场机制是不足以确保发展的。必须制订计划，某些形式的国家干预也是必需的。这一点在两个方面和凯恩斯主义的视角合上了拍。其一，人们把不同类型的理论视为针对不同问题所需。正如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才把宏观经济学划为和微观经济学有所不同的学科一样，发展经济学也是为了专门研究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才设立的。其二，人们相信，对市场不能听之任之，要想使市场经济朝着有益的方向运行，必须有政府干预。

然而在 70 年代，关于发展的这种思维方式受到了冷落。制定发展规划的种种努力，进口替代、出口鼓励也好，平衡或不平衡的增长也好，创造非均衡也好，都差强人意。并且，人们越来越明白，“发展中”国家根本不是一类。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面临的问题和东南亚或拉丁美洲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人们更加明确，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减少贫困。经济增长的结果可能只是，在贫穷的层层包围中，出现了一个富裕的现代部门，而穷的还是受穷，甚至更糟。同时，意识形态上也出现了转变，开始摒弃计划，而偏向于对市场给予更多关注的解决方案。新加坡、韩

国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也有权威性很强的政府干预各行业的经济生活，但那里涌现了经济发展的大量成功案例。许多结构性发展理论假设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不同于发达国家，这么一来这个假设站不住脚了。于是，人们越来越多地应用分析发达国家问题的方法，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是根据理性的认知来行动的。

所以，解决发展问题的方式在 70 年代出现了显著变化。往往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一些主流理论，渐渐让位于十分倚重物价的微观经济理论。1969 年，伊恩·利特尔和詹姆斯·米尔里斯（James Mirrlees，1936 年～）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写了一本项目评估方面的指南，提出了一些得到广泛应用的手段。其中认为，不应该按市场价格评估项目，这样会造成严重偏差，应该按能反映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约束的“影子价格”来评估。“有效保护”这个概念也是在类似的情境下，于 60 年代首次提出的，并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经济学家还对贫穷这个概念给予了更多关注，纷纷找寻更好的衡量办法。“基本需要”指数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它考虑了营养水平、死亡率和识字率等因素在内。经济增长固然仍然重要，但不再是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了。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样，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例如 70 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采用了风险和不完全信息模型。80 年代，发展经济学再次跟随宏观经济学的脚步，把理论工具扩大到包括不完全竞争理论和最新发展的增长和贸易理论在内。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两个领域一起发生着变化，当然差异还是有的，就连国际组织内部，也有差异。例如，70 年

代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采纳了利特尔—米尔里斯项目评估模型和成本—效益分析法，世界银行就没有采用。

80 年代，世界银行在确定发展日程的过程中，其作用日益凸显，这是 80 年代的一个主要进步。它摒弃了早先只向特殊项目贷款的政策，引入了“结构性调整贷款”。这是为了帮助各国在不妨碍增长的前提下摆脱中期国际收支问题而设计的贷款。贷款条件是，借款国要实行改革计划，包括允许由国际市场决定汇率和利率，降低公共部门的规模，放开市场管制，取消对投资的控制等。这个措施的思想基础是，要取得发展，需要有自由市场和以贸易为导向的发展战略。80 年代发生的债务危机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局势恶化，而世界银行坚持要求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为条件贷款，引起了很大问题。一些人批评世界银行的做法，认为结构性调整政策是把调整的重担压在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身上，它往往引起失业和公共服务的减少。而支持者强调，若想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样的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 1989 年到 1991 年苏联的解体，发展经济学的背景发生了更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们突然蜂拥似的关心起“过渡”和“新兴市场”问题来。在东欧和前苏联建立市场经济的情况，显然与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传统”发展中国家是一样的。人们相信，在长期内，确立市场经济将提高生活水平，但短期内会提高失业率，拉大贫富差距。

小　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技术性学科，其所有学科分支都系统地应用了数学方法。这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学科内容的转变，这期间人们提炼理论的目的是，要使理论变得能够用已知的数学工具来分析。就连“竞争”、“市场”、“失业”这样的基本术语的含义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发展只可能发生在学术环境之中，因为很多理论的发展即使和现实世界的问题有联系，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联系。试比较科学和医学的“基础”研究或“蓝天”（即没有任何特殊目的的）研究，就可以为这种疑问找到证词了。

经济学家日益技术化的同时，也在更加国际化。（很难讲清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但除了数学方法的传播这个原因以外，还有很多原因造成国际化。）很多经济学家仍可归属到某一个国家，但也有很多不是。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一位经济学家出生在某一国，在另一国（或两个国家）求学，然后在其他很多国家的研究所度过学术生涯。交流网络也越来越国际化。结果，经济学思想的国籍越来越难以界定，实际上它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从本质上说，经济学思想成了国际性的思想。即使有些学派贴上了国籍标签（如“奥地利”学派），仍然变成了国际性学派。

处在这个变化过程核心位置的国家是美国。各个大学日益按照美国模式塑造其教学模式，连拥有老牌学术机构的德国、英国

等国也不例外。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了美国教科书。以在知名杂志上发表文章为重点的美国式学术进步标准，也得到了推广。此外，由于美国学术系统陡然增大，其经济论文越来越雄踞各学术杂志，连欧洲的学术杂志也是如此。美国人赫然名列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的榜首，他们一直是这门学科最有影响的新思想的推动者。所以，说是国际化，不如说是美国化。但是和这个情况相对照的是，当前舆论所指的各种思想其实都深深地扎根于欧洲：德国 20 年代的数理经济学、荷兰人丁伯根的计量经济学、英国剑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另外，美国取得明显主导地位的一个原因是，20 世纪上半叶，大量经济学家从欧洲等地移居美国。造成学科转变的很多关键角色都来自英语国家或东欧。如果说经济学变得美国化了，那是因为美国的学术体系太大、太有钱、太开放。

然而这还只是经济学日益技术化过程的一个侧面。经济学家日益参与政府、国际组织和商业组织的活动，是另一个方面。人们逐渐把经济学家看成技术专家，他们的建议是制定决策的重中之重，这个变化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动。预测仍然重要，但远不止于此了。特别在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比别处更深，他们定期设计管制行业的规范，决定出售特许经营权的过程。90 年代期间，他们还深入参与了环境保护措施的设计过程。有些领域的思想是从学术界发展起来的，然后如人们所料，为在政府或企业任职的经济学家所用。当然，这样简单的关系也不是到处都有。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这两个领域所作的研究，很难分清哪个是学术界的成果，哪个是政府、

央行、国际组织的研究成果。政策问题一直是这两个领域的主流问题，大学和其他组织的经济学家们一直保持着互动关系，不同类型的机构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因此，两种组织的经济学家之间保持着一致性，例如在考虑货币政策和处理经济发展问题方面，央行的经济学家和学界人士的态度是一致的。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学术环境相当重要，在这个环境下，20 世纪后半叶涌现了各种经济思想。这期间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离不开这个环境。经济学家所担任的政策顾问的角色也不容忽视，某些特殊领域尤甚。

14

学科的扩张
（1960 年至今）

应用经济学

随着经济学的日益技术化和经济理论的日益抽象化和数学化，应用领域在遍地生花。早在 40 年代，熊彼特就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应用领域。第一类是货币、银行业等领域，人们普遍把这些领域视为一般经济学，但总是单独教授，以便得到更透彻的理解。第二类包括保险和精算，它们从经济学分出来，纯粹是出于历史原因。第三类是以公共政策为基础的领域，包括农业、劳动力、交通、公共财政等。最后两类混合了社会主义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研究和地域研究。他评价说：

> 这些个纷繁的应用领域，显然没有什么永久或符合逻辑的秩序。它们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边界线。它们此起彼伏，重要性此消彼长，受着兴趣和研究手段的变化的支配，发生相互重叠。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

用这段话来评论 20 世纪末的形势也是完全可能的。不过，20 世纪后半叶还是发生了些许变化。其一，经济学应用领域的划分逐渐制度化了。应用领域不再是在课堂上贴上的一个方便使用的标签，它开始反映这个职业的组织方式了。它们成立了自己的协会，有了学术会议和杂志，比 40 年代成熟得多。最明显的信号是，专业类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在应用领域工作的经济学家之间开始了频繁对话，远甚于和一般经济学专家的对话。

第二点进步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经济学有一个可以用来解决不同问题的理论“核心”。这个核心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然后和经济计量学（主要被视为统计手段的载体）一起，用于解决劳动力、发展、货币、公共部门等问题。这种等级制度体现在，大部分学位课程都要求学生先接受核心课程的训练，然后选修应用课程。这个进步的效果是两方面的。它为应用领域提供了明确得多的基础，而在 40 年代，核心领域和应用领域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与此同时，它又在特殊意义上整合了经济学。由于应用领域越来越以一个普遍的核心为基础，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差别明显缩小，这么一来，所有经济学家不论精通什么领域，都有了一个对话的平台。可以说，经济学家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下的各种方言。

这些应用领域各有各的历史。有些领域显然和学科以外的政治发展有关系。冷战时期，“比较经济制度”的作用是明显的。它多半要归功于早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但两者远不是一回事。虽然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

资本主义制度之间还存在着微妙的区别，还有待人们去理解，但集中分析如何选择两种制度的比较经济制度研究已经丧失了政治理由，让位于过渡经济学和新兴市场经济学了。和它形成对比的是劳动经济学。它的历史或许展现得更为连贯，像工资决定、劳动力市场组织这样的问题，常年受到大家的关注。而经济计量学这样的技术领域，由于采用的是一系列十分专业的，须经年努力才学得会的数学手段，无疑是以独立领域的面目出现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变化对经济计量学也有影响，比如人们要求经济计量学家回答的问题变了，但和技术性较差的经济学领域相比，它受到的影响较小。信息技术的发展或许要算影响到经济计量学最新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现代计算机技术开放了无数可能性，这在以前的经济计量专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经济学的扩张主义

应用领域取得的进步是明显的，特别是60年代以后，它的进步扩展了经济学的疆域。本属于别的社会科学的范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社会学和政治学范畴内的问题，现在也用经济学的手段来分析了。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30年～）曾应用标准的价格理论来分析犯罪和家庭这样的社会学论题。他把犯罪活动塑造成一个最优化问题，潜在的罪犯会估量犯罪成功时的收益和被逮捕、判刑时可能的损失。即使犯了罪，如果不确定会不会被捕和判刑，还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标准的、在不确定情形下作选择的问题来分析。可以用这样的模型来决定，加重量刑在多

大程度上能对犯罪产生威慑作用。类似的模型还可用来分析家庭决策问题，例如什么情况下丈夫或妻子更有可能出去工作，甚至可以分析，经济因素的变化是增加还是降低夫妻结婚或离婚的可能性。这些进步使经济学家成了人们的笑柄，例如有篇文章就模仿贝克尔的手段，分析刷牙经济学。

另一个扩展了经济学疆域的应用领域是公共选择理论。这个领域起源于布坎南、塔洛克、唐斯、奥尔森 60 年代前后所作的研究，但其实它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时候，特别是选票理论和阿罗不可能定理。它把标准的经济手段应用到政府和官僚的决策中。假设选民、政治家和官僚都是理性人，都想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政府没有能力彻底监控三者的行为，也不可能设计出涵盖了所有可能性的契约，因此增大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这些思想不只是给现有的微观经济理论课程添上了一个标题。“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一种可以识别的应用领域发展起来的，70 年代有了自己的学会和杂志。它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了。原因有几点。布坎南和塔洛克是最有影响的公共选择理论家，他们在政治上是右派人士，这个身份可以帮助他们更容易地获得资金支持。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偏好用文字表述论点，不爱用数学模型。这么一来，他们和经济学主体分离了，这至少在部分意义上说明，他们为什么发现自己很难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只要召开定期的会议，开办学位课程和专业杂志，公共选择理论就有可能发展，但用别的办法就不行了。

这种扩张主义使人们难于界定经济学的疆界。理性选择社会学和贝克尔的研究很相似，它应不应该划到经济学里去？公共选

择理论该不该当成政治学看待？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吸引人。学术门类的界限本来就是人为划分的。但现代经济学边界线的流动性反映了它学科史上的类似变化。在本书所涵盖的多数时期，经济学不是作为一种轮廓明晰的学科存在的。前几章叙述的是人们在法律、哲学、神学等方面著作中谈到的思想，这些思想直到现在才被说成“经济”思想。即使是19世纪初，这个学科作为鲜明的思想载体在英国出现以后，它的边界线还是流动不定。那时候，“毗邻”学科（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的身份也模糊不清，它也就只好如此。

整个20世纪，随着经济学内部相继出现新的学科、新的领域，差异化的过程在延续。管理科学的发展给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界限问题。例如，人事管理一度被视为经济学的一分子，现在明确归到了管理学。经济史又是一例。人们把它放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界线上，举棋不定，影响它的安放问题的既有制度因素，也有智力发展的因素。而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经济学总是迎头撞上政治学和社会学。（赫希曼说他的职业生涯是“跨越国境线”和“侵入他人领地”的生涯。）自从配第、格朗特以后，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挂上了钩，虽然它现在还在蓬勃发展，但几乎被逐出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社会学等新的发展还在继续挑战着规定疆界划分的传统假设。

很多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一直喜欢评论经济学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说经济学是“最硬”的社会科学，因为它运用了严格的数学理论，可以媲美物理学所用的理论工具。他们又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所以外界总是认为经济学傲慢自

大，搞扩张主义。

非正统经济学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见证了经济思想主流的大规模单一化进程。当 19 世纪末，经济学逐渐职业化的时候，学科内部依然存在千差万别。它涵盖了历史经济学（以德国为甚）、对边际主义的各种诠释、凡勃伦的进化经济学、康芒斯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其中，边际主义既有瓦尔拉斯和费雪运用数学方法的分支，也有克拉克和奥地利学派截然不同的，较少使用数学方法的分支。历史学家回首过去，可以说这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学”，但很难说如此纷杂的方法都建立在一个单一基础之上。比方说，费雪、康芒斯和凡勃伦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

然而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形势变了。30 年代期间，经济学取得了一些进步，特别是塑造个人行为模型的新方法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此基础上，研究方法的范围开始明显缩小。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经济学要么被消化吸收，成了标准经济学的应用分支，要么被排挤到别的领域去了，而制度主义慢慢失去了学科骨干力量的地位。但仍然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大家都承认，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主流范式，不可能解释一切，于是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当成轮廓鲜明的分支，各有各的应用范围。就连集中分析结构—行为—绩效的工业经济学，也作为一个部分是自发产生的，由经验推动的学科，得到了发展。

但是自从7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萎缩，情况又变了。随着一个个领域逐渐开始以严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学科出现了狭窄化倾向。学科的数学水平又迈进了一步。从事经济学职业的人中，1950年以后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占了多数，他们认为经济学理当需要数学，这些人改变了经济学学科形成的进程。就连不赞同学科所作假设（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里的假设）的那些经济学家中，也多半承认，更加严格的理论化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少数反对者依然故我，更加激进。

有些反对团体由来已久。从政治方面得到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美国的制度主义从未完全泯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年～）在《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年）中，对消费主义以及大公司对美国社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批评。他的思想可以放到制度主义传统之下。然而，虽然他身兼美国经济协会主席，他的书也十分畅销，但他的思想从未被学界多数人士认真采纳。（1950年，就在德国发生世人所称的“经济奇迹”的前夜，他对美国经济协会的人说，取消物价管制的措施会毁掉德国经济。）可是到了70年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围绕一个核心发生了合并，带动了新的“非正统”类别的兴起，这些群体的经济学家感到，他们的思想遭到了学界主流杂志的集体排斥。1973年，阿尔弗雷德·艾克纳（Alfred Eichner，1937～1988年）和简·克里格（Jan Kregel，1944年～）论证了用“后凯恩斯主义”代替正统经济学。它是把艾克纳的寡头定价理论和经过琼·罗宾逊详细诠释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结合起来。罗宾逊从来没有接受《通论》

对 IS－LM 模型的解释，而且在她以后的职业生涯当中，她批驳自己早先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时，在不完全竞争理论上，对时间和不确定性的考虑不够。艾克纳和克里格借用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术语，认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这门学科提供了一个新范式：一个崭新的用以思考经济问题的概念性框架。

这个时期出现了另一场抗议活动，它是 1968 年美国经济协会召开会议以后成立的“激进的经济学”。这个派别是因为对美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幻想破灭，以及反对越南战争而组织起来的。它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共性颇多，它强调美国社会在制造剥削、歧视和不平等，对军事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提出了批评。但它并不承认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同时它寻求用新的方法分析这些问题。它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样，作为一个可以识别的团体（激进政治经济联盟）在学科内部确立了地位。

就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奥地利”学派开始合并成有组织的、非正统的经济学学派。1974 年召开的一次会议聚集了一大群经济学家，他们在卡尔·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特别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里面找到了灵感，从而联合了起来。上述三人一度脱离了战后的发展进程，遭到排斥。和激进派以及后凯恩斯主义者相比，奥地利学派在政治上是保守派，在募集私人基金方面成绩斐然。他们强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认为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个人行为理论基础上的学说），认为个人是讲究节约的（针对价格和机会作出选择）。但他们和门格尔一样，拒绝用数学建立模型，喜欢采用文字逻辑。他们采纳了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发现的过程，认为市场是在变化中

的、不确定的世界上传播信息的一种手段。这个观点一度遭到正统经济学的排斥。

人们为什么开始组织非正统团体？原因之一是，人们感到主流经济学存在向同质化演变的趋势。学界的经济学家不断面临发表作品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抱有非正统观点的经济学家深感威胁，这时组织对于他们的生存就显得重要了。他们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也正是这个职业充分发展壮大的结果，正是这样，它才能包容持有异议的团体。持不同意见的人没有散播在各个大学，他们依赖一些特殊机构求生存。芝加哥大学有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1911～1991 年）、贝克尔和卢卡斯，是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的中心，耶鲁大学、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心是在弗吉尼亚大学，奥地利学派在纽约大学和奥伯恩大学。美国大学制度的多样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概念和新手段

就在非正统经济学试图摆脱地位愈加牢固的正统观念的束缚，试图自成一体的时候，正统的观念也开始了变化。经济学家开发了新概念和新手段，这样，他们就可以解决以前被排斥在正规经济分析范围之外的问题了。很多进步的发生距今时间太短，很难详述它们的长期影响，但无论如何，它们不容忽视。它们反映了经济学的边界线在朝着很多方向扩张。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说明了，现在被视为主流或正统经济学的一分子的经济思想，是

如何摒弃了以前被当成正统理论的核心因素的那些成分的。例如，人们一度本来要说，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信息是完全的。然而从60年代开始，就连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特别是斯蒂格勒，都开始把研究的假设定为“人们只了解环境中不完全或有限的信息”。这些进步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不承认“非正统”经济学家把这门学科描绘成“被正统思想堆砌成的铜墙铁壁”。

第一个进步就是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一系列进步。交易费用是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时发生的费用。交易费用的出现有很多原因：

> 签约各方必须找到对方，必须进行沟通，交流信息。必须描述、检验货品，给货品称重、测量。必须起草合同，咨询律师，转移所有权，保存记录。有时候，还有必要采取法律行动强制执行合同，如果违约，还会提起诉讼。

马沙克1950年第一次使用了“交易费用”这个词，但是这种思想由来已久。经济学家经常提到“摩擦”，并将货币比喻为降低这些摩擦的润滑剂。20世纪20年代，康芒斯对交易费用下了极广的定义，它涵盖的范围远远大于物品、服务的交换范畴。他认为，交易费用应该形成经济学家注意的焦点。1937年，科斯论证了交易费用可以解释企业的存在性和规模。科斯指出，可以用两种方法组织活动。一种通过市场，另一种通过企业内部的管理。两种方法都产生交易费用，但费用大小是不同的。他还论证了企业的疆界，也就是通过管理和通过市场组织的活动之间的分界线，应该能使交易费用最小化。换言之，交易费用揭示了企业

存在的原因（即为什么有些交易是在市场之外进行的），也揭示了不按一个巨型企业的形式（中央计划经济）组织整个经济的原因。直到1970年左右，经济学家才开始注意到科斯思想的重要意义。奥立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1932年～）等人开始探索各种途径，使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变得可操作。他们用它来解释某些行业实行纵向一体化（同一些企业控制了原材料供应、生产和销售），而另一些行业没有纵向一体化的原因。

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代替了传统的企业理论。传统的观点认为企业是把投入品变成产出品的技术单位。技术决定着企业的规模——钢铁厂之所以大，因为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小企业的少，而蔬菜水果店可以小，是因为小商店可以和大商店一样有效率。相反，正如威廉森所说，科斯把企业看成一个组织或一个治理结构。这一点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直到科斯引入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才找到分析这个问题的方法。许多经济学家曾经研究工业组织问题，马歇尔的《工业与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但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描述性质的。经济学家没有找到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为什么像那样组织各行各业。“工业组织”是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教师授课的课程之一，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垄断、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这样的问题上。他们是把工业组织当成已知数看待的。

有了科斯、威廉森等人的重新诠释，企业理论渐渐成了讲述不同类型的契约的效率的理论。这是一个范围广得多的问题的一部分——法律的经济分析通常被称为“法与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了其现代形式的发展历程。1960年科斯发表了一篇

论述社会成本的文章，认为要想有效地解决任何外部性问题，最要紧的是确定财产权（是个法律问题）。他分析了英美两国的法庭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并宣称，法官在解释“合理”、“通用或常用”这一类说法的时候，往往反映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考虑。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1914 年～ ）和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 年～ ）也分析过财产权。吉多·卡拉布雷希（Guido Calabresi，1932 年～ ）对侵权行为的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了财产权。这项研究在保留其独特性的同时，同当时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相得益彰。

交易费用这个概念虽然带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它仍旧是理论创新，是思索经济现象的新思路。和它相反，实验经济学讲的是如何开发新的实证研究程序，从而检验经济理论。它和交易费用的概念一样，由来已久。心理学家总是用实验确立和检验关于行为的理论，经济学家也遵循这个路子。现代实验经济学文献可以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算起，早期的著作提出了问题的几种类型。其中最早的是用实验确定消费者偏好。1931 年，瑟斯通（J. J. Thurstone，1887～1955 年）要求实验对象从不同物品堆里面反复挑选，从而决定消费者偏好。他的做法遭到激烈批评，说实验对象没有作出真实的选择。但 50 年代初，其他经济学家继续走这条研究之路。第二类是用实验证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1948 年，张伯伦做了一个实验，证明一群实验对象会不会正好以竞争性均衡价格成交，使供求相等。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 1944 年出版了博弈论著作以后，人们对两种类型的实验兴趣大增。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虽然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但整体上，人们开始关注如何进行实验的问题。因此实验经济学维持在小规模。70 年代，这门学科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连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也提供了支持，从此它增长迅速。80 年代末，人们开始普遍认可这是研究经济学的一种途径，而 90 年代末，实验经济学终于入了主流，教科书的入门读物对它有所介绍。它不再局限于专家从事的活动。

实验经济学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它提供了检验经济理论的途径，而在从前，人们以为这是做不到的。但是实验经济学主张，经济学家所作的一些基本假设，例如效用最大化等等，可能是错误的。这对于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个不幸的消息。实验证据证明，人们的做事目的并不是要实现效用最大化。有些经济学家发展了决策理论，以便把实验结果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设调和起来。还有些人干脆置这些实验结果不顾，并时不时地对人为条件下的实验能不能反映真实状况表示怀疑。

实验经济学还提供了制度设计的另一种思路。例如，人们对拍卖做过大量研究。有人主张，油田竞标中的中标人总是获得低回报，试验可以证实这是“对胜者的诅咒”现象。现象背后隐藏的思想是，当企业对石油开采权或其他价值未知的财产进行竞标时，中标人一般是高估了财产价值的那些企业。正因为如此，竞标人才会在竞标过程中步步为营。这就是把标的合同授予竞标价格第二高的人的根本原因：此人知道，必须另有一个竞标人愿意出更高价，竞标才会成功，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出个高价就安全些。拍卖程序设计一直是实验经济学得以发挥功效，检验经济理论思想的一个领域。

实验经济学需要组织和资源。现在一般认为，如果要实验对象像在真实生活中那样处事，就得发生真实的货币交换。因此这个领域在八、九十年代的确立就要用“经济学的社会学”来解释了。不过总体来说，如果当初经济学家不那么怀疑这一类研究的话，它就没有理由不出现得早得多。

相反，要不是眼下的技术进步，就不可能出现现代经济计量手段。经济学家能够拥有既便宜又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对于他们革新统计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若没有现代计算机，过去 20 年里层出不穷的估算手段和统计检验方法就不可能为人所知。

人类还利用计算机，得到了 10 年前还不敢想象的数据。例如金融市场的贸易实现了计算机化，使人们有可能监控股票价格和个人交易，并且精确到每秒钟，从而得到研究市场详细操作过程的足够信息的数据组。人类利用新的经济计量手段，获得了大型数据组，从而使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发生了变迁。同样，有了计算机，劳动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从此能研究上千个个体样本。经济学家利用这样的大型数据组，就能在控制个人特征差异（性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就业经历等）的影响的同时，计算失业补贴的变化对就业率的影响了。

20 世纪的经济学

1912 年，熊彼特用下列文字概括了当代经济学取得的进步：

我们越是触摸现代，越是难于抓住丰富多彩的潮流和反潮流的特征，学科的系统性排列和归类就越是呈现出不真实

的、牵强的、使人误入歧途的外表……学科内容的增加和分析方法的进步，使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在一天天加深，使很多优秀工人变成了除了本专业以外的其他所有部门的门外汉。但是我们必得补充说，和这个潮流并驾齐驱的还有最近才确定的一个趋势，它力图打破各个专业部门之间的壁垒。

这些文字虽是一个世纪以前写的，但它概括了本书最后五章或六章的很多主题。经济学范围是越来越大了，特别是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学家的人数在增长，学科覆盖的领域及其知识量也在增加。本书拣出了一些非常宽泛的主题，从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的兴起，到经济学家作为政府顾问的角色延伸，都按顺序讲到了。虽然探讨了大量时而使人迷惑的经济思想，但有更多被遗漏了。熊彼特说，我们越是触摸现代，越是不大可能抓住这个学科的主要特征，他的判断至今依然合情合理。

当我们回顾熊彼特对学科结构的看法时，这个图景越发复杂了。他写作的时代里，学术派别正处在建设的最高峰，这些学派以某个机构为基础，往往以某个人为领军人物（施穆勒、马歇尔都是绝佳例子）。他认为，这样的归类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 用来称呼某些杰出团体的口号远远不够得到现实条件的认可。再者，这些口号从部分意义上染上了非科学的因素……出现这些口号时，人们总是声称它们普遍有效，其实在社会科学的每个部门，条件都有不同，往往就连同一部门也有不同问题。

换言之，这些历史手段和理论手段的口号都过于简单化了。

各种手段必须并用才行，这么做的结果是，不同专业部门之间的壁垒正在被打破。

正如熊彼特所知，学术派别正在消失，但学科思想的分类仍在继续。两次大战间隙，美国经济学界展现了各式各样的研究方法，却过于简单地贴上了两个标签：一个是“制度主义”，主要有康芒斯、米契尔、凡勃伦；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克拉克和费雪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而在英国，分为剑桥学派和伦敦经济学院派，前者的继承人是庇古和凯恩斯，后者有罗宾斯和哈耶克代替了韦伯的历史方法。

战后，各学派仍在继续，但其特征再次发生了变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形成的新古典主义综合体发展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正统理论。而非正统学派有意识地形成了它的对抗力量，只是为数甚少，且处在学科的边缘。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主流内部诞生了新的研究方法，它们和流行的观点有颇多相似之处，但走的是另一条有争议的探索之路，因而很难贴上“正统”或“非正统”的标签。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都在其列，它们是坚定的“新古典主义者”，而且正在挑战舆论；此外还有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等等。

19 世纪晚期，各学派是和等级森严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缺乏国际交流，出版的机会也少。一个世纪以后，交流变得轻而易举，经济研究的机构和渠道在蓬勃发展，给各学派创造了好机会。当今的学派或许是以某些人的著作为主导，但那往往是因为众人受了这些人的思想的刺激，而纷纷效尤。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各学派的思想传播得更广，流动性更大，它们构成了思想

相近的一群经济学家的网络，这些人不必都在什么机构任职，只需自行选择在某些地方发表作品，加入某些学会即可。随着各种思想的潮起潮落，各学派的边界线和重要性都在变。

对应用经济学领域也可以下这样的评语。一方面，如熊彼特所察，学科的增长提高了各应用领域之间的壁垒。例如一个经济学家很难精通一个以上领域的最新进展。而专业杂志和专业会议的出现，更使得各领域“隔行如隔山”。另一方面，一些力量正在努力降低行业壁垒。经济理论出现了共同的核心，已经在联合各领域。精通某一组分析手段的专家有可能在多个领域应用它们。就是说，研究不完全竞争模型的理论家可以撰写文章，论述工业组织、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而对于上一代经济学家，宏观和微观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门类，它们之间的壁垒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降低很多。

熊彼特曾希望各团体能消除其口号背后的“非科学因素”，希望经济学家不再对他们的思想扩大其辞。现在看来，恐怕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一般均衡理论和后来的博弈论都曾坚持希望提供一个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可以澄清和解决纷争。然而，有的纷争解决了，新的纷争又出现了，而原来的纷争卷土重来。经济计量学曾取得惊人的进步，但它解决理论纷争的能力恐怕仍然受到极大质疑。熊彼特希望发展科学的经济手段，使经济学脱离纷争，看来这依旧是个幻想。不但如此，学术制度的竞争性日益增强，使很多人过分吹嘘其思想的原创性。要想在美国的大学任职，一般必须发表好几篇文章，而很少有哪个经济学家能指望不到 30 岁就有这么多纯粹原创的思想。一旦通过了这个障碍，又

得靠定期发表的作品来决定晋升和薪水，更何况低调谦逊是换不来好名声的，只好提出很多主张。一个有争议的学派的创始人，只要他的作品频频获奖，他就得到了报偿，而高级别的嘉奖是衡量威望时要考虑的因素。结束一种纷争，反倒不会带来很多嘉奖。除此以外，政治和意识形态还和从前一样，喜欢侵蚀经济学各领域。

后记：经济学家及其历史

经济学的历史上，几度出现强烈的一体化倾向。熊彼特指称，这样的“经典格局”有过两次。一次出现在1890年以后，以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另一次是从杰文斯、瓦尔拉斯、卡尔·门格尔解决了和历史学派的纷争以后开始革新算起：“这些一流的著作展现了大幅扩张的共同基础，给人静止的感觉，从表面上看，这两次一体化都给人留下了大局已定的印象——仿佛希腊神殿向万里无云的天空射出万丈光芒。”在这样的格局下，经济学家很自然地采取了“一切统一在马歇尔思想中”之类的态度。

1960年前后，即“新古典综合体”时代，是否也构成了这样一个经典格局，尚有待商榷。凯恩斯曾提供了一个可供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框架，而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也都曾向世人展示，如何围绕一般均衡理论构筑微观经济学。帕廷金[①]曾把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起，考尔斯委员会也曾验证，数量增长迅猛的统计数据是可以检验理论模型的。

在一体化的时期，很容易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麦卡洛克和

---

① 帕廷金，Don Patinkin，1922年～，以色列经济学家。曾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以色列经济学会会长等职，是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美国科学发展学会外籍荣誉会员。主要研究货币理论，著有《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年）、《以色列经济：第一个10年》（1959年）、《货币经济学研究》（1972年）、《凯恩斯货币思想发展的研究》（1976年）等。

很多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一样，都能接受亚当·斯密确立了学科基本框架的观点，认为余下的事情就是充实和丰富斯密的框架。熊彼特的态度差不多，他确信存在一个一般均衡体系，而瓦尔拉斯发现了这个体系。于是，他作出了如下评论：

> 说到纯理论，在我看来，瓦尔拉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是经济学家唯一堪比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的著作。和它相比，那个时期以及以后的大部分理论著作……像巨轮旁边停靠的小船，像抓住某一瓦尔拉斯式的真理时付出的一点心血。

在熊彼特看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了一体性框架，有了这个框架，人们就可以理解经济学的所有内涵了。经济理论的历史也是努力认识真理的历史，这些真理，瓦尔拉斯第一个看清楚。新古典综合体的经济学家受到了瓦尔拉斯的有力影响，在他们看来，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年～ ）的《经济理论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年）写的是经典历史。这本书完全从当代经济学的视角，赞颂前人的思想。它采用现代的理论工具，重新表述了历史上各个经济学家的思想。

在这些一体化趋势里，人们可以说："一切统一在萨缪尔森（或凯恩斯，或希克斯、阿罗、帕廷金）的思想里。"可惜这些趋势并不持久。接下来总是各学派思想层出不穷。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有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有传统的货币主义，也有真实经济周期学派，不一而足。此外，经济计量学家用的是归纳法，应用经济学家则既摒弃抽象理论，又拒绝技术性的经济计量学。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有博弈论者、一般均衡论者、交易费用论

者。实验经济学家既怀疑理性选择理论、帕累托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又怀疑各种非帕累托式的福利研究方法。“新”的领域，包括新的增长理论、新的经济地缘学、新的贸易理论，无不在蓬勃发展。它们强调的是思想的原创性，至少要有一部分是原创的。

在这样纷繁的世界里，越来越难用现在的眼光赞美过去。有太多现代理论可供选择，每一种都和过去的视角不同。在这甚嚣尘上的各种主张的包围下，历史成了了解这门学科何去何从的唯一途径，历史的分量陡然重了。经济学家创造的历史是不完全的，往往带有偏见，为他们及同行的行为作出辩护和解释。越来越需要从这门学科内部产生职业历史学家，对它的历史进行扩充和修正。

在经典格局下，当经济理论正在朝着一个广为认可的框架实行一体化的时候，人们普遍把经济学当做一种进步的历史来写。故事可以这样讲：从古代初萌时期、中世纪或现代早期社会的核心经济思想的历史讲起，一直讲到现在的特殊时期。例如，竞争性市场的供求关系史可以从古代社会讲起，历经经院派、现代早期学者，讲到亚当·斯密。斯密之后的故事开始更加精细，数学上更严格，最后在阿罗和德布鲁的著作中结束全文。虽然故事展现的发展之路上有无数迂回曲折，但总归是进步之路。经济理论日渐精练，日趋严格，更加明确地专注于一些特殊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得到的数据和统计手段也在这个过程中日臻完善。

然而这样的历史揭示了一些事实，也掩盖了一些事实。数学上更加严格精确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些根本的变化，不仅是核心概念的意义变了，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理解也变了。对于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人来说，竞争是个过程：人类的相互竞争好比

赛马。斯密谈到的“天赋自由”或“自由竞争”这个制度，是人人都能把资本投入和他人的竞争的一种制度。可是，随着竞争概念的公式化和数学化，这样的概念渐渐地失去了意义。在库尔诺的领导下，经济学界朝着“完全”竞争理论的方向迈进。完全竞争是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买卖双方为数甚多，没有谁能操纵价格，也没有哪个生产者能赚得比正常利润多。竞争不再是一个过程，它渐渐成了一个终结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任何企业都不再有动力参与竞争性活动。迟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仍然意识到这个特性。张伯伦曾写道：

> 谁都没有听说把“竞争”和巨大的市场（比如商品市场）联系在一起，“削价”、“亏本销售”、“不公平竞争”、“迎接竞争”、“保障市场”这之类的词汇，人们闻所未闻。这些词汇唯有在“商业”社会才有意义。难怪一旦把（完全竞争）市场的原则用到商业社会，就显得如此不真实。

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先那个动态概念彻底失去意义了。经济学界不理解哈耶克，因为没有意识到，哈耶克是在运用原先那个表示过程的竞争概念。

这个例子对进步这个概念本身会不会产生歧义提出了疑问。“迂回”是由什么构成的，取决于人类花了什么代价才回到前进的道路上，取决于怎样判断进步和倒退。思想流派风起云涌的年代里，经济学家很容易理解这些问题。各个学派形成各自的历史，挑出那些指引道路的思想来，形成他们自己的思想，同时也明白，别的学派也在讲述各自的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历史故事综合起来，进行修正和放大，并告诉世人，这些故事如何嵌入一个范围

更广的故事情节当中。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既不会是保守的（为现代经济学的成就而喝彩），也不会是革命性的（为了推翻当代正统思想而揭它们的伤疤）。它是为经济学家提供一种洞察力，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要如何放到更博大的历史情节当中。